

REMEMBRANCE

記憶

Vol.1 No.1

2019年 第1卷 第1期

美国华忆出版社 奥斯汀·得克萨斯州·美国

Remembering Publishing, LLC Austin, Texas, USA

记忆

2019年 第1卷 第1期
夏季刊

REMEMBERANCE

Vol.1 No.1 2019
Summer Quarterly

主 编: 方惜辰

Editor: Fang Xichen

副主编: 王立嘉 乔晞华

Associate Editor: Lijia Wang, Joshua Zhang

编 委

董国强 (复旦大学)

Guoqiang Dong (Fudan University, China)

金光耀 (复旦大学)

Guangyao Jin (Fudan University)

李 洁 (美国哈佛大学)

Jie Li (Harvard University, USA)

潘鸣啸 (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

Michel Bonnin (EHESS, France)

孙沛东 (复旦大学)

Peidong Sun (Fudan University)

唐少杰 (清华大学)

Shaojie Tang (Tsinghua University)

魏昂德 (美国斯坦福大学)

Andrew Walder (Stanford University, USA)

吴一庆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Yiqing Wu (Toronto University, Canada)

萧小红 (法国国家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Xiaohong Xiao-Planes (INALCO, France)

叶维丽 (美国麻省大学波士顿分校)

Weili Ye (U. of Massachusetts Boston, USA)

印红标 (北京大学)

Hongbiao Yin (Peking University)



美国华忆出版社

Remembering Publishing, LLC
9600 S IH-35 STE C600
Austin, TX 78748, USA
Tel: 512-699-2700
Email: RememPub@gmail.com

ISSN 2687-9964 (Print-印刷版)

ISSN 2687-9972 (Ebook-电子版)

出版日期: 2019 年 8 月

【发刊词】

本刊的前身是 2008 年在中国大陆创办的同名刊物。不同的是，前《记忆》是半月刊，只有电子版；现《记忆》是季刊，既有电子版也有实体版。前《记忆》实行会员制，主要面对国内；现《记忆》实行订阅制，主要面对国外。前《记忆》的重点在文革历史，现《记忆》的重点在中国近百年的思想文化。

创办这本季刊的目的，一是改善“记忆”的生存条件；二是为编者和作者提供一个更广阔更开放的平台；三是开辟国内外学术交流的通道，把国内学者的成果带给国际，将国外的成果译介给国内。

为适应新环境，本刊对前《记忆》的栏目进行了调整，在原有的专稿、评论、读书、序跋的基础上，增加了研究、综述、译文、学者自述等栏目。研究专为华文作者刊发学术文章而设，综述意为西方的中国学学者提供研究上的方便，译文是译介西方学者研究成果的窗口，学者自述是学人谈论治学经历、研究方法、师从同道，以及人生感悟的园地。除此之外，本刊将加强读者来信/编读往来的作用，刊发人们对学术研究、学界动向、学界风气的看法和感想。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它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年，××卷，××期”的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法律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违反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本刊是在美国出版的学术刊物，须遵循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界通行的写作规范。投稿者请仔细阅读本刊末的《投稿须知》，按照要求撰写论文。本刊对不符合规范的来稿有修改和退稿之权。

《记忆》季刊

2019年第1卷第1期

【发刊词】 |

【专稿】

大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	
——兼论“猫论哲学”与“戏子文化”（上） 单少杰	1
关于“四大”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探微 赵园	9
文化大革命的三次发动	
印红标	29

【研究】

“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构想的提出与终结	
——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分歧辨析之一 郭予庆	38
文革前的阎红彦	
——云南文革人物述评 周孜仁	55
风中的呐喊	
——一位公社干部的内心世界（1958—1970） 姜成洋	68

【评论】

被忽略的历史	
——重视对文革保守派的研究 李逊	86
对“三角游戏”与“最后胜利者”的讨论	
——与杨继绳先生商榷 何蜀	95
文革中的造反派是什么人？	
——以《奉献》为例证剖析 徐友渔	104

【往事】

“猴子被吓住，鸡却没有死”	
——我的母亲刘衡 刘新华	112

独酌翁杂忆	
——情爱篇 梁沪生	116
追忆三线“五七”厂	
马昌海	121
北师大二附中的红卫兵暴力	
——1966年“八二五”惨案概述 季 烨	133
【序跋】	137
信史，在民间不在府衙	
——《师劫：北京师范大学文革亲历者文集》序 启 之	137
借鉴前覆 展望未来	
——《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第二集）》序 乔晞华	139
【综述】	
文革时期省级领导干部沉浮录	
——地方干部、军队干部、群众干部的情况综述 石名岗	141
【投稿与征订】	
投稿须知	163
征订启事	166

【专稿】

大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

——兼论“猫论哲学”与“戏子文化”（上）

单少杰

内容提要：本文分上中下三篇，从毛泽东生前和身后两个方面讲述毛对中国文化的巨大破坏和深远影响。上篇主要着眼文化大革命的现象层面，特别是其中的红卫兵现象，以揭示他们如何大革文化命：一是羞辱中国文化人物，二是损毁中国历史文物，三是挖掘中华民族先贤陵墓，四是挖掘中国抗日先烈陵墓。本篇还采用比较方法：一是比较红卫兵虐行与鬼子兵虐行，以揭示前者堪比甚至超过后者；二是比较抗日国军与抗日共军，以揭示前者才是抗日中坚力量。

关键词：毛泽东、文化、文革、红卫兵

1. 引言：国难与国耻

2001年9月，正值毛泽东去世25周年，亦即文化大革命闭幕25周年且开幕35周年，笔者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电话采访时谈道，毛泽东给中国造成的最为严重的负面影响，既不在政治方面，也不在经济方面，而是在文化方面。笔者还进一步谈到，毛泽东在文化方面给中国造成的最为严重的负面影响，主要是严重地颠覆了传统中国人所持有的那种较为中庸的价值观，那种能够在“工具尺度”与“价值尺度”（类似于法家所崇尚的“功利尺度”与儒家所崇尚的“道义尺度”）之间保持某种平衡（或某种张力）的价值观，并代之以一种只讲成败而不问其他的价值观，一种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极端实用主义的价值观（林格2001）。

如今，文化大革命已开幕50余周年且闭幕40余周年，笔者在撰写此文时仍坚持认为，毛泽东给中国造成的最为严重的负面影响，还是在文化方面，特别是他蓄意发动并执意坚持的文化大革命，深深地危及了已延续两千年的中国文化命脉。至于毛泽东在文化方面究竟给中国造成什么样的最为

严重的负面影响，主要显现于两个方面：

其一，已经显现于毛泽东生前的中国，主要显现于当时毛所推行的那些严重摧残文化的施政举措。这些施政举措用毛自己的话说，已超过秦始皇“焚书坑儒”一百倍（毛泽东1958：227），以至于一度把整个中国文化领域都变成了一片废墟，一片被红卫兵打、砸、抢、抄、烧过的废墟。

其二，正在显现于毛泽东身后的中国，主要显现于当今中国所流行的一些社会风尚。这些社会风尚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过于功利且过于权谋（即只讲求“术”而不讲求“道”），以致常常不择手段，从而彰显一种很是庸俗的实用主义哲学，姑且称作一种“猫论哲学”；另一类则是过于做作且过于张扬，以致非常缺乏教养，从而彰显一种很是低劣的世俗主义文化，姑且称作一种“戏子文化”。

在文革时期的官方用语中，常将“史无前例”一词置于文化大革命一词之前，几成固定词组。事实亦是如此，这一固定词组所指称的这一历史事件，的确是中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一场文化大革命，一场竟要“大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故也

是中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一场文化大劫难，一场已经严重危及中国文化命脉的文化大劫难。

尤为可悲的是，这场文化大劫难并非由某个外族强加于中华民族的，而是由我们自己折腾于我们自己的，故是极其耻辱的。正如李慎之先生所说的，“历来的所谓‘国耻’其实不过是各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国难’，‘文化大革命’才是真正的‘国耻’”

（李慎之 2004：518）。

笔者深以为是，如“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不过是“国难”，因中国国力不如列强，是前现代国家不敌现代国家，故中国国家有难；而文化大革命才真是“国耻”，因中国自己作践自己，既作践自己的政治，也作践自己的经济，还作践自己的文化，以致一度把自己作践成一副很破败且很下作的样子，故中国国家有耻，其耻甚大！

今天，我们撰文纪念文革，就是要记住“国耻”，就是要“知耻”而不至于“无耻”；并因“知耻而后勇”（孔子语），既要知耻而后勇于改革我们的经济，也要知耻而后勇于改革我们的政治，更要知耻而后勇于改良我们的文化，改良我们的曾被“大革过其命”故而有着诸多不端遗风的文化。

2. 虐行：堪比鬼子兵的红卫兵

在许多中国人所存的历史记忆中，那些曾肆意侵略中国的日本人，也就是那些被他们所蔑称的“鬼子兵”，曾干过许多非常野蛮的坏事，例如，曾干过南京大屠杀、三光扫荡战、奴役慰安妇以及731部队用活人做试验等一系列非常野蛮的坏事，一系列可说是天底下最为野蛮的坏事。

数十年后，在许多中国人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中，那些曾誓言保卫毛主席的红卫兵，也曾干过许多非常野蛮的坏事。在某些方面，红卫兵所干坏事的野蛮程度堪比鬼子兵，甚至超过鬼子兵所干坏事的野蛮程度。例如，在如何对待中国文化人物、中国历史文物、中华民族先贤陵墓以及中国抗日先烈陵墓等一系列方面，红卫兵所干坏事的野蛮程度都超过了鬼子兵所干坏事的野蛮程度。

2.1 羞辱中国文化人物

作为两千年来最为重要的中国文化人物，孔夫子在二十世纪曲阜故地先后遭遇了两拨正气焰高涨的造访者，先是遭遇了一拨正暴虐中国的鬼子兵，后又遭遇了一拨正肆虐神州的红卫兵（张顺清 2015）。

在遭遇来自异族的前者时，孔夫子竟受到了一定的礼遇，至少不曾被过分地惊扰。无论是安放其牌位的孔庙，还是安置其家人的孔府以及安葬其遗骸的孔林，都平安地度过了那个很不平安的年代，那个正值鬼子兵大肆侵华的年代。

在遭遇同为本族的后者时，孔夫子不只是受到了惊扰，非同寻常的惊扰，竟被接连砸了孔庙、孔府、孔林；还受到了羞辱，非同寻常的羞辱，竟被拉出头部塑像，上戴写有“头号大坏蛋孔老二”字样的高帽，进行极具嘲弄性的游街。最为不堪的是，他老人家还被掘开了已封土两千余年的陵寝（按：笔者曾在七十年代于曲阜孔林看见过那座被红卫兵掘开的孔子墓穴，依稀记得一个约有一、二十米直径的大土坑），遭受了类似于鞭尸的凌辱，也就是遭受了一个已故历史人物所能遭受的最大凌辱。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主要掘墓者不是来自别的学校的红卫兵，而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红卫兵，也就是来自现代中国最高水准的专门培养老师的学校的红卫兵；而被掘墓者也不是作为别的什么行业的历史名人，而是作为“万世师表”的历史名人，也就是作为中国自春秋以来所有老师的老师，进而也是所有国人的老师，即所谓“大成至圣先师”，并因此而被供奉在“天地君师亲”五大牌位中。

如今，前者掘开了后者的墓，也就是掘开了自家最为尊长且最为荣耀的祖师爷的墓，干出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票欺师灭祖的事。北师大红卫兵将因此而永载史册，其带头大姐谭厚兰（北京五大红卫兵领袖之一）也将因此而永载史册，即所谓“遗臭万年”。

作为二十世纪最为重要的中国文化人物之一，陈寅恪先生也先后遭遇了上述孔子所遭遇的那两拨人，先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香港沦陷区里遭

遇了鬼子兵，后又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的中山大学居所里遭遇了红卫兵（陆键东 1995：47–48、466–485；蒋天枢 1997：128–131、178–186）。

在遭遇前者时，陈先生也受到了一定的礼遇，尽管是带有苦涩味的礼遇。日本占领军当局责令其部属不仅不要惊扰这位中国大学者，还要优待他，先是送粮让他度过战时饥荒，后又送钱让他创办东方文化学院，在均遭到拒绝后也不予以强求，至少没有表现出恼怒（“寅恪力拒之，获免”）。从总体上看，侵占香港的鬼子兵没有过于为难这位中国大学者，至少没有严密监控他，使得他最后能在“半盲”的身体条件下携一家人安全逃离香港，返抵中国抗日大后方。

在遭遇后者时，陈先生则受到了巨大的羞辱，用其传记作者陆键东的话说，“这是陈寅恪在晚年第二次遭受重大的人格侮辱”，并因此“陷入了‘生不如死’的境地”：

——他们给他贴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并由居所外贴到了居所内，甚至贴到了他的床头前，“已快把陈寅恪淹没”了。

——他们还对他的居所施行抄家，并“到了不分日夜，‘造反派’随到随抄的地步”。他们抄走了他的文稿，致使“先生最后所著文一篇（按：即《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迄无下落”；还抄走了他的财物，“凡轻便物均拿去，室中荡然”，甚至为“勒索珠宝首饰”而打了陈先生夫人。

——他们还对他的听觉进行摧残，“日夜为四面八方的高音喇叭所包围，痛苦不堪”。据知情者梁宗岱夫人记述，“历史系一级教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活活给吓死了。”

——他们还对他的工资和存款进行冻结，使其“经济生活至艰困”，不得不呈上一份像是在乞讨的“申请书”：一是“恳求允许每日能得牛奶四支（每支约四元八角）以维持生命”，并为此“不胜感激之至”；二是请求每月在其夫人“活期存款折中取四十元为老工友开支”，否则人“死了也无人知道。”

——他们还逼他写出带有羞辱性的交待材料，在 1966 至 1967 年间，其夫人代笔写了七次交待材料；在 1969 年 5 月 5 日，其本人“又被迫作了‘口头交待’，直至不能讲话才罢休。讲话中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之语”。仅过了五个月后，即 1969 年 10 月 7 日，这位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学问的教授终于坐完了他的“死囚牢”，在病痛与屈辱中离开了人世，离开了他曾以其渊博学问为之大增其色的人世。

在鬼子兵面前，陈先生还敢于“力拒之”，先是“力拒”他们送来用以度荒的粮食，继又“力拒”他们送来用以办学的钱款；在红卫兵面前，陈先生就做不到“力拒之”，而是任凭他们随意处置，甚至被他们吓得尿湿了裤子。可见，在陈先生心里，红卫兵比鬼子兵更恐怖，更缺少最起码的文明素养。

2.2. 损毁中国历史文物

在这个世界上，中国无疑是历史文物存量最多的国家，但也无疑是历史文物损毁最多的国家，仅在二十世纪的中叶就曾发生过两次较大规模的损毁：一次发生在三、四十年代日本侵华期间，另一次则发生在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间。

在日本侵华期间，日军兵锋所至，一片战火，不仅危及许多中国民众的生命，还危及许多中国文物的安全。例如，在 1932 年“上海事变”中，日军先是派飞机进行轰炸，后又派浪人进行纵火，硬是将整个商务印书馆以及所属东方图书馆变成一片废墟。该馆曾藏有 46 万册图书，其中包括数万册珍贵古籍。

又如，在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先后采用地面炮击、空中轰炸和人为纵火等一系列毁灭性方式，硬是将整个南开大学变成了一片废墟。该校为中国北方名校，也藏有包括许多珍贵古籍在内的大量中国文物。

另外，日军还在其占领区，通过各种抢劫方式，或为公开抢劫方式，或为私下抢劫方式，抢走了大量中国文物，包括各种古籍、字画、石刻、木雕、金银器、甚至青铜器，等等，使得该国成为除中国

外拥有最多中国文物的国家。

在文化大革命进行期间，特别是在其中的“破四旧”期间（其高潮期在1966年8月至10月间），全中国数以百万计的红卫兵纷纷涌出校门，冲向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用打、砸、抢、抄、烧等方式，来“横扫一切”他们认为是“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东西，其中包括各处历史古迹和各种历史文物。

在1958年文物普查时，北京还保存着6843处文物古迹，“破四旧”时，竟被红卫兵砸毁了4922处文物古迹，“其中包括200多处古建筑，700多尊佛像，120多座石碑”（陈明显1994：70—71）。另外，在1949年后仍散存于民间的大量历史文物，包括各种版本的古籍和各种材质的古董，也在“破四旧”中遭到红卫兵大肆洗劫，或遭到他们彻底毁坏，或遭到他们强行查抄。“事后经各地文物工作者抢救，从各炼钢厂抢出金属文物117吨，从各造纸厂抢出古籍图书320多万吨，拣出字画53.8万件，但仅占‘破四旧’运动中遭劫的一少部分”（陈明显1994：70—71）。

比较上述两场文化浩劫，不难发现，仅就给中国文物造成有多大损失这一角度来看，那些来自异邦的鬼子兵远不及那些生长于本土的红卫兵，外来鬼之祸害远不及家中贼之祸害。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结果，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其一，鬼子兵之祸害只殃及半个中国，即东部中国，并且主要限于东部中国的部分地区，即一些城镇地区和一些沿交通干线地区。红卫兵之祸害则遍及整个中国，即除港澳台地区外的整个中国，不分东部中国与西部中国，不分城镇中国与乡村中国。也正因此，居住在港澳台三地的中国人有理由感到庆幸，庆幸此时港澳没有“回归”，庆幸此时台湾没有“解放”。

其二，除去一些较为极端的情况外，比如除去蓄意摧毁商务印书馆和南开大学这些较为极端的情况外，鬼子兵通常是要抢劫中国文物，即只是要改变中国文物的归属关系，而红卫兵则通常是要毁坏中国文物，即完全要剥夺中国文物的存在本身。

一位长期从事地方志研究的朋友告诉笔者，中国地方志特别是其中的县志，在二十世纪先后遭遇了两次浩劫：一次浩劫发生在抗日战争中，许多县志被日本人以各种方式给抢走了，现在还散存于日本各地；另一次浩劫则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县志被红卫兵以“破四旧”名义给烧掉了，已彻底不存在了。

可见，在如何对待中国文物上，鬼子兵与红卫兵有着较明显的差异：前者抢劫中国文物的行为，主要是对文物持有者的侵害，而不是对中国文物本身的侵害；后者烧毁中国文物的行为，就不仅仅是对中国文物持有者的侵害，更重要的是对中国文物本身的侵害，即以彻底毁灭的方式所实施的侵害。

从红卫兵所做出的这些极端反文化的疯狂举动中，多少可以看出中国历史上曾有过的那种“暴民政治”的某些特征来。这里所谓“暴民”，主要指旧时造反者，通常为农民起义军。他们起于社会底层，曾长期受精英文化的歧视，被后者讥为“白丁”“睁眼瞎”，并因此对后者隐有许多疏离乃至逆反的情绪。他们一旦造起反来，就很有可能要对曾慢待过他们的精英文化做出许多报复性的举动，比如做出许多滥杀秀才、焚烧典籍的举动。中国历史上那些最好的经书、最好的字画乃至最好的房子，大都不是被那些外来的异族给烧毁了，而是被那些造反的“暴民”给烧毁了（单少杰2000：336—347）。

不过，今天的红卫兵与昔日的造反者还是有所不同：后者大多是出身社会底层的农民，曾经遭受精英文化的歧视，故能做出上述那些具有报复性质的举动；而前者则大多是身为大中学校的学生（其中包括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北京四中、北京六中、北京八中以及北师大女附中等名校的学生），正在接受精英文化的教育，却能做出上述那些大肆亵渎中国文化人物和大肆焚烧中国文化典籍的举动，那些具有欺师灭祖性质的举动，那些被中国传统文化认定为最野蛮且最下作的举动。

2.3. 挖掘中华民族先贤陵墓

需要特别指出，在红卫兵所做出的许多很下作

的举动中，最下作的举动，甚至连鬼子兵也做不出来的最下作的举动，就要数他们到处去挖掘中华民族先贤陵墓这一最不堪的举动了。

红卫兵把他们所能找得到的许许多多中国历史名人的陵墓，既包括许许多多中国古代历史名人的陵墓，也包括许许多多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的陵墓，几乎都当作“四旧”给挖了个遍，硬是把“青山处处埋忠骨”变成了“青山处处掘忠骨”，墓茔洞开，棺木碎裂，遗骸四散于荒野。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被红卫兵挖掘的许许多多中国历史名人的陵墓中，竟有一些非同一般的中国历史名人的陵墓，一些特别能彰显汉文化核心价值的中国历史名人的陵墓，因此也是一些特别受汉民尊崇而只会遭汉奸亵渎的中国历史名人的陵墓。毛泽东的红卫兵无疑成了汉文化的不折不扣的掘墓者。

红卫兵不仅掘了前文已提到的所有中国老师的祖陵，即位于山东曲阜的孔子陵，竟把“欺师”的恶行做到了“登峰”之处；还砸了所有炎黄子孙的祖陵，即位于湖南鹿原的炎帝陵和位于陕西桥山的黄帝陵，竟又把“灭祖”的恶行做到了“造极”之处。毛主席的红卫兵又无疑成了除他们之外的所有中国人的不折不扣的公敌。

红卫兵还砸了诸多纪念中国文明初创者的庙宇（即作为能突出表征汉文化的实物符号）。他们砸了位于多地的纪念仓颉的庙宇，而仓颉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造字者，并因此而开启了数千年中国文字史以及堪与地中海文明史和恒河文明史比肩的中国文明史。

他们还砸了位于多地的纪念大禹的庙宇，而大禹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治水者以及为治水而需要动员大规模人力的组织者，并因此而开启了数千年中国治水史以及自夏朝以降的中国国家史。

红卫兵们还砸了诸多民族英雄的墓。他们砸了位于陕西茂陵的大汉英雄霍去病的墓（衣冠冢），而霍英雄曾纵马挥刀将横行北国数百年的强大匈奴驱逐数千里；故可以说红卫兵是在帮两千多年前匈奴的忙，帮他们报被霍英雄追杀之仇。

他们还砸了位于杭州西湖的大宋英雄岳飞的墓，而岳英雄曾转战“八千里路云和月”，将金兵打得节节败退，并发誓要“踏破贺兰山缺”，但最终被秦桧（实为宋高宗）所害而冤死风波亭；故又可以说红卫兵是在帮八百多年前金兵的忙，帮他们报被屡屡击败之仇，也就是在做类似于秦桧所做的事。

他们还砸了位于北京市崇文区的大明英雄袁崇焕的墓，而袁英雄曾在宁远城击败那位号称“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后金大汗努尔哈赤，并致使其心情郁愤，引发毒疽，于当年病逝。（按：袁崇焕墓在努尔哈赤再传子孙乾隆当朝时得到修缮，并开始接受公众祭拜）

红卫兵还掘了诸多著名清官的墓。他们掘了位于安徽省合肥市的大宋朝清官包拯家族的墓园（按：在包氏后人精心保护下，红卫兵只挖到包拯亲属的陵墓），而包拯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清官，被历代老百姓奉为神明，以致成为清廉与正义的化身，甚至被编进了许多神奇的民间传说。

他们还掘了位于海南岛海口市的大明朝清官海瑞的墓，而海瑞堪称明王朝中的一位最廉洁且最刚正的清官，却因四百年后的一桩公案即彭德怀案而“躺枪”——躺在墓里中枪。红卫兵认为这个墓中死人要为那些墓外活人负责，既要为那位想学“海瑞上书”的武人彭德怀负责，也要为那位想写“海瑞罢官”的文人吴晗负责；于是很愤怒地将海瑞遗骨从墓穴中挖出来，抬着游街示众。

他们还掘了位于山西省方山县的大清朝清官于成龙的墓（按：该墓曾于1947年被当地农会掘开，所掘文物被用来换成棉花分于村民，而所掘遗骨又被重新葬入墓中），而于成龙曾被康熙皇帝誉为天下第一廉吏，即有清一代最负盛名的清官。

红卫兵还砸了或掘了诸多著名文人的墓。他们砸了位于浙江嵊州的“中国书圣”王羲之的墓，还掘了位于河南巩县的“中国诗圣”杜甫的墓（已被挖开封土堆一角，露出墓室，遭局部性破坏），还掘了位于江西临川的中国戏剧泰斗汤显祖的墓。

他们还掘了位于山东淄博的《聊斋志异》作者

蒲松龄的墓（按：墓中人的头盖骨被抛于野外，后由其族人悄悄拣回予以掩埋），还砸了位于江苏淮安的《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故居，还砸了位于安徽全椒的《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的纪念馆。

2.4. 挖掘中国抗日先烈陵墓

自公元 1840 年鸦片战争以降，中华民族所经历的最具有正面价值的战争，莫过于中国抗日战争。因为，这场战争不仅拥有着反抗侵略的正义性质，而且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胜利，即为中国赢得了真正的独立，并获得了“世界四强”的地位和“联合国五常”的席位。除此之外，所有在这一百多年间发生在这个国家里的各种各样的战争，不是世界列强国家战胜我们老弱中国的战争，如 1840 年鸦片战争和 1894 年甲午战争；就是某一部分中国人战胜另一部分中国人的战争，如第一、二次直奉战争和第一、二、三次国内革命战争。

与此相应，自公元 1840 年鸦片战争以降，中华民族所拥有的最能为全体国民认同的先烈，莫过于中国抗日先烈。因为，这些先烈真正是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而投入战争并献出生命的，而不是为了某个政治党派或某个政治领袖的夺权需求或保权需求而投入战争并献出生命的。也正因此，这些先烈无疑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英雄，理应受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祭拜。

中国国民党及其军队与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都参与了这场战争，并且都为这场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和巨大牺牲。不过，在这两者之间，仍存在许多差别。

国民党军队由于主要经略正面战场（实为抗日主战场），要守必须要守的战略要地，如湖南长沙和湖北石牌，要护必须要护的交通干线，如滇缅公路和浙赣铁路；因而要硬碰硬地直接对抗日军由其精锐部队组成的重兵集团：比如要硬碰硬地直接对抗侵犯湖南湖北地区的日军第 11 军（通常下辖七八个野战师团，其中第六师团属于日本陆军第一等精锐师团），比如要硬碰硬地直接对抗侵犯滇北滇西地区的日军第 15 军（其中第十八师团也属于日

本陆军精锐师团，后被中国驻印军孙立人部全歼）。

在八年全民抗战期间，中日两国军队共发生二十二次大会战，其中二十一次大会战的中方主角都是由国民党军队担当的，仅有一次大会战的中方主角是由共产党军队担当的（按：这唯一一次由共产党军队担当中方主角的大会战便是“百团大战”，其中方主帅彭德怀还为此受到本党的严厉批评，并且是直到彭将军去世前都还在进行的严厉批评，因而也是让这位抗日英雄死不瞑目的严厉批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所歌唱的“血肉长城”，大都最真实且最血腥地屹立在抗日国军所坚守的那些阵地上，如屹立在淞沪会战中曾有“血磨坊”之称的抗日国军所坚守的罗店阵地上，如屹立在忻口会战中曾于“一昼夜十三次易手”的抗日国军所坚守的 204 高地上……

与此相应，在八年全民抗战期间，不仅国军歼灭日军人数要远多于共军歼灭日军人数，而且国军自身伤亡人数也远多于共军自身伤亡人数。在佩戴将军军衔的中国抗日烈士中，属国军者有二百余人，属共军者仅一人，即捐躯太行的左权将军。在我华夏大地上，葬我抗日国军先烈的坟茔要远多于葬我抗日共军先烈的坟茔。

1949 后，执政党出于美化自身历史的私利，刻意曲解中国抗战的史实，一方面竭力夸大自己的抗日功绩，把自己说成是全民族抗战的英明领导者，还美其名曰“中流砥柱”；另一方面又竭力贬低国民党的抗日贡献，指责后者奉行消极抗战的政策，诬称国军对日作战不力，不是避战，就是败战，甚至还诬称蒋介石为“峨眉山上的猴子”，在抗战艰难进行时却躲进了峨眉山，在抗战取得胜利后又急忙下山要摘桃子，要抢占别人的胜利果实。

执政党还把被他们刻意曲解过的中国抗战史，堂而皇之地写进了新中国的历史教科书，用以教育新中国的下一代。笔者就曾受到过这种历史教育。这种历史教育使得许多学生形成了非常片面且非常错误的抗战史观，只知道我抗日共军是怎么“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地进行机动灵活的游击战，而不知道我抗日国军是怎么“一寸山河一寸血”地进行

英勇悲壮的阵地战，还真的以为我抗日国军在侵华日军面前很是不堪，不是一触即溃，就是一溃千里。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这种非常错误的历史教育开始结出非常严重的恶果。抱有上述历史观的红卫兵开始大规模地掘抗日国军的墓，掘他们以为是消极抗战的抗日国军的墓。结果所有被他们找到的抗日国军的墓，其间既有著名抗日国军的墓，也有无名抗日国军的墓，不是被砸碑，就是被刨棺，无一能幸免。

国内现存规模最大的抗日国军陵墓，要数位于云南腾冲的“国殇园”，其间葬有数千名为光复这座滇西名城而牺牲的国军先烈。该墓园在文革中就遭到了红卫兵的严重破坏，其烈士纪念塔被炸毁，其烈士墓碑被“一块一块”地“全部敲毁了”，其烈士骨灰也在敲毁墓碑的过程中“暴露出来”。

在整个八年抗战期间，国共两党最高领袖都敬献悼亡诗的抗日先烈只有戴安澜将军一人。戴将军为国军“荣誉第 200 师”师长，曾率部先后取得昆仑关大捷、同古大建，重创日军第 5 师团（为日本陆军中的最精锐师团，号称“刚军”）、第 55 师团、第 56 师团（号称“龙兵团”）。1942 年，戴将军在撤兵缅甸途中，遭遇日军埋伏，身受重伤不治，后被安葬在安徽芜湖赭山。文革期间，戴将军墓园遭到破坏，戴将军长子戴覆东也迫于压力，“不得不忍痛将父亲留下的奖章、勋章敲碎后扔进河里”。

毛泽东一生只给两位将军写过悼亡诗，一位将军是共军方面的罗荣桓，另一位将军则是国军方面的戴安澜。罗将军是唯一参加过秋收起义的中共元帅，也是毛泽东最亲信的中共元帅。戴将军能与罗将军同获毛泽东祭献的悼亡诗，可见他在中共方面所受到的礼遇非同一般。即便如此，他的陵墓与后人也都不能在文革中免受羞辱。

国军第 29 军第 132 师师长赵登禹为传奇人物，曾与老虎搏斗过，荣获“打虎英雄”称号；又曾亲率敢死队夜袭日军，用大刀斩杀数百名鬼子兵，取得“喜峰口大捷”，又荣获“大刀英雄”称号。著名作曲家麦新还为这一大捷谱写一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遂成二十九军军歌，传唱全中国。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赵将军亲率国军第 29 军将士在北京南苑与日军激战，后在撤往北京城内途中遭遇日军伏击，身中数弹牺牲。日军对之很是敬佩，称其为“名誉地战死”。赵将军的遗体先是被红十字会掩埋，后又被龙泉寺僧人收敛，1946 年 7 月 28 日在北京中山公园举办公祭大会后，被正式安葬在位于北京卢沟桥东面的西道口山坡上。文革时期，红卫兵掘开了赵将军的陵墓，拖出了连日本兵都不曾凌辱的赵将军的遗体来予以凌辱。

更有甚者，红卫兵还掘了一些曾被日军礼葬的抗日国军先烈的墓，干了一些连鬼子兵都不屑于干的那种人世间最丑陋的事。

1933 年 3 月 12 日，国军第 25 师第 145 团七名士兵孤军坚守古北口帽山，在毙伤许多日军后全部战死。日军为之敬佩，将 7 名国军遗体合葬一处，并立有一木牌，上书“支那七勇士之墓”。2015 年初，笔者在拜谒此墓时，听当地老乡说，原先的七勇士墓已在文革中遭到红卫兵破坏，如今的七勇士墓是由古北口村民重新修建的。

1937 年 8 月 17 日，中国空军飞行员阎海文驾机轰炸上海虹口日军阵地，不幸其座机被击落，其本人跳伞又落入日军阵地。大批日军围上前齐声叫喊：“支那飞行士投降”。阎海文在拔枪击倒几名日军后，高呼“中国无被俘空军”，随即饮弹自尽。日军为之震撼，其白川大将坦言“这值得我们敬佩”，并对阎“厚加葬敛”，立有一碑，上书“支那空军英雄阎海文之墓”。该墓后来迁至南京航空烈士墓园，在文革期间遭到红卫兵破坏。

需要说明，礼遇敌方战死者，不只是日本人要彰显的武德，也是中国人至少是大唐人要彰显的武德。武德四年（公元 621 年），李世民率唐军在武牢（位于现今河南荥阳汜水镇）大败窦建德，斩杀窦军无数，唐军亦有伤亡。贞观年间（公元 627-649 年），李世民为追念那些殒命于此战的将士，并为昭示其仁慈与胸怀，命人将敌我双方所有阵亡者的尸骨都一起掩埋，并建起一座寺庙即等恩寺（位于现今汜水镇赵村东南处），不分敌我地来为这些阵亡者超度亡灵。

有鉴日本民族一向崇尚大唐风范，故有理由认为，从侵华日军将士礼遇中国抗日烈士之举动中，多少可以看出一些大唐遗风，同时也反衬出中国红卫兵非礼中国抗日烈士之举动有多么下作！

在中国历朝历代中，凡挖坟掘墓的事都被看作是最下作的事，凡挖坟掘墓的人都被看作是最下作的人。在陈琳所写的那篇已成古文名作的讨曹操檄文中，有一段用意最为刻薄的话，也是传之最为久远的话，就是骂曹操干了许多挖坟掘墓的事：“操帅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宝”；还骂曹操是一个在挖坟掘墓方面有过特殊作为的人：“操又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笔者按：托陈琳和曹操的福，“摸金校尉”一词，很可能就是由这篇古文名作而风风光光地进入了汉语词库，并被国人亦庄亦谐地使用了一千多年）

到了二十世纪，毛泽东的红卫兵竟把这一史上最下作的事干成“最出彩”的事，不仅干出最大业

绩，掘了最多数量的墓，而且干得最为张扬，竟成轰轰烈烈之势；与此同时，也把其自身干成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庞大的掘墓集团，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下作的掘墓集团。

史上掘墓者大都以盗取墓中文物为目的，当代红卫兵掘墓集团则主要以羞辱墓中人物为目的，并且他们所羞辱的墓中人物大都是我们民族的杰出人物。另外，当代红卫兵掘墓集团在蓄意羞辱墓中人物的同时，还严重损毁许多墓中文物，许多为所有盗墓贼都极为看重故而都极为呵护的墓中文物。因此而可以说，红卫兵掘墓集团不仅是一个最为邪恶的掘墓集团，而且是一个最为愚蠢的掘墓集团，一个连盗墓贼都看不上的最为混账的掘墓集团。

总之，就反人类文明而言，中国的红卫兵已在许多方面堪比日本的鬼子兵，甚至超过日本鬼子兵，故而让中国人民蒙受巨大耻辱，让中华文明蒙受巨大耻辱。¶

参考文献

- 陈明显等。1994。《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典》。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 蒋天枢。1997。《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 李慎之。2004。《只有一个顾准——顾准日记序的补充》。载《李慎之文集》（自印本）。
- 林格。2001。《美国之音》中文台官网（<https://www.voachinese.com>）新闻栏：毛泽东左、右本质评说（2），2001年9月10日稿。
- 陆键东。1995。《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北京：三联书店。
- 毛泽东。1958。《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8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57—1961）。
- 单少杰。2000。《毛泽东执政春秋》。香港：明镜出版社。
- 张顺清。2015。《谭厚兰曲阜“讨孔”纪实》。《炎黄春秋》2015年第2期。

【专稿】

关于“四大”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探微

赵园

内容提要：本文讨论的是“大民主”一说的缘起，“四大”（尤其大字报）在文革期间的具体实践，“四大”的制约因素（包括时限），“四大”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揭秘性质的大字报对公众历史认知的影响，以及“四大”影响于社会伦理、民风、人的心性；旁及文革初期所谓的“自发性”等。

关键词：大民主、四大、自发性、文化大革命

“四大”的“话题性”是无须说明的。“四大”亦称“大民主”。“四大”“大民主”，均属文革期间的关键词。关于“四大”“大民主”的讨论，关涉对“民主”的理解，及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想象，至今仍未失现实意义。

一、“四大”溯源

作为语词与政治实践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非始自文革；大字报延安整风时即有；与“大鸣大放”“大辩论”并置，至迟1956—1957年“整风”“反右”中已然出现（大字报、大辩论不过是“大鸣大放”的具体形式）。称得上文革中的新事物的，或许仅“四大”的名目。文革中的“四大”较之“反右”，表现形态有所不同，无论具体指向还是使用的规模。¹

《向党认罪实录——李慎之的私人卷宗》，收入了李慎之作于1997年的《“大民主”和“小民主”》一文。李慎之文（李慎之2013）引1956年11月

15日毛在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如下讲话：“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形象化，我们就借用这个话”（毛泽东1977：323），李慎之说，毛讲话中所说主张“大民主”的司局级干部，就是自己（李慎之2013：7）。毛举以示众的，是其派人征求意见时李所说，即一个党员干部向党的领袖反映的个人意见，并非公开发表的言论。对此，李“反右”中做过交待。交待中李说自己的原意，“小民主”指机关里的会议，“大民主”则指“议会辩论，报纸言论方面的论辩”；毛的反应，却认为大民主是“上大街搞运动”“因此他说大民主从来是对敌人的，我们今后不应该搞大民主，而只能搞小民主，小小民主”。²李认为毛对他的本意有误解。讽刺的是，文革中启用“大民主”之说，所赋

¹ 当时清华附中学生卜大华事后回忆道：“聂元梓的大字报发表以后，写大字报的形式被肯定了。”（卜大华2011：33）。卜的印象，“反右”之后，大字报由此正当化了。

² 参见注释1。

之义正包括了“上大街搞运动”。此一时，彼一时，或许为李慎之当年始料未及。摄于运动的压力，由“私人卷宗”看，文革期间李不曾申明自己系“大民主”这一说法的“发明人”。

1957年2月，毛有“大民主与小民主”的字样（毛泽东1998：310），或可猜测为在上述方向上的持续思考。3月1日毛《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作结束语的提纲》中有：“大民主，小民主——一般适用小民主，局部（不实行小民主地方）允许大民主。”（毛泽东1998：361）涉及“大民主”的适用范围，显然在斟酌，评估，权衡利弊。同年6月6日，毛在《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中，对大字报有积极评价，说“大字报是延安整风时期的传统，并非现在才有”，但对“机关学校出大字报的消息，报纸不应登载，以免影响中等学校及工厂”；“将来中等学校及工厂整风时是否允许出大字报，那时再考虑”（毛泽东1998：491）。态度依然谨慎。到同年10月，毛即在《做革命的促进派》一文中写道：“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毛泽东1977：467）还说到“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民主传统”的“很大的发展”；“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毛泽东1977：468）。同年同月的另一篇文章不厌重复地说，“整风”“找出了一种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群众创造的一种新形式。跟我们党历史上采取过的形式是有区别的”；延安整风“也出了一点大字报，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提倡”（毛泽东1977：480）。尽管毛一再说群众创造了“新形式”，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毛的概括，发明权或应属于毛本人。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通过的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经毛泽东审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使用

了“大字报、大辩论”“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的说法。这份“纲领性文件”的另一处说：“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³

向“革命学生”允诺的民主权利不限于“四大”。1966年8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说“广大革命学生”“贴大字报，是好事，大鸣、大放、大辩论，是好事。他们有上街游行示威的权利，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权利”。这原是《宪法》承诺却从未兑现的权利。⁴

直至1974年11月，出现在广州街头署名“李一哲”（按“李一哲”即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仍引用毛的说法，说文革“从形式上说，实际是一个最广泛的人民的革命大民主，它是‘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是防止和反对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武器”（余习广1989：250）该大字报还说，“上了宪法的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以及未上宪法的串联自由都在这场大革命中真正实行起来，并得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支持”（余习广1989）。大字报的作者据此而堂堂正正地向当局提出“民主要求”。其主要诉求之一，即反对镇压，“保护人民群众的一切应有的民主权利”（余习广1989：260）。

“行使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所以值得特别强调，正因这种“行使”属于特例而非常态。托克维尔在其《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谈到那种“名为民主制度的特殊专制形式”，说这种形式下“社会中不再有等级，不再有阶级划分，不再有固定地位；人民由彼此几乎相同、完全平等的个人组成；这个混杂的群体被公认为唯一合法主宰，但却被完全剥夺了亲自领导甚至监督其政府的一切权力。在它头上有个独一无二的代理人，他有权以他们的名义处理一切事务，而不必征求他们的意见。控制他的是不带机构的公共理性；阻止他的，则是革命而不是法

³ 参见注释2。

⁴ 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

规：在法律上，他是听命于人的执行者；在事实上，他是主人”（托克维尔 1992：197–198）。是否正像是在说文革中——不限于文革——的中国？我读来费解的是，“控制他的是不带机构的公共理性”。我们这里是否有所谓的“公共理性”、即使是“不带机构的”？

应当说，“大民主”自然有也必有限度；问题是何种限度，在何处设限。“四大”即以此限度界定自身。还应当说，“四大”只是发表言论的方式、形式，并没有许诺较之 1954 年宪法所许诺的言论自由更多的东西。文革中的“四大”被一些人乐道，或出于发掘文革正面意义的需要。也应当承认，“四大”确曾短暂地实现过，尽管有下文将要写到的来自当局的限制与“群众运动”中势不可免的负面现象，依然造成了中国政治史上的奇观。也可见有关需求之旺盛——至今亦然。文革中不无合理性内涵的，非唯“四大”。有必要对文革期间的思想与实践作综合的考量，彻底肯定或否定均非对于历史的正常态度。

在“整顿群众组织”的名义下各地的小报停办后，大字报仍偶尔出现在城市街头。1976 年的“四五运动”也赖此条件才能发生。直至文革结束前夕，较有影响的，尚有重庆钢铁公司机修厂技术员白智清的大字报（1976 年 2—3 月），贵州的“七人大字报”（1976 年 3 月）等。面对以清洁市容的名义刷洗大字报的官方行为，“李一哲”质问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还在继续吗？谁曾经宣布过大字报使命的完结呢？毛主席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里对于大字报‘应当永远使用下去’的那段论述不也是‘最高指示’，应当‘坚决执行’‘坚决照办’吗？”（余习广 1989：233–234）。⁵

文革后期、末期直至文革结束后“大字报”的功能，未见得为毛逆料所能及。周恩来逝世后各地自发的纪念、批判活动，声势浩大的“四五运动”，直至“改革开放”之初的“西单民主墙”、北大“三角地”。“四大”的终结，应以 1989 年的“政治风波”为标志。至此，大字报“完成了‘历史使命’”，

退出了——有可能永远退出——当代中国的政治舞台。一些年后，网络空间多少提供了公民议政的平台，尽管不断发声也不断被过滤、消音。文革的后延，也在这一具体方向上。

二、“四大”的盛况

街头政治、广场政治，中国近代史上，民国时期堪称波澜壮阔。至于 1949 年之后，1957 年大字报虽已溢出了单位围墙，却不能拟文革于万一。文革中的街头政治，亦当代中国政治史上的奇观。尤其“群众组织”初兴之时。文革初期的城市街道，正可谓生气勃勃，随处可闻辩论声。陌生人之间或应和或攻防，由白天直至夜深。这个被严格管理的国家，何曾有过这番景象！赵无眠《重读大字报》一文引苏联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句：“街道是我们的画笔，广场是我们的调色板。”（谭放、赵无眠 1996：14）用以状写文革前期的某一阶段，的确适用。有人记 1966 年秋西安的街头辩论，听众通宵热情不减，“上千辆停放的自行车无一人看管，却无任何偷窃丢失之事发生”（尤西林 1998：11）。

另有人记武汉街头的类似情景：“那时还不兴动手动脚，大家各讲各的道理，各显各的口才。这也成了许多市民的业余文化生活，吃过饭，便匆匆跑到街上去，一处一处地听去，直到深更半夜，乐不思归。”作者说自己一次看到一个踩三轮的老头，“将车停在一堆辩论的人群旁，一直听到结束，然后又赶去听另一堆”。作者以为，“这大约是武汉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全民性的大辩论。很有一点罗马广场或英国海德公园的味道”（胡发云 1998：222）。当年北京二十八中学的学生侯瑛，几十年后接受访谈，还说到记忆中所在学校的辩论会，说当时的“民主气氛”“特别浓厚”“随便谁都可以组织一个会，畅所欲言”（米鹤都，2011：219）。不同城市在同一时间演出着类似的剧目。文革后另一次动员广泛的“动”，足以将底层群众也吸引到街头与广场并流连忘返的，即发生在 1989 年初夏——或也是绝响。

⁵ 参见注释 3。

1971 年被特许在山西长治一带从事调研的美国人威廉·韩丁 (2008: 526)，生动地记述了他所听说的 1967 年最初几个月长治的街头辩论：“市政府和大街周围到处都在昼夜不停地进行着激烈的辩论。由于大部分人白天必须上班，学生们从八点一直辩论到下午四点。但是，傍晚时分，工人下班、政府干部离开办公室后，半个城市的人都参加了辩论。晚上九点左右，激动人心的辩论达到高潮，直到凌晨两点左右，‘顽固派’认输回去睡觉，辩论才骤然平静下来。”“在大街上，成群结队的人群浩浩荡荡，一会儿又分成了许许多多小股人群，人群不断地聚散组合。一个地点有十几个进行激烈辩论的活跃分子，只要他们能坚持大声争辩，就能吸引一倍围观的听众，辩论声音减弱时，旁观者就渐渐溜走而转到其他地方了。”

文革初期的街头辩论，或可认为是压抑既久后的一次释放，使无缘政治参与的普通民众意外地获得了自以为在“参与”的快感。也因此上述街头辩论在亲历者的记忆中，有一种欢乐的气氛。令他们经久难忘的，毋宁说是那种氛围。人们乐于享受这从天而降的“表达权”，体验一把言论的狂欢；至于辩论的内容，已不重要。这种即使有限时间内的放任，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交流、交往方式：城市的不同阶层、行业、单位、人群之间，大中学校校内以及校际间。在这个被严格管控、缺乏近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的国家，上述现象，的确难以再现。

大字报也同样壮观。据说当时的北京，“凡是能粘上糨子的物件上”都贴上了大字报，“有的地方的大字报竟有寸把厚”“当时中国的纸都贴到了墙上”，于是就有了如下小景：“那些出身虽红但非常微贱的穷人们”“他们为自己的光荣出身而显得有恃无恐，纷纷钉个小车，跑上街头撕大字报卖钱”（者永平等 1998: 71）。韦韬、陈小曼 (2008: 40) 写到了所见批茅的大字报上读者的批语：“大部分的批语不同意大字报的观点，有的质疑，有的反驳，不少读者还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很勇敢。众声喧哗，亦一种纸上的辩论。直至文革后期，如“反对走后门”的大字报，如广州“李一哲”的大字报，

还吸引了众多民众的围观。有人回忆起深夜街头众人打着手电筒读、抄“李一哲”大字报的情景。文革初期的大字报栏下，往往可见一脸虔诚的抄写者，尤其由外地来京“取经”、自任“传播革命火种”庄严使命的青少年。到了 1970 年代，只有被当局指为“异端”的大字报，才有如此的吸引力。在信息传输手段落后的条件下，不知有多少人抄写过大字报。在封闭的言论环境中，人们搜寻任何可能的资源。这种情景，文革结束之初的“西单民主墙”时期也曾再现。

化名“伊林·涤西”写《致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的北京农业大学附中两个学生刘握才、张立才，几十年后受访时说，因文革爆发“出现了一个机遇”，即关心国家大事，“去想一些过去肯定不敢想也不可能去想的问题”（米鹤都 2011: 256）。刘握中在受访时谈到他们那封公开信引起的连锁反应，即“一连串的‘炮打司令部’”（米鹤都 2011: 262）。“李一哲”大字报属于“抗争性政治”。该大字报说寄希望于“街头读者”“街头理论家、政治家、法律家、哲学家、批评家、观察家们”（余习广 1989: 248），即诉诸尽可能广泛的受众。而大字报无论形式还是效应，均与“上书”这一种传统形式有别。“异端思想”的公开发表，正是借诸“四大”提供了稀有机会。北京中学生“四三派”的《论新思潮》，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均曾以大字报或传单的形式造成广泛影响。年轻人为了在喧嚣中发声，务求振聋发聩，为此不惜试探底线。这也可能夹杂了“投机心理”的冒险冲动，由存留至今的当年大字报中仍不难察觉。

“四大”所提供的特殊的信息传输方式，使关注时局者可能拥有此前不能想象的眼界。首都红卫兵到各地点火，各地大中学生四出串联。经由红卫兵小报与遍布城市的大字报栏，你有可能得知各地的消息（无论是否属实）。“地方”的封闭性由此打破——影响于“后文革时期”的政治与文化，值得探究。

下文还将谈到，“揭秘”性质的大字报最足以耸动。对于长期闭锁于给定的空间的知识人，即使一隙的透露，也非同小可，何况缝隙远不止于一条。

一时街头遍布了震撼弹，颠覆着你已有的认知与想象。铺天盖地来源不明的种种信息，莫辨真伪，也无从考实。经历了这一种“洗礼”，你已难以找回失去了的“童真”。发生在“后文革时期”被认为精神危机的信仰缺失，近缘即在此。

一个稳定地执掌政权的党，发动、鼓励“街头政治”，毕竟是太稀有的事，非有超常的气魄与奇特的思维逻辑才能。佩里·安德森在比较中、苏时，说与苏联的大恐怖不同，“文化大革命不仅仅是一场超大规模的镇压行动。这是一次横扫全盘的尝试，试图通过发动青年一代起来造反，达到粉碎官僚结构的目的。当时那种经历——即使仅仅因为那么多各种各样的体制权威曾在突然间被打倒——对许多人来说都不啻于一次精神解放，尽管他们后来可能会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结果而大失所望，甚至会成为共产党的狂热反对者”（安德森 2001：160–161）

文革后一度的“去政治”的倾向，其近缘自然是刚刚过去的文革。文革后政治生态、社会面貌的某些不可逆转的变化，亦缘于此。问题却仍然没有如是简单。有所谓的“‘去政治’的政治”。莫里斯·迈斯纳（1990：490）说，文革后“隐藏在群众对政治表面上的消极性之下的东西”，令人怀疑“大动乱时的那些观念仍然在发挥作用，群众的政治意识远非其表面呈现的那样。”

三、“四大”与“自发性”

“自发性”是我们曾经耳熟能详的概念。由自发到自觉，被描述为一个上升的过程（即如阶级觉悟提高的过程）。在高度组织化中保留某种“自发性”，应当是毛的实验的一部分。他对于“自发性”似乎有一种隐秘的迷恋。文革之初派出的工作组固然依循惯例而错会了伟大领袖的意图；由发生在运动中的事态看，组织化与自发性，其间的“度”，确

也几乎无从把控。至于“自发性”用于描述文革，其适用性，我还将在其他处讨论。

文革期间，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两报一刊”（按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评论员文章，中央文件（有时发布得极频密），派仗中“中央首长”的表态，甚至中央文革成员的个人讲话，某些署名（多为化名）的大批判文章，都有可能被领会为“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影响运动的走向。几家权威媒体（即“两报一刊”）充当最高当局的喉舌，其功能得到了极致的发挥。作为操控运动的工具，虽前此亦有此类运用——如公布毛加了按语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如发动“反右”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仍远不及在文革舞台上展演得充分。被权威媒体点名，犹如“释之之爱书”，足以宣告某人（政治上的）死刑（何蜀，2010：7–8）。⁶如此逐一引爆，控制运动的节奏；以突然袭击的反常做法，造成戏剧性的效果。毛在这方面，从来是“特效大师”。

“革命群众”则将权威媒体读作官方文告，不但唯此马首是瞻，且其中的积极分子训练了由字里行间捕捉风向、判断“来头”、揣摩圣意、先机而动的特殊才能。⁷

当年河南的造反派骨干袁庚华 2010 年接受访谈时，肯定“文革中群众直接参与政治的权利”，说文革中“所有老百姓都可以直接参与政治”，甚至认为毛在“人类社会进步中的巨大作用”，就包括了文革中“放手让 6、7 亿人口中的绝大多数（95% 以上）直接地、全面地行使广泛的民主权利”（陈宜中 2001：49–50）。袁氏甚至说，文革“使中断了两千多年的希腊民主得以重新继续”。“直接地”“全面地”云云，即使不出于错觉，也显然系为了论证某种政治主张的有意夸大。“老百姓”的“直接参与”赖有“恩准”，即使不全是“奉旨革命”“自发性”也有必要大打折扣。至于“95%，是毛惯用的说法，也像毛一样无意于核查其统计学意义上的真

⁶ 据何蜀（2010：7–8），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区书记处书记、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的任白戈，不过因其名字出现在权威媒体（《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署名（穆欣）文章的注释中，即遭灭顶之灾。

⁷ 李逊（2015：131、135–137）写到文革之初上海市民与北京红卫兵的街头辩论“实际上是上海市委默许甚至引导的”。上海与北京同样有操纵运动之手，只不过手势、意图有别而已。

实性，比如笼统地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囊括在内。⁸

来自当局的有意“透露”，或权威媒体的煽动，均为“运动群众”的手法，到了文革，运用已极其娴熟。文革初期红卫兵的某些大动作，有来自高层的背景。有意的透露，也是一种古老的政治操控的技术。蒯大富(2011: 353, 356)⁹说聂元梓的造反是“中央授意”“奉旨造反”，他的公开反刘少奇，亦得之于张春桥的授意。当年北京四中的学生李宝臣(2011: 237)，说那时“打探消息成为时尚”。“捕捉到重大消息，弄清运动走向是冒险投注的前提。如果你认为那桩桩件件引领风骚的轰动事件完全出自造反者的政治判断与造反精神，那就错了。”“造反者差不多预先都得到了准确情报或是受到上峰的暗示。”在文革初期的氛围中，抢先机也即抢头功，且不难造成轰动效应。其时大有善于“捕风”者。总能先于他人听到风声。政治形势变幻之诡谲，也鼓励了这一种能力的施展。陈焕仁《红卫兵日记》记作者见闻所及的文革中北大师生的状态：对高层动向的打探、揣测，或迅速跟进，或及时调整、转向，某些细节、人物之生动，或有过于小说。

叶维丽(2008: 109)谈到毛写信支持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说：“毛是很善于‘从群众中来的’。要说‘一大批原来不知名的青少年登上了历史舞台’，不如说是毛把他们引领上了历史舞台。如果毛不允许他们上来，他们上不了台。”这不能不是可疑的“自发性”。套用时下的流行语，即“被自发”。“运动”的始终，都有那只时而可见时而不可见的操纵的手。1967、1968年局面失控，倒是有了更真实可信的“自发性”——被当局斥之为“无政府状态”。卷入文革的中国青少年，与大致同一时期手中也举了一本“小红书”(毛语录)的欧美、日本青年，最大的不同，也在此的吧。当然，那些异域青年自以为的“自发”“自主”的背后，或也有“看不见的

手”，却不像“最高当局”的那只手。

以“工农兵”的名义组织批判，引导运动，也非自文革始。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刊出社论《这是为什么？》，10日发表社论《工人说话了》。文革不过沿用了惯用的方式，包括召开座谈会，将座谈会记录加以整理——“实际上很多是根据需要编写的”，一度作为“中央文革”工作人员的阎长贵如是说。阎(2010: 203)还曾为《红旗》杂志起草过评论员文章《工农兵群众参加学术批判是划时代的大事》。那种座谈会上，确有被特选的“工农兵群众”说了话，只是说的未必是自己的话，且他们的话被“根据需要”作了“编写”。¹⁰遇罗克(1999: 117)1966年5月22日的日记中，关于“工农兵参加论战”，说：“谁掌握报刊，谁就掌握工农兵。”“报刊上所谓的工农兵论文，现在看来是批判邓拓的，但不用换掉几个字就可以变成下一次运动批判其他人了。”

与“群众运动”相对，有“运动群众”之说，文革中即已流行：被操控的“自主性”，虚假的所谓“历史的主动性”。“群众”一旦发现“被运动”，也就有了“群众运动”的式微。尽管“运动”作为社会治理的手段，仍然被惯性地运用。

但也应当说，纵使脚本前定，也仍然有随机的“自发性”，也是文革这一非常事件与前此政治运动的不同之一。这不是一种非同小可可以忽略的不同。此外，被诱导的“自发”与被授意的“自发”，也微有区别。事实是，文革期间“自发性”始终存在，重要的是性质。如系何种“自发”，何种前提下、情境中的“自发”。根据卜伟华(2008: 155-172)，赶工作组的行动也有某种自发性，虽背后有官方媒体(《人民日报》)的鼓动。李逊(2015: 660-661)则认为：“经济主义风潮是文革中最具自发性和自觉性的群众运动”，因与切身利益有关。此风潮很快被制止。

此外，运动的不同阶段，“自发性”也有程度、

⁸ 莫里斯·迈斯纳(2001: 439)说，“十分清楚，文化大革命‘敢于造反’的权利不是人民固有的权利，而是由被神化了毛泽东的权威赐给人民的，因而这也是毛泽东随时能够废除的一种权利。”

⁹ 参见注释4。

¹⁰ 王若水(1989)写到，张春桥、姚文元以报道上海工人座谈的方式传达毛的意见，打压《人民日报》王若水等人的批“左”。

表现形式的不同。文革初期各级权力机构瓦解之时，群众与群众组织确也获得了各自发挥与“创造”的空间。某种失控，文革初期已然。权威不再，甚至伟大领袖的权威。这种意义上的“自发性”确也贯穿始终。批评“五分加绵羊”，批判“驯服工具论”“奴隶主义”，鼓励“反潮流”，不消说有“解放”意义，却又势必加剧了混乱，鼓励了离心的倾向。

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对于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问题是“正确领导”“错误领导”，实践中必然见仁见智，“群众”只能自行其是。自发/被自发，自发/失控。毛的伟大实验，终于越出了他的预期、他预设的路径。

甚至毛是否有明确的“战略部署”，亦未可知：至少在文革的某些关头、关口。有诸种偶发事件与毛的“灵光一闪”。毛在文革中的有些灵感，即得之于“群众运动”，亦所谓的“顺势而为”。¹¹ 文革的“史无前例”，多少也在于此。1949年后不曾有过，此后也未可复制。

四、“四大”的功效之一：揭露干部特权

“四大”中对领导层火力密集的攻击，毋宁说直接得自毛本人文革前“反修”“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言论的启发。毛如此轻易地引爆文革，正利用了民众对体制、对“特权阶层”的积蓄已久的不满；“巴黎公社的原则”的风行一时，亦缘于此。¹²

在反“特权”的普遍要求下，“四大”中与“特权”有关的揭露最能呼应民众的情绪。与其说“走资派”激起的民愤由于“走资”，不如说因了表现为

“特殊化”的权力的滥用。上层（包括军队）的腐败，1949年后第一次成了公众议题。高墙深院、警卫森严的所在一旦向公开敞开，高官的物质生活被民众围观，超乎普通人想象的差别即无从遮掩，足以使“公仆”云云的一套说辞破产。¹³ 较之1990年代后的贪腐、奢靡，文革中大字报所揭露的，实在“区区”，无足挂齿；回头看去，倒像是老百姓在大惊小怪。但在1950—60年代的匮乏经济下，涉及物质利益的特权暴露在公众面前，却最易激起民愤。对“特权”的愤恨文革后期借“反对‘走后门’”继续发酵，无可作为1989年社会运动的伏线。

“特权”在文革期间的大字报中，具体化为官员的生活空间、社交场所、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官员身边行政干部、工勤人员（包括私人医生、警卫员、保姆、司机）的揭发，最被认为有可信性。如收入《文革大字报精选》的《邓小平私人医生访谈纪要》，北京市委机关工作人员、工人参与撰写的《彭真的腐朽生活罪行》。《彭真的腐朽生活罪行》一篇中，为其宅邸维修施工者，详细罗列彭氏居所的器物，举凡食、用，巨细靡遗，无异于纸上的展览。态度则如刘姥姥进大观园，目不暇接，少所见多所怪。非以当年普遍的生活水准、消费能力，即不能体会揭发者的义愤。公物私用（“盗用”“霸占”），“占公家便宜”，甚至“盗占文物”，是揭发的内容之一。对彭的揭发亦有此项内容。倘若属实，这些官员确也“不拿自己当外人”，将国家的视为自己的。其时的老百姓过惯了苦日子，紧日子，不知还能怎样“穷奢极欲”。他们惯听的，是“密切联系群众”“为人民服务”。大字报却让他们开了眼，见识了与这套说辞满拧的官老爷。

隐性的“特权”更体现于“待遇”。“四大”揭开了“平等”表象下的隐秘一角，不能不引发公众的围观。¹⁴ 工资待遇，涉及利益诉求。被揭批的“特权”，包括了外交部驻外人员与国内干部的工资差

¹¹ 借题发挥，是毛的“领导艺术”。借聂元梓等人大字报引爆文革，即毛“灵光一闪”之一例。毛的灵感不止来自北京、上海，还来自其他省市。如关于“三结合”，参看李逊（2015：787-788）。毛（1998：12、72）说林彪的等人“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毛本人何尝不如此。

¹² 参见注释5。

¹³ 参见注释6。

¹⁴ 参见注释7。

別。高层人士的看西方影片，也被归为文化资源普遍匮乏时期令人垂涎的“待遇”（譚放、趙无眠 1996: 525–527）。让人不平的是，似乎“公仆”们天然地具有免疫力，而他们为之“服务”的群众，则难免“中毒”。京城中“养蜂夹道”一类隐秘处所，文革中进入了普通民众的视线（譚放、趙无眠 1996）。文革前的“高干俱乐部”，多少像是此后“私人会所”的前身；只不过 1990 年代后的“会所”，乃京城及某些省会城市中的秘境，进出其间的，高官之外，更有钜富而已。

“特殊化”还指向了面向干部子弟的贵族学校，贵族幼儿园（参看同书中的《“北海幼儿园”是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的苗圃》《彻底砸烂贵族化的北京十一学校》），属于最能民众侧目的那部分“特权”。较之“三大差别”，民众感受更直接的，或即官民差别。临时工、合同工，机关学校、事业单位的“工勤人员”的诉求，借诸“四大”得以表达。

“特权”“特权阶层”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文革爆发时毛的一呼百应，也可由此得到部分解释。

文革后期无论署名“李一哲”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还是南京徐水良的大字报《反对特权》，以及未以大字报形式传播的云南陈尔晋的长文《特权论》（杨继绳 2016: 964–968），均集矢于“特权”“特权阶层”，本不难由此洞悉民意、人心。文革后爆炸式的“特权—腐败”，更像是对文革中冲击的报复性补偿。

我始终相信文革的发动有普遍的社会要求作为背景。即使对内幕小百姓无缘知晓，对基层党组织、基层干部的不满，对专政机构的怨恨，也在为宣泄寻找出口。参加过“四清”的赵毅衡，说自己知道“饿死人的时候，农民们对多吃多占的基层干部如何仇恨”。一个女社员对自己说：不用查账，“看看他们的粪坑就知道他们吃的和我们不一样”（者永平 1998: 209）。文革前“干群关系”之紧张，已到了某种临界点。处在不同位置上的人们，由不同的方面感受“官僚主义”，感受政治压抑。除了高层有意纵容，民怨，民愤，或更是文革中冲击“公、

检、法”的真实背景。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党决定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废除职务上的终身制，仍有待遇的终身制——确系“中国特色”。在 2012 年年底中共中央“八项规定”、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之后，2016 年 11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规范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关待遇的文件，其中有党和国家领导人退下来要及时腾退办公用房；不能超标准配备车辆，超规格乘坐交通工具；压缩赴外地休假休息时间等项内容，适用的仍然是“待遇适当从低”的原则，甚至不能比照西方民主国家的相关制度，是否有违执政党宣称的宗旨？如若将文革中对“特权”的批判作为资源，体现于文革后的制度设计，是否会有有所不同？

五、“四大”的功效之二：揭露政界内幕

“四大”的另一效应，是将普通人无从窥探的高层内部的矛盾、分歧，以致历史恩怨，暴露于公众的视野。“外交学院革命造反兵团”所揭发的陈毅的言论，其中有，“现在什么人，戴上红卫兵袖章都可以看大字报”，而自己是“最坚决反对大字报上街的一个”“不是我个人害怕，从党的利益出发。刘少奇的大字报在王府井贴了一万多份，把秘密都泄出去了，给我们伟大的党面子上抹黑”（譚放、趙无眠 1996: 322–323）。¹⁵ 文革对保密制度的冲击，的确威胁到了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后果。但群众对此制度的不认可，亦事出有因。至于大字报中的大量丑闻，何止于“抹黑”！你大可相信陈毅不是基于个人利害；他对失范、无序的高度警惕，确属“从党的利益出发”。事实是，大字报将高层人士“揪出来示众”，无可避免地将党内分歧公之于众，将党的历史上不为人知的部分公之于众，其后果仅凭常识也不难想见。在这种关头维护“党的利益”，陈毅是在代表相当一些老共产党人说话。事实确也证明

¹⁵ 参见注释 8。

了陈绝非杞忧。

由“革命群众”揭发的“黑话”，你多多少少看到了政治人物的另一面，非公开场合的言行，正式表态外“私底下”或小范围内的言论。¹⁶“高度一致”表象下的诸种分歧，证明了毛所说的党内有党、党外有派，且不同派系、主张间的博弈由来已久。¹⁷这也是群众未曾见识的更丰富更多层次也更近于真实的“政界”。至于对高层人物的批判，则无不是“宣判”式的。这也是文革期间“大民主”的特点之一。

收入《文革大字报精选》一书的大字报，揭高级干部的“历史污点”，通常归结为其人一贯反毛。如收入同书的《大军阀、大野心家朱德的滔天罪行》《陈云的十二大罪状》《打倒东北地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宋任穷》等等。同书中批朱德的材料两份，《滔天罪行》外，尚有《看！朱德反动的思想，肮脏的灵魂！》。另有批彭德怀、贺龙等人的材料，无不涉及党史、革命史、战争史。有关的揭发、批判虽有罗织，种种夸大不实，却仍不止撩开、更撕下了“政治”的神秘帷幕，鼓励了寻求真相的努力。那种“野史”式的叙事，颠覆了既有的历史认知，足以造成“思想混乱”，引发是否有所谓“信史”、官修正史是否可信的怀疑。以毛划线，由反毛/拥毛讲述党史，算“党内历次路线斗争”的旧账，¹⁸据此“起底”党史、党史人物，或非毛的旨意；在文革的语境中，却势不可免。魔盒开启，诸种关于高层、以至于最高领袖的“政治谣言”、流言暗中传播。“倒周（恩来）”“倒谢（富治）”“攻击中央文革”，即使在打压下，此类事件仍层出不穷。

将对手污名化，从来是政争的武器，包括了文革式的放任“群众”丑化，抹黑，发露隐私，扣屎盆子。大字报指朱德为“老贼”，说其人“混蛋透顶”“一贯反对……毛主席”“阴谋篡党、篡军”，杀伤力远不如说其人私德不堪，腐化堕落，“糜烂”

“下流”（《看！朱德反动的思想，肮脏的灵魂！》）。指陈再道为“混进军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自不及说其人系“大淫棍”“大流氓”解恨（谭放、赵无眠 1996：422）。以名人（包括高官）的“丑闻”娱乐群众，亦大众文化的常态。由大字报与小报可以知道，“搞臭”一个人，何等容易！有关的揭发不免捕风捉影，渲染或太过，却未见得凭空捏造；公众则宁信其有。这些大字报，无疑使一些人获得了对高贵者恣意羞辱的快感。官威之“亵”，莫此为甚。“后‘文革’时期”的信仰危机，多少也因人们看到了听到了太多他们本不该听到、看到的东西，无法再将堂皇的教义与实际对接。前此的政治运动纵然也包含了某种“自我否定”，却从未有如此之彻底。由这种意义看，文革实在是一场气魄惊人的豪赌。¹⁹

也有反批判的大字报。如外交部九十一名司长、大使的《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该大字报指斥批陈者“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凭空捏造”“篡改事实”“栽赃陷害嫁祸于人”“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小题大做任意渲染”“断章取义无限上纲”（谭放、赵无眠 1996：619–620）。所斥责的种种，正是“大批判”中的常态，不唯对陈。

党史、当代政治的一些被深藏的面向，渐次打开。在一个严密掌控信息传输的社会，这甚至可以视为“历史性”的时刻。大量真伪淆杂的资讯，潮水般涌来，令人应接不暇。关心中国当代史（尤其政治史、革命史）的知识人，获得了一次梦想不到的机会。大字报对于井冈山苏区“反 AB 团”、延安整风、“抢救运动”、1947 年至 48 年春各根据地的“搬石头”、1950 年代“镇反”“肃反”扩大化、五六十年代之交大饥荒等等的披露，使被长期讳言的事件浮出水面，对于书生既有误导，又有祛魅、祛蔽，由此开启了反思、追问之门。“揪军内一小撮”的大字报，则将军内问题公之于众，更是文革中的

¹⁶ 收入《文革大字报精选》的《陈毅反动言论录》《三反分子李瑞环罪行录》《宣判“胡家黑店”死刑》附《胡耀邦的反动言行录》等，言论方式均相当个性化，本色生动，的确肖他们各自的口吻。

¹⁷ 参见注释 9。

¹⁸ 有关的大字报如收入该书的《邓小平反动言行录》《陈云的十二大罪状》《彻底埋葬以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等。至于揭发康生的大字报（《勒令康生》《炮打老奸巨猾的康生》）指其人为“酷吏”“残害忠良”，刻画逼真，显然知根知底。

¹⁹ 参见注释 10。

反常事态。在被制止之后，影响业已造成，难以消除。

1957年“反右”以来各级党组织维持已久的权威，文革后至今不曾真正恢复。对领导（官员）的敬畏即使不至于荡然无存，“等威”也再难重建。在一个具体单位，“抗上”未见得需要付出政治代价。甚至有了抗上“专业户”，官员眼中的“刁民”，有本事将领导整治得狼狈不堪。对权力机构、当权者的轻亵，是放任群众羞辱当权派的一部分后果。权威的维持需要一点神秘感。文革中权力机构与当权者脱卸了包装，赤裸裸地现身。此可亵，彼亦可亵，终至于无可亵。饭桌上用于消遣的关于权贵的“黄段子”，岂是文革前的老百姓所敢想象的？但也应当说，文革中最高领袖“走下神坛”，各级官员则走下了宝座；批斗会、大字报上的“示众”，固然使一些人颜面扫地，却也拉近了政治人物与普通人的距离，将官员们还原为有七情六欲的人，而非大小神祇，效应复杂，不便作一概之论。中国传统的官民关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精心营造的廉陛、等威的隳堕，权威感的削弱，与信任危机、信仰危机互为表里，却也可能成为塑造新的政治生态的契机。令人失望的是，文革中的冲击，似乎并未被官员引为教训。官复原职，依然如故，甚或变本加厉。1990年代以降官员的滥用特权，足令当年的“走资派”自叹弗如。老式官僚主义与“权贵资本主义”叠加，世袭、裙带关系盛行，也成为一些人怀念文革的依据。

六、“四大”的功效之三：释放人性之恶

文革中的大字报，在揭露政治内幕、社会弊病、“自下而上地揭露我们的黑暗面”的同时，使人之于人的怨毒与嫉恨，得到了恣意释放的机会。不唯对高层人士可以“自由地”攻讦，发露其丑闻、绯闻、秘闻，更可以对无从设防的他人，由同事到街坊邻里，肆无忌惮地发泄私怨，包括积久的“羡慕嫉妒恨”——尤其针对才华、名望、待遇。血气健

旺或为人倾险者，不难于快意恩仇。挠挠者易折，那就放任摧折；娥眉曾被人妒，正可假借大义引燃妒火。在这种氛围中，“卑贱者/高贵者”的说辞，无疑具有煽动性。掩蔽在“群众运动”同质性表象下的不同阶级、阶层、人群的利益诉求，尤其对于社会分配的不平不满，经由揭发批判以至攻讦诋毁，得到了（至少象征性的）补偿。

李慎之“反右”中检讨说，“过去整个贯穿我的思想是反对大鸣大放，认为狂风暴雨是不好的。”用名对大字报，有些内容赞成，但对这种形式是反对的；认为这种形式，将人性与兽性都放了出来，即如“暴民心理”（李慎之 2013：157、159、161）——极其敏锐。到毛在文革中倡导“四大”，这种言论早已没有了发表的空间。

“四大”式的“大民主”，鼓励部门、单位内部的相互揭发批判，往往抉发及于隐私，追查至于日常的人际交往，²⁰ 力求耸人听闻。在这种时候，知名人士、公众人物，有更多被“示众”的机会，往往是大字报的“看点”。绯闻、丑闻，尤有娱乐大众的价值。某些只能称之为“攻讦”的内容，“四大”期间是堂而皇之地发表的。在“前网络时代”，那是一种理论上可以“全民”卷入的相互窥视。不但个人对于个人，而且派仗中的攻防，均不乏这类内容。涉及床第之间的揭发尤具杀伤力。“批倒批臭”“批臭”的手段之一，即由私德方面败坏其人的名声。最能证明其败德的，往往与情色有关，所谓的“生活作风问题”即“男女关系问题”。这种发露，关系到有洁癖的书生视同生命的“人格尊严”。不堪其辱，也成为“非正常死亡”的重要诱因。以言杀人，以这种大字报的效果为烈。

文革中陈寅恪曾由其妇唐筼为之辩诬（陆键东 2011：468–469）。钱锺书、沈从文也曾以小字报、大字报为自己辩诬，亦其时“危机公关”的例子（参见杨绛 1981：63；张新颖 2014：186）。“辩诬”已够屈辱，更多的知识分子欲辩无从。大字报不承担“言责”。“群众组织”有所谓的“揭老底战斗队”；

²⁰ 李逊（2015：15）记文革初期的上海市委提出“大是大非可以贴，小事（按应作‘是’）小非也可以贴”“许多单位被贴大字报人数占总人数的30%至80%”。

各级“专案组”，更以发露历史污迹为己任。在这样的狂潮中，一些人无从设防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不但门户洞开，任由他人出入，且“历史”公开，包括私生活（或曰尤其私生活）在内的一切，均不能逃过“群众雪亮的眼睛”。大字报如此，“大辩论”亦然。文革中的辩论会往往是批判会以至声讨会，“靶子”只能任人抹黑，并没有反驳、申辩的权利。不以揭发批判他人的自由，剥夺他人免受攻击诽谤的自由，应当是一个民族文明程度、一个国家政治文明水平的一项指标，卷入文革者对于这种普世的原则却像是闻所未闻。大批判中的语言暴力，与武斗中的施暴相互支持，互为补充，造成的破坏以至导致的毁灭，非通常的伤亡数字所能反映。你可以公开指控（除毛、林、“中央文革”成员外）的任何人，也可以被任何人公开指控而无须提供证据；你对于他人或他人对于你的指控不被追究。这种“言论自由”，与任何意义上的“民主”无关。

文革前的政治运动中，相互“告发”即已受到鼓励。“人身攻击”，延安“整风”“抢救运动”直至1956—57年的“鸣放”“反右”，乃“党内斗争”“群众运动”中的常态。这种戾气充斥的语境，正适用三百年前钱谦益（1996：1399）所描述的他有关世态人心的体察：“劫末之后，怨怒相寻，拈草树为刀兵，指骨肉为仇敌，虫以二口自啮，鸟以两首相残……”。直至文革结束后的一个时期，暴戾之气仍时时可感，却少有人有明清之际如王夫之、钱谦益、吴梅村关于社会文化后果的洞见，甚而至于全无此种思路。

文革中人性之恶的释放，影响于普遍的社会风气，文革后仍继续发酵。其中就有那种被指为“文革遗风”的文风。如此看来，将“四大”的实践片面化，比如仅仅归结为“人民群众”有公开批评党组织、领导人的权利，不能不是有意的误导。

七、“四大”与非主流

思考的风险性质，正是在声称“大民主”的文革中，夸张地呈现出来。标榜“四大”的文革的一

大悖论，即，不但不能包容“异端”，甚至不能容忍“另类”。通行的，是高度一致的“主流话语”。但即使有一条缝隙，所谓的“异端思想”“异端思潮”，也仍赖“大民主”的言论环境发声，尽管旋起旋灭，被消音，甚至言论者被消灭肉身。

短暂停时间里思想能量的集中喷发，纵然理论成果有限，也示人以巨大的思想潜能。上文提到的《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发表于《四三战报》第1期（1967年6月11日），得到了湖南“省无联”杨曦光等人的阐发。《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一书的编者认为，湖南“省无联”思潮“有‘全面的反体制倾向’（第269页），所拈出的诸项，在当时并非空谷足音。诸多相互呼应的声音，嘈杂而激烈，其中且有来自最高当局的声音。

一种思路一旦开启，即难以封闭。这种后果，当是始料未及的吧。数十年后，原北京中学红卫兵“四四派”的领袖人物李冬民受访中关于“四三派宣言”阐述的“新思潮”，仍然认为“这种理论骨子里是反共产党的”（米鹤都2011：196）。

久经训练的限度感，文革期间始终有潜在的制约。即使在1949年以来言论环境最宽松的短暂时期，学生领袖也随时保有对“异端思想”的敏感与警戒，在派别对抗中严守边界，未失自律，即使是未经政治历练的中学生，偶有批判性言论，如《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在某些敏感问题上也仍保有谨慎，“不仅是策略性的小心，也是思想性的谨慎”（印红标2009：101）。只不过其“擦边球”硬被指为出界罢了。那种自我制约思考与表达的范围，以避免被“阶级敌人”、国内外敌对势力所利用的自觉，几近本能，确应归之于1950—60年代“阶级斗争教育”的一大成果。

伟大领袖与“巴黎公社”有关的思路，启发、激励了年轻的思想者对新的国家形式的思考。其时较为“尖端”的言论，未出“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等“巴黎公社的原则”；至少在这一方向上，甚至尚不及上述思路（“彻底砸碎……”）激进。1966年10月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学生李文博的大字报提出的“彻底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革新”“改善”而已；即“彻底改造”“全

面完善”，较之“革新”“改善”，仍只有程度之别（参看杨继绳[2016: 958、959]）。《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杨曦光《中国向何处去？》所主张的“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也不过“再分配”。杨的论述的确超出了当局容忍的限度，却也非无所本：“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官僚资产阶级”出自毛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彻底砸烂”依然来自“巴黎公社的原则”（杨曦光1997）。

李文博事后回忆说，“当时是文革中一个短暂的可以就这一类问题进行公开探讨的时期”（印红标2009: 89）。类似探讨或与1957年某些知识人的思考相呼应，却未必在深度上更有推进——或可据以估量1957年以降知识分子思想能力萎缩的程度，以及文革“大民主”为言论所设限度。在为思考（尤其关涉制度、体制的思考）设限成为常态的情况下，文革中即使有限的探索空间中短暂的讨论，也令人怀念。若不过于苛求，仍然应当说，仅仅一隙，已足以使得上述人物释放其思想能量，令人想见更大的可能性。

较杨曦光的大字报更为“尖端”的，是一份署名“联动”的“通告”。该“通告”的锋芒直至毛、林，提出“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生活中得到坚决贯彻，保证中共各级党委、党员的生命安全”。“召开……”无疑是作者的主要关怀。这段话前，却有一句“取消一切专制制度”。“取消一切专制制度”云云，更像是愤激之词，未必出自深思熟虑，却也要有相当的底气，才敢有如此凌厉的表述。有人申明此“通告”系由“伪联动”发布；对于本文，重要的是，“通告”曾以大字报的形式公开张贴²¹。

上述论者显然（甚至有意）忽略了“大民主”的前缀——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有此限定，才符合“大民主”的本来语义。毛使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或始自其1966年的生日谈话。²²

问题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大民主”是何关系？是否“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由谁判定？置此不论，单提“大民主”，的确有违毛的本意，更不合于文革的实际。毛的“生日谈话”反复强调“大民主”的阶级属性，一再划定其适用范围，正属于文革式“大民主”的历史性，不容无视。

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第三十八章，题为“另类思潮——来自边缘的思索”。

“另类”≠“异端”，只是非主流，或只是非文革时期、文革中某时段的主流。该章所涉及的异见表达者，无不受到围剿迫害，暴力摧残，甚至身陷囹圄。尤为荒唐的是，有人竟因与“丁学雷”（按“丁学雷”为上海写作组的化名）商榷的文章被判刑七年（李逊2015: 1482-1485）。强势话语对不同意见的打压，亦号称“大民主”的文革中的常态。宋永毅、孙大进（1997）所录的有些言论，也难言“异端”，不过“异见”“异议”，也证明了文革期间对不同思想言论的容忍度较其他时期更低。

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是时距文革爆发不过半年。《公安六条》中，有“凡是利用大民主，或者用其他手段，散布反动言论，一般的，由革命群众同他们进行斗争。严重的，公安部门要和革命群众相结合，及时进行调查，必要时，酌情处理”一条。“利用大民主”云云，其解释权，自然归文革当局、专政机关与“革命群众”。以“公安六条”规范“四大”的直接后果，是“恶攻”“现反”罪的泛滥。²³ 号称“大民主”的时期，竟成为言论禁忌最多、禁网最密的时期。诸多“恶攻”“现反”案例，可惨可笑，以至于荒谬绝伦。

文革在多数场合，表现为多数人——或假借多数的名义——对少数人以至任一个人的专政。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民主”时期的个人，甚至更彻底地消失在了人群中。其表征之一即着装。更如

²¹ 参看杨继绳（2016: 283、284）。杨指出该事件的诡异之处，在未闻对“通告”的作者、背景有何追查。当局本不难做到这一点。也应当说无论“联动”还是其他文革中的群众组织，都不具有同质性，不能如现代政党组织严密。

²² 1966年毛的生日谈话，王力（2001），阎长贵、王广宇（2009），戚本禹（2016）均有记述，诸有关记述版本不一。

²³ 参见注释11。

山呼万岁与诸种匪夷所思的效忠仪式。基于对仪式的狂嗜，文革期间较之以往任何时期，都更要求整齐划一，更不能容忍个人意志的表达。至于表达方式的非个人化，文革期间的流行文体足为证明。不但大报抄小报，小报抄“梁效”，且大字报栏上的文字，亦相互复制，彼此抄袭，充斥着其时特有的套话。“言论自由”时期文风的单一与表述的制式化，亦有讽刺意味。

“大民主”既与“群众专政”互为表里，就绝不至于混淆于欧美的“民主”。毛确也严于此种区分。有人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据文革的实践，总结为“三个全面”，即“开展全面阶级斗争，进行全面夺权，实行全面专政”（阎长贵、王广宇 2010：112）。李慎之（2013：上 13）则说，文革中自己已经悟到，“毛主席心目中的大民主和他心目中的无产阶级专政其实是一回事，或者是用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手段”。也如被操控的“自发”，这里是被恩准的“民主”；其幅度与形态都受制于最高当局的意志。将这种“民主实践”作为某种“遗产”，至少先要还其“本来面目”。麻烦的是，“民主”与“专政”间的逻辑关系总不免于吊诡。看来必得用了极其玄奥的理论、锻造得精致无比的逻辑，才能将“四大”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样本，使“全面专政”与“大民主”兼容。²⁴

八、“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执政党社会动员之强大而有效，文革中达于极致。如上文所说，这种极致的社会动员，不全由高层的号召力，也赖有社会矛盾的积蓄。社会能量一旦暴烈释放，来自不同方向的力，冲撞激荡，不难于堤防溃决，终至于洪水滔天。

“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是毛的口头禅之一，确可用以自我刻画，也昭示了他所欣赏的一种行事风格。这种风格在其掌控绝对权力的条件下，难免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因而放/收之间危险的游戏，往往以平衡的破坏、他本人出手干预而告终，使其

看起来正像一个随心所欲、反复无常的暴君。对此，我宁愿由动机/效果、愿望及其实现间的冲突的角度看取，而不认为都宜于用“阴谋论”解释。

毛好引古语，如“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参见毛泽东 1966：1264）。文革期间对言论的放与收，也有极致的展演。一度置身运动之外的沈从文（2015：425、427、431），由街头景象揣测时局的变化，如由 1967 年 10 月节日前北京的拆除“大字报棚架”，清除橱窗、墙壁上的大字报，由王府井小报的减少，判断运动方面的消息，观察仍有小说家的细心。1968 年 1 月，他注意到“街上已有通告，外埠内部刊物不许上街，将严加取缔、禁止。本市经批准付印的，也只许在内部发行，不许外售”。

“管控”加严，“四大”的逐渐收束也正在此期间。据 1974 年广州署名“李一哲”的大字报，那年 5 月，“广州市委组织的‘政治市容清扫队’已经装配好水龙头和扫把，随时可以把任何大街小巷出现的大字报清除干净”（余习广 1989：233）。“政治市容清扫队”的名目，妙不可言。

文革中的毛，不能再像前此的政治运动那样收放自如，操纵在我：或许为其始料未及。据说唐代罗隐的两句凭吊诸葛亮的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毛在文革中不止一次吟诵、抄写；阎长贵将此作为毛经过武汉“七二〇”事件后的心态写照，甚至“也是他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中的心态写照”（阎长贵、王广宇 2010：75）。延安整风后，这或许是毛所经历的仅有的一次局面失控。在此之前，即使“反右”前的“鸣放”时期“放”出来的言论大大超出了他的容忍限度，也仍然自信局势在其掌控之中。文革的一大失败是，始终未能达到自发与操控间理想的平衡。一放就乱，一管就死，文革后也依然如是。文革中一再发起反对“无政府主义”，正因不再能指挥若定。指挥失效，正在“最高指示”铺天盖地的情境中，其近期与远期的效应都不能不严重。

大乱一大治的历史循环，本是古老的思路，来自毛嗜读的《资治通鉴》一类史书，也是基于其个

²⁴ 参见注释 12。

人经验的治理之道。1966年7月8日毛（1998：12.71）致信江青，其中有“天下大乱，达到天下治”云云。林彪则一再说到大乱的必要性。1966年8月8日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林说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逢先知、金冲及2018：2397）。前于此，被毛（1966）亲自写信支持的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组织的宣言，就已说过“把旧世界……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²⁵结果却不止“乱了敌人”，更乱了自己。²⁶如果相信这是一场实验，那么它是以整个国家为实验室，所冒的是秩序大破坏、社会结构大松动的风险。这种豪赌，的确只有毛这样的大领袖才敢一试。

毛对于“自发性”固然态度矛盾，我却不认为系预先设局，布好了诱饵，当放任之初就谋划了收网；却也如1956—57年的“鸣放”，一旦超出了他的预期，逾越了他所设框限，即断然收回。强力操控，确也更是其一贯的作风。文革中由“大民主”到“军训”“军管就是戏剧性的转折”。²⁷“大民主”——“天下大乱”“全面夺权”——军管，文革的上述轨迹，看似封闭系统中的循环、轮回，却不可能回到原点。

即使如此，将文革全归之于“操控”，无法解释“最高指示”失灵、权威失坠这一事实。再回到“自发”“被自发”的议题上，我要不避重复地说，文革过程中自发性始终存在，只是或隐或显、或受制约或被放任而已。“大民主”中确有空间，不难“溢出”，有不可控的思想与言论，有规划外、预想外的事态。管理也未全失效。金大陆（2011）由粮油供应这一端，论证文革中“国家管理”的“在位”。“在位”的，当然不止此一端。由此看来，对于“大乱”，也不宜想象过度。至于即使中学生，在“四大”中也未失去限度感与自律，并不轻易越位（由上文所引李冬民等人的言说可知），或也是文革中具有特

征性的现象。

韩少功（2013：139）说：“实际上，十年间的权力大多由官方掌控，包括一头一尾。”韩更以为，毛文革初期推动的激进化“民主”，即使在被收回之后，仍有其遗产。“反叛精神和平等目标既然有了合法性，就固化成一种全社会的心理大势”，参与构成了终结文革的力量（陈益南2006：3）。²⁸更有穿透力更警策的，仍然是莫里斯·迈斯纳（2001：490）的下述议论。莫氏说，文革开始后的一两年间，“中国人民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批判社会，向现存的政治权力机构造反，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在公众讲坛、大字报和报纸上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希望等等”——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这个社会绝不可能毫发不变地回复旧观。“后‘文革’时期”的历史，由正反两面一再证明着这一点。

莫氏接下来说，“这种在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出版自由等方面广泛的（尽管是失败的）实验至少在城市地区是如此普遍，给人的体验是如此强烈，因而它必然给人们尤其是给年轻人对权力的态度造成深远的影响。在大动乱年间，只有毛泽东本人是不能批判的。人们很难相信，在‘大民主’时期曾是毛泽东忠实信徒的数亿人将会非常驯服地服从毛泽东后继人的指挥。同样不太可能的是，在党如此之多的赘瘤暴露在公众的审视面前之后，中国共产党能够轻而易举地恢复其一贯正确的列宁主义形象。无论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有多么惨重，它确实把向当局造反是群众的权利这一概念灌输进了群众的意识之中。当中国人民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这种权利是既非上面所赐亦非上面所能废除而为他们所固有的权利时，他们也许会再次实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鼓吹的那一幕。其唯一的方法‘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取任何包办代替的方法。’”无论“那一幕”会否在可以预见的未

²⁵ 该文原题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1966年6月24日，刊载于1966年8月2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时，题目改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²⁶ 蒲大富（2011：374-375）数十年后接受访谈，说：“毛泽东把我们从盒子里放出来造反，他是要把我们放在他能控制的范围内，或者说他让你反谁，你反就可以。而我们一造反，却就没有止境了。”

²⁷ 参见注释13。

²⁸ 李逊（2015：161）也说，出于“被毛泽东‘大民主’催生的朦胧的权利意识”，红卫兵中的一些人，“后来又成为反对文革的主力”。文革造就了自己的反叛者。曾经倾情投入的一批青年中，确有较早觉醒，发展出对于文革的批判意识的人。

来上演，以及以何种方式上演。由此看来，对于所谓的“文革遗产”，又岂能作一概之论！

有另一种“四大”，所谓的“四大自由”，²⁹与本文讨论的“四大”不消说性质迥异。但彼“四大”中的“言论和表达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此方人士也期盼已久。在吃饭问题初步解决之后，“言论和表达”“免于恐惧”的重要性凸显；这种“自由”，是普通中国人最感陌生的——尤其“免于恐惧”，也绝不像是治理者的选项。未知他们能否体会这种“自由”对于人的意义。当然，关于政治自由的想象力是有待培养的，否则所想到的只能是阿Q式的“要嘛有嘛”，在文革初期的“横扫”及其后的武斗中有恶性表现。这里正有专制下小民所熟悉的那一种“自由”。

1956年5月，时任中宣部长的陆定一（1992：501–502），在阐述毛的“双百方针”时，提到过另一版本的“四大自由”，包括“独立思考的自由”“辩论的自由”“创作和批评的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只是有效期较文革中的“四大”更为短暂，其兑现至今也遥不可期。误信了上述承诺起而“鸣放”者，忘记了鲁迅（1981：612）的如下告诫：“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戏剧性的还有，“四大”写入了197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宪法，又将其删除，被作为了“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具体动作，尽管并未同时打开反思的空间。³⁰

即使有《公安六条》等对言论的“管控”，文革期间的大字报、大辩论，仍可归为《宪法》所承诺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的一度兑现。此外尚有“群众组织”（“结社自由”），有据说达数千种之多的“小报”（“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即使上述现象仅出现在特定时期，且各打了折扣，但在当代中国，仍属奇观，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没有复

制的可能。

毛（1998, 12: 220）1967年2月8日《同卡博、巴卢库的一段谈话》中说，他希望“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我倾向于相信将主张直接诉诸群众，是毛的真实愿望。轻易地将其归之于权谋，不过在证明政治斗争从来都是肮脏的游戏。讽刺的是，正是文革这种“形式”“方式”不可重复，甚至在文革中也难以维系。纵然如此，在我看来，“找到一种形式”仍然不失为堪称惊人的构想，尽管在文革的实践中，不可避免地遭遇了滑铁卢。³¹由此看来，以文革为极致表现的“大民主”，其本质，其政治意涵还有待发掘。

我相信毛的上述构想中包含的政治理想主义，对于建设区别于西方民主制度的另一种民主制度的想象；至少是尝试寻找一种途径，为制度注入生机，使其有自我更新以至再生的能力。那么，能否将一种设想与其在“现实政治”中的样貌略作区分，提取“设想”中的合理成分？但我对于有的论者将“四大”与其历史内容剥离，以至直接将“四大”等同于“政治民主”，不能苟同。³² 将“大民主”抽象化，抽离既经发生过的文革历史，有悖于知识论的诚实。在文革本身几成禁忌性话题的情况下，将“四大”作为“‘文革’遗产”夸大其正面意义，是否有点儿荒谬？

李慎之（2013：13）说，“在中国以外的世界，大民主的故事还没有完。不知哪位高手把大民主译成 mass democracy——群众性的民主，这是一个很容易望文生义而极有吸引力的名词”；这种误译一误解，据李所知，在欧美大学里不无信众。中国大学亦然。但“误译一误解”与蓄意“误导”毕竟有别。这应当是中外间的一点绝非无关紧要的不同。³³ ☒

²⁹ “四大自由”即言论和表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由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二战期间提出。

³⁰ 参见注释14。

³¹ 参见注释15。

³² 参见注释16。

³³ 参见注释17。

注释

1. 关于毛派员到新华社国际部征求意见始末，李慎之（2013：852–853）文革中也有交待。收入冯雪峰（2017：357–358），说自己曾说“‘大民主’也可以”“事实上是在提倡‘大民主’”。冯亦代（2000：10）“反右”前“鸣放”的发言中使用了“小民主”“小小民主”的说法。可证毛关于李慎之“大民主”的批评，当时即为党内外人士所知。
2. “四大”外，另有“五大”的提法。王年一（1988：58）注一：周恩来1967年2月26日接见《中国建设》一些人员时，说到“十六条”早已被突破，“四大”变成“五大”。另一大即大串联。赵无眠（1996：13）认为，“四大”实际上是“一大”，即大字报。这种说法忽略了小报（当时称“红卫兵小报”）在一段时间里所起作用。关于小报，我将另作讨论。
3. 文革后期城市街头引起围观的大字报，尚有武汉署名“杜则进”公开张贴的系列文章、赣州青年李九莲的大字报、南京青年徐水良题为《反对特权》的大字报（杨继绳2016：877, 887, 966）。我记忆中文革后期的大字报潮，即有由“知青家长”李庆霖得到毛的回应的信引发的“反对‘走后门’”。1980年代仍有大字报，往往被限制在单位、学校的围墙之内。
4. 前的说法不尽可信。较为合乎事实的说法或许是，有自发，也有来自外部的启发、推动。关于聂元梓领衔的大字报产生的背景，参看卜伟华（2008：126–128）。关于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毛的写信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尚可参看阎长贵的《点燃文化大革命的三把火》一文（阎长贵、王广宇2010）。陈佩华（1997：193）注意到她的一个受访者“一次次地谈到‘赶潮流’‘跟形势’‘卷入潮流’”。
5. 1964年7月14日发表的“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简称“九评”）第九篇《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提到“苏联特权阶层”，说：“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为文革中对“特权阶层”的批判提供了思想资源。1964、1965年之交毛（1998：11. 265–266）《对陈正人关于社教蹲点情况报告的批语和批注》中有如下表述：“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南斯拉夫密洛凡·德热拉斯（1963）的《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一书，尽管系内部发行，对于有可能读到该书者仍有相当大的启发性。陈佩华（1997：217）在《毛主席的孩子们》第三章的注释中说，“虽然吉拉斯（Milovan Djilas）并不为年轻人所知，但他们的批判却表明，他们认识到一种吉拉斯所定义的‘新阶级’已在社会主义中出现。”应当说，文革中关于“特权阶级”的思路，也凭借了“阶级斗争”的视野，凭借了这一视野所训练的敏感（关于“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作为背景的，是关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一整套论述。
6. 官员享有的特权，是文革中曝光率较高的方面。有关揭发往往引用财务统计以增进可信性，如《赫鲁少奇在昆明》（谭放、赵无眠1996）。刘少奇不安于昆明方面对自己的接待，本可由正面解释，却被大字报作者指为“伪君子”“伪善”。仅由收集的大字报看，其时批判“特权”者掌握的资讯有限，更多隐秘的特权、复杂的等级差别，普通民众无从知晓。关于1949年后官员的特权，参看杨继绳（2016：45–48）。
7. 杨奎松（2009：451, 456–457）谈到，“讲平等、平均的共产党制定的级别及分配标准还高于并不讲平等、平均的国民党制定的级别及分配标准，这无论如何有些吊诡。而尤为关键的是，这种等级差别的规定，还并不，甚至主要不是表现在工资多少上，它更多地其实是表现在无法从工资数字上反映出来的各种物质待遇上，这就更是国民政府时期文官薪给制所不能及的了。”“一般人往往忽略了高官按照等级所能够享受到的极为特殊的待遇。而这种种待遇，在其他西方国家一般是无法想象的”。中共建政之初有关各级干部

在工资以外待遇的规定，“很大程度上参考了苏联人的做法”，不厌其细。

8. 同篇大字报还引陈所说“什么人都到外交部看大字报，特务、反革命、牛鬼蛇神都来看”（第323页）。据卜伟华（2008：191），最初尚考虑到“内外有别”，顾忌“国际形象”、外国人的观感，后这一层禁忌也被打破。毛在1966年8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后涉外“革命行动”愈演愈烈，冲击国际列车，莫斯科红场冲突，直至火烧“英代办”（英国驻华代办处），已然失控。对“国际形象”又绝非不在意。文革后期大举批判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摄制的纪录片《中国》即可为证。1967年1月17日林彪致信《解放军报》社，说为照顾“解放军的威信”“照顾国际影响”，对此报社采取“内批外帮”的方针（宋永商毅 2002）。关于文革中的涉外事件，参看卜伟华（2008：558–572），杨继绳的（2016：31章）。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事件，卜著与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和沈迈克（2009）记述均详。该书与卜著引用了英国记者对现场的报道。卜著还摘引了“美国友好人士”韩丁有关此事件的访谈记录。
9. 1966年8月12日毛《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101页）“有人”即陈独秀。陈独秀曾创作民歌《国民党四字经》发表于1927年12月26日《上海工人》第43期，当时流传较广。其中有“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以党治国，放屁胡说；/党化教育，专制余毒……”
10. 接受访谈时袁庚华（2011）却另有一番见识，说西方“对官僚主义进行斗争的彻底性，远不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事实是，文革中对领导干部，保谁批谁，往往出于“圣意”。如保谭震林、李先念（戚本禹 2016：580）。高层人士的命运，系于最高领袖之一念。戚本禹试图解释陶铸的被抛出，不过制造了更多疑团，只能说“圣意”难测（同书第561页）。戚本禹的回忆录对江青多所回护，却也令人看到了江的以毛甚至以自己划线，如对王稼祥（第531页），对李富春、谭震林、王震、叶子龙（同上）：对运动操控之具体一至于此。
11. 王年一（1988：160）说，《公安六条》发布前，公安机关即于1966年12月中旬逮捕了写大字报、大标语批评、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和林彪的人。“有人为写《致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的伊林、涤西被捕鸣不平，也被逮捕。有人为‘虎山行’的大字报辩护，也被逮捕。”卜伟华（2008：240）：“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大城市8月23日至10月3日……破获现行反革命案件1788起”。
12. 印红标（2009：3、41）关于文革中的“大民主”，说，“在1966至1968年红卫兵运动阶段，群众可以运用大字报、报刊、集会演讲等相当广泛的‘大民主’方式，在中央认可的范围内发表言论”，1968年秋季以后则不再享有这种“自主发表言论的有限机会”。他还说，文革中“对保守派的压制，也揭示出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不是对所有群众开放的公正的民主制度，而只是按照既定的政治目标，为发动群众运动而使用的工具”；对“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则照样压制以至镇压”“甚至动用专政机关对反对派群众进行逮捕、关押，其做法比工作组有过之而无不及”。
13. 1966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毛的意见，发出《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即由军队执行军训任务。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对电台实行军事管制。“军队由此开始执行军管任务”（王年一 1988：194）。同日，另有《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保护银行的通知》。1月12日，毛批准同意《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其中规定“地方的电台、监狱、仓库、港口、桥梁，由军队负责守卫”。2月1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同年3月10日，决定对江苏省实行军管。3月13日，周恩来宣布：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单位，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边防、沿海、交通要道（码头、铁路局、海港）、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企业事业单位，都应实行军事管制。他在报告中说：“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天津市），已经实行军管或等于实行军管的加上已经批准准备实行军事管制的有十

个：陕西、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同上）3月16日和24日，毛先后批准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对需要实行管制的厂矿的布告和聂荣臻提出的对国防工业各部的研究院、所，以及科学院所属承担国防任务的各研究所，实行军事管制的意见。5月28日毛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对国务院××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到1967年下半年，“全国绝大多数的省、市、自治区，中央、国务院各部委，一些重要的铁路枢纽站段，大型工矿企业、港口码头、医院、银行等，都实行了军事管制（教育部、文化部由中央文革小组派人负责处理两部的事宜）”（逢先知、金冲及2011：2440、2443、2444）第2446页）。1967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有中发〔67〕379号《关于公安机关实行军管的决定》。事实上实行“军管”的不止公安机关，而是“公、检、法”。1968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命令》，对全国体育系统实行军管。同年9月2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工人进军事院校及尚未联合起来的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通知》。“大多数的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实际上是军管会的变种”（王年一1988：297、304、306）。关于全国实行军管的省、自治区、大城市、专区（包括自治州和特区）、县，实行军管的中央部委、广播电台、报社、公安部门、铁路局、港口、厂矿、军队单位，参看卜伟华（2008：432-433、539）。据该书，全国大部分地专以上所属的银行和仓库实行了军管和军事保护。匪夷所思的是，被军管的单位尚有解放军总政治部。军队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行政事务中的作用前所未有的。

14. 莫里斯·迈斯纳（2001：518-519）谈到，“1954年宪法批准的某些自由权利在1975年宪法中被取消了，最突出的有‘公民有从事科学、文学和艺术创作及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和‘居住与迁居的自由’等。这反映了当时普遍的专制特点。另一方面，新宪法又增加了公民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的权利。这又鲜明地体现了文化大革命的特点。根据毛泽东个人的指示，新宪法补充的一条新的自由权利是罢工自由。”补充的这一条自由权利能否兑现，检视文革后的历史即不难知晓。至于文革期间工人的停工停产与破坏国家财产，属于不同性质，与宪法赋予的民主权利无干。1975年“全面整顿”期间，由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而未公诸于世的文件《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中，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它们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这些武器来反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来反对无产阶级。”（参看杨继绳[2016：910]）。这种表述，我们都耳熟能详。《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则有文革后“取消了不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所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表述。
15. 杨曦光（1994：80、113）说他在看守所读毛1949年后的内部讲话，“发现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前期毛泽东的很多观点都是想避免斯大林道路，想摸索社会主义民主的方式。看起来他那时的观点是真的想搞自由化，而不是像后来他说的只是‘放长线钓大鱼’。‘放长线钓大鱼’与其说是毛泽东的阴谋不如说是他的新的自由化试验没有得到党内大多数实力派的支持及他发现知识分子的多数并不真正喜欢共产党后的一种自我解嘲的说法”。该书还说看守所中的一个“难友”与他持相近的观点。关于文革，宋永毅、孙大进（1997：20）一书说，“这作为毛泽东所号召的群众性的造反运动的发端，是否也带有相当的民主性或人民性？答案是肯定的。”只不过压抑既久后引发强力反弹，所释放的巨大社会能量不能实现有效转换，“清查‘五一六’‘一打三反’等运动对应声而起的‘造反’者的清算，足以令人认为是另一次‘引蛇出洞’的‘阳谋’”。
16. 袁庚华（2011）接受访谈时，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民主”（亦曰“四大自由”）为“政治民主”；以《鞍钢宪法》为“经济民主”；以文革中的“群众专政”为“司法民主”。戚本禹（2016：478）：“我想文革运动中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体现的言论自由；红卫兵组织、群众组织的成立体现的结社自由；这种大民主的形式不应简单否定，而应认真总结，以法律形式完善、规范。”戚有意回避了上文提到的“被自发”，言论的受制于《公安六条》，群众组织的被操控。至于“出版自由”的被随时收回，牟志京等人（2012、2013）的《中学文革报》可为例（参看牟《似水流年》，收入《暴风雨的记忆》）。
17. 上文讨论“四大”，集中于大字报，“小报”，将在其他处讨论。还有必要说明，无论本文一再引用的《文革大字报精选》，还是整理印出的《复旦大学大字报选》，均不能反映文革期间大字报的一般水平。后者因出

自高校且名校，较之街头的大字报，行文较文明。泼妇骂街、恶徒诟詈式的大字报，文革中触目皆是。知识分子未见得较小民文雅，但不入流的大字报通常不会进入选本。仅据选本想象其时的“四大”，难免对“群众运动”中丑恶肮脏的一面估计不足。此外也应当说，一个单位的大字报，即使当时有“爆炸性”，引起关注，也势必因时过境迁，难以还原“其情其境”。大字报时效不同，史料价值亦互异。因此又有精选之必要。

参考文献

- 佩里·安德森。2001。《思想》集刊第18期。
- 卜大华。2011。“我所知道的红卫兵。”《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米鹤都主编。香港：中国书局有限公司。
- 卜伟华。2008。《“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陆键东。1995。《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北京：三联书店。
- 陈佩华。1997。《毛主席的孩子们——红卫兵一代的成长和经历》。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 陈益南。2006。《青春无痕——一个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 陈宜中。2001。“永远的造反派：袁庚华先生访谈录。”《思想》集刊第18期。
- 冯雪峰。2017。《冯雪峰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冯亦代。2000。《悔余日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 韩丁。2008。《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香港：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
- 韩少功。2013。《革命后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 胡发云。1998。“红鲁艺。”《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徐友渔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 何蜀。2010。《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三联（香港）有限公司、香港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
- 金大陆。2011。《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
- 剪大富。2011。《回忆与反思——口述历史》。香港：中国书局出版。
- 李宝臣。2011。“往事岂堪容易想。”《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北岛等主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 李冬民。2015。“几度风雨几度秋。”《回忆与反思》。米鹤都主编。香港：中国书局有限公司。
- 李慎之。2013。《向党认罪实录——李慎之的私人卷宗》。香港：新世纪出版及传媒有限公司。
- 李逊。2015。《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 陆定一。1992。“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陆定一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 鲁迅。1981。“死”。《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密洛凡·德热拉斯。1963。《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陈逸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 麦克法夸尔、沈迈克。2009。《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台北：左岸文化出版社。
- 莫里斯·迈斯纳，2001，《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毛泽东。1977。《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毛泽东。199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 毛泽东。1966。“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牟志京等。2012、2013。“似水流年”。《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北岛等主编。北京：三联书店。
- 逄先知、金冲及。2018。《毛泽东传》第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 戚本禹。2016。《戚本禹回忆录》。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
- 钱谦益。1996。《牧斋有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 沈从文。2015。《沈从文家书》。北京：译林出版社。
- 宋永毅。2002。《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 宋永毅、孙大进。《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香港：田园书屋。
- 谭放、赵无眠。1996。《文革大字报精选》。香港：明镜出版社。
- 托克维尔。1992。《旧制度与大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
- 王年一。1988。《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 王若水。1989。“从批‘左’到批右的转折。”《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余习广主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 王力。2001。《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
- 韦韬、陈小曼。2008。《父亲茅盾的晚年》。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 阎长贵、王广宇。2009。《问史求信集》。北京：红旗出版社。
- 阎长贵、王广宇。2010。《问史求信集》。北京：红旗出版社。
- 杨继绳。2016。《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香港：天地圖書。
- 杨绛。1981。《干校六记》。北京：三联书店。
- 杨奎松。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 杨曦光。1997。“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中国向何处去？”。《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宋永毅、孙大进主编。香港：田园书屋。
- 杨曦光。1994。《牛鬼蛇神录——文革囚禁中的精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 叶维丽。2008。《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北京：新华出版社。
- 印红标。2009。《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 尤西林。1998。“文革境况片断。”《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徐友渔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 余习广。1989。《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 袁庚华。2011。“永远的造反派：袁庚华先生访谈录”。《思想》第18期。
- 遇罗克。1999。《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 张新颖。2014。《沈从文的后半生》。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者永平等编。1998。《那个年代中的我们》。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专稿】

文化大革命的三次发动

印红标

内容提要：文革的发动经历了三个阶段，或曰三次发动。1966年5月和6月首次发动，运动在文化教育界展开。7月下旬和8月再次发动，工作组撤出学校，红卫兵先后在学校和社会掀起狂暴之风，却没有在文教界之外指向当权派。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第三次发动。群众运动的矛头被引导到冲击地方和基层党政领导，批判“资产阶级司令部”，实现了重点进行党内斗争的目标。本文着重指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启了第三次发动。

关键词：文化大革命、发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文化大革命确是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其发动并非一路畅通，而是面对阻力，一波三折，呈现阶段性。毛泽东最初对于文革的目标、方式、没有做出清晰说明，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干部和民众对文革的理解存在差异甚至冲突。在运动发动的过程中，毛泽东不止一次采取重要措施，指导或矫正运动的方向，包括召开重要会议，撤换领导人，重组群众运动的主流构成等，最终将运动的矛头指向他设定的目标。有学者概括这种情况为文革的发动与再发动¹。本文认为：文革的发动，经历了三次，表现为三个阶段。这三次发动，除了已经有学者指出的，发生在1966年5月至6月初的第一次，7月底8月初的第二次之外，10月开始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可以称作第三次发动。²

本文依据既有资料和研究成果，提出文革三次发动的框架，以便于理解文革发动的曲折历史过程。

一、第一次发动及第一阶段：1966年5月至7月中旬

文化大革命第一次发动的标志性举措是：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布《五一六通知》和6月1日毛泽东决定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此阶段，运动以文化教育界为突破口，学校停课，诸多文化界知名人士遭到批判。毛泽东滞留南方，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并领导运动。从中央到基层的党政领导体系掌握着运动的领导权，在党政领导瘫痪的文教部门，由上级党委派遣工作组（或工作队）接替党委、党支部的领导职权。群众运动的态势与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及1963年之后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似。

1965年11月，江青在上海密谋姚文元发表《评

¹ 王年一（1996：9）依据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革的“再全面发动”的标志。参见安建设（2009）。

² 卜伟华（2009：77）提出：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是继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对文化大革命进行的再一次发动。笔者曾与历史学者叶维丽（2013：19）谈过文革三次发动的观点，第三次发动是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向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发难，看似 1963 年之后文化艺术领域批判的升级。从此时至 1966 年 5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前，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或文革全面发动的准备阶段。在此期间，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领导人在高层开始受到批判。

1966 年 5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当时毛泽东继续留在南方，没有出席会议，但是会议按照毛泽东会前的安排进行。刘少奇主持会议，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请示汇报。会议集中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通过决议，停止或撤销四人的职务，成立审查委员会进行专案审查（王年一 1996：18-30）。

5 月 16 日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通知宣布：中央决定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会后，宣布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等人任副组长。中央文革小组的设立对于文革具有全局意义，日后它在文革运动中起到了特殊的重要作用。从 8 月 30 日开始，江青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代组长、实际的领导人。

五一六通知的基本内容是批判彭真主持制定的关于学术讨论的“二月提纲”，通知宣告：文化大革命是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尖锐的阶级斗争，也是严重的政治斗争。这场大斗争的目标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

毛泽东在修改时，加写了几段党内斗争意味强烈的话。通知说：为要彻底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学术权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以及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些代表人物，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通知的叙述逻辑是：为了要进行思想文化意识

形态领域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必须同时批判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给人的印象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文化革命”，即文化界的革命以及清除资产阶级在党政军文各界的代理人的斗争。当时，党内外极少有人会想到，或者不敢想所谓“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指位居党中央第二位的领导人刘少奇。

5 月 18 日，林彪讲话，谈防止政变、反复辟和颂扬毛泽东是天才。

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会议，被作为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标志。当时对于运动的任务、重点、主要方式、群众和党的组织在运动中的地位等问题，都没有明确的说明，党内外普遍认为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

6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此后几日连续发表社论，宣传五一六通知的精神，营造革命的舆论。

在批判彭真和五一六通知的鼓励下，5 月 25 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 7 位党员教师贴出大字报，指责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和北大校党委主要领导。1966 年 6 月 1 日，毛泽东指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北京大学大字报。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一张大字报》并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题，全文刊发大字报全文。此举点燃了文化教育界群众运动的烈火。

《人民日报》转发聂元梓等人大字报事实上给学生们树立了榜样，各地学生纷纷效仿，质疑本校领导。继北京大学之后，清华大学、南京大学等一批高等院校以及一大批中等学校的领导的主要领导遭到停职、批判、斗争。全国范围内的大中小学相继停课，很多学校的领导人无力履行职责。

面对学校的混乱局面，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请示毛泽东，得到毛泽东相机处理的指示，决定由上级党委向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运动，工作组根据具体情况替代或协助原校领导，这是沿袭以往领导群众运动的方式（王年一 1996：35）。工作组沿用了 1957 年反右派运动和

1963 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办法，强调党的组织领导和政策，矛头主要对着知识分子和文化教育界的领导人。

6月20日前后，即工作组进校大约两星期，北京一些学校先后发生学生质疑、批评、反对，甚至驱赶工作组的事件。造反的学生往往思想激进，其言论或有部分道理，或小题大做、强词夺理，而关键问题是挑战工作组的领导权威。中央和北京新市委认为，这是干扰运动的健康发展，进行了“反干扰”运动，以政治高压应对不同意见，对提批评的学生进行劝诫、反击、围攻、将其中激烈者定为“假左派、真右派”“反党分子”。北京市有一百几十名学生被打成反革命，受打击的学生恐怕不下数十倍（王年一 1996：43）。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西安交通大学学生李世英等人因挑战工作组及省委被打成右派、反革命；清华附中红卫兵不愿服从工作组的指挥，与工作组发生摩擦与冲突。这些典型事件后来受到毛泽东的特别关注。

6月20日，在北京等地发生一些学生驱逐工作组事件的时候，中央出现了两种意见。中央文革小组向中央提出书面建议，“建议全国大中学校、机关单位在合适的时候成立文化革命小组，领导文化革命运动。”“在最必要的地方，最必要的时候可以由上级派工作组。”7月13日、19日和22日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三次在中央会议上提出撤出北大工作组，均被邓小平等多数人否定（王年一 1996：46）。

这一时期，中央和各地党委将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组织群众进行批判、斗争，同时将一些主管宣传或文教工作的领导人抛出来进行批判。工作组在学校引导学生对教师、文化界人士及学校领导进行批判斗争，同时要求服从领导，注意政策。

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听取汇报之后，对运动的状况、工作组领导运动的方式、中央第一线制定政策的刘少奇表示极为不满，要求撤销工作组。7月24日、25日他在召集中央文革小组和各

大区书记谈话时说：“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阻碍革命势力，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

“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成立革命委员会。”又说，“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起破坏作用，阻碍运动。”

“凡阻碍一斗二改者，统统驱逐之。”（中央文献研究室 2003：1423-1424）毛泽东回到第一线直接领导运动，这导致文革的再次发动。³

谈及刘少奇领导文革运动的 50 天，人们常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毛泽东已经不信任刘少奇，还要让他领导运动？“欲擒故纵”，让对手犯错误似乎是合乎情理的解释。³

此外，文革结束后，官方的文革史通常回避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这一期间，中央及各省市党委抛出一批党内文化教育界领导人，以及批判文化界知名人士的事实。例如：中央决定将高教部长、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蒋南翔、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等人停职，交群众批判。这些举措实际上与林彪、江青的关系和责任很少。

二、第二次发动与第二阶段：1966年7月下旬—9月底

7月下旬毛泽东回到北京后，指责刘少奇犯了路线错误，回到第一线重新部署运动。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指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运动方式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全面选举产生的文化革命委员是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毛泽东支持了自发的学生组织——红卫兵。然而，很多学校的运动在工作组撤出之后，仍然在地方和基层领导人的掌控之下。八月下旬，红卫兵发动的破四旧运动，暴力冲击社会基层。群众运动的主要矛头没有指向党内。

批判工作组是毛泽东再次发动群众运动的开端，由此打破了刘少奇主持中央，在一线指挥运动的格局。毛泽东指责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犯了路线错误，要求撤出工作组。8月1日，毛泽东写信

³ 王年一在一份未刊稿中谈及这个观点。

給曾經與工作組發生摩擦的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表示熱烈的支持。這既是支持紅衛兵批評工作組，又可以延伸理解為群眾可以在黨組織直接控制之外自發成立團體。8月5日毛澤東寫《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严厉斥責道：“在五十多天里，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並以“發人深省”的方式不點名地示意：炮打司令部的目標是劉少奇。毛澤東給紅衛兵的信和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作為八屆十一中全會文件印發。

1966年8月1日至12日召開的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是文革第二次發動的最重要步驟。全會由毛澤東主持，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這是繼《五一六通知》之後又一個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進一步確定了五一六通知中闡述不夠清晰的政策，回答了通知發布後兩個多月運動中新出現的問題。

關於運動的目標和任務，十六條明確提出：“我們的目的是斗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評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評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藝術，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即“一斗、二批、三改”。十六條着重指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就糾正了五一六通知之後，黨內外普遍認為文化大革命是文化界革命的認識。

關於運動的方式，十六條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不能採用任何包辦代替的辦法。”“要充分運用大字報、大辯論這些形式，進行大鳴大放”，即大民主的方式。

十六條提出要像巴黎公社那樣，由全面選舉產生文化革命的權力機構——文化革命委員會。這實際上否定了黨的基層或上級組織直接或派出工作

組領導運動的方式。

十六條還為保護群眾批評領導的活動，提出：“警惕有人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有些學校、有些單位、有些工作組的負責人，對給他們貼大字報的群眾，組織反击，甚至提出所謂反對本單位或工作組領導人就是反對党中央，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就是反革命等類口號。他們這樣做，必然要打擊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積極分子。這是方向的錯誤，路線的錯誤，決不允許這樣做。”這些規定都是針對黨委或工作組在群眾中打擊“反革命”的作法。為防止把群眾打成反革命，十六條還特別規定：“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運動的後期酌情處理。”這些規定被造反派當作护身符。

十六條還做出了一些政策規定，例如：“這場鬥爭，要文鬥，不要武鬥。”又如：在一般情況下，領導幹部中，好的和比較好的是大多數。但是這些政策在運動中沒有得到認真執行。

全會及會後中央進行了組織調整，毛澤東回到第一線領導運動，林彪實際上成為黨的唯一的副主席，劉少奇從黨內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鄧小平從第七位變為第六位。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包括領導文化大革命運動。

8月和9月，學生走出校園，出現了兩個方向的活動：少數派學生矛頭向上，追責工作組及其上級領導，纏鬥不已却障礙重重。老紅衛兵和多數派學生矛頭向下，以“破四舊”運動為中心，打擊“牛鬼蛇神”⁴、階級敵人，受到傳媒贊賞及各級領導的認可，震驚社會。

8月23日《人民日報》頭版發表了兩篇社論，表示文革最高領導對這兩類活動的支持。一篇刊載於頭版上半版顯要位置，題目是《工農兵要堅決支持革命學生》，針對一些地方的黨委領導動員工农保卫党委，把批評黨委、造黨委反的學生說成反革命的現象，支持學生斗争走資派，並非要求工农支特破四舊。這篇社論傳達了兩份中央文件的精神：

⁴ 牛鬼蛇神沒有確定的定義，最初泛指所有的敵人，後來逐漸偏重指那些在文革之前已經被打倒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等“階級敵人”以及資本家；還有文革初期已經被批評、打倒的教師、校領導及其他文化教育界人士。通常不包括即使有爭議的在位的領導人。

8月21日《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和22日《中央同意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⁵这两份文件十分明确地指出，是针对北京之外的桂林、西安、兰州、哈尔滨等地学生游行、集会，与工人、警察即不同观点学生发生冲突的情况，这些地方还没有开始破四旧活动。

另一篇社论题为《好得很》，刊登在头版下半版左侧次要位置，字数少一半，内容是欢呼北京市红卫兵的破四旧活动。人民日报的版式显示，中央支持的重点是冲击当权派，但是实际的情况却是破四旧运动受到传媒欢呼、赞赏和领导人的普遍认可，在群众运动中占有了压倒的优势。

毛泽东要炮轰中央的“司令部”，破四旧却横扫社会基层。毛泽东对红卫兵的破四旧运动最初赞同，也有所保留，后来逐渐表露出不满意。毛泽东曾对前去汇报的吴德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所谓“也好”，恐怕是既赞同又语带保留。1966年8月30日他又说：“现在学生对一斗二批三改不感兴趣，心思不在学校，要到社会上去横扫牛鬼蛇神。一斗二批三改是我讲的，现在学生不听了”（吴德2004：27；中央文献研究室2013：618）。

9月18-20日，中央文革小组和军委文革小组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召开大专院校部分师生座谈会，参加的是少数派学生。会上有学生反应：受打击学生的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他们依然是少数。有学生提出文化大革命存在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抱怨周恩来“搞调和”“怀疑现在是否还有一个暗中与党中央、毛主席对抗的司令部”（王力2001：946；卜伟华2008：274）。⁶座谈会纪要由中央文革小组转给毛泽东。

据时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王力回忆，此时，毛泽东形成了这样的看法：“从八月八日（引者注：通过十六条的日期）到九月，整个运动是向前的。但是，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特别是批判错误路线的

严肃的坚定性和彻底性。”（王力2001：947；中央文献研究室，2003：1446）据此，毛泽东决定发动新的运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将运动的大方向扭转到党内路线斗争。

三、第三次发动及第三阶段：1966年10月—1967年1月）

毛泽东不满8月和9月运动的发展态势，在10月发动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打破了地方和基层党政领导人对运动的直接或间接掌控，实现了“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将群众运动的主要矛头扭转到斗争党内，冲击当权派，揪斗走资派，批判刘少奇“司令部”。这可以视为第三次发动。

7月底、8月初刘少奇被批判，失去了主持中央工作的权力，靠边站了。但是毛泽东不愿就此止步，为什么？参照延安整风等党内斗争以及苏联的历史，是否可以做出如下推测：

其一，在政治和组织上，毛泽东不仅要罢黜刘少奇个人，还要深入追究、撤换其“司令部”的要员，以及为数甚多的追随者，即“走资派”。

其二，在思想上彻底批判、肃清刘少奇的“路线”（即其思想和政策主张），使毛泽东的“路线”和思想掌握全党以及党外群众，如同延安整风那样，批判和肃清王明路线，树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而不仅仅是撤销王明的领导职务。深入进行思想批判也有利避免再次出现罢免彭德怀之后，不断有人为其鸣冤或重提相似主张的情况。更远一点说，为了防止出现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历史重演。

其三，毛泽东不满领导干部的状况，对于仅仅依靠党的领导人完成上述任务不抱希望，而力求在党外群众尤其是青年人中动员进行党内斗争的支持力量。1964年底，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严重分歧，党内高层拥戴毛泽东，却努力化解毛刘危机，而没有搬倒刘少奇。这次毛

⁵ 两份资料见：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1988：90-91）。

⁶ 又据笔者2017年夏季听取当年与会者对会议部分情况的回忆。

毛泽东要借用大民主的方式，借用党外群众的力量进行革命。林彪在中九大报告解释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时提到毛主席1967年2月的一次谈话，毛泽东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林彪代毛泽东解说道：现在，我们找到了这种形式，它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另一个参照是：1957年春毛泽东计划通过发动党外人士“鸣放”帮助整顿党内干部的官僚主义等作风，但是后来斗争方向反转，把党外提批评意见的人打成“右派”，党的领导干部对这一转变着力甚著。这次，毛泽东不能允许主要矛头再次转向党外，致使文化大革命偏离他预期的轨道，乃至半途而废。

1966年10月的第一周，毛泽东发动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10月1日，由毛泽东审定的林彪在国庆庆祝大会上的讲话提出：与“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当天晚上毛泽东决定调整提法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王力2001：946–948；卜伟华2009：73）。2日，《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要求：“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5日，中共中央转发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主要内容包括：要求为在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平反；撤销军委和总政做出的军队院校在工作组撤出后由校党委领导等决定。6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三司”）在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召开有十万各地师生参加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领导人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全面展开。

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这是继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第三次发动的重要会议，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在会议上讲话，陈伯达做了会议的主旨报告。报告最初的题目是《两个月来运动的总结》（陈晓农2005：297–298），报告稿传达了毛泽东的意图并经毛泽东的修改和与会者的修改，最后定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这两个标题显示：报告针对的是前两个月的运动状况，中心是路线斗争问题（陈伯达1988：133–141）。

陈伯达的报告说：“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就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八届十中全会做出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之后，“纠正了前一个阶段的错误路线，即资产阶级的路线。但是错误路线，还可以用另外一些形式出现。”文化大革命中路线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而且还会经过多次的反复。

针对8月至9月的运动进展，陈伯达强调了平反、批判血统论、大串联等问题。他强调认错、平反和支持群众的重要性，说：“区别改正错误或坚持错误的标志，是对群众的态度，是否公开向群众承认执行了错误路线，是否给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认真平反，并且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

陈伯达要求坚持毛主席提出的阶级路线，团结大多数，反对用血统论代替阶级论。他尖锐地批判红卫兵中流行的“自来红”“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观点，说：“这是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他反对在学生中划分“红五类”“非红五类”或者“黑几类”。他明确地反对“高干子弟要掌权”的说法，重申不久前的建议：如果高干子女在学校和单位占有领导岗位的话，应当让给工农兵和普通干部子女担任。陈伯达批判血统论的观点，不仅是他个人的观点，更是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⁷

此外，陈伯达报告还大力提倡学生串联。说：串联是“让学生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形式之一”，批评很多领导干部怕乱，不支持大串联。不同单位，不同地区学生之间的串联，意味着突破单位管理体系，其直接作用是促使在各个单位内处于分散、孤

⁷ 陈伯达批判血统论的观点，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王力2001：645）。

立状态的少数派学生通过交流、声援，聚集成可观的政治力量。此外，串联还使地方和基层领导难于对外来的学生施压或实施惩治（李逊 2015：158-162）。

所谓“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要平反、批判“血统论”和鼓励串联都起着削弱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对运动的操控能力，促进群众摆脱党委控制的作用。

毛泽东重视并赞同陈伯达的报告，先后做 4 次批示。报告作为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下发，继而印发县团级干部。不久，报告通过红卫兵小报和传单等渠道在群众中广泛传播。⁸

10 月中央工作会议主要是解决八九两个月主持中央工作的总理、陶铸，以及各省市市委的问题。毛泽东认为他们在这两个月中对路线斗争是不明确的，不坚决的、不彻底的。毛主席从九月就形成了这个概念（王力 2001：625、679）。就是说，第三次发动，源于对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陶铸不满意，但毛泽东不准备抛开周恩来，最初也不准备整倒陶铸，主要是要扭转运动的大方向。此后，周恩来仍然主持中央工作，但是受到削弱，江青主导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政治作用增长。陶铸、王任重在运动深入之后，加上涉及他们负责的中南地区运动的问题，最终遭到批判，被打倒。

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表面上指刘少奇 50 天的路线，实际上对着 8 月至 9 月周恩来、陶铸等人领导运动的一些作法，认为这些做法是在新形势下继续刘少奇压制群众的路线，必须改变。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推动了造反派的兴起。中央支持的平反活动，赋予被党委和工作组打击的群众进行反抗和发泄不满的机会，动员了原来政治上处于边缘状态的群众。批判血统论则给予了因为家庭出身被歧视、被排斥的学生参加运动的机会，动员了因社会关系处于边缘地位的学生。这些人有了被毛泽东“解放”的感觉，发自内心地愿意跟着领袖参与路线斗争。这些在阶级斗争的话语下

难免被动的人们，在路线斗争的话语下成了与错误路线斗争的先锋。各省市自治区造反派冲击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活动逐步升级。11 月以后，工厂也实行大民主，工人造反派组织迅速发展，成为造反派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指出的是：此时中央要求予以平反的，是文革开始之后大约四个月，刘少奇及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期间，被打击的学生及群众，而不是文化界的领导及文化界知名人士，后者继续是被批判斗争的对象。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使党政领导干部失去了政治权威地位，不能继续领导运动。所谓资反路线是刘少奇主持中央时期通过党的组织体系贯彻实行的，因而，所有在文革之初位居领导岗位的党内当权派都是执行者。于是，尽管他们不是路线的制定者，也要在群众面前检讨自己执行了错误路线，为被自己打击的群众平反，面对愤怒的、有理或无理的指责。领导人从此人人自危，其中很多人从运动领导者变为批判斗争的对象。当权派丧失了领导或掌控群众运动的地位，群众实现了“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实现了不受当权派管制的群众性大民主。随着运动的发展，地方党政领导机关逐渐不能正常工作，陷入半瘫痪或瘫痪状态，社会秩序和正常生产难以维系。在造反派组织日益活跃的同时，党的基层组织活动陷于停顿。

领导层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普遍不理解，甚而予以抵制，却又无可奈何。毛泽东发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事先没有征求周恩来的意见。10 月初，《红旗》13 期社论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周恩来向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合适吗？历来党内提路线问题，都是左倾右倾，没有“反动路线”的提法。毛泽东坚持，周恩来回答说：“我懂了。”显然，周恩来对此有保留，提出了疑义，但是毛泽东决心已下，周恩来只能执行（王力 2001：627）。中央文革小组在讨论《红旗》13 期社论稿的时候，陶铸和王

⁸ 毛泽东赞赏陈伯达的这个报告。10 月 24 日，在讲话稿上批示：“改稿看过，很好。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二本。”11 月 6 日毛泽东再次批示缩小下发的范围：“第一步拟以发至县、团级为宜，待县、团籍以上多数干部思想通了，再往下发”（毛泽东 1998：12.140-141）。11 月 9 日中央办公厅将修改后的陈伯达讲话印发县团级。

任重曾托人转达建议：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前面加一个“基本上”或“实质上”的限制词，表达了某种保留，但没有被采纳。⁹ 11月13日，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4位元帅在军队院校来京人员大会上对造反派冲击老干部的行为进行了抨击。但是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如同绳索，捆住了领导干部抗争的手脚。

1967年“二月抗争”中，李先念愤怒地说：“从13期社论开始，那么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打倒了。”很清楚，对于这些老干部而言，厄运是从《红旗》13期社论批判资反路线开始的。很多老干部可以接受对彭真的批判，对刘少奇的批判，但是不能容忍对整个老干部群体的冲击和对党的组织体系的触动。谭震林说得真切：“我不是为自己，是为整体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王年一1996：206-211）。

在批判资反路线运动中，与领导干部关系密切，在前一段运动曾经强势的老红卫兵、保守派也受到了批判，失去了群众运动的多数派地位，遂起而反对。他们的抗争在北京汇成所谓“十二月黑风”，其中以公开对抗中央文革小组的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最受关注。

毛泽东通过发动三次，终于突破党内的重重阻力，引导群众运动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和党内当权派，同时运动的领导力量、主流群众、运动方式等诸方面均扭转了8月和9月的态势。毛泽东把文革前和文革初处于边缘状态的群众发动起来，壮大了造反派队伍，这是一支为改变处境而心甘情愿跟着毛泽东，不妥协地与走资派斗争的社会力量。这次发动的代价也很明显：党的地方和基层组织瘫痪，整个领导干部群体受到冲击，因而开始与文革结怨，埋下了十年后否定晚年毛泽东的根子。

四、结语

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斗争所谓“党内走资本主

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党内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党的领导干部群体对此“很不理解”，执行“很不得力”，甚至抵制。这是文革发动过程中最大的阻力和难点。毛泽东经过三次发动才使运动的主要矛头指向斗争党内走资派。至于文革第二位的任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在党内很少阻力，无非是再来一次1957年反右派斗争。实际上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时期，运动就是沿着这样的路子进行的。

在文革发动的每个阶段，中共中央都举行了一次重要的会议；通过了指导性的文件；发生中央或地方领导人的重大变更，批判、打倒了一些重要的领导人；从而使群众运动的构成和方向表现新的形态，最终达致自下而上发动群众，运用大民主的方式，冲击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批判和打倒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及“资产阶级司令部”。

第一次发动，群众运动在学校及文化教育界展开，批判学术权威和旧意识形态的活动开始进行，但基本限于文化教育界，主要是学校。党内外对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标不甚明了，多以为是文化界的革命。毛泽东让刘少奇领导运动，有欲擒故纵之嫌。

第二次发动，毛泽东回到第一线领导运动，刘少奇、邓小平遭到批判，离开领导岗位，周恩来继而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并领导运动。工作组受到批判，但是以干部子女为核心的老红卫兵和维护工作组的保守派学生仍然是多数派，起主导作用。红卫兵热衷于文化教育界的批判以及破四旧运动，矛头向下暴力打击以党外人士为主的“牛鬼蛇神”，受到官方媒体和当权派的赞赏；而冲击当权派的造反派遭遇重重阻力。运动偏离了毛泽东期待的斗争党内走资派的方向。

第三次发动，通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党内路线斗争压倒党外阶级斗争成为明确的政治目标及强势话语；造反派兴起并在全国各地掀起

⁹ 据王力写的一份材料（1980年7月22日），转引自王年一《关于〈红旗〉1966年第13期社论的一些资料》，《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11期。

冲击党政机关和领导人的高潮，群众运动斗争的矛头终于指向了党内当权派、走资派和刘少奇。随之，各地的党政领导机构陷于瘫痪或半瘫痪，党的基层

组织生活停顿。至 1966 年底，文革发动的任务完成。1967 年 1 月，造反派在毛泽东支持下开展“一月夺权风暴”，文化大革命进入新的阶段。

参考文献

- 安建设。2009。“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再发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修订本）第三卷。郭德宏等主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卜伟华。2008。《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
- 陈晓农。2005。《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
- 陈伯达。1988。“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1966 年 10 月 16 日）”。《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内部发行。
- 李逊。2015。《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 毛泽东。199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 王力。2001。《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
- 王年一。1988。《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 吴德。2004。《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 叶维丽。2013。“卞仲耘之死”。启之编：《故事不是历史：文革的纪实与书写》，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中央文献研究室。2003。《毛泽东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 中央文献研究室。201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5 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研究】

“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构想的提出与终结

——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分歧辨析之一

郭予庆

内容提要：建国初，刘少奇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构想。刘少奇与毛泽东在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农业合作化等方面发生了一些分歧。他们的分歧属于策略或枝节的性质，而在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根本方向上，刘少奇与毛泽东是明确一致的。之后，刘少奇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终结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构想，使他们之间的分歧得以消弭。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私人资本主义、农业合作化、刘少奇、毛泽东

1921年入党的刘少奇，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但在较长时间里在党内地位并不太高。刘少奇1943年跃升为排名毛泽东之后的三人中央书记处成员之一，“在党内实际上已上升为第二把手”（胡乔木1994：275），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信任¹。建国后的中共八大上他当选为排名第二位的中共中央副主席，1959年当选为国家主席。在长达二十三年中，他始终是党的第二领导人，参与了党的所有重大决策，与其间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但在建国后，刘少奇与毛泽东在一些方面的认识上发生了分歧，导致矛盾和裂痕产生。以至于在文革中，刘少奇被毛泽东被定为“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²，被彻底打倒。那么，刘少奇与毛泽东有哪些重要分歧？这些分歧的实质是什么？刘少奇是否有一条与毛泽东相对立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路线？本文

依据现有资料，对建国初，在“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方面，刘少奇与毛泽东发生的分歧进行梳理和辨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构想的提出

毛泽东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³。他指出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长，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毛泽东1966：644）。“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很长的”（《论联合政府》）。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协第一次会议通过

¹ 1946年1月7日，毛泽东在致斯大林的电文中说：“在我休息期间，我的日常工作由刘少奇同志接替。他完全可以胜任这方面工作。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3位书记之一，也是我党建立25年来未犯过原则性错误的人之一。15年前他曾两次到过莫斯科，在我党享有崇高威望。”《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第一卷，第121页。

² 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审阅、批示过的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首次不点名指称刘少奇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8页。

³ 有学者指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是抗战时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的宣言，是1945年后夺取全国政权的动员纲领，但一直停留在一种“说法”的层面，“从来没有认真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方案”。燕凌：《新民主主义的历史命运》，《炎黄春秋》2012年7期。

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国家”。

根据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共同纲领》，刘少奇主张新中国成立后要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建设，他把这段过程称为新民主主义阶段。1951年3月28日，他在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明确提出“现在要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刘少奇1985：62）。

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主要思路是：

第一，他认为“新民主主义阶段是过渡阶段也是准备阶段，即准备进入社会主义”（刘少奇1993：214）。“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这段时间，估计少则十年，多则十五年，二十年”（刘少奇1989：6）。

第二，他主张这个阶段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搞工业化，实行计划经济。他指出只要不发生战争，“我们的任务就一直是经济建设，把中国工业化”（薄一波2008：59），“在建设时期，除开必要的国防开支外，其它一切工作和其他均配合经济建设。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刘少奇2005：539）。他提出“力求走上计划经济——要资本家服从国家计划，小生产者受国家控制，……今后必须在国家统一的领导和计划下发展经济，不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完全自由地发展经济，没有国家的控制，或控制不确定不严格都是错误的”（刘少奇2005：539）。

第三，他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五种经济成分构成的国民经济（刘少奇1981：427）。应当使五种经济成分都得到发展。其中“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它可以使社会的经济命脉操在国家手中，而居国民经济领导地位”（刘少奇1981：427）。“国家要集中资金及人力、财力来发展国家企业。因此，它会发展很快，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也会越来越大，它的领导作用与控制作用也会越来越大”“私人资本主义也会发展，自然发展，资产阶级也会要加强一些，但它的发展速度要慢些，比重和作用反

而减少”（刘少奇2005：539）。这样发展的结果，达到“逐步地增加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性，以便逐步地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刘少奇1981：428）。

第四，他主张不要过早否定私有制。他说“私有制在今天中国的条件下，一般还不能废除，并对提高社会生产力还有一定的积极性”（薄一波2008：60）。“新民主义革命一般地不破坏私有财产的制度”（刘少奇1981：62）。中国产业落后，过早实行工业国有化，“对人民是无益的，伤害私人工业生产的积极性，无疑地是破坏当前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刘少奇传1998：690）。过渡时期“不要侵犯私人资本主义财产”“没收是打草惊蛇”（薄一波2008：60）在农村，不要过早动摇、削弱个体经济，发挥个体经济的积极性，鼓励劳动致富，提高农业生产，待条件成熟时，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

他主张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不应当采取社会主义实际步骤。1951年7月，他在中共第一次全国宣传会议报告中说“现在就有人讲社会主义，我说这是讲早了，至少讲早了十年”（刘少奇1993：182）。

“中国的前途，是要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去的”“但这是很久远的事情”（刘少奇1981：435）。

他指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是：经过新民主主义阶段建设，“工业大大发展了，农业也要有了大发展。国家经济的领导更加强了，变成绝对的了，经济管理工作的干部成熟了，数量也多了，党的技术干部也有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巩固了，那时就会采取进入社会主义的步骤”（刘少奇2005：541）。

在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构想下，刘少奇与毛泽东在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保存富农经济以及农业互助合作化等方面发生了分歧。

1. 关于天津讲话⁴

天津于1949年1月获得解放，共产党接管了城市，社会秩序稳定，但恢复经济的工作出现困难。

⁴ 刘少奇天津讲话的时间为建国前夕（1949年4—5月），但讲话内容集中阐述了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思路，是他“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故将天津讲话列入本文考察范围。

国营企业一时难于恢复生产，私营企业普遍停产关门，开工不足 30%（薄一波 2008：51）。大批工人失业，上百万人生活无着落，全市经济滑坡。造成困境的原因，除了城乡阻隔，外贸断绝、原料匮乏、通货膨胀等原因外，没有处理好公私、劳资关系是突出问题。

“所有城市的中心问题，在有计划有步骤地的复工，这一问题得到解决，则万事皆通，否则一切均谈不到”（薄一波 2008：52）。解决这一问题刻不容缓。于是，1949 年 4 月中共中央委托刘少奇前往天津指导解决如何尽快恢复城市生产问题。

刘少奇抵达天津后，到各主要工厂企业调查，听取党政各领导部门的汇报，召开各种座谈会，广泛听取干部、工人、资本家意见，发现工人和资本家都有许多模糊认识。

工人认为（1998：628），“在乡下分（地主）地，在城市里还是要分（资本家）”，以为共产党允许分厂、分店。天津解放后，一个月内发生 53 次自发的清算斗争（薄一波 2008：51—52）。工人普遍要求提高工资。

资本家不了解共产党将如何对待资本家？担心清算分厂，顾虑将来是不是像农村消灭地主一样消灭资本家，因此普遍生产经营情绪不高，有的甚至准备弃厂携款外逃。

许多干部不了解党对民族资本家的政策，“认为天津解放后，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本主义，找不到，看不见了，于是就把子弹打在资本家头上”（刘少奇 1998：629）。

“对他们（资本家）很冷淡，不找他们，他们来了也不见他们”“报纸上骂他们的多而表扬的少。在劳资关系上将工资和劳动条件定的高”，使得劳资关系紧张，生产效率因之降低。“贷款也不贷款给资本家，政府也不理他们，又不许解雇工人，所以可以说他们是告贷无门，呼呼无门”（刘少奇 1998：629）。

这些状况严重影响着几万私营中小企业，阻碍了城市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不解决这个问题，几十万失业工人的就业问题就不能解决。

因此刘少奇把天津之行的工作重点放在，如何引导社会各阶层正确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方面。一方面强调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同时，根据党的政策，利用各种场合向广大干部工人解释中国的国情，引导他们正确认识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目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

他说“中国经济中百分之九十是落后的小农经济，手工业经济，只有百分之十是进步工业，其中一部分是国营的，一部分是资本家的。因为有了百分之十的工业才产生了无产阶级，所以中国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其进步性。”“私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是最大量的”（刘少奇 1998：631）。1949 年全国工业中私人经济占 62.7%，国营经济占 33.9%（周恩来 1984：113），“天津的工商业将近有四万家，光是搞生产的工业就有上万家，有几十万工人，社会上很多的必需品，吃的、穿的用的、鞋子、袜子、牙刷、牙粉要他们供给，他们是社会上一个很大的生产力，这个生产力是很重要的，今天没有它不行”（薄一波 2008：52）。私营经济目前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它的适当发展对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刘少奇 1998：630）。

“今天中国资产阶级是在青年时代，正是发挥他历史作用，积极作用和建立功劳的时候”（刘少奇 1998：631）。

针对工人和资本家的思想问题，刘少奇分别在天津干部大会、职工大会和工商企业家座谈会上讲话了如何正确看待资本主义剥削问题，“关于剥削问题，这不是几个资本家可以负责的。剥削行为不是由意识决定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整个社会制度问题，中国工人阶级还要忍受一个时期的痛苦”（刘少奇 1998：631）。

“马克思在一百年以前，就认为资本家对发展生产、组织生产是有历史功绩的”“剥削也要分清几种：奴隶剥削已经废除，封建剥削制度我们也已经废除，但资本主义的剥削今天还不能够废除”（刘少奇 1998：630）。“我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功有过，今天是功大于过，但今天要限制它”“今天工人痛苦不是资本主义发展才受痛苦，而是资本主义不发展才受痛苦，在目前中国条件之下，私人资本主义

的剥削有若干发展，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对于中国是有利的”（刘少奇 1998：629）。

为了解除资本家“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的顾虑，刘少奇向工商业资本家解释：“今天我国资本主义剥削不仅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消以后，资本主义剥削是有进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剥削工人太多，而是太少了，你有本事多开工厂多剥削一些工人，对国家人民都有利”（刘少奇 1998：631）。

刘少奇批评了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左”的倾向。他强调说，自由资产阶级不是我们斗争对象，而是争取对象。如果把资本家当做斗争对象，就要犯错误，“等于农村中伤害了中农一样”。“现在还必须允许资本家存在，因此还要使他们有利可图，实行劳资两利的政策。……就是也允许资本家对我们剥削，剥削不能完全避免，剥削是不好的，但现在来说，也有一点好处的”（刘少奇 1998：632）。

他说劳资两利，就是使工人有钱可赚，使资本家有利可图。如果只求劳方一利，就会造成“资本家不安心，工厂关门、工人失业”“这是工人的自杀政策”（刘少奇 1998：632）。“别把资本家挤垮，不要为眼前部分的利益妨碍了长远的利益。正像黄敬市长讲的：‘不要吃母鸡，要慢慢吃鸡蛋’”“所以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对工人的好处多，坏处少”（刘少奇 1999/4）。

刘少奇也讲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他说：

工人和资本家是有斗争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这斗争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天生的，不能不斗的问题。所以对民族资产阶级有斗争的一面，有联合的一面。……因此，只斗争不联合是错误的，只联合不斗争也是错误的。但以哪个为主呢？，今天来讲，重点是联合不是斗争。因此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必要的适当的斗争，但不能破坏联合，如果斗争到把资产阶级消灭，这样工厂减少了，市场下降，工人失业，对工人，对国家，对人民都不利《刘少奇 1998：632》。

刘少奇还提出了对私人资本主义进行和平过渡的初步设想。他提出：新中国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时期，就“非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可”（薄一波 2008：53）。社会主义前途不但是无产阶级的前途，全国人民的前途，而且也是资本家的前途（刘少奇 1999/4）。“我们可以和平转入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资本家也会高兴。……经过许多步骤，那时资本家就不会感到十分痛苦”“在中国的条件下，有些资本家将来还可以同我们一起来走入社会主义”（刘少奇 1999/4）。

在天津的近一个月内，他先后调查了工交、财贸等十几个行业，听取了二十多次汇报，做了十多次讲话。这些工作收到明显成效，很大程度稳定了资产阶级，社会各界出现团结向上情绪，促进了天津城市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工业主要行业六、七月以后就恢复到解放前水平，九月被批准开业的私营工商业户从四月份的 293 户增加到了 380 户，职工人数增加近百分之二十（刘少奇 1998：637）。

刘少奇天津讲话是同他的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构想密切相连的，总的来说正确阐述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与毛泽东关于私人资本主义历史进步性的论述基本一致的。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1991：1060）中指出“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1991：1431）：“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

1949 年 4 月 15 日，他在一次谈话中说：

二中全会决议讲到我们同自由资产阶级之间有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目前的侧重点不是限制而是联合自由资产阶级。那种怕和资本家往来的思想

是不对的。如果劳资双方不是两利而是一利，那就是不利。为什么呢？只有劳利而资不利，工厂就要关门，如果只有资利而劳不利，就不能发展生产。……二中全会决议提出要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不这样就不行（陶鲁笳 1996：128）。

1950 年 4 月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了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的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薄一波 2008：98）。

1950 年 4 月，在全国统战会议上，党内有人对私营工商业政策上发表了错误意见，他对此做出批语，对有人说“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批语：“今天的斗争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对有人谈到对私营工商业的限制和排挤，批语：“应限制和排斥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毛泽东 1999：49）。

1950 年 6 月 6 日，毛泽东向七届三中全会提交的书面报告中说：“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毛泽东 1977：15）。

刘少奇天津讲话的基本精神是遵循毛泽东的思想的，但二者之间又有一些差别和歧异。对待私营工商业，毛泽东在强调要利用的同时，比较突出强调节制资本、限制反限制的斗争一面，刘少奇则在赞同限制的同时，更强调利用和发展的一面，因此在有关“剥削”问题上讲了些过头话。当毛泽东听取华北局负责人薄一波关于刘少奇天津讲话的汇报时，对天津讲话总的是满意的，认为讲的好，

但也认为“剥削越多越好”等语不妥（薄一波 2008：55）。

刘少奇此后在七届四中上做自我批评时，谈到“我对天津当时的工作说过许多话，曾批评了当时对资产阶级的左倾情绪，虽则原则是没有错误，但其中有些话不够妥当的”（刘少奇 2008：83、25）。这些话当时受到高岗的“激烈的攻击”。十七年后的文革中，戚本禹在批判文章（2016 年：627）中有意避开毛泽东当年对私人资本主义历史进步性的论述，避开七届二中全会对资本主义利用、限制的政策，对刘少奇天津讲话掐头掐尾，断章取义，宣称是刘少奇向资本家投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大罪证。

毛泽东 1952 年 9 月提出了现在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思路，刘少奇积极响应，最早于 10 月提出十五年内对私人资本主义工业进行全部国有化改造的设想（2005：526）。1953 年党中央确立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刘少奇完全赞成，努力贯彻。此后，他对待私人资本的政策思路完全转换到，如何对私人工商业实行国有化改造，以达到消灭资本主义的目的。

2. 关于保存富农经济

富农经济是旧中国农村中带有半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富农的人数不多，经济上不十分重要。土改前，富农户数占农村总户数的 3.08%，富农所有土地占农村土地总量的 13.66%（廖鲁言《人民日报》1952 年 9 月 28 日）。但对它采取怎样的政策，却对农民其他阶层（特别是富裕中农影响很大）以及城市中的资产阶级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建国初期，党中央在决策土地改革政策时，分析新形势，讨论如何对待富农。1950 年 3 月 20 日，毛泽东致电邓子恢并各中央局领导，提出暂时不动富农：

这样做的理由：第一是土改规模空前伟大，容易发生过左偏向，如果我们只动地主不动富农，则更能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并防止乱打乱杀，否则很难防止；第二是过去北方土改时在战争中进行

的，战争空气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特别显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如果我们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几年之后再去动他们，则将显得我们更加有理由，即是说更加有政治上的主动权；第三是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已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上都形成了，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似较妥当的（毛泽东 1977：13）。

1950 年 6 月 6 日，毛泽东在向七届三中全会提交的书面报告里说“我们对待富农的政策应有所改变，即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小土地出租者”（毛泽东 1999：70）。

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新区土改中，实行保存富农经济政策（薄一波 2008：120）。

同年 4 月 29 日，刘少奇在北京“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庆祝大会上的讲演中，公开宣布：今后的土地改革“不动富农的土地和财产”（刘少奇 1985：22）。

1950 年 6 月，刘少奇在《关于土地改革问题》报告中指出：实行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一般是能争取富农中立的，而且能够更好地保护中农，去除农民在发展生产中某些不必要的顾虑。“因此在目前的形势下，在今后的土改中，采取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无论在政治上在经济上都是必要的。是比较对于克服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对于我们国家和人民有利些”“我们采取的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当然不是一种暂时政策，而是一种长期政策，就是说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都是要保存富农经济的”（刘少奇 1985：39、40）。

1950 年 6 月 28 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保护富农所有自耕或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它财产，不得侵犯。富农所有出租之少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动。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

上人民政府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之一部或全部。”该项法律颁布后，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

“土改中，富农出租那一部分土地已被分配”（刘少奇 1985：153）。“在新解放区，在土地改革中，我们在宣传上和法令上都说要保存富农经济，但在农民斗争中，富农经济实际上已受到很大削弱”（刘少奇 2005：528）。

在 1952 年冬季和 1953 年春季的农村合作化高潮中，富农在农村中事实上成为不合法，1953 年 11 月毛泽东审定的《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宣布“逐步由限制富农剥削到消灭富农剥削”。标志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正式终止（薄一波 2008：137）。

在新区土改中实行保存富农经济政策上，刘少奇与毛泽东没有分歧，但对这项政策的意义的认识上，二者是有差距的。刘少奇认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对于更好地保护中农，去除农民在生产中不必要的顾虑，对于克服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有利。因而是一种长期政策，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都要保存富农经济。毛泽东在谈到这项政策的意义时，着重点在于把它看作是顺利推进土改的策略，现在不动富农，“几年之后再去动他们”。他们在这方面认识上的差距，为以后党内在农村经济发展上的争论埋下了伏笔。

如何对待东北老区土改后出现的新富农问题，1950 年春，刘少奇与东北局高岗发生了争论。东北大部分是 1948 年完成土改的，土改后大部分农民经济生活上升，其中一小部分添置了马车，有的雇了长工，买进或租进了土地，另有一部分农民因劳动力缺乏或疾病等原因经济生活下降，他们中一小部分开始出卖或出租土地，借粮借款。有的党员开始雇工，有的村干部认为避免农村两极分化应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集体劳动道路。农民通过什么样的道路才能走向富裕？这是党的农村政策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高岗 1949 年 12 月对此发表意见：“必须使绝大多数农民走‘由个体逐步向集体方面发展’。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乃是我们农村生产领导的基本方向”。他批评了各种要求单干思想，强调限制雇工、

借贷、土地买卖和出租。在谈到党员雇工时，他说从原则上讲党员是不允许剥削人的（薄一波 2008：196）。

这表明高岗主张土改后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不需要新民主主义阶段。之后，东北局就有关党员雇工问题写报告请示中央。刘少奇于 1950 年 1 月 23 日签发了中央组织部答复东北局的信，复信说“党员雇工与否，参加变工与否，应有完全的自由，党组织不得强制，其党籍亦不得因此停止或开除”“在今天农村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一定限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是错误的”（薄一波 2008：197）。

同日刘少奇同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东北局组织部长张秀山等就东北土改后出现新富农问题谈话：东北土改后农村经济开始向上发展了。有三匹马一副犁一挂大车，不是富农而是中农。今天东北的变工互助是建立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这是一个不好的基础。将来 70% 的农民有了三匹马，互助组就会缩小，因为中农更多了，他能够单干了。这是好现象。现在的变工互助能否发展成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同社会主义混为一谈。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庄，这是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机器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雇工、单干，应该放任自流，让农民都有三匹马一副犁就很好。现在对富农雇人买马不要限制，三五年之后再限制……党员成富农其党籍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得过早了。有剥削还是可以做社会主义者的，……即使东北将来有 1 万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因为过几年，东北可能会有 100 万党员，这一万人若都不好，被开除也不要紧。认为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刘少奇 2005：399，薄一波 2008：198）。

1950 年 9 月 20 日刘少奇在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央关于新富农可以被选为劳动模范给东北局的电报》中提出：“由贫雇农劳动起家的新富农是否可以被选为劳动模范问题，我们认为是可以的”“富农本人也是劳动者”“只要新富农劳动好，对

劳动有新发明和创造，对雇农待遇好，合于劳模各种条件……就可以选为劳动模范”（刘少奇 2005：437）。

东北与关内有不同特点，当时东北地广人稀，即使有劳动力，但没有牲口大车就无法耕种。因此东北土改后，允许拴车买马雇工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当时有人讲，如果东北的富农能每年吸收关内一千万失业人口，来开垦东北几千万亩荒地，对于增产粮食和减少失业人口将是一大贡献（薄一波 2008：199）。

刘少奇关于东北农村发展问题的政策思路是：现在是新民主主义阶段，不能过早地否认个体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个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鼓励农民劳动致富，以提高农村生产力发展。“让农民都有三匹马一副犁就很好”，是农村经济向上发展的表现。应当允许新富农发展，不要过早限制。这些类似于“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主张，是适合当时东北农村生产力发展需要的。

刘少奇上述主张与毛泽东关于对待新富农的思想是有差别和分歧的。毛泽东认为，“新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毛泽东 1987：437），现阶段虽然允许富农经济存在，但应当加以限制，达到逐步消灭。毛泽东指出：“片面提出‘发家致富’的口号是错误的”（毛泽东 1988：579），他对于农民个体经营的自发倾向所导致的两极分化现象，持有特别关注，主张尽量避免两极分化的后果。

刘少奇关于对雇工、单干应该放任自流；新富农可以当劳模的意见，被认为是有放任、鼓励农民单干、富农雇工剥削的错误倾向；认为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将来即使东北有 1 万富农党员也不可怕”等观点，当时被认为是有悖于党的组织原则。

毛泽东是如何看待刘少奇谈话的呢？现有的资料鲜有披露。仅有薄一波回忆录记载，高岗称，他将刘少奇讲话的记录稿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对讲话表示不满（薄一波 2008：198）。但此说系他人转述，尚未得到现有文献资料的证实。但有资料显示毛泽东支持了高岗的意见。

1951年10月17日，毛将高岗关于东北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报告批转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并转各中央局，各省委、地委，批示指出“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党委都应该研究这个问题”（毛泽东1988：477）。

此后，刘少奇改变了认识。多次在中央会议上做检查，并在工作中做出明确改变。1952年6月，他在《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中处理富农成分党员党籍问题的新规定》中，亲笔写上“不准许党员去做富农”，继续进行富农的或其他方式剥削的党员，“应无条件开除党籍”（刘少奇2005：243）。1952年7月24日，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给陕西省委电报中指出“农村共产党员不得雇工，进行富农式的剥削，否则，无条件开除其党籍”（刘少奇2005：351）。1953年10月，他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做检查说：“在处理富农党员的问题上，可能在和个别同志谈话的时候，说了一些不妥当的或错误的话，应该说，所有说的不妥当的或错误的话都应该取消和修正”（刘少奇1998：748）。1954年2月，他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检讨说：对富农党员如何处理，“我同个别同志谈到这个问题可能说过一些不妥当的话”（刘少奇2005：80）。

刘少奇的谈话当时受到高岗的批判。戚本禹在其文革批判文章中，隐匿毛刘当年同样主张在新区土改中实行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该政策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的历史事实。对刘主张保存富农经济和鼓励东北个体农民劳动致富的观点，抽去历史背景，寻章摘句，歪曲原意，指称刘少奇“积极鼓吹发展农村的资本主义经济”“企图使资本主义经济在农村迅速泛滥”（戚本禹2016：627）。

3. 关于农业互助合作化问题

1951年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党内发生了一场争论。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和华北局党委递交了《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报告说：在山西老区“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的自发力量是发展了

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方向发展，这就是互助组发生涣散现象最根本的原因”。在分析山西农业互助组的情况后认为，老区互助组的发展已经处于一个转折时期，互助组必须提高，否则就会后退。省委主张：扶植互助组内“公共积累”和“按劳分配”两个新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的自发趋势，引导互助组走向更高一级形式。“对于私有制，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刘少奇2005：530）。

华北局不同意山西省委意见，为慎重起见，华北局负责人薄一波、刘澜涛先后两次向刘少奇作了请示和汇报。刘少奇明确表示：现在采取动摇私有制的步骤，条件不成熟。没有拖拉机，没有化肥，不要急于搞农业生产合作社。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见（薄一波2008：187）。华北局5月14日批复山西省委报告，指出：“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的方法来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在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指出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薄一波2008：188）。7月3日，刘少奇对山西省委的报告写下批语：

在土改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表现出来了，党内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这种趋势的目的。已经有人提出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思想。山西省委的这个文件，就是一个例子（《刘少奇1993：183》）。

在此前后刘少奇几次发表谈话，阐述反对农业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为条件的观点。（刘少奇1951年5月7日在中共第一次全国宣传会议上的报告；6月3日同薄一波等人谈话；7月5日在与马列学院学员讲课时，都谈到这方面观点）。

7月25日华北局向中央做了《关于华北农村互助合作会议的报告》，刘少奇对报告作了多处修改，报告说：“会议不同意山西省委的这种意见，认为目前的互助组织是以个体经济（私有的）为基础的，在自愿两利下的集体劳动组织，故不能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直接地发展的集体农场。因为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和使用机器耕种以及土地国有化为条件，没有这些条件，便无法改变小农的分散性、落后性，而达到农业集体化”“因此山西省委在目前提出在互助组内对私有财产不是巩固，而是逐步动摇、削弱以至否定，并企图由此走上集体化的方针，是错误的”（薄一波2008：191）。

毛泽东得知刘少奇上述意见和谈话后，找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谈话，明确表示他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不同意刘少奇和华北局的意见。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他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薄一波2008：191）。这表明刘少奇与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发生了明显的分歧。

土改后农民有两种积极性，一种是互助合作积极性，一种是个体经济的自发积极性。

刘少奇认为互助组与集体农庄是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两个不同阶段的发展形式。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刘少奇2005：399）。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为条件，先有机械化，后有集体化。目前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集体化条件还不成熟。

他认为土改后农村小生产者的自发力量是不可避免的，不能阻止的。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不要过早否定私有制，是要充分释放农民个体劳动发展生产的积极性，鼓励农民劳动致富，促进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而对于个体经济可能出现两极分化，他指出“完全让农村经济自由发展也是不对的”。主张用互助组组织农民；用国家贸易及价格政策、税收政策限制富农；用集体主义教育农民等措施同农

村中的自发势力和资本主义做斗争。后“依靠国家，依靠工人阶级，吸引农民到集体经济中来，消灭资本主义”（刘少奇2005：546）。

毛泽东认为，从个体劳动转到集体劳动是继土改后的第二次生产关系改革，通过这种改革，生产就可以大大提高，增加一倍或一倍以上。这样的改革，生产工具根本没有变化，但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变化了。从土改到发展劳动互助组织两次变化，这是生产制度上的革命（毛泽东1996：70、71）。土改后，农民中蕴藏着强烈互助合作积极性，是农村中日益增长的社会主义因素，应鼓励、支持、扶植这种积极性，通过互助组—农业合作社——集体农庄的形式，立即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在我国的条件下，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毛泽东1977：168）。

毛对于个体经济产生的两极分化持有特别的警觉，“片面提出‘发家致富’的口号是错误的”（毛泽东1987：579），主张限制个体经济的自发性，动摇、削弱个体经济的自发势力，逐步达到最终否定私有制。

综上所述，在引导个体农民走集体化道路这个根本方向上刘少奇与毛泽东是一致的。他们的分歧在于实行农业集体化的步骤上。刘少奇后来在检讨他与毛泽东的分歧时说：“我认为农业集体化的时间要慢，……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中间过渡形式没有找到”。而“毛主席的想法是农业生产的集体化要很快地搞，其形式就是农业生产合作社”（刘少奇1998：748）。

在毛泽东看来，作为党的第二领导人刘少奇的这些思想落后于实际，脱离了群众，并且已影响到了华北局的政策导向，这是严重的问题，亟须纠正，因此直接批评了刘少奇。刘少奇出于他一贯对毛泽东的敬佩、赞同、跟随和尊重的态度，完全接受了批评，自1951年秋就放弃了自己的观点，转而拥护和贯彻毛泽东关于互助合作化思想，努力跟上毛泽东的步伐。他连续三年在中央会议上做检讨。

1953年10月，他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闭幕上讲话中做自我批评：我在农业生产互助组问

题上，“曾经有一个时候有过一种想法是不正确的”“主观上的想法落后于客观上的可能和需要”（刘少奇 1998：748）⁵。对他给山西省委《把老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批示和对马列学院学员讲话中的观点进行检讨。

1954 年 2 月，他在七届四中全会上的系统检讨中说：“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我曾经有过一种想法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在农村土地改革后，要对我国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要实行农业集体化，我是没有怀疑过的。”但是，“我有过一种想法，以为要等过一个时期才能在我国农村大量地，普遍地实行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庄，没想到立即就可以大量地组织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社，由此发展到完全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合作社即集体农庄。……所以，我赞成华北局在个别地方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赞成推广；我批评了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文件。我这个批评时是不正确的，而山西省委的意见则基本上是正确的”，这些想法“在 1951 年秋，中央讨论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问题后，由于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得到了纠正，我就抛弃了这种想法。”（刘少奇 2008：78、79）⁶

1955 年 10 月，他在七届六中全会上发言中，再次做检讨：“几年前，我也有过一种想法，以为在土地改革后除开普遍发展劳动互助组以外，大约还要过一个时期再来普遍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因而对当时已经出现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社没有认真地加以研究和提倡，这是不对的”（刘少奇 2008：375）。

1952 年 7 月，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东北局复电中，同意东北局关于“农民小生产者经济自发发展着的资本主义与党所领导的合作化道路的矛盾是当前农村中的主要矛盾，而党所领导的合作化运动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意见（刘少奇 2005：309）。

1954 年 1 月 20 日，他在纪念列宁逝世三十周年大会上讲话中指出：“列宁教导说，要对小农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采用农业合作制。苏联早已完成了农业集体化，这对于像中国这样农民占人口中最大多数的国家特别重要”（刘少奇 2008：32）。

1955 年上半年，邓子恢、中央农村工作部建议浙江省压缩了 15000 多个农业合作社。同年 6 月，毛泽东与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上发生争论。毛认为党内有人对合作化持消极态度。7 月、9 月、10 月，毛连续严厉批评邓子恢，“小脚女人”，犯了右倾错误。

1955 年 10 月，刘少奇在七届六中全会发言中拥护毛泽东对邓子恢的批评，赞扬了毛泽东的贡献。他说：我们正处于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中，这是一场激烈的深刻的社会阶级斗争，农村中全国性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高潮将要到来：

一些同志则在斗争中表现不能容许的犹豫和动摇，被群众运动吓昏了头，从而阻碍群众运动，这在当前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这在目前的革命斗争是一个重要问题……正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进入这种紧要的历史关头，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以及他的其他指示，恰好是及时地、正确而全面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所作的又一次大贡献（刘少奇 2008：368）。

在排消除了党内不同意见后，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迅速发展，到 1956 年底全国 96.1% 的农户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原计划用 15 年左右完成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短短 4 年就完成了。为而后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准备了基础条件。

在互助合作化问题上，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分歧，从个体经济向集体经济过渡的视角看，建国初，

⁵ 转引自《刘少奇传》，第 748 页。

⁶ 关于刘少奇这份自我批评，毛泽东是重视的。全会召开前的 1954 年 1 月 7 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提议：全会上“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宣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433 页。根据毛的意见，刘少奇认真修改了检讨稿。1 月 16 日他将检讨稿报送毛泽东，“现将我准备在全会的检讨发上，请审阅和修改。”《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六册，第 25 页。毛阅后没有表示不同意。《刘少奇传》，第 725 页。

农民的经济力量十分脆弱单薄，生产力低下。刘少奇关于不要过早否认私有制，充分发挥个体劳动的积极性，发展生产，改变经济现状，脱贫致富，待条件成熟后，再向集体化过渡的观点，有利于在生产力提高和积累的基础上，个体经济向集体经济平稳过渡，避免震荡和摇摆。因而是较符合实际的。

然而，从七十年来我国农业曲折发展的轨迹来看，建国初，建立的合作社体制及人民公社体制，由于受苏联农业集体化模式的影响和时代的局限存在明显的缺陷。

关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阶段，依靠工场分工可以形成新生产力，中国的农业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也可以形成新生产力，进而去动摇私有基础的认识，忽视了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显著的不同特点，忽视了农业生产的自然属性。

农业再生产是同自然生态系统再生产相互交织的复合再生产，对自然条件依赖最大。马克思指出：“在所有生产部门都有再生产，但这同生产联系的再生产只有农业中才是同自然的再生产一致的”（马克思 1978：61）。这是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最显著的不同。

工业生产是由工人集中在固定的场所空间内，以整齐划一的分工协作，服从统一的调度、指令完成生产的，很少受气候的影响。因而手工工场的紧密分工协作，集中劳动所创造的生产力要远大于分散的个体手工业。

而农业则受气候为主的自然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最大。农业生产是由农民分散于敞开的田野空间中进行的，农民在不同的地块，根据不同农作物的生长周期进行播种、灌溉、施肥、收获等各种农事作业，需要因地制宜，因作物制宜，因此农业生产具有很强的转移、变换和分散的特点。同时，气候条件的复杂多变性和不可控性，使农业生产又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及时性。因此农业生产难以像工业生产那样按照预先的精准设计，接受统一的指令，进行标准化批量生产。所以在农业领域“靠统一经营”未必能形成新生产力。在农业很大程度上靠天吃饭的条件下，独立劳动具有一定优越性。家庭经

营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自主决策，灵活应对气候变化，合理安排农事活动，调配农业资源，生产成本更小，自主分配劳动成果，激励机制更强，因此是农业生产中更合适的组织形式和经营主体。

目前，在发达国家中，家庭农场和小农家庭经营仍然是普遍的农业经营模式。在人均耕地最多，农业规模化、社会化程度最高的美国，家庭农场仍然是农业经营的主体。据统计，美国家 200 万家农场中，家庭农场占 85%（《美国、德国和日本发展家庭农场的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世界农业》2016/11）。在人均耕地最少，土地细碎化严重的日本，农业同样是以小农家庭经营为主。

在我国，1978 年，由安徽小岗村十八户农民发起的包产到户，首先打破长达二十多年的体制坚冰，之后，短短几年内半个体经济性质的家庭承包制就迅速实行于全国各地。这是农业生产力强烈的内在呼唤和要求，是对原有体制弊端的矫正和否定，是历史的选择。这证明生活实践之树常青，而理论常常显得苍白无力。

即使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虽然随着规模化程度的提高，农业社会组织的发展，一些土地进入流转，但家庭经营仍然是我国农业经营的主体。据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2016 年全国 76.6% 的耕地仍由家庭承包者自家经营（陈锡文：爱思想网）。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确立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构想的终结

1.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确立

刘少奇关于革命胜利后实行一个时期新民主主义政策，待条件成熟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认识，在建国前夕和建国初，与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1948 年 9 月，在西柏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做《关于新民主主义建设问题》报告说，民主革命胜利后，“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则要犯‘左’倾的错误”。报告分析了不能过早

实行社会主义的理由，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步设想。毛泽东赞同刘少奇的观点。在总结发言中说：“关于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问题，刘少奇的提纲分析得很具体，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薄一波 2008：49）。

1950 年 6 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上闭幕词中指出：“将来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的时候（这种时候还是在很远的将来），只有‘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走进社会主义新时期’”（毛泽东 1987/1：416）。

1951 年 3 月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现在要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事前刘少奇将报告稿送毛泽东审阅，毛阅后批示“看过，同意”（毛泽东 1987：206）。

同时期，其他中央领导人也在不同场合表达过与毛、刘相同的观点。1950 年 4 月，周恩来在全国第一次统战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实现社会主义是要有一定条件的。今天条件不成熟”“大家都还是说搞社会主义要十五年左右”（《周恩来 1984：169、166》）。1949 年 7 月，朱德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讲话：“只有中国工人阶级把新中国领导得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然后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朱德 1983：262）。1949 年 3 月，任弼时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时说：工业是社会主义的基础。“全国革命胜利后，我们仍需要有两个到三个五年计划，才可能到社会主义”（中央文献 1994：710）。

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在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有了新思路。1952 年 9 月 24 日，毛泽东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逢先知：2003：236）：从现在起即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毛泽东这个新构思“显然已不同于刚进城时他本人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设想了”（薄一波 2008：215、66），与刘少奇产生了分歧和差距。

毛泽东 1953 年 6 月 15 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完整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错误”（毛泽东 1977：81、82）。

2. “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构想的终结

毛泽东同时在 6 月 15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刘少奇等党内一些领导人主张的“新民主主义阶段”的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薄一波 2008：215、66）：“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错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毛泽东 1977：81、82）。

在此之前，毛泽东视察外地时，1953 年 2 月 17 日在与武汉市委书记王任重谈话时说：有人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还有人主张“四大自由”，我看都是不对的（毛泽东 1993：2）。

1953 年 12 月 7 日，毛泽东（1990：403）在一则批示中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

1953 年 12 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经中央审议，认为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决议中，“关于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将来要为转变为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的提法，是不妥当的”（此提法出自刘少奇该会议报告）（刘少奇 1985：62），“应改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国家就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的时期”（《党的学说文件汇编》1979：

167)。以上毛泽东的讲话、批示和中央通知否定了“新民主主义阶段”的观点。

在新民主主义必然要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个基本方向上，刘少奇与毛泽东是一致的。他们的分歧在于过渡周期的长与短，过渡步骤的快与慢方面。

刘少奇(1996: 689)认为，“中国实行社会主义至少需要十年二十年以后”(1951年5月)，毛泽东提出，从现在起即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而不是十年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1952年9月24日)(逢先知2003: 236)。毛泽东非常看重中国向社会主义推进的速度，他强调：把社会主义改造看成遥遥无期而停止不进是不许可的，盲目冒进也是不许可的(周恩来1984: 113，毛泽东1990: 326)。在他看来，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十年二十年后再实行社会主义的认识，是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没有随着革命性质的转变而去搞社会主义，要犯右倾错误。作为党的第二领导人刘少奇有这种认识是很严重的问题，需要对其击一猛掌，促其向前跨进一步。

刘少奇是如何面对、直接回应毛泽东的批评呢？现有资料没有披露。但是此后刘少奇连续三年在中央会议上，就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相关联的对待私人资本主义、新富农经济和互助合作化等问题做出了深刻、系统的自我批评(如前所述)。

1954年9月，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同时还批评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观点，“最近几年，我们还常常听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这样一种说法”，这是维持既有社会主义，又有资本主义现状的思想，这是不可能的(刘少奇1985: 144)。

这些表明，刘少奇完全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转变了认识，自我否定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观点，“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构想就此终结，

对毛泽东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刘少奇完全赞同，积极贯彻，努力把自己的认识统一到毛泽东

的思想上来。

1952年9月，毛泽东提出，从现在起即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的新思路后，刘少奇积极响应，于同年10月最早就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内容提出初步设想：第一个五年计划后，“工业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比重会缩小到百分之二十以下，十年后私人工业会缩小到百分之十以下，国营工业将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到那时，我们将征收资本家的工厂归国家所有”。在对私人资本主义实行国有化时，设想多数情况采取和平的方式。“准备在今后十年到十五年内将中国多数农民组织在农业合作社和集体农庄里，基本上实现中国农业经济的集体化”“对于手工业我们准备用力帮助小手工业者组织生产合作社”(刘少奇2005: 526)。

1954年2月，刘少奇在七届四中全会上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会议报告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基本内容。随后，他主持全会正式批准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在“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方面，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分歧，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层面看，从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后果看，刘少奇主张建国后实行一段新民主主义建设，反对“超出实际的可能性，过早地、过多地、没有准备地去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刘少奇1981: 430)，在提高生产力，积累和准备充分的物质技术条件的基础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路。是比较务实的，有利于在稳固的基础上平稳有序地向社会主义过渡，避免由于急躁冒进留下的后遗症和急于求成的风气。

三、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完成与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

1. 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完成

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对全党工作发出指示：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计

划（刘少奇 1998： 777）。

刘少奇积极贯彻。1955年12月5日，他在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讲话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进行了工作部署。他在讲话中提出：“必须加快速度，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都要反对保守主义，一切工作要办得又多、又快、又好。要求我们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更大成绩”“要站在群众前头，不要做群众尾巴。要鼓励群众，不要泼冷水。在较短时间内取得较大成绩，这就是现在中央的路线，这就是稳步前进。另一条是按常规走路，照老样子前进，时间拉得很长，群众没有气，成绩不大，这是保守主义”（刘少奇 1998： 776）。

同时他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推进速度提出要求和督促。1955年11月他在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改造座谈会上提出：“我们要全面地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在两三年之内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搞出一个头绪来，公私合营要基本上完成”（刘少奇 1981： 176）。

同年12月5日，他在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批评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不积极，太慢了”。12月20日，他在听取手工业管理局汇报时提出：手工业改造不应比农业慢，要求手工业合作化要1956、1957年两年搞完，“时间拉长了问题反多了”（薄一波 2008： 448）。

这些表明，在推进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方面，刘少奇已经跟上了毛泽东的步伐，在思想上同毛泽东保持了一致。

在毛泽东、刘少奇等最高领导人的亲自倡导、推动和督促下，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一路高歌猛进，至1956年底，原定用十五年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短短三年就完成了。

社会主义改造的指导思想：消灭私有制，建立单一公有制的社会经济结构，这是毛泽东、刘少奇那一代领导人共同一致的社会主义观（毛泽东 1990： 359）。由于受苏联传统社会主义的影响，在毛看来，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公有制，他认为“公有制是富强的根源”“在实行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以后这种源泉还会更加强大”（张素

华 2001/1）。

1952年12月，毛泽东审定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明确写道：“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要使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经济基础。”他在这句话之后，写下一段文字：“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中央文献研究室 1993： 702）。

1953年6月15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总路线的报告中说“要在十年到十五年使资本主义绝种”（毛泽东 2003/4）。

1953年10月15日，他与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时，讲到当时城乡粮、棉、蔬菜供需矛盾时，他指出：“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毛泽东 1990： 359）。

1955年10月，他在七届六中全会做结论讲话中说：“马克思主义……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要使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毛泽东 1977： 217）。

对社会主义的这种理解，刘少奇有同样的认识。

1951年3月，他在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报告提纲中写道：“社会主义就首先要使在工业中然后在农业中破坏私有制”（刘少奇 1996： 62）。

1953年7月，他在第四次全国统战会议上讲话中指出，消灭资产阶级决定的一招，就是这个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1954年9月，他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1981： 143、144）：

由目前复杂的经济结构的社会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社会，即由目前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是我国应当走的唯一道路。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相反的生产关系在一个国家里互不干扰地平行发展是不可能的。中国不变成社会主义国家就要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要它不变，就是要使事物不动，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世界资本主义已经没落，世界上所有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都已经走到了绝路，而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其它人民民主国家已经繁荣强大起来。

在这样的国际国内的局势下……我国只有社会主义这条唯一的光明道路可走，而且不能不走，因为这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1955年4月，他在中央会议的报告中指出（1981：177）：“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就要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建立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只要我们抓紧了这一点，在这一点上不动摇，那么，我们就基本上没有违背马列主义，就不会犯重大错误”。

1955年11月16日，他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座谈会讲话：现在我们要全面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刘少奇1996：346）。

上述认为只有使公有制成为国家唯一经济基础的观点，已被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符合社会发展实际的。目前，我国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已达1亿户，提供了60%以上的GDP，48%的外贸出口，50%以上的税收，80%的城镇劳动力就业岗位，成为国家不可或缺的重要经济力量，与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外资经济并存构成了混合经济结构，显示了蓬勃的活力和生机。

2. 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

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我国逐步建立了单一公有制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是一种效仿苏联模式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该体制在运行初期，以高度的动员力，最大限度调配社会资源，在短时期内建立了工业化基础和集聚了国力，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在持续运行中其内在缺陷逐步显现，至文革中达到了极端。物极必反，才有了改革开放。

邓小平在回顾历史时坦承（1993：63）：“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他总结指出（1993：116）：毛泽东“有一个重大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1993：63），“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1993：237），“我们耽误了几十年”（1993：383）。

正是汲取过往经验教训后，邓小平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1993：53）。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根据他的理论建立了多元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肯定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步入了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新轨道，从而取得改革开放四十年令世人瞩目的社会进步和成就。

考察建国初在“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构想方面，刘少奇与毛泽东分歧的产生与消弭的轨迹，给人留下几点深刻的印象和思索。

首先，在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根本方向上，刘少奇与毛泽东是明确一致的，刘少奇并不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主张。然而，由于受苏联传统模式的影响和囿于时代的局限，他们的社会主义观是有缺陷的。

第二，他们之间的分歧点属于策略或枝节的性质。如互助合作化发展的快与慢，向社会主义过渡周期的长与短等方面。其中，刘少奇有些主张，如注重稳健发展，发展阶段之间平稳衔接与过渡等的观点，相对于急于消灭私有制、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认识，比较务实，比较讲求实际。但一生怀有浪漫情怀和革命豪气的毛泽东，“心潮逐浪高”，永远站立革命潮头，将潮流不断推向高峰。常常将不能快马加鞭，勇往直前的人，视为落后于实际、落后于群众，批评为右倾。因而对刘少奇进行了或直接或严厉的批评。而在刘少奇方面，他在党内地位擢升过程中，毛泽东的欣赏、支持、提携起到了决定

作用。⁷因而长久以来，刘少奇对毛泽东形成了信服、拥戴、尊崇和依赖的关系。⁸所以，他每次都能诚恳接受毛泽东的批评，深刻检讨，放弃自己原有的认识，努力将认识统一到毛泽东的思想上来。从而使他们之间的分歧得以消弭。

第三，“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建国初，刘少奇与毛泽东发生的分歧是否给他们长

久以来的密切合作关系投下了些许阴影？是否影响到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信任而为以后发生更大的分歧埋下伏笔？有一线索令人回味，据时任东北局第二书记张秀山的回忆录记载，1953年初毛泽东曾布置高岗查阅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沈阳）被捕的情况（张秀山2005/5）。个中内情语焉不详，有待于有关档案资料解密。❷

参考文献

- 薄一波。2008。《若干重大决策与历史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
- 胡乔木。1994。《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
- 刘少奇。1981。《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刘少奇。1985。《刘少奇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刘少奇。1989。《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党的文献》1989年6期。
- 廖鲁言。1952。《三年来土地改革运动的伟大胜利》。《人民日报》1952年9月28日。
- 蔺全录、包惠玲、王馨雅。2016。“美国、德国和日本发展家庭农场的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世界农业》2016：11。
- 毛泽东。1966。《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毛泽东。199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毛泽东。1977。《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毛泽东。1996。《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毛泽东。1999。《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毛泽东。1987。《毛泽东文稿》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 毛泽东。1988。《毛泽东文稿》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 毛泽东。2003。“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党的文献》2003：4。
- 戚本禹。2016。《戚本禹回忆录》。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

⁷ 1941年毛泽东电召刘少奇回延安，“少奇在路上差不多走了十个月的时间，毛主席无时不在挂念。对少奇的安全这样关怀备至，在不少人的亲闻中是很少有的。”“毛主席的关怀，不仅说明对少奇同志的深厚情谊，更说明对刘少奇同志寄予厚望，要委以重任。1943年3月中央机构的调整表明，少奇同志在党内实际上已上升为第二把手了。”《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75页。1942年12月30日，刘少奇抵达延安。1943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刘少奇一举越过张闻天、周恩来、任弼时、朱德、陈云等，就任排名毛泽东之后的三人中央书记处成员之一。《刘少奇年谱》，第416页。

⁸ 刘少奇在党的七大所做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提出：毛泽东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舵师”，“中国无产阶级……最杰出最伟大的代表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唯一正确的总路线”。“过去有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当着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之下，革命就胜利，就发展；而当着革命是脱离了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时，革命就失败，就后退。”《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19页，第334页。何方评论说：刘少奇“这个报告是制造个人崇拜的标本”。《记忆》243期，第56页。

- 陶鲁茄。1996。《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 朱德。1983。《朱德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 周恩来。1984。《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刘少奇。2005。《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 刘少奇。2005。《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 刘少奇。2008。《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 刘少奇。2008。《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 刘少奇。1996。《刘少奇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 刘少奇。1993。《刘少奇论经济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 刘少奇。1998。《刘少奇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编。1980。《党的学说文件汇编》第三册。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 毛泽东。198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
- 毛泽东。198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北京：人民出版社。
- 毛泽东。198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北京：人民出版社。
- 毛泽东。1993。《毛泽东在湖北》。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
- 中央党史文献研究史编。1994。《任弼时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2003。《毛泽东传》（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研究】

文革前的阎红彦

——云南文革人物述评

周孜仁

内容提要：阎红彦，中共元老之一。自 1959 年庐山会议反右倾时入滇主政，善举与蠹行并立：实用主义改善民生，却反对向内地开放经济；因历史恩怨而告密小说《刘志丹》，为毛泽东阶级斗争绝对化提供重磅炸弹，却又在全国唯一以官方文件提出“不以阶级斗争为纲”；无法面对毛泽东追责，却又将替他“挡驾”的同僚打为“反党集团”。

关键词：阎红彦、云南、大饥荒、反右倾、四清

一、循吏阎红彦

按照中共中央文件定义，云南“新生红色政权”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是云南“全

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谭震林、李井泉、罗瑞卿、陆定一、薄一波、杨尚昆、安子文等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赵健民之流进行英勇斗争的伟大成果。”¹因此，要说清云南文革，必须要先说清两位云南文革反派主角：阎红彦和赵健民；其次，文革肇端之时，阎红彦贵为封疆大吏，权倾三迤²，要说清云南文革为何应势而起，权力大坝如何从经年不休的管涌到文革一朝溃堤，必须从 1959 年阎红彦入滇主政说起。随着文革戏剧惨烈演进，稍后我们再说赵健民。

阎红彦，原名阎候雁，1909 年 10 月 26 日生于陕西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16 岁造反起家，参加中共，与著名的陕北领袖刘志丹、谢子长等一

道成为西北工农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当时正值危机迭起、群枭争雄，需要英雄而盛产英雄的年代，如果不是毛泽东带领中央红军万里南来，如果不是历史赐予了中国共产党反法西斯战争的特殊机遇，阎红彦和他战友们壮怀激烈和悲喜沉浮，最多不过是 300 年前他们的陕北老乡李自成、张献忠故事的再版而已。幸运的是，上述所有的偶然成全了这个并不起眼的陕北后生。

阎红彦生得高大壮硕，共产党日益壮大的造反事业见证了她的成长历程：历任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大队长，陕甘游击队大队长、红三十军军长、警备第一旅政治委员，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期间，任二野三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随刘（伯承）邓（小平）大军入川，先后任川东区党委副书记、行署主任，川东军区副政委，四川体育委员会主任等职……1950 年代末，他鬓有华发，已然“知天命”之年，政治品格和行为操守已铸练成型：第一、在英才辈出的官僚群体中，他能力相对平庸；

¹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中发（68）128 号文（1968 年 8 月 10 日）。

² 云南省习惯将滇地分为滇东北、滇南和滇西三部，俗称三迤。

其次，虽非干臣能吏，他绝无政治野心；最后，他安于命道，与左右相处谦和。1959年巧遇庐山会议，他终得以封疆大吏之尊调赴边地云南，官拜省委第一书记、昆明部队第一政委。作为资深宦吏，阎红彦何以年近五十方才修得正果？除了上面说过的缘由，还有一段历史公案必须加以说明。

同为陕北红军创始者，阎红彦与高岗素多不睦。1942年延安整风，已当上西北局书记的高岗到中央党校找阎，称西北红军和陕甘根据地“是子长（谢子长）、志丹（刘志丹）、你和我创建的”，他要阎为此说作证：一、他是红军陕甘游击队的队委；二、在临镇战斗中他临阵脱逃是被人绑架。没承想耿介直道的阎红彦偏不赏脸，怒称：“你不要把自己打扮成陕甘游击队的领袖。你的历史我清楚。组织晋西游击队时没有你，成立反帝同盟军时没有你，陕甘游击队成立后，你是三支队二大队的政委，不是陕甘游击队的队委。”阎还反揭高的疮疤：“临镇战斗中，你火线上当了逃兵，按当时的纪律，抓回来是要枪毙的。后来我担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时，你回来了，队委会考虑到你是自己回来的，给了你留党察看的处分，决定让你到一个游击小组当战士。”高岗恼羞而怒，连称“造谣、陷害”，大骂阎“有野心”而去。³

延安整风时期，政治才干与官场手段远在阎之上的高岗已深得高层赏识。1945年中共召开七大，高岗不仅当选陕甘宁边区代表团代表，还被提名为中央委员候选人，阎红彦坚认此议不妥，遂向刘少奇、任弼时等力呈异议，事情无果，反遭批评。两个月后，高岗不仅当了中央委员，且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阎愈益愤愤，再次向刘少奇、任弼时反映“高岗伪造历史，临阵脱逃，品质不好，诡计多端，不可信赖。”要求中央将他的意见记录存档。意气用事的阎竟然还当面将其状告中央之事面告高岗。二人再结梁子。

1945年7月，中央召开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高岗对阎实施反击，并由康生宣布：“高岗是西北

的革命领袖，今后不准任何人反对。阎红彦反对高岗是错误的。”其时，高岗颇为得意地向人炫耀：我原来要阎红彦当边区保安司令，因为他和我闹别扭，没让他当。

于是阎红彦被调离了。两个月后，他到晋冀鲁豫野战军任三纵副司令，当了邓小平部属、陈锡联⁴搭档，从此脱离陕北的是是非非，亦远离了最高层领袖的视线。⁵

阎红彦重受重用又过了许多年。“七大”后，高岗地位节节攀升。1949年中共建政，高岗荣登共和国副主席大位，如果不是事有突变，他大有可能取代刘少奇，成为毛的接班人——1954年2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高岗成了“高饶反党集团”的头子，是年自杀身亡。其中蹊跷吊诡，此不赘述。

与高岗大起大落相比，阎红彦的日子过得平淡无奇。他先是以行署主任和军区副政委的身份往来奔走于川东穷山恶水，默无声闻地组织土改、剿匪、征粮……那当儿，与阎同在四川、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的赵键民，已主持修建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而一举成名（正是这个赵键民，在十多年后的文革中把云南闹了个天翻地覆）。如果不是高岗摊上大事，谁也不会注意阎红彦这个憨厚平实的陕北汉子。

高岗自杀次年9月，中共军队第一次授衔，早已从事地方工作的阎红彦，和乌兰夫、叶飞、周保中等中共历史上有特殊表征意义的老资格，一起破例被授予军衔，贵为上将。又三年，1958年3月，中央召开成都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一律衣着藏青色干部装的臣僚中又见到这位大个子，抱歉道：“阎红彦同志，很对不起你，把你冤枉了十多年，当时只怪我看错了人。”阎当然知道，1942年他同高岗论争、1945年向中央状告高岗挨批，这回终得洗清反正。毛又道：“你还有什么意见没有？”阎立即大度而恭敬，谨答：“多少年前的事了，我没有什么意见。”那一年，他年四十九，重新回到毛泽东的视线

³ 李原：《阎红彦年谱简编》，《只唯实》第361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⁴ 其时，陈锡联任三纵司令员。

⁵ 李原，第361-362页。

之中。⁶翌年8月17日，彭德怀在庐山会议被领袖一巴掌从云端打落。国防部长易人、总参谋长缺位，遂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替补；公安部长缺位，则云南省委书记谢富治替补；滇省书记缺了位，阎红彦遂调任了该省第一书记。

中国历来将官吏类分为循吏、能吏和佞臣。所谓循吏，司马迁的定义是：“奉职循理”。循吏仁厚爱民，善施教化，以宽政得民安人和；他们清廉自正，严守法纪，当公私利益发生尖锐冲突时，甘愿以身殉法，维护君主和纲纪的尊严。执政能力则相对不那么重要了。云南远离中心，经济文化落后，对全国大局影响甚微，中央对边地工作的唯一要求，就是稳定、稳定，还是稳定。执政官员只需老实、忠诚、肯干就行。阎红彦正符合这个条件。用邓小平的话说“这个人正派，耿直刚强”，用他的老上司陈锡联的话说，就是“老阎诚实、坦率、直来直去，不搞私心杂念的东西。”⁷上面所言“耿直刚强”“直来直去”，换一个说法，就是执拗、认死理，循规蹈矩却不懂机变圆通：在官场行走，这正是一大忌。后面我们还会看到，阎红彦之后第三任云南省委书记周兴，也属同一类色彩。客观地说，按正常规矩，由这类官员主政云南是适宜的，只是一遇纲纪崩毁，尤其是文革这样史无前例的政治大风浪就坏了，这类循吏注定手脚无措，左支右绌，落入灭顶之灾。

长期担任副职闲职，如今要以封疆大吏之身独当一面，阎红彦心有不实。初接任命，他找时任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说自己按“水平”和“性格”“怕难担此重任！”自认“党内斗争我总是失败者。”邓回答很痛快：“我还是第一次听你说‘怕’字！”邓要他“从实际出发，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吗！”

除了对自我能力缺乏自信，还有一问题让阎忧心：前任谢富治主滇，政策一贯左倾，“大跃进”搞“一步登天”穷过渡，搞得民不聊生。如今庐山风暴未歇，彭德怀反“左”言论正遭狂批，会议要求

全国持续“大跃进”，继续循此套路，焉能扭转南疆乾坤？阎红彦再找彭真求情，直截了当摊牌：“我和彭老总的看法是一样的，当前又主要是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在这个时候，要我去云南担任省委第一书记，怕不合适吧！”彭真对阎的肚子疼心了然之，于是替他作切割：“他是他，你是你，那是两回事吆！作为领导干部，看到工作中的问题，说真话，讲实情，干实事，是应该的，也是正常的。”⁸

1959年9月，云南这块烫手山芋正式传到阎红彦手中。

二、阎红彦德政

中共入滇建政后，谢富治曾在此主政七年余⁹。初，执行“稳定、团结”方针施政，也创行不少功德，后来——尤其1957年后——该谢紧随领袖的冒进战车一路左奔，愈益出格。1959年入京后对领袖亦步亦趋，以至文革红极一时，权倾天下——其人虽侥幸于1972年离世，待到“四人帮”塌台，仍被重掌权柄的“老家伙”们定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于1980年开除党籍，撤销《悼词》，骨灰从八宝山公墓移出。

谢富治左倾治滇，“大跃进”表现最为淋漓。官方资料记载：“1958年6月18日至10月21日，中共云南省委农村工作部根据省委指示，先后4次向各地州市和一些县委发出创高产的通知。”省委指示，为了打破迷信，鼓励人们敢想敢干，必须创造大面积的丰产纪录和创造单位面积高额丰产纪录。单位面积产量的高产纪录“力求突破，哪怕一亩、两亩也好。”“必须放出一些‘卫星’来，这对于打破迷信，鼓舞士气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经济上也有实际意义。”8月16日，云南省委给各地的电报中公开号召弄虚作假：“据了解各省很多地方搞高产产量‘卫星’田，都是用移苗并秧的办法。如果时间来不及，你们搞几亩或十来亩水稻‘卫

⁶ 李原，第361-366页。

⁷ 陈锡联1981年访谈，李原，第368页。

⁸ 李原，第377页。

⁹ 谢富治1953年由四川调云南接替宋仁穷任省委书记。

星’，放出 3 万斤以上的水稻‘卫星’，晚稻能否放 5 万斤以上争取 10 万斤的‘卫星’。”到了 9 月，眼见尚未弄出成效，4 日，省委再次给红河、思茅、玉溪等地委追发电报，称：“我省早稻、中稻都没有放出千斤省的‘卫星’来，晚稻一定要设法放出千斤省的‘卫星’来。”10 月 17 日又给产粮大县宜良、富民、澄江、江川、建水、元阳，大姚、邓川、大理下军令状：“省委指示 9 个县今年小春一定放出大面积‘卫星’。尤其是小麦‘卫星’。我们意见是小麦不少于 1 万斤以上……争取比一般早收一个月，赶在全国全省之前放出‘卫星’”10 月 21 日，再给澄江、玉溪等 10 县委发电通知：“省委要求 10 县委保证明年放出小春‘卫星’。”¹⁰

大跃进高压下超强的农业劳动和营养不良很快就出了问题。官方统计，从省委连篇累牍追发放卫星指示的 1958 年 6、7 月始，浮肿病便开始在曲靖，玉溪、红河、楚雄、昭通、大理、丽江、文山、临沧、思茅等 10 个专州 70 多个县、市大面积爆发，死亡率畸高，截至 8 月 20 日止，全省发病人数已达 236000 多人，死亡 34000 人，占发病人数的 14.4%；其中尤以曲靖、玉溪、红河等为最。曲靖地区至 8 月底累计发病 141169 人，死亡 18909 人，占发病人数的 13.4%；玉溪地区至 9 月下旬累计发病 52500 人，死亡 10062 人，占发病人数的 19.2%；红河州至 9 月上旬累计发病 33249 人，死亡 3262 人，占发病人数的 9.8%。7 月 7 日，云南省卫生厅派出省第一人民医院内科主任沈允斌等到死人人数仅次于陆良的泸西县实地调查，认定此病系混合型营养不良性水肿，并向曲靖地委写了《泸西县肿病调查防治报告》。曲靖地委怕承担责任，转发报告时称水肿病发病原因尚待进一步研究，此报告仅“供领导同志参考”。云南农村死人的事情进一步恶化。¹¹

云南省委农村工作部 1958 年 8 月 22 日写给省委的报告《陆良县茶花乡肿病死人情况调查》继续痛呈凶信：茶花乡现有 2434 户，9510 人。从 1958

年 1 月到 8 月 16 日止，发病 4081 人，占全乡原有人口 11104 人的 36.8%，其中肿病 2946 人。死亡 1594 人，占全乡原有人口的 14.3%，占现有人口的 16.7%。较严重的第四社，共有 273 户、1089 人，死亡 272 人，死亡率为 25%。有的人患肿病后一泻肚子就死了，有的消肿反复两三次死亡，有的肿后皮肤破裂而死亡，有的不肿却干瘦而死。社员史正富没有肿，十分瘦，在拣小白菜时倒地即死。30 岁的社员王德民因肿病插秧时倒在田埂上就死了。社员史老秋肿病一夜小便多次，次日早晨死在床上。开始死人时还用棺材、木匣子装好埋葬，后来用席子卷了抬出去，再后来没有人抬，用牛车拉，一牛车拉三四具尸体，在村附近的泥塘、水沟、房前、屋后随便丢。县委书记孔祥柱还看到一个塘里有 9 个死人，一条沟里有几个。省委检查组 11 月 20 日的报告说，茶花乡共有土地 18817.14 亩，1957 年产粮 526.4796 万斤，1958 年产粮 381.099 万斤，比上年减少了 145.3799 万斤。减产 27.61%。1957 年人均口粮 336 斤，还要扣除吃掉的萝卜（10 斤萝卜折 1 斤粮）和已超前吃掉的国家供应指标，到 1958 年春天，农民能吃的口粮已经很少了。

省委书记处书记刘卓甫给省委的报告中说，曲靖专区从 2 月到 8 月 20 日，累计发病人数为 139451 人，死亡 18843 人。究竟死了多少还弄不清。陆良原统计 3067 人，后改为 5167 人，加上其他病死亡的人，共死亡 12912 人。在病情严重时，个别母亲吃小孩，父亲卖儿女。由于大人死亡，留下大量孤儿，仅泸西五区就有孤儿 150 多人。为什么死人问题拖半年之久？刘卓甫认为，主要是干部不敢提粮食问题，怕右倾，怕当右派。¹²

事情闹到这一步，谢富治不能不心惧上峰降罪，遂于 11 月 18 日，以省委名义向中央上报了《关于肿病死人情况的检查报告》。《检查报告》分析了所犯错误的根源，“主要是领导作风不深入，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现象较为普遍，对群众的生活疾苦关心重视不够，加之在宁左勿右思

¹⁰ 《当代云南大事纪要》1958 年条目，北京：当代中国，1996 年。

¹¹ 同上，第 189 页。

¹² 转引自《墓碑》第十章《大饥荒中的云南》。

想的指导下，不敢正视当时已经非常严峻的粮食问题，以致给全省人民造成了不应有的巨大损失。鉴于省委的失职错误严重，请求中央给予处分。”毛泽东从来喜欢属下书面检讨，因为一份检讨便是一份驭人利器。大跃进本是他头脑发热的病态冲动。谢的检讨自然让毛对他的左倾及忠诚之好感又添了一分。1958年11月25日，毛对中宣部《宣教动态》145期转发的此报告宽宏大量地做了题为《一个教训》的批示：“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如他们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及时觉察部分地方发生的肿病问题，报告对问题做了恰当的分析，处理也是正确的，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别的省份，则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样的错误。因为他们还没有犯过云南所犯的那样一种错误，没有取得深刻的教训，没有取得免疫力。”¹³

前任此类荒诞作派，阎红彦早有耳闻且并不陌生，任职四川期间，他对“大跃进”“高指标”“浮夸风”便深恶痛绝。1958年秋，听说温江地区某公社水稻试验田亩产3万多斤，他曾专程前去查看，所谓高产“卫星”果然是将几十亩即将成熟的水稻移栽挤进一小块田地摆样作秀，党报《四川日报》所发消息则毫不脸红地宣称四川粮产几近翻番。为此，阎红彦憋不住在省委会议上怒批报纸“瞎吹”。¹⁴ 阎红彦向彭真坦言与彭德怀观点一致，其源盖出于此。云南作为边疆民族地区，谢富治施政不仅口号花样百出，实际结果又比内地多一重灾难：1958年谢大反“边疆特殊论”“民族落后论”“条件论”，大搞“三步并作一步走”，原来和谐有序的民族政策惨遭冲击，边疆动荡，边民13万多人非正常外流¹⁵……

“左”倾错误使云南省的经济、社会生活处于

极为困难的状况。履新伊始，摆在阎红彦面前的数据是：1959年，农业生产总值比上年下降5.89%，财政赤字8112万元；1960年，农业总产值继续下降4.01%，粮食下降3.51%，粮食大幅度减产，副食品严重缺乏，致使农村浮肿病患蔓延。截至1960年7月底，除临沧地区以外，全省浮肿病人已达7.9万多人，人口持续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¹⁶……

庐山会议刚落幕，批“右”风暴横扫全国，“三面红旗万万岁”口号响遏行云，事实却是所谓“总路线”“超英赶美”“钢铁翻番”“全民炼钢”已彻底失败。最要命的，是农村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公共食堂，弄得饿殍处处……这些都是必须马上解决的。阎红彦作为第一责任人，如果继续靠政治梦呓和左倾口号治滇，显然只会更糟。他必须实事求是地解决三农问题。来滇前阎面见邓小平、彭真，丑话已说在了前头。况且政敌高岗早已塌台，阎红彦成了陕北根据地旧果仅存的正确代表，有此“丹书铁卷”，按自己的主意大干一番，阎红彦底气足矣。

中国为官之道，对政事儿无非三种办法：一是不说不做，一是只说不做，一是只做不说。不说不做，尸位素餐，诚然安全无虞，但射灯永远照不到头上，难有升迁之机；只说不做者，只要巧舌如簧，又遇上司喜人吹拍，往往一路春风；在政治风险极高的极权环境下，只做不说，当属有理性又有社会担当的稀缺物了。阎红彦基本属于第三类。他懂得中共游戏规则，他知道毛泽东的“三面红旗”是万万碰不得的，但就事论事地解决应急的事——首先是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却刻不容缓，也是可以办的。来滇三月后的1960年2月至7月，阎红彦用整整半年时间，就安排群众生产生活为重点，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发现问题，研究对策，他从滇中粮仓禄丰、建水、曲靖、玉溪、巍山……到边境穷乡勐海、孟连、澜沧、西盟、景洪等县，普遍听取了地

¹³ 《当代云南大事纪要》第201页。

¹⁴ 李原，第376页。

¹⁵ 云南民族处于不同社会发展时期。有的（如傣族）是典型的封建制度，有的（如佤族、基诺等）尚处于原始社会。解放之初，有的采取“和平协商土改”（称“和改区”）、有的搞直接过度（称“直过区”）等，保持了边疆总体社会稳定。1958年4月26日，省委边疆工作委员会召开边疆‘直接过渡’地区工作座谈会，肯定这类地区出现的“民主革命和合作化高潮，双管齐下，一箭三雕，三步并作一步走”的激进做法。自此边民开始外流。

¹⁶ 《当代云南大事纪要》1958年条目。

县委汇报，同时直接向农民和基层干部进行探访。

大理三月，车过剑川县金华公社，著名电影《五朵金花》描写这儿“大跃进”的“好风光”曾感动过全国无数观众。阎红彦在此路遇的，偏偏是凄凄惨惨的送葬队伍，死者多为缺粮患浮肿病致死。阎红彦愤怒了，他当即找土官们查问为何知情不报？基层书记一个个噤若寒蝉，承认怕被扣“右倾”帽子，不敢说真话。

阎随即召集省委常委开会，决定：一、对主要责任人州委、县委、公社书记进行组织处理；二、向全省灾民发放平均每人每天8两救济粮，对浮肿和妇科病人集中免费救治，全省共组织医务人员3万多人下乡工作；三、要求各地、州把制止肿病死人作为当前头等大事来抓。4月10日、14日，阎又在全省六级干部会议上提出：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要注意安排群众的休息，做到劳逸结合；强调领导干部要深入群众，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要把真实情况向上反映。4月17日，就金华公社大量肿病死人事件签发云南省委向中央、西南局的报告；6月，省委召开地委书记会议，阎红彦专门主持研究让群众吃饱饭的问题，他再次强调：“不顾群众死活，胡吹，蛮干，不是马克思主义。”经过一段时间努力，大量肿病死人的蔓延和干群关系的恶化得到暂以遏制和缓解，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健康状况逐步得到恢复。

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组织形式一大要件，是消灭家庭私有制、建立斯巴达式军事共产主义的重要生活方式。1960年底，在阎红彦主导下，云南省委明确决定：边疆地区一律不办公共食堂；而体现人民公社所谓“一大二公”的核算制度，也被云南省委进行了大幅调整：内地高山分散地区分别实行大队、生产队、作业组所有制，远离生产队的单家独户或三家再户，作为生产队的“挂钩户”，实行单独经营；生产队、作生组、个体户实行农作物、畜牧业、林业和副业的生产承包责任制……阎红彦动作

之大，实属全国罕见。

还有边疆民族问题。大跃进以来，随着“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论断的提出，原来那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很快就被贬斥为“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而横遭挞伐¹⁷，云南作为少数民族最多的边疆省，反“边疆特殊论”、反“民族落后论”、反“条件论”随之风靡一时。阎红彦针锋相对地提出：“‘反三论’的观点，不是没有常识，就是说假话”，那种“没有条件也要上”的观点，是“刀枪不入的主观主义”“刮‘共产’风的办法，不能刮出社会主义来。”“不能光一天唱赞美歌，而置群众死活于不顾。”¹⁸

来滇第三年的1961年1月20日，云南省委正式向中央、西南局报告，要求“全面审查以所有制为中心的边疆各项政策”，并组织工作团分赴边疆，决定根据“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原则，把入社农户由1961年占总农户的90%调整到56%，退回到互助组和初级社的水平；允许社员长期保留自留地、零星果木、竹蓬、柴山、小鱼塘、分养牲畜；对缺乏劳力的个体农民，允许用合理工资雇用短工，或以畜力换人工；允许自由借贷和买卖。¹⁹ 12月5日，阎红彦对省边疆民族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批示：“在边疆不要笼统地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²⁰

阎红彦的动作、言论的尺度之大，让基层干部心有悸怕，担心“允许一些人单干”会“一动百摇”，破坏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阎红彦态度却坚决执拗，他说，我们要做到“百摇不动”，该集体的坚持集体，该允许单干的也要实事求是地允许单干。

阎红彦的许多言论，成了1960年代云南人的福音。到了文革，这些言论都成了“阎红彦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话’”。——

“光讲政治，不管生产，生产抓不上去，政治

¹⁷ 《人民日报》1980年7月15日，特约评论员：《评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

¹⁸ 李原，第376页。

¹⁹ 李原，第382页。

²⁰ 刘明辉、赵增益：《崇高的品质 求实的精神》，《人民日报》1979年2月10日。

就讲不好。着重点是生产。”²¹“所有制的过渡，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共产风’纠正起来困难，是由于我们的干部错误地认为，搞集体方向就是对的，搞集体比个体好，搞公有比私有好……但群众有很大的消极情绪。全党的同志必须下很大的决心，从理论上、实际上有个清醒的认识，才能纠正‘五风’”²²“右倾是方向问题，‘左’倾也是方向问题。王明、李立三‘左’得很厉害，他们的方向也错了，我们有些干部认为各民族共同富裕是个方向，因此就大办公共食堂。他的愿望很好，但是愿望达不到，方向就错了。把明天的事拿到今天来办，是错误的。”²³“我们的制度，千好万好，没有饭吃就不好。我们的政策，千正确万正确，不能发展生产就不正确”²⁴……

除了上升到理论的语言，这个省委书记的许多指示简直就是婆婆妈妈大实话：“（边疆）现在还保持落后的状态，有的地方不会使牛；有的地区还是刀耕火种。”“不洗脸，发也不理，生活水平反映了文化水平。我老是挖苦我们批的有些部门的文件，总是提那么一大堆什么教育方针呀！边疆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阶级教育啊！……实际上是很不负责任的，讲了那么多空话。沧源²⁵有个地方，有些青年人，问他是哪国人，他都不知道，你教育了多少年，他们连是中国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爱国主义？”“（工作队）要有教员、有医生、有会手工业技术的，工农商学兵都要有。工作队到哪里，就在那里教他们生产，教他们手艺，教他们生活，教他们文化，教他们由不理发到理发。”²⁶

阎红彦的努力得到了回报。1961年秋，云南农村情况已有显著好转。80%地区生产、生活情况和政治情况都比较好。小春作物产量已达历史最高水平。初见成效的喜悦和自信难以掩抑，1961年5月9日，阎红彦在调研途中忙不迭给毛泽东写信，就社队规模、公共食堂、工资制、山林管理、实物分

配等问题，作了较系统的汇报，提出：

一、人民公社的社队规模不是越大越好，要考虑居住条件、经济联系、民族关系，该大就大，该小就小。山区的公社有的可以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而且应该基本上以村寨为单位划分生产队。生产的组织上，有的可以包产到组，有的可以包产到户。二、公共食堂问题，群众反映普遍都很强烈。主要意见，一是浪费大，二是平均主义，三是和发展私人养猪、家庭副业有矛盾。既然食堂是直接关系群众生活的大事，还是根据自愿，由群众讨论决定，不能有任何勉强。群众真正要办的就办，群众真正不愿意办的就不办。三、关于分配问题，各地群众一致同意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多数地区群众不主张实行部分供给制。四、耕牛、大牲畜归生产队所有，可以大大加强生产队的责任心和积极性。五、山林应分级管理，并应迅速确定林权，明确所有制。六、公社内部的集体与集体、个人与个人之间，分配上是平均主义的，什么都按人头分，各地社员要求实物按工分分配，多劳多吃。

自从“大跃进”纵横国中，毛泽东急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不断祭起乌托邦理论宝典：“一大二公”、反“资产阶级法权”、消灭商品经济、取消八级工资制……阎红彦其所作为，无不忤逆这些宝贝命根儿。可是毛泽东竟然没发怒，反而对其大加抚慰，5月16日，毛主席对阎信做了如下批示：“阎红彦同志此信写得很好。他的调查方法也是好的，普遍与个别相结合，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以及五六月间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到会各同志，供参考。”

毛之所以没有发怒，是他知道大跃进惹下大祸。这时候正需要有人替他擦屁股。阎红彦是个实在人，由这样的人洁臀，领袖放心。阎书记于是继续任性地干下去。

²¹ 1960年4月27日视察巍山县的讲话。李原，第380页。

²² 同上

²³ 1960年7月23日对边疆工作发表的意见，同上，第381页。

²⁴ 同上，第377-383页。

²⁵ 沧源县系云南临沧专区一边疆县。

²⁶ 《当代云南大事纪要》，第335页。

三、告密与小说《刘志丹》冤案

1962年，整个社会出现了1956年以来再一次宽松局面。但毛泽东心情却并不舒畅，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公然挑战，说大跃进失败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甚至私下警告毛：“人相食，是要上书的”……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清算给毛敲响了警钟。1962年7月25日至8月24日，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原定讨论农业、财贸、城市等方面的问题，毛泽东却突然提出阶级、形势、矛盾三大题目要与会者讨论。他集中炮轰农村出现的“单干风”，谈“光明”“黑暗”的比例，尤其是大讲特讲阶级斗争，让代表们一头雾水。9月24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开幕，毛泽东正式提出了他关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新理论。

按照马列主义关于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经典说法，社会主义仅仅是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一个“过渡阶段”，毛泽东颠覆此一提法，宣布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此历史时期“始终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因此阶级斗争必须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所有工作都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后来被称为马列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奠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依据亦来源于此。全会决定在城乡发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成了文革的预热。党内斗争再次拉开大幕。

在这次会议上，阎红彦意外爆冷。小说责任编辑、《人民日报》何家栋说法最有代表性：（正是阎红彦的告密）“为毛泽东‘阶级斗争为纲’提供了一枚重型炸弹，从这里打开突破口，在哲学、经济学、史学、文学、新闻、电影、戏剧等意识形态领域里展开了对资产阶级的大批判，形成文化大革命的前

奏。”²⁷事情经过如下：

1956年，工人出版社约请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之妻李建彤撰写《刘志丹》一书，以歌颂这位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刘志丹》于1959年夏完成第六稿，作品体裁由纪实体改为长篇小说，付梓之前，作者将稿样送各相关人士征求意见，阎红彦属于征求意见者之一。《刘志丹》源于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旧事虚构，阎红彦自然要“对号入座”。从陕北当年造反，到延安整风、七大召开，阎红彦和高岗拧来拧去，早成一对老冤家，阎红彦想要争的，无非就是陕北根据地到底谁是正宗创始人。事情到了1958年，高岗因“反党集团”事早身陷地狱，毛泽东亦专门向阎道歉，说把他“冤枉了十多年”，事情至此不挺好吗？可阎红彦偏偏对这段历史恩怨不依不饶，认为小说还在抬高岗、贬老阎，简直就在翻案！坚决反对出版。让阎更不能忍受的是，待到他去北戴河参加中央会议，《人民日报》《中国青年》已经开始发表小说部分章节：他的愤怒可想而知，立即致电全国总工会和团中央要求停止刊载。致电无果，干脆将事直告康生——这一卦拍灵了。康生如获至宝，当即要中宣部通知各报刊一律禁发，接着致信杨尚昆，提请中共中央书记处处理小说《刘志丹》。

阎红彦乘胜追击。9月3日，阎红彦亦致信杨尚昆，要求中央针对小说《刘志丹》引发的西北历史问题，召开一次专门座谈会。9月8日，阎在西南组再以小说《刘志丹》做文章，说当前国内外的气候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动闹“翻案”，小说《刘志丹》是习仲勋“主持”写的²⁸，是“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康生接话：“现在的中心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他们的发言在全会“总72号”简报登出，引起爆炸性轰动。

这次会议前的1962年6月16日，彭德怀曾向中央和毛泽东呈送长信（所谓“八万言书”），详述

²⁷ 摘自《西北革命历史网站》/《理论园地》文：“何家栋：阎红彦、李原和小说《刘志丹》”。

²⁸ 事实是，1959年作者写出第三稿后，作者曾请当年担任过陕甘苏维埃政府主席、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审阅，1960年春，习仲勋两次约请作者谈了自己对书稿的意见，认为小说还没有写好，要把刘志丹放到大革命整个一个时代去写。不要写高岗。根据习仲勋的意见，作者于1961年春写出第四稿，而阎红彦看到的，已经是第五稿了（参看方兴海著《小说《刘志丹》冤案始末》）。

自己历史，请求中央全面审查，并特别申明，他在党内从未组织过什么“反党小集团”，也没有“里通外国”的问题。8月22日，北戴河会议召开期间，彭德怀再次致信毛泽东和中央，重申不存在反党小集团篡党和同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的问题。彭德怀两次上书本已让毛恼怒，以为是向党发起新进攻²⁹，遂决心利用本次大会实施反击。阎此举正好为批判“翻案风”送来一枚重磅炸弹。9月中旬开始，各组结合批彭，同时集中火力对小说《刘志丹》展开批判，并将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打成“反党集团”，继而升级为“彭、高、习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9月24日，毛泽东正讲话间，康生乘机递过一张字条称：“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主席念了这张条子，接着发挥：“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9月27日，全会决定成立审查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的专案审查委员会。康生为主任。³⁰

整人的权柄一旦落如康生这类酷吏手上，谁都不会有好日子过。西北五省大批省级干部被齐调北京“学习”，不少被诬为“习仲勋反党集团”成员。《工人日报》党组、全国总工会党组以至中宣部亦未能幸免。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被撤销职务，1965年下放洛阳矿山机器厂当副厂长，文革期间被关押八年；原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这位1952年由毛泽东点名调任政务院财经委副主任、曾被毛誉为“党内的贾宝玉”“陕北才子”的传奇人物，亦被撤职下放，1967年5月7日被迫害致死；1968年5月，刘景范被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入狱。李建彤于1968年1月遭关押，1970年被开除党籍，劳动改造；1968年1月，时任劳动部部长的马文端也被关押。“习、贾、刘反党集团”一转眼就被说成了“习、马、刘反党集团”。陕甘宁老区上万基层干部和群众被打成该集团的“黑爪牙”。一部小说株连

万人，实为史上罕见“文字狱”。

八届十中全会吹响了阶级斗争号角。自1962年秋冬始，“阶级斗争”成了全国各级共产党组织执政的头号主题。次年5月，毛泽东主持召开“杭州会议”，讨论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9月，中央在北京再次召开会议，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从此开始。

阎红彦告密事件让他在八届十中全会赢了个大满贯，其客观效果，确为毛泽东将阶级斗争绝对化、扩大化提供了一枚重磅炸弹，酿成一场株连上万人的大冤狱，同时亦让他本人广遭诟病。文革后，他的大秘李原³¹极欲为他辩诬，不但无济于事，反而越辩越黑。笔者以为，综观阎红彦性格逻辑和处世风格，对该告密事大可不必过度解读，看作陕北历史“山头”之间恩怨的继续，阎像个乡村怨妇携私复仇，也就可以了。我们马上就会看到，阎红彦政治上其实非常不清醒、非常不敏感，有时干脆就是个糊涂虫。

四、全国唯一公开宣称“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省委文件

八届十中全会9月27日落幕，云南省委即刻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会议从10月25日至11月29日，参会793人，涵盖了滇省地、县委书记和军队团以上干部。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足见对中央精神之重视。开幕前，西南局办公厅李辛夫专电云南省委秘书长梁浩，传达西南局有关介绍四川经验的指示，说：“从四川的经验看，要划清阶级界限，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透一点有好处。”其时阎红彦正在上海治病（他身材肥胖，血压高，每年都需要去上海求诊³²），梁浩随即向省长于一川做了汇报。

²⁹ 《阎红彦告密与习仲勋遇难的历史追踪》《中华论坛网》。

³⁰ 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095-1096页。

³¹ 文革前曾任阎红彦秘书、云南文山地委书记，1975年后任云南省委秘书长，后调南开大学任党委书记。

³² 1970年代笔者供职于云南省委办公厅，多有老省委同事说起阎红彦身材高大肥胖，每年都要去上海做吸脂手术，用云南土话说，就是“割板油”。

于一川，河北沧州南皮县人，自幼聪敏好学，博闻强记，品学兼优，19岁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并加入中共，自此走上革命道路。时任晋冀豫区党委书记的李雪峰曾如此赞誉：“一川是党的秀才，革命才子。”1950年代，宋任穷任云南省委书记，专门向西南局书记邓小平要来了两位学识和经验均属丰富的“秀才”能吏，一曰岳肖侠，任云南粮仓曲靖地委书记³³；另一位，就是担任省委秘书长兼土改委员会主委的于一川。

按于的思想水准和政坛历练，他应该读懂毛泽东对其阶级斗争理论的创新成果是何等看重的，只是久居边地，日近长安远，对中央极权下的服从意识略有淡薄；其次，于一川精明干练，仕途顺风，短短十余年，已官拜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难免自负刚愎；最后，此次他恰恰随阎红彦赴北戴河亲历盛会，记牢了毛泽东讲话，除了阶级斗争，还有“不要因强调阶级斗争放松了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的指示，于是居然自作聪明地告诉梁浩秘书长：“四川那样提，我们不那样提。”两天后，于主持省委常委会议研究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事宜，明确肯定，云南的情况与四川不同，四川那样提，我们不那样提。不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开展群众运动。要强调抓生产力，抓经营管理。³⁴

阎红彦于会议开幕次日返滇，因小说事件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暴得大功，不免得意满满，回得昆明，立马又一头栽进振兴云南的经济幻梦之中。对于省长自以为是的观点，他真心赞赏，鼎力支持；同样，对于西南局那个李辛夫的电话提醒，他不以为然。

11月26日，于一川受省委委托作《会议总结报告》：“我省情况是这样：两条道路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但作为这个时期的突出表现的‘单干风’并没有刮起来。也就是说，经过调整，执行政策，发展生产，农村中是正常的状况。因此，没有必要、

也不应该在农村中从开展一次两条道路的斗争入手，通过这样一个政治运动来解决目前所存在的问题。而应该以改善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发展生产为中心，结合对农民进行正面的社会主义教育，达到巩固集体经济的目的。”于省长的总结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两天后会议闭幕，阎红彦作总结发言，对于一川的《会议总结报告》充分认可，明确认定：“一川同志作的总结，是经过省委讨论同意的。”接着代表省委提出“鼓足干劲，大力生产”的方针；要工业和手工业生产增加产品品种，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云云；同时强调要有干劲，又要实事求是，能搞多少算多少，不要再犯浮夸、弄虚作假的错误，云云。

根据这次扩大会议精神，12月21日，云南省委在批转宣传部《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意见》中再次宣布，云南没有刮起单干风，也不存在生产生活和市场混乱的问题，因此“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的群众运动”“主要的和首先的是通过重续贯彻执行政策，改善经营管理，解决实际问题，把群众的生产运动组织起来，从中结合进行思想教育、启发诱导、分清是非，提高觉悟，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积极性。”³⁵

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正如大旗升杆，高高飘扬。仅仅时隔两月，阎红彦就公然对着干，在全国发出了唯一一份公开宣布“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红头文件，无异于掰龙鳞，捋虎须，吃了豹子胆。西南局一位常务书记见此文件，立即提出，这是明目张胆地违背中央精神，当即责令云南检查。对此，阎红彦竟然针锋相对发牢骚：“没有饭吃，搞哪样阶级斗争！”云南急于要解决的是老百姓的温饱和稳定，“如果谁能发明人可以不吃饭，我就天天搞运动。”³⁶

麻烦越惹越大。翌年5月召开的杭州会议专门

³³ 岳在文革中属于“八二三”派的干部，云南揭批查中理当属于整肃对象。所幸宋任穷复职，任中央组织部长。又得早年河南老家朋友、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搭救，调河南任省委副书记，幸免于难。

³⁴ 阜人政：《云南社教运动中的一场政治风波》载《百年潮》2008年2期。

³⁵ 《中共云南省委文汇编（一）》第142-147页，云南省档案馆存。

³⁶ 《合肥晚报》2002年12月23日文章《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一份不提阶级斗争为纲的文件》。

讨论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毛公开点名批评了阎红彦“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省委文件，是“大胆的主观主义的假设，小心的主观主义的求证。”

这一回，倒是先把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吓一大跳，会议尚未结束，他便提前回了四川，于5月10日至23日主持召开西南局第二次全体会议传达杭州会议精神，专门传达了毛泽东对云南“不以阶级斗争为纲”问题的批评，责令阎红彦检讨，还要云南省委写出书面检查报告。李井泉斥责参会的于一川：“你们就是对待十中全会不严肃！”于省长只得检讨。第一次不过关，西南局领导再次敲打，提醒问题严重性，要其继续检讨，于唯唯遵命——直到会议结束，虽经多次检讨亦未得过关。西南局责令于一川“回去再写检讨”³⁷。

阎红彦没有参加西南局的会议³⁸。他缺乏政客的厚脸皮。杭州会议被最高领导点名，高血压也发了，心脏病也发了，省委诸人劝他看病去，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家里的事我们会料理的。阎去上海看病前，为检查定下口径，说省委的做法“是符合云南省实际的，只是文件在文字处理上有不妥之处，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应该记取教训。”留下于一川全权代表省委去成都挨克。知识分子干部最喜欢表现自己对组织的忠诚。于一川表现的机会到了。

五、“于、梁反党集团”

于一川从西南局返回云南，立马召开云南省委第七次常委会和省委扩大工作会，检查贯彻执行八届十中全会精神方面的错误。5月28日，受省委常委委托，于一川将七次常委会讨论的情况加以综合，在会议作《检查报告》称：省委“对过渡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认识上有模糊之处”，宣传部写的那个文件，是有错误的，把十中全会的精神，把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两条道路斗争问题冲淡了。

会议结束次日，彭真受中央委托特来云南处理此事；31日，所有在昆常委悉数到场，由于于一川正式代表省委汇报。依旧是那一套自我批评：云南省委对八届十中全会精神认识不够、对阶级斗争认识比较模糊、从概念上讲阶级斗争多、联系实际不够、抓生产多，对社会主义教育抓得不够、宣传部的那个文件是有错误的，与省委思想有关系……云云。彭真多次插话，宽宏大量地说，我看了你代表省委在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检查报告，“常委讨论，认识了问题，就行了”“你们还是要抓生产，现在抓生产也得突出。”于一川于是再表沉痛，说问题严重，还要继续按上级指示，向西南局、中央写检讨。中央大员自然更加宽厚，回答道“不必写检讨了”“我回去向毛主席报告”。

彭真离滇，6月2日，云南省委马上召开省委扩大工作会议，学习贯彻彭真视察云南的指示，会议再次印发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对照检查前一段云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5日，于一川继续代表省委检查，说省委在一些问题上认识有错误，依旧是“阶级斗争的旗帜不明显”，对当前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不足，甚至估计错误，因此把社会主义教育的位置摆得不够重。西南局敲了我们一下，指出了省委宣传部写的那个文件的错误，最后一锤定音：“主要是省委负责”。会议顺利结束，以于一川所作检查为基调，正式形成云南省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的检查报告》，20日呈报中共中央、毛泽东及西南局。云南省委官员们的态度委实真诚，委实沉痛，28日，西南局批复：“同意云南省委对过去一段工作的检查。”

事情至此，关于“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引发的风波，算是暂告结束。于一川殚精竭虑，左支右绌，屁股基本擦干净，可以松一口气了。只是，1963年后的中国，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已如大网垂天，所有人都难逃劫数。云南四季虽如春，云南省委企图按部就班工作已不可得，以至阎红彦不得不先借于一川的政治头颅来祭一回旗。

³⁷ 同上

³⁸ 李原，第194页。

1964年10月，根据中央精神布置开展“反右倾”运动，在云南省委召开的书记处书记会议上，那个稀里糊涂的“不以阶级斗争为纲”文件，作为重大政治事件旧话重提。这一回，文件的操刀手和擦屁股者于一川、梁浩在劫难逃：双双成了“反右倾”的主要对象。

10月21日至11月19日，云南省委召开工作会议，地、市委书记和省直有关部门的参会者被要求对于一川进行揭发批判。其间，省委常委还多次召开专门会议对于一川进行“帮助”。于省长先后作了4次检查，承认这几年工作上犯了许多错误，主要错误是将近两年的时间不讲阶级斗争，或者讲了而没有具体内容，没有和实际情况联系起来……总之，这两年的时间，阶级斗争的观念是模糊的，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已经反映出来。

云南省委于是形成了《关于于一川同志所犯错误初步情况的报告》呈报中央和西南局。时间是会议结束一月后的12月26日，《报告》指出：从1961年调整以来，于一川的“右倾观点是相当突出的”，特别是1963年5月西南局会议“批评了我们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错误提法，他极力推卸责任”。次年1月下旬，云南省委布置全省“四清”运动，再次召开专门会议继续批评于一川，阎红彦将于的“错误”系统归纳三大块：“阶级斗争的观念问题”“干部问题”和“经济问题”，阎红彦称：于一川的检讨把许多重大问题都那么轻描淡写，好似至多不过是一些认识问题、工作问题。“一川同志是不是说错一句话、办错一件事的问题？我认为，不是这么个问题。”“贯彻十中全会精神时，在我们省委宣传部的文件上出现了一个‘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的群众运动’的提法，这是一个错误。”“当然，当时全国没有提‘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只是四川提了，但是全国谁也没有提不以阶级斗争为纲，只是我们云南提了。”“所以，一川对十中全会的态度问题，是反映了他的阶级立场、阶级观点、思想感情的，是阶级本能的反映。一川的基本思想是：对阶级斗争，反正不能提。”

阎红彦对于一川下此狠手，有他的私心——于

一川太能干了，对人又和蔼，在干部中印象普遍良好。谢富治主滇时代，很多具体工作都由于一川担纲，谢调离云南，原本就推荐于一川接任，皆因李井泉从中作梗，得以让阎红彦成了封疆大吏。阎的陕北“土老财”作风与于一川的京城知识分子作风一幅鲜明对比，将于一川干掉，确可让阎书记六根清净。

一把手定调，批判继续升级。就在这次会议上，有人甚至危言耸听地揭发，说“于（一川）、梁（浩）集团”实际已成为地下省委，已经在反党。”“八届十中全会后，于一川害怕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主张农村工作主要是生产和经营管理问题，梁浩背着省委极力加以宣扬和执行。性质已上升至“反党集团”层次。

干部们的揭发批判已然狂涛巨澜，事情就顺水下滩了，许多庸俗的花边传闻也派上了用场。时任组织部长、同样精明干练的孙雨亭正意欲上位，为了搬开王静这块拦路石，告密说：于一川夫人王静，云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本系于的大学同学，王有一表哥是二人的同学，时在交通部交通管理局任局长。三人在校关系皆不错，而王静与此表哥局长又有青梅竹马之谊。王每次赴京开会理要前去探望表哥，此事登上了省委“简报”遂成了：王静与表哥关系暧昧不清，于一川甚至瞅机会送夫人去北京幽会。还称王静虐待保姆，毒打时把保姆头发都抓掉了。四清简报称，于一川对阎红彦来滇主政心有不满，曾私下发牢骚，说“什么红军？不过西北红军！”

接下来就是做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1965年2月20日，云南省委向中央及西南局报告，认为于一川犯“政治上右倾”等错误，定性为“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央及西南局则据此作出正式处理：撤销于一川的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昆明军区副政委、云南省军区政委及党委第一书记等所有职务，调河南省郑州柴油机厂任副厂长。

“反党集团”另一名主犯梁浩因“在修改省委宣传部代省委起草的《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意见》时，按照于一川同志的意图，删去原件中‘以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为主要依据’和

‘教育的主要内容是进行阶级斗争教育’等重要语句”，加上了“‘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的群众运动’。这个错误的文件未经过正式讨论，他就擅自发出。”再加上“梁浩是一个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极端利己主义者”，云南省委决定，给梁浩留党察看两年、工资由 9 级降为 12 级的处分。³⁹

这次机关“四清”牵连了多少人，现无法查阅到官方资料。笔者保留了云南大学炮兵团驻省委联络站《捣毁阎王殿》战斗队 1967 年 1 月 16 日的传单，上面载有如下人员落马：“张子斋（省人委秘书长）、吴鸿宾（机关事务管理局长）、郭庆基（省委农村工作部长）。玉溪、昭通地委整个班子，大理地委书记郑刚（省委委员）”民间还有什么“四大流氓”“四小流氓”之说，则更难稽考了。据笔者掌握的资料，至少李清祥是在这次“四清”运动中被打倒的。李此前在省林业厅森林防火大队任党委书记兼大队长，再前，则任大型企业昆阳磷矿党委书记，再前则为谢富治警卫员。文革中被造反派从劳改地解救，后来便在两派间呼风唤雨，演出许多荒唐剧，这些，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再说。

对于于一川、梁浩和他们的同事们，我们有理由认为，在造反年代，他们对理想的献身和信念追求是完全真诚的，我们又必须承认，当共产党成为执政者，在毛泽东这样的一代雄主之下当了大小诸侯，历史又要他们在陌生的政治生态中重新学习：在政策与良心之中工作，在迎合上意与守正存真之中选择。造反需要的是拼命和牺牲，执政需要的则是柔韧、退让、妥协、平衡术和生存技巧（特别是自我保护技巧），甚至或真或假的服从与逢迎，而不是信念和是非感，在某种极端情况下，不排除背叛和出卖。于一川没有学会这个，他的积极奉献，收获的完全相反的结果。

1979 年 9 月，云南省委开会研究，同意省委组织部、省纪委关于于一川的复查报告，并上报中央。

中共中央于 11 月 23 日为于一川平反。同年 12 月，云南省委亦作出决定，撤销原来对梁浩的处理。事情已经过去 14 年。⁴⁰

阎红彦在制造“于梁反党集团”冤案上，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从追求正义的革命者到党国官僚，几十年来，对假革命之名而制造的不义和冤屈，应该看得太多，但是为了自保，他放弃了良知和正直，把明理和自己思想一致、行为与共的同事拉出来祭旗。这个政治上的糊涂虫和经济上的实干家，满以为如此一来便可一劳永逸。事实证明，他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阎红彦主滇 7 年，确实对风行全国的某些左倾错误进行了抵制，并取得让滇人赞誉的成就。从 1959 年走到 1966 年，可谓他人生的高峰时代。早在 1964 年，云南就实现了平均每人占有粮食 780 多斤，每户有大牲畜 2 头，小牲畜（主要是猪）3.3 头，工业、手工业和文教卫生也有很大发展。他还发豪言壮语，说如果注意用先进技术带动落后，因地制宜地来改变落后，云南的情况会改变得快一些。如果工作跟得上，等火车通了，昆明的蔬菜水果可以供应北京，水果可以比北京提前两个月上市。这样，云南可以贡献比较多一些的东西。⁴¹ 还计划培养少数民族自己的知识分子、工人、技术人员、管理干部，要部队、农场和所有机关、工厂、企业事业单位都要吸收少数民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各方面的人才，并且要列入工作计划。

1965 年初，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四清”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二十三条”明确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阎红彦依旧地强调说，这个运动“主要是掀起生产高潮”“运动搞得好不好，主要是看生产上、经营管理上、领导水平上是不是有显著的变化。”对边疆地区，他公然明确提出了“不搞整党内走资派”。⁴² 振兴云南的经济梦让这位封疆大吏沉迷得太深沉。

（下转 85 页）

³⁹ 参看卓人政：《云南社教运动中的一场政治风波》载《百年潮》2008 年 2 期。

⁴⁰ 《当代云南大事纪要》1965 年卷。

⁴¹ 1965 年 12 月 10 日，阎红彦在昆明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讲话。

⁴² 李原，第 398 页。

【研究】

风中的呐喊

——一位公社干部的内心世界（1958—1970）*

姜成洋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对“大跃进”及其后续影响的认知，学界多停留在宏观层面。即便涉及微观，也多是群体的行为呈现，鲜有系统的体现个人命运、观念波动的故事。人们往往想到群体无理性、乌合之众等概念，并借此想象那个特殊年代的社会状态。人们看到发自肺腑的群体欢腾，也看到了顺应时势的政治演出，但似乎忽略了为数不多的呐喊者。相对而言，他们保持了理性与常识认知，重要的是，他们敢于发出质疑。他们个性耿直，也往往因此命运坎坷。就此而言，丁志伟的个案具有一定史学价值，它呈现了当时基层干部的心态史料，因此有助于从基层干部的个体视角理解那个时代。

关键词：大跃进、浮夸、舟山、公社干部、心态

一、一份报告

1960年6月的一天，浙江舟山一位公社干部起草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并非正式公文，而是私下起草，陈述了这位年轻干部对时局的看法。他期待这份报告传到县委、省委，甚至转达中央，让毛

主席亲自看到。由于担心字迹潦草，他还专门练习用工整的楷体书写。¹

这份报告分析的主要问题是“大跃进”的“浮夸风”。起草报告是一个写满焦虑的过程，这使草稿上留下诸多反复修改的痕迹。起草者的内心不无困惑，他反复问自己：“要讲真话还是讲假话？要

* 2018年3月，清华大学退休教授唐云先生告知笔者丁志伟的故事，并协助联系获取史料，谨致感谢。关于丁志伟的材料，由其三弟丁士杰复印提供，包括《农业生产大跃进经验汇集——和平社大队搞浮夸材料》1958年12月、《反浮夸风报告》1960年6月19日、《舟山地委组织部给城东中学党支部的信》1961年10月27日、《告党内同志书》1962年4月17日、《关于丁志伟同志申诉的调查报告》1962年7月24日、《关于改划丁志伟家庭成分的决定》，1962年12月1日、《揭露舟山地委书记崔晓东材料》1962年12月9日、《给胞弟丁世忠的信》1963年4月27日、《给吴志（子）诚专员的信》1963年5月1日、《事实证明材料——共产党员周庆杰作证材料》1963年5月15日、《历史见证——天大的冤枉》1963年5月30日、《张雨调查材料》，1963年5月31日、《舟山地委监委报告记录处理意见》1963年6月12日、《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监察委员会报告》1963年8月12日、《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信》时间不详、《给刘澜涛书记并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信》时间不详、《给安子文、刘澜涛二位中央首长并中共中央监委的信》时间不详、丁士杰与丁志伟往来信件若干（1962年至1965年）、《浙江省舟山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1967年9月8日、《浙江省舟山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1983年4月2日、《中共舟山地委关于对丁志伟同志问题复议复查情况报告的批复》1983年6月4日、《丁士杰申诉材料》1983年7月11日、《丁士杰申诉材料》1991年6月。

在鉴别史料真实性的过程中，我曾困惑于不同材料手迹的差异，主要问题是《反浮夸风报告》与丁志伟其他信件字迹不同。我对这份报告是否出自丁志伟之手表示怀疑，起码文字的抄写有可能另找了他人。丁士杰告诉我，大哥担心自己的手迹潦草难辨，给中央、省领导带来阅读困难，为此曾花时间练习工整的楷书。至于其他材料为何潦草，原因是丁志伟发送信件后，会抄写保留底稿，因为底稿不示他人，故而抄写迅速，为日常字迹。

¹ 丁士杰（1940年—），2018年4月2日电话访谈。

坚持真理还是随大流？”²他一时找不到明确的答案，外面喧嚣的世界让他隐隐感到孤独。他很犹豫，不知该不该把这份报告发出去。

6月18日晚，他观看了一出名叫《孙安动本》的柳子戏。这个戏剧当时风靡中国，讲的是明朝一位地方官为民请命，惨遭冤屈的故事。戏台上，角色孙安声音颤抖，充满怨愤：

含悲愤问苍天，方才你可亲眼见，是非曲直尽颠倒，浑浊不分忠与奸，为什么黎民无辜遭涂炭，老贼逍遙玉阶前，为什么万岁偏把奸臣宠，拒纳忠谏听谗言……

这位干部很快陷入戏曲情境中，戏台上颤抖呐喊的人仿佛不是孙安，而正是自己。他或许联想到“大跃进”给农民带来的饥饿，想到对自己打击报复的南下干部，想到自己无比敬仰的毛主席。现实与历史竟会如此相近。或许受到戏剧感动，他坚定了信念，准备第二天将报告发送出去。³他在心里为这份报告起了个名字——《反浮夸风报告》。

这个人名叫丁志伟，原名丁士华，1931年出生于浙江舟山，是当时舟山白泉公社的党委组织委员。⁴起草报告的时候，中共刚刚发起新“三反”运动。与几年前一样，这场运动反的也是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1958年夏天，中共发起旨在赶超苏联的“大跃进”运动。⁵毛泽东相信，人的意志可以影响工农业生产。他默许了上下脱离实际的工农业生产指标，希望全国人民趁着这股热劲，尽快把中国建成一个强大国家。但这股热情很快被现实泼了冷水。从1959年开始，各地陆续出现闹饥荒事件，农村干部和社员的关系也渐渐紧张。1960年这

次“三反”运动，一个重要目的正是“改进干部工作作风，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⁶

丁志伟对这次“三反”运动充满期待，他在报告里写道：“浮夸是普遍性的问题，那么我们更应该下决心，乘这次新三反之东风，火烧这个怪东西，拿起实践论、矛盾论的犀利武器，介（解）剖一下浮夸的真面目。”⁷丁志伟所说的浮夸，正是各行业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在这年年底的整风整社运动中，浮夸被中共列为“五风”之一。⁸但在丁志伟写报告的时候，浮夸还没有受到中共高层足够重视。但百姓和基层干部体会深切。丁志伟对浮夸的忧心或痛恨，既源于一位基层干部的忧民情怀，也因为自己在这个问题上遭遇了不公对待。这次不公与舟山“大跃进”的落实有关，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个故事，不妨先从丁志伟的早年经历说起。

二、早年经历

丁志伟1931年出生在浙江舟山，祖辈是从福建逃荒过来的船工，几代人都靠海上摇船度日。到了丁志伟父亲这一代，他们定居的村庄兴起了手工酿酒业，全村37户人家，有27家靠手工酿酒谋生。丁家当时经营了“天吉”酒场，人手不够时，会雇用四、五人帮忙干活。酒场年产达到300缸左右（一缸950斤），这个规模在当地是中上水平。除此之外，丁家还合股经营了一家货行，丁父担任该行经理。还合伙开了一家瓦冰场（储备冬天冰块，以备夏天使用），资金6000元，丁家占1000元。当然，丁家并没有完全放弃农事生产。他家有1.3亩土地，同时与丁家同代兄弟共有宗田15亩，轮

² 丁志伟：《反浮夸风报告》，1960年6月19日。

³ 丁士杰（1940年—），2018年4月3日电话访谈。

⁴ 1953年2月，中共浙江省委决定成立舟山专区，下辖定海、岱山、普陀和嵊泗（从江苏省松江专区划入）4县。1958年10月4日，舟山撤地建县，定海、普陀、岱山、嵊泗4县合并建立舟山县。1962年5月，舟山县被撤销，恢复舟山专区。1967年，舟山专区改称舟山地区。载《舟山市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4、45页。

⁵ 虽然从口号来看，中共发动“大跃进”是为了赶英超美，实际上，它暗中将苏联作为自己追赶的对象。可参见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亦可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

⁶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325页。

⁷ 丁志伟：《反浮夸风报告》，1960年6月19日。

⁸ 五风，指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参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377—387页。

流耕种，所获归己。但因为 16 年才轮一次，因此平均算下来，一家分的宗田还不到一亩。⁹

丁家生活渐有起色，然而世事多舛，中日两国很快爆发了战争。1939 年，日军攻占舟山定海，屠杀了上百居民。¹⁰ 这年 6 月 23 日，丁志伟的父亲为了抵抗破门而入的日军，被活活刺死。丁母忧劳成疾，几年后也病逝。在此期间的某段日子，丁志伟本人也险些遇害。他遭遇的是海盗绑票，被关在海盗小船的甲板下面。是丁家亲朋凑了不少钱，才把这个孩子保了下来。动荡岁月不仅危及人的生命，也让丁家几代积累的财产化为灰烬。年少的丁志伟经历失去双亲的痛苦后，不得不为糊口奔波。毕竟他有两个年幼的弟弟，身为大哥，他肩上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1946 年，14 岁的丁志伟初中辍学后，被堂叔带到上海，在留兰香糖厂当徒工，一干就是三年。这期间，丁志伟的生活想必艰辛，上海表面的繁华与一个徒工的辛酸，使渐入成年的丁志伟体会了人世苍凉。1949 年 5 月，人民解放军接管上海，对比国民党统治上海的混乱，解放军秋毫不犯的气象给丁志伟留下深刻印象。共产党带来了和平局面，或许这让他想起了中日战争的惨烈，想起失去的父母以及自己年少被绑的遭遇。这些亲身经历的对比，使丁志伟下定决心，今后跟着共产党干事业。¹¹

1950 年 5 月，共产党军队解放了浙江舟山。¹² 国民党撤退台湾之前，从舟山抓走不少青年壮丁，这种行为无疑增添了舟山人对国民党的愤恨。¹³ 丁志伟躲过了这次抓丁，此时他已经从上海返回老家

种田。他是在一年前运送糖时被车撞伤了腿，随后被糖厂解雇的。共产党解放舟山后，随即派干部领导土地改革。由于丁家的主要财产在中日战争中毁于一旦，按照土地的拥有数量来算，他们在土改中被划成贫农成分。¹⁴ 因为舟山是东海之滨的群岛，原本就没有太多可耕种的土地。而领导土改的多是来自山东的南下干部，或许因为舟山的情况与山东差距太大，他们在土改中很难找到典型的地主，因此他们把斗争对象放到了斗土匪、恶霸上。舟山的群众或许从没见过这种情景，无论如何，共产党带来了和平局面，它的政策赢得了多数群众好感。¹⁵

划成贫农成分，意味着在乡村生活中会有诸多政治便利。因为在共产党的政策中，贫下中农是可以依靠的主体力量。无论丁志伟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此时已经萌生了对共产党的坚定信念。上海的生活培养了他不断学习的习惯，他开始自学马列经典。大概就在这段时间，丁志伟改了名字。受到共产党信念的鼓舞，也受自己阅读的马列经典影响，他认为人须树立伟大志向，于是不再使用原名丁士华，而改用丁志伟。¹⁶ 丁志伟 195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¹⁷，这意味着他的出身、信念和好学精神都受到组织认可。实际上，中共解放浙江之后，确实很重视赢得年轻人支持。¹⁸ 丁志伟似乎看到了干事业的机会。

丁志伟入党时，正赶上全国农业合作化开始阶段。整个浙江省的合作化开展很迅速，其中当然不乏虚假汇报。比如 1952 年临安县委第一书记因为虚报受到处分，曾给丁志伟留下深刻印象。¹⁹

⁹ 《关于改划丁志伟家庭成分的决定》，1962 年 12 月 1 日。

¹⁰ 《舟山市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18 页。

¹¹ 丁士杰（1940 年—），2018 年 5 月 7 日，舟山访谈。

¹² 《舟山市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21 页。

¹³ 《定海县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13 页。

¹⁴ 《关于改划丁志伟家庭成分的决定》，1962 年 12 月 1 日。

¹⁵ James Z. Gao. 2004. *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 1949 – 1954*. University of Hawaii ‘i Press: 111-112.

¹⁶ 《丁士杰申诉材料》，1991 年 6 月。

¹⁷ 《丁士杰申诉材料》，1991 年 6 月。

¹⁸ James Z. Gao. 2004. *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 1949 – 1954*.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12.

¹⁹ 丁志伟：《反浮夸风报告》，1960 年 6 月 19 日。

地方干部的虚报或许是个普遍现象，合作化运动在此后数年也越搞越快，浙江一度成了全国合作化最快的省。²⁰ 虽然其间因为急躁倾向，浙江曾受到中央批评²¹，但 1955 年毛泽东批判邓子恢“小脚女人”后，浙江合作化又变得非常迅猛。²²

丁志伟在这段时间负责什么职务，我们并不清楚。但鉴于农业合作化是此时的重点工作，而丁志伟又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因此他很可能直接参与了当地合作化的执行工作。这几年合作化的政策波动，或许使他对基层干部的责任和处境有了些切身体会，大概也会让他意识到，无论国家还是个人，干事业是个充满曲折与艰难的过程。

三、跃进与浮夸

中共执政初期，在自上而下的政策推行中，农业合作化很快在全国展开。1955 年底，农业合作化运动迎来高潮，全国多数农民加入了合作社，且形式上由初级社转入高级社。但毛泽东并不就此满足，他有进一步建大社的想法，认为大社便于大机器使用，便于大规模经营。²³ 于是 1958 年夏天，全国兴起建人民公社的热潮。人民公社包括工、农、商、学、兵，特点是规模大，公有化程度高。与此同时，中共发起“大跃进”运动，号召全国人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²⁴

舟山也响应政策，在所辖一千多个岛屿上建起 26 个人民公社。一般是一岛一社，小岛是多岛一社，大岛是一岛多社。²⁵

公社分成不同管理区，管理区包括不同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舟山的粮食生产以水稻为主，四季分明、冬暖夏凉的亚热带季风气候，满足了当地一年至少两季的水稻生产。²⁶ 早稻通常 4 月底种，7 月底收。晚稻大约 9 月种，10 月底收。

1958 年下半年，舟山也与全国其它地方一样，全民炼钢，村村办食堂，吃饭不要钱。丁志伟也参与了炼钢，担任定海县第一钢铁厂副厂长。这个过程中，他可能受到全民跃进的氛围感染。作为一名有上进心的基层干部，“大跃进”的工作方式或许让他感到新奇。这段时间，舟山传达上级指示，工作方法上强调全面务虚，先虚后实，以实论虚。²⁷ 基层干部对此理解，就是以统计指标刺激生产。刺激手法多种多样，通常强调先解放思想，然后开展挑战赛、摆擂台等形式，提出决心书、保证书，鼓足干劲，搞好统计工作。²⁸

先虚后实在农业上的体现，便是放高产卫星。当时，舟山紧跟全国形势，已经放出了一些农业高产卫星。最典型的是白泉公社和平生产大队，这是 1958 年县委副书记亲自蹲点的大队，可能也是白泉公社基础条件最好的大队。这年和平大队上报的水稻亩产 2075.45 斤，通常情况下，早稻平均亩产有 500 多斤，晚稻平均亩产 300 斤左右。也就是说，实际平均每亩年产不到 1000 斤。

因为上报的产量较 1957 年有大幅增长，它被评为 1958 年全国农业生产先进单位。大队得到由周恩来总理签名的奖状，大队干部也受到奖励，获

²⁰ 《中央农村工作部杜润生在浙江的讲话》，1955 年 4 月 5 日，载《沙文汉工作笔记：1955 年》，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编，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 年，第 125 页；江华：《江华在浙文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91 页。

²¹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年，第 317、321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371 页。

²²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年，第 404、406 页。

²³ 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年，第 611 页。

²⁴ 林蕴晖：《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1958—1961）》，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154—168、212—216 页。

²⁵ 《中共舟山地委关于人民公社化运动情况的报告》，1958 年 10 月 10，舟山市档案馆 5-6-29-1。

²⁶ 《舟山市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1 页。

²⁷ 《中共舟山地委关于全区第二次公社党委书记扩大会议的报告》，1958 年 12 月 28 日，舟山市档案馆 5-6-27-1。

²⁸ 《利用统计资料，大搞评比竞赛》，载《农业生产大跃进经验汇集》第一辑，中共定海县委办公室编，1958 年 12 月，第 23 页。

得前往北京参观的机会。²⁹

和平大队声名鹊起，或许会刺激其他生产大队的热情，但也很可能增加了基层干部的困惑。人们早就听说过，和平上报的不是真实产量。或许因为县委副书记亲自蹲点，和平大队的浮夸想必获得了潜在支持。在这种氛围中，其他大队的生产也多有浮夸。这年晚稻收获后，县委在一次大会上做了统计，显示1958年粮食平均亩产1080斤，早稻最高亩产4383斤，晚稻最高5529斤。³⁰这些数字显然超出了舟山农民的认知，因为长期以来，这里的早稻亩产仅有500多斤。包括丁志伟在内的基层干部之所以感到为难，一方面因为产量浮夸意味着上级征购粮食增加，另一方面，各公社号召社员敞开肚皮吃食堂，撑了不到半年，就出现粮食告急的局面。丁志伟或许不无困惑：应该怎么理解先虚后实，以实论虚？

这种困惑不光基层干部有，1958年底，“大跃进”的浮夸和各地粮食告急情况为高层所知，中共中央连续召开数次会议，尝试纠正左倾。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响应中央号召，在年底省委的几次会议上多次强调要尊重客观规律，不浮夸、不虚报。³¹或许正是出于这种反思，舟山在年底开始搞起整社试点工作，目的是建立几个样板，以便更好地推动下一年工作。

1958年底，舟山选定白泉公社和其他四个公社做试点，从地委、专署机关抽调67名干部，组成9个工作队，下去帮助开展整社试点。³²丁志伟是在1959年2月参与其中，他被调到白泉公社，主要负责党委组织工作。³³调到白泉公社后，丁志伟随后被安排到下属的金星生产大队，负责指导这里的农业生产。丁志伟或许意识到，这是一次施展身

手的机会。

丁志伟被安排到金星大队时，正值早稻播种时节。于是他向白泉公社领导提出请求，发起一次农业生产竞赛，挑战的对手正是声名鹊起的和平大队。丁志伟提出“学和平，超和平”的口号，他想通过发决心书的形式，掀起一个“学赶超帮”运动，推动全社粮食生产。³⁴当然，他要赶超的不是那个虚报产量的和平，而是想靠实实在在的产量去竞赛。既然上级强调不浮夸，不虚报，年轻的丁志伟就有信心发起挑战。

丁志伟发起竞赛的决心受到公社领导肯定，但他们似乎不看好金星向和平发起的挑战，理由很简单，两个生产队的基础条件有差距。和平大队之所以成为县委副书记蹲点的地方，一个重要原因是基础条件好，主要是土质好。但丁志伟认为：“事在人为，条件是可以改变的，人的主观能动性有重大作用，同样的客观条件超过和平，不能说服人，客观条件差超过和平，才能破除人们的迷信。”³⁵丁志伟的论证充满辩证意味，这很可能是他自学《毛泽东选集》的体悟。无论公社领导如何表态，丁志伟竞赛的决心不改变。

转眼到了早稻收获时节，为了推动产量上报工作，舟山县公布早稻亩产800斤和1000斤生产队的奖励办法。³⁶看得出来，相比于1958年下半年的浮夸，此时的粮食指标虽仍超出现实，但已经收敛了若干。

一天，白泉公社的魏书记找到丁志伟，问他负责的金星大队亩产多少。丁志伟说700斤左右。魏书记说：“看（舟山县）领导的意思，是叫我们搞800斤公社，你觉得怎么样？”丁志伟回答：“实事求是好了，毛主席在党内通信中叫我们讲真话，我

²⁹ 《和平社是怎样领导大面积丰产田运动的？》，载《农业生产大跃进经验汇集》第一辑，中共定海县委办公室编，1958年12月，第7页。

³⁰ 《跃进中的舟山群岛》，1958年12月15日，舟山市档案馆5-6-101-1。

³¹ 江华：《江华在浙文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01页。

³² 《中共舟山地委关于全区第二次公社党委书记扩大会议的报告》，1958年12月28日，舟山市档案馆5-6-27-1；江华：《江华在浙文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26页。

³³ 丁志伟：《反浮夸风报告》1960年6月19日。

³⁴ 丁志伟：《反浮夸风报告》1960年6月19日。

³⁵ 丁志伟：《反浮夸风报告》1960年6月19日。

³⁶ 丁志伟：《反浮夸风报告》1960年6月19日。

们要吸收五八年教训，谭震林同志的放开肚皮吃饱饭，是我们浮夸造成的，虚报成绩要犯错误。”

魏书记对丁志伟的谨慎不太满意，他不用中央纠左精神说事，而是用身边的例子给自己证明。魏书记说：“1958年县委艾衍笃副书记在和平搞重点，搞出双千斤队（按：早稻千斤，晚稻千斤），实际产量他又不是不知道。”魏书记的意思很明显：谁都知道现在搞浮夸，但大家心照不宣，就这么个形势。

魏书记是南下干部，来自山东莱芜，他提到的艾副书记也是莱芜人。³⁷ 1949年，当共产党在山东战区取得作战胜利后，山东分局抽调了一万五千干部随军南下，解放南部中国。³⁸ 其中，来自鲁中南地区的3680名干部被分配到浙江，接管省、市、县三级政权。³⁹ 接管舟山的这批共产党干部，大部分都来自山东莱芜。他们被安排在舟山地、县、公社各级。

魏书记在舟山的工作或许并不顺利，南下干部与地方干部的隔阂是个普遍问题。由于来自革命老区，经历过激烈的土改和战争洗礼，农民出身的南下干部难免形成这种意识：贫农占领国家，管理国家。同时，华东局在组织对他们的培训时，也强调他们在全国革命胜利中的贡献，无形中培养了南下干部的领导意识，在当地人看来，这几乎是一种傲气。⁴⁰ 除此之外，南下干部明显的外地口音，以及饮食和出行上的不同习惯，被他们自己看成革命特征，但在当地人眼中，却被视作缺少文化修养的表

现。这种文化习俗上的隔阂，使得远离乡土的南下干部感受到情感上的冷漠。⁴¹ 因此，魏书记与本地干部无形中有些情感隔阂，这进一步催生他按照上级命令行事的思维，毕竟县委主要领导也是莱芜的南下干部。⁴²

当然，魏书记默许浮夸，可能也是联想到浙江前几年农业合作化的经过。当时浙江一哄而上，在全国一马当先。后来中央根据不同地区的进度差异，制定了“停、缩、发”指示，浙江发展得太快了，被要求砍社。⁴³ 1955年上半年，中央农村工作部警告浙江“不要勉强维持虚假成绩”。浙江负责的干部不得以做出反思，承认省内合作化运动“不能算是正常的，健康的，而是冒进的”。⁴⁴

但1955年7月，毛泽东批评邓子恢“小脚女人”，讽刺这位中央农村工作部长畏手畏脚，总是担心合作化走得过快。⁴⁵ 毛泽东的态度给前不久决定压缩规模的浙江省带来转机，省委乘时乘势，立马又做自我批评，只不过这次不再批评“急躁冒进”，而是批评“坚决收缩”，并自嘲这个方针“是在一种惊慌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被“胜利吓昏了头脑”。⁴⁶

政策浮动给基层干部带来两难困境，一旦前期执行政策比较冒进，他们之后便不愿接受上级的收缩调整，这不只关系他们在群众中的颜面，也因为先前一哄而起，随后紧急收缩，工作难度很大。⁴⁷ 在这种困境中，基层干部自然学会了揣摩顶上意

³⁷ 《舟山市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45页。

³⁸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组织部关于抽调一万五千干部随军南下任务执行情况的补充报告》，1949年4月29日，载《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二十二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393页。

³⁹ 西南服务团团史研究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组织史（1949.6—1950.5）》，西南服务团团史研究会，1989年，第3—4页。

⁴⁰ James Z. Gao. 2004. *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 1949–1954*.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8,51.

⁴¹ James Z. Gao. 2004. *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 1949–1954*.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07.

⁴² 《舟山市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44页。

⁴³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71页。

⁴⁴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317、321页。

⁴⁵ 关于毛泽东与邓子恢的争论，参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360页。

⁴⁶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404、406页。

⁴⁷ 《中央农村工作部杜润生在浙江的讲话》，1955年4月5日，载《沙文汉工作笔记：1955年》，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编，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第130页。

图。所以，当1958年的浮夸受到纠左批评时，机敏的干部或许会做出联想，并预感到此后一段时间的形势。

丁志伟似乎没有这么敏感的意识，毕竟他只是二十几岁的年轻干部。自学马列、熟读毛选的他更认准实事求是这条原则。实际上，1959年金星大队早稻亩产600多斤，相对于500多斤的平均亩产，丁志伟负责的金星大队产量已经不错了。⁴⁸而丁志伟决定上报700斤，大概也是在浮夸形势与实事求是之间取了个平衡，即上报的稍微多点，但不能离谱。丁志伟之所以不愿上报高产量，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报的高，上级征的粮食就多。“大跃进”搞了一年，人们似乎从最初的狂热中清醒了。农民挨饿不是个别现象，许多基层干部开始瞒产私分了。舟山虽然挨饿不严重，但干部瞒产私分的情况也出现了，“过去是越叫富越好，现在是越叫穷越好”。⁴⁹当然，丁志伟并不赞同瞒产私分的做法，如同他不赞成浮夸虚报一样。⁵⁰无论出于哪种考虑，丁志伟上报的700斤，在公社干部看来都太谨慎了。

没过几天，白泉公社召开党委会议，讨论早稻亩产上报问题。本地干部徐社长也问丁志伟产量的事，丁志伟仍说报700斤。丁志伟的谨慎显然让公社主要干部不满意，徐社长当场说了句激将话语，听起来却不无嘲讽意味：“不要唱低调，小小金星不超和平吗？”丁志伟自然品出话语的个中意味，毕竟自己半年前喊出了“学和平，超和平”的口号。他回答：“实事求是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固有风格，超不超和平，看今后分配产量好了。”丁志伟这个反驳一下激怒了徐社长，他在大会上不指名地说了句：“党委会个别成员思想意识不好，挖社会主义墙脚。”⁵¹

丁志伟在上报产量上的固执，似乎影响了整个公社的评选。即便白泉公社其他大队上报了高产量，因为金星大队不够800斤，可能使公社整体上不达指标，白泉公社没有在全县评上800斤公社，没有得到县委任何政治上、物质上的奖励。因为这件事，丁志伟在公社干部中印象受到影响。⁵²

1959年9月下旬到10月上旬，正是晚稻种植时，舟山县委书记连续召开三级、四级、五级干部会议。紧密的会议预示着形势又有新变化。原来，在刚刚结束的庐山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因为国防部长彭德怀的一封信，毛泽东决定发起反右倾运动，对“大跃进”的质疑遭到批判，1959年上半年的纠左努力被迫扭转。转变来得挺突然，却很可能应验了一些基层干部私下的形势预判。

在9月下旬到10月上旬的一系列会议中，舟山县有1373名干部被视作“右倾”“白旗”，受到批判。⁵³其中点名批判51人，涵盖了不同级别的干部，既有公社党委正、副书记，又有党委委员、管理区书记及生产队支部书记。受批判的原因包括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八字宪法等。⁵⁴

自然，在这次反右倾运动中，丁志伟也成了受批判的对象。他先前上报产量的谨慎，显然与“大跃进”精神不符。当然，很难判断丁志伟是否成为重点揭发批判的人物。但他受批判的原因大致是明确的，他的主要问题被归纳成“个人主义”。所谓“个人主义”，是指在先前工作中，他对领导安排的某些事情不满，或许先前早稻产量的分歧，就被视作“个人主义”的一种体现。在与公社干部辩论时，丁志伟或许流露了一些孤傲神情，这大概掺杂了南下干部与本地干部的情感隔阂，却也多少反映出丁志伟的耿直性情。⁵⁵

⁴⁸ 丁士杰（1940年—），2019年5月5日，电话访谈。

⁴⁹ 《王裕民同志在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记录》1959年9月19日，舟山市档案馆6-1-74-3。

⁵⁰ 丁志伟：《反浮夸风报告》1960年6月19日。

⁵¹ 丁志伟：《反浮夸风报告》1960年6月19日。

⁵² 丁士杰（1940年—），2018年5月7日，舟山访谈。

⁵³ 《中共舟山县四届干部大会情况简报 思想动向第八期》，1959年10月14日，舟山市档案馆6-1-125-8。

⁵⁴ 《舟山市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7页。

⁵⁵ 《关于丁志伟同志申诉的调查报告》，1962年7月24日。

丁志伟试图用自己认为的真理说服公社领导，而公社领导则认为丁志伟在跟党唱对台戏，显然，领导们把自己看成了党的代表，尤其考虑到政策落实来自上级领导意图。丁志伟并不认同这种批判，一方面，他不认为干部们代表共产党，在他心中，说真话才能代表共产党。另一方面，或许他也认为自己有提意见的权利和资历，丁志伟曾不时透露过内心的骄傲：“《毛选》四卷我通读过四遍，我佩服毛主席，也相信毛主席。”⁵⁶

丁志伟这种执拗的性情显然不受干部欢迎。1960年1月，舟山县委为了新一年工作“开门红”，布置各公社开展内部干部整风活动。白泉公社1月1日开始整风。由于先前上报早稻产量发生过不愉快，加之近期赶上了反右倾和干部整风，在白泉公社内部会议上，丁志伟自然成了重点接受帮助的对象。为了从思想上帮助丁志伟，白泉公社在干部整风之前，特地制作了一份材料，列举了丁志伟的“个人主义”表现。可以想见，在公社内部的整风活动中，丁志伟一定承受了不少思想压力：自己反对浮夸，却被说成右倾，而那些响应浮夸号召的人，此刻却一本正经，从思想上对自己进行帮助。

丁志伟不是轻易服输的人，二十九岁的他正处在血气方刚、思想独立的年龄段，他决定做些反抗。1960年3月，丁志伟不服批判，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私自带走了这份“个人主义”的材料。这件事引起公社主要干部不满，他们一定会把这种不打报告、私拿材料的行为，看成无组织、无纪律的体现，也更验证了丁志伟是“个人主义”倾向严重的人。丁志伟可能料到了这种不满，但他无法预料自己的意气会引起多大风波。

拿走材料后的某一天，丁志伟回家后发现屋子里有些异常，他感觉自家的床、帐席、衣柜、书桌有被翻动的痕迹。他从邻居口中探得消息，好像公社派人来找过他。丁志伟预感到一定是因为自己私拿材料，公社派人搜查过自己的住处，还翻了自己的

工作生活笔记。⁵⁷ 与此同时，丁志伟听说县委原计划提拔自己做农工部副部长，但后来又没动静了。

四、写报告的心态

舟山六月的夜晚，凉风习习，农人劳作一天，结束晚上的集体开会后，终于可以放松身心，缓解一天的疲惫。丁志伟却难有放松身心的闲情，他端坐书桌前，奋笔书写着一些文字。他酝酿好几天了，或许也已经动笔数日。丁志伟内心充满苦闷彷徨，思绪纷飞，却也不无混乱。他不时用笔做着圈点、勾画，显然，他在酝酿如何更好地表述自己的想法。

丁志伟写完时，已经形成一份长达四千余字的报告，这时，私拿材料的风波已经酝酿三个月了。这三个月丁志伟过得并不平静，因为自己的耿直，他成了公社重点批评对象，又因为意气用事，他与公社领导的矛盾逐渐加深。从一年前上报早稻产量开始，丁志伟与公社领导的纠葛便已经产生。这一年不定期受到批评，促使他想写一份申诉报告，既反映自己内心的冤屈，又对这两年浮夸的氛围进行反思。他需要拿捏感情，使自己在申诉中接近道义。他也需要反复思辨，尝试用自学的马列经典、《毛泽东选集》去分析浮夸现实，找出浮夸原因，并发出纠正的呼吁。

丁志伟一个很大的困惑，是不知该讲真话还是讲假话，该坚持真理还是随大流。他渴望人人讲真话，但经历一年的挫折后，他不得不承认讲真话需要勇气，更需要共产党的支持。⁵⁸ 当他想起自己受到“和党唱反调”的批判时，便情不自禁写下这样的话语：“我认为领导的话，正确的就是党的话，不正确不能代表党的话。”⁵⁹ 显然，在丁志伟心中，共产党是真理的化身。

或许在潜意识里，丁志伟和许多中国农民一样，他们认为共产党的政策没问题，坏就坏在下面

⁵⁶ 丁士杰（1940年—），2018年5月7日，舟山访谈。

⁵⁷ 《丁士杰申诉材料》，1983年7月11日。

⁵⁸ 丁志伟：《反浮夸风报告》1960年6月19日。

⁵⁹ 丁志伟：《反浮夸风报告》1960年6月19日。

执行政策的干部。⁶⁰但并不是所有农民都这么朴实，正如丁志伟已经发现的那样，“有的说共产党拾到一本说乱话的书，不是亲眼看到的不要相信。”⁶¹看起来，共产党执政十年后，尤其最近两年“大跃进”的浮夸泛滥，党在民众心中的形象已经受到影响。基层干部左右为难，对政策浮夸的体会更深。一位与丁志伟熟识的基层干部就意识到：“我们明知道县委和毛主席指示不对头，可是不敢向上级反映。”⁶²

丁志伟思绪纷飞，不断穿梭于1959年与当下之间。经历这一年不顺后，他的一些观念发生了微妙变化，他或许会意识到这一点，也可能并不自知。比如1959年与和平大队搞竞赛时，自己相信事在人为，条件是可以改变的，人的主观能动性有重大作用。当然，那时他不愿应和风气，一起放高产卫星，在丁志伟心目中，如果把浮夸理解为发挥主观能动性，那就错了，主观能动也应建立在实实在在基础之上。此刻酝酿报告时，浮夸带来的危害已经让丁志伟深有体会，他写了一句“他们违反了客观存在不随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这个唯物主义原则。”与一年前相比，此时丁志伟可能不再机械地理解主观能动性了。时间变化与自身经历为他增添了思想混乱，这种混乱很大程度上源于书本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丁志伟并不想单纯书写自己的冤屈，而要上升到分析浮夸，发出呐喊的高度。当然他也清楚自身的冤屈与社会大环境密切相关。他反复思考身边接触的人物，感到浮夸让人变得虚伪，让人逢场作戏。但不同人在这场闹剧中表现不一样。想到这里，他把浮夸分成四种类型：第一种是不明确立标兵与讲真话的关系，不明白这是矛盾的辩证统一。立标兵应该建立在讲真话的基础上，而有的同志却曲解了先虚后实的含义。第二种是锦标主义，为了争先进，争光荣，吹嘘自己，不服别人，或者干脆骗取党的

信任。第三种是工作没做好，担心影响自己地位而不择手段搞浮夸。第四种是看大势，随大流。⁶³

写到这里，丁志伟不能不为党的未来忧心。十年之前，共产党接管上海、解放舟山的时候，人们怀着怎样美好的期待！仅仅十年，共产党内就开始形成一种虚伪氛围，逢人不说真心话，对党不讲忠诚话。尤其严重的是，党在民众心中的形象也受了损蚀，有人说共产党拾到一本撒谎的书，不是亲眼看到的不要相信……⁶⁴

丁志伟尽量表达着自己的忧民情怀，但他似乎也隐藏了一些内心想法，或者说在起草报告过程中，他一直在拿捏表达的技巧。或许丁志伟清楚，自己这种性情的人只适合踏实干事，自己不愿弄虚作假，也没那套弄虚作假的本事。如果放任浮夸一直存在，那自己凭实干做出来的成绩，自然会遭到浮夸湮没。这种不公是自己无法接受的。

另一方面，如何处理同公社领导的关系呢？现在跟领导闹得有点僵了，丁志伟三番五次受批评，还可能被干部派人搜了屋子，这一切纠葛的根源是1959年上报产量的事。明明自己有理，但能不能说公社干部打击报复呢？丁志伟很纠结，他写下这样一段模棱两可的话：“是不是他们打击报复呢？不是的，而是他们认为我不听他们的话，想压服我！我没有服！”什么叫压服呢？或许丁志伟想让别人认为这是以理服人，与打击报复不同。这是他的真实想法吗？也许这种模棱两可的表达只是一种策略，一方面丁志伟对这次三反运动抱有热情，他希望自己受的冤屈在这次运动中得到解决。另一方面，一旦自己的问题引起重视，并得到解决，在未来的工作中，自己还需要与现在的领导打交道。

经历数个夜晚酝酿，这份四千多字的报告总算写好了。交到哪里呢？丁志伟心里一定清楚，只交到县委是不管用的，毕竟是公社和县委在批判自己，他们只能把报告压住。只有向省委甚至中央转

⁶⁰ 江华：《江华在浙文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51页。

⁶¹ 丁志伟：《反浮夸风报告》1960年6月19日。

⁶² 《事实证明材料——共产党员周庆杰作证材料》，1963年5月15日。

⁶³ 丁志伟：《反浮夸风报告》1960年6月19日。

⁶⁴ 丁志伟：《反浮夸风报告》1960年6月19日。

发，自己的事情才能引起重视，浮夸的风气才可能止住。但这事风险挺大的，搞不好会跟公社和县里闹得更僵。丁志伟或许有打退堂鼓的时候，绞尽脑汁写出的报告，发还是不发，真是个问题。

6月18日晚，丁志伟萌生看戏的念头，或许这些日子心太累，看个戏曲调整心情。无论他是否是第一次观看《孙安动本》，这夜的柳子戏都足以引他共鸣。丁志伟很可能产生了时空恍惚的幻觉，戏台上的唱声咿咿呀呀，满是凄凉，时而传入他的耳朵，时而又是一片沉寂……

五、希望与挫折

1960年11月，舟山县委会召开会议，宣布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强调“放手发动群众，普遍开展一个整风整社的运动”。⁶⁵中央之所以发动整风整社，因为全国不少地方出现了闹饥荒现象。中央认为基层干部出问题了，提出“民主革命不彻底”的疑虑，强调纠正干部群体的“五风”问题（“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⁶⁶

对于“跃进”了两年多的舟山农民而言，中央整风指示拨云见日，他们对干部“五风”早有怨愤。白泉公社先前传开了一个说法：“饿死和平，吃饱金星”。⁶⁷说的正是虚报浮夸给农民带来的影响。基层干部则不无压力，先前顺着上级意思搞浮夸，眼看却变成了自己的罪过。丁志伟的心情更复杂，可以说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整风应验了自己的呼吁，或许这一次整风，能把已经泛滥的浮夸风狠狠刹住。但隐隐的忧虑袭上心头，丁志伟一定能感觉到，自己跟公社干部的关系更加微妙了。

县委传达中央指示时，丁志伟那份报告已经发出半年了。他并没有直接收到省委、中央的回复，这使他半年的生活不无忐忑。但县委对这件事却反

应强烈，在县级干部眼中，丁志伟越级上书，完全是对他们的无视。丁志伟或许盼望中央指示，渴望自己的真话得到共产党支持。但中央整风指示发出时，他很可能意识到自己已经犯了大忌。他越能证明自己正确、直属上级错误，就越有可能遭到上级暗中报复。毕竟中央整风指示并不是对自己报告的直接回复，这意味着中央指示并不是保护自己的尚方宝剑，天高皇帝远，丁志伟或许隐隐感到了忧惧。

1961年4月，根据上级安排，丁志伟被送到舟山县委会党校学习。⁶⁸一方面，县委或许抱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不想把丁志伟的事情闹得太大。因为他们意识到，丁志伟的报告已经引起省委注意了。另一方面，县委有些领导觉得丁志伟能说能写，工作能力值得肯定，觉得这个年轻人还有挽救的必要。因此，舟山县委会干部希望利用党校学习期间，促使丁志伟思想上有个转变。⁶⁹然而，丁志伟不愿在思想上屈服，依旧认为自己反浮夸是坚持真理。另外，虽然没有明确证据，他想在“抄家”和“提拔农工部副部长”两件事上追究到底。省委的调查或许让丁志伟看到了希望。

省监委第一次调查似乎无果而终，大约1961年10月，省监委开始第二次调查丁志伟的事。丁志伟的事不断发酵，给他的情感生活也带来了波澜。这段时间，他正与嵊县城东中学一位姓卓的女教师恋爱，并计划在1962年春节完婚。丁志伟近来状态的起伏，一定让未婚妻感到了压力。于是，她给舟山地委（区划调整，由县级升地级）组织部写信，询问自己未婚夫的情况。

1961年10月27日，组织部给她所在的学校去信，内容简单而又不失冰冷。在这封信中，组织部给丁志伟这样定性：“丁志伟是一个存在资产阶级思想，屡教不改、无理取闹分子，具体情况就不一一详告了。”组织部并建议学校“视情况和卓××谈一谈，作为她改变二人恋爱关系的参考”。⁷⁰或

⁶⁵ 《舟山市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7页。

⁶⁶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10月，第386页。

⁶⁷ 《丁士杰申诉材料》1991年6月。

⁶⁸ 丁志伟：《告党内同志书》，1962年4月17日。

⁶⁹ 丁士杰（1940年—），2019年5月10日，电话访谈。

⁷⁰ 《舟山地委组织部给城东中学党支部的信》1961年10月27日。

许迫于政治、舆论压力，丁志伟与未婚妻的恋爱关系很快终结。

丁志伟看到了组织部给城东中学的信，他通过什么渠道看到的，别人并不清楚。或许省监委开展第二次调查时，曾把这封信给他看过。他很可能并未经任何人同意，看到信的原文后，迅速用潦草的字迹抄写了这封信件，作为未来申诉的证据。他发现信里写着这样一些文字：

丁志伟是一个党员，原是公社党委的组织委员，但是近几次帮助他不改变，而且借我们纠正五风的机会，捏造事实，攻击党委，到处告状伸冤，甚至于制造假象，陷害干部。我们为了进一步帮助他，挽救他，送他到地委党校学习好几个月，但结果不但没有提高，反而多方面攻击党校干部……

抄完信的原文后，丁志伟对里面提到的“到处告状伸冤”很是气愤，于是在纸页空白处写了一句备注：“在 61 年 10 月 27 日以前，我根本没有到处告状伸冤，只写了一封信给省委。”⁷¹丁志伟所说的这封信，可能正是不断发酵的《反浮夸风报告》。

经历了一年调查研究调整，中国整体上淡化了阶级斗争氛围。这让 1962 年的春节充满喜庆氛围，舟山百姓沉浸在阖家欢乐的喜悦中。这种气氛引得丁志伟格外落寞，按原本计划，他此时本该准备完婚的大事。这种落寞促使丁志伟做出决定，他要去北京申诉冤屈。

这是丁志伟第一次前往祖国首都。春寒料峭，北上的火车发出碰撞铁轨的“咣咣”声，声声入耳，如同一把重锤敲打心房的声音。丁志伟思绪纷飞，时空恍惚的感觉再次让他穿梭于现实与幻觉之间。或许他又想起了《孙安动本》的戏曲：

可叹这朝中事混乱不堪，难道说有忠心真无处用，官家只会害百姓，哪管你妻离子散死和生，怨恨声犹绕耳边，罢，五更天明再上殿，圣意不转誓不还……

“圣意不转誓不还！”丁志伟在漫漫旅途中想

起了毛主席，他翻出随身携带的纸笔，开始给毛主席写信：

敬爱的毛主席并党中央：

您老人家工作很忙，不可能亦不应该看这封信。我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表示为了争取真理的胜利，我将共产党员的权利、义务运用到最高程度，尽了最大的努力。真理能不能胜利，不取决于一个人的努力，取决于党的支持，依靠同志们共同坚持。

现在看来，真理是失败了……在共产党领导的时代，比关汉卿写《窦娥冤》、孙安动本更动人的典型，特别是贯彻 60 条的今天，这场反五风斗争，历时五个年头，不能取得胜利。这个顶住共产风、浮夸风的同志，本身没有原则性错误，现在还被组织上当作“以顶风为名，拉拢坏分子，打击报复，并且说他是一个坏分子，已经开除了党籍”，写信给他未婚妻。为此，他的未婚妻提出解除婚约。本来他们在这次春节结婚，现在这个同志流落在火车上，渡过 62 年的春节。

坚持真理是要化代价的，可是化了代价，就要取得胜利为止。不胜利人家要怀疑党的政策。现在同志们议论纷纷，反应很大。这件事发生在祖国东部的舟山群岛。

这个同志为什么这样做！是对主席“有真理就要跟”“舍得一身剐”的一次大胆尝试。愿意做真理的奴仆，相信马列主义，没有什么私人的目的。

“坚持真理是要花代价的”“真理失败了”。丁志伟在字里行间流露着心底的绝望。真理失败了吗？他此时还不想放弃，无论于公于私，他都咽不下这口气。舍得一身剐，丁志伟要来一次大胆尝试。

丁志伟的北京之行并没有什么效果。浮夸早就受到中央重视了，为此已经用一年时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丁志伟去北京时，中央正在召开七千人大会，讨论如何解决征粮的困难。⁷²他很可能没有渠道见到事物缠身的各级领导。

坚持真理是要花代价的。丁志伟从北京返回舟山后，没多久就收到开除党籍的通知。在开除丁志

⁷¹ 《舟山地委组织部给城东中学党支部的信》1961 年 10 月 27 日。

⁷² 参见张素华：《变局：中共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 年。

伟党籍的问题上，舟山地委召开了不下四次讨论会。看起来，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挺谨慎，挺纠结，或许也不想让这个问题收到省委关注。

1962年4月17日，丁志伟写了一份《告党内同志书》。他写这封信的目的，是想在舟山的党员群体中寻求道义支持。在这封公开信的开头，丁志伟便申明舟山群岛发生了比《窦娥冤》《孙安动本》更动人、更典型的斗争。相比于《反浮夸风报告》，这封公开信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丁志伟开始毫无遮拦地表达对打击报复的不满，而在两年以前，起码从字面上来看，丁志伟认为领导不是对他打击报复。他写道：

这场斗争搞得全舟山干部都知道，只允胜利，不允失败，否则坚持真理还有什么信心呢？丁志伟要为党、为人民、为同志、为省委、也要为自己争一口气，一定要夺取这场斗争的胜利，这是党赋予丁志伟的天职。组织原则是手段，追求真理是目的，冲破组织原则的限制，把这场斗争的真相揭开，让同志们评一下……勇敢地站起来吧！顽强地战斗下去！⁷³

虽说尚有胜利的希望，但丁志伟此刻分明有了骑虎难下的感觉。当年写《反浮夸风报告》时，他可能想不到事情会弄到这种地步。既然已经越闹越大，索性越大越好。与《反浮夸风报告》不同的另一点是，这封公开信以第三人称的形式叙述。丁志伟为什么用第三人称来记录自己呢？他大概想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表述自己承受的冤屈，同时，还可能想以第三者的口吻为自己的斗争鼓气。

丁志伟的处境很孤单，即便是自己的胞弟，也越来越不认同大哥这种斗争方式，尽管他们知道丁志伟在坚持真理。丁志伟的三弟丁士杰1960年考入在杭州大学，最初学化学。到了1962年8月份，他向学校申请学习政治学。丁士杰改读政治专业的隐蔽目的，便是搞明白中国的政治问题，搞清楚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

三弟的这种观念显然是受了大哥遭遇的影响。1962年9月3日，丁士杰从杭州给大哥丁志伟写信：

……一个人（少数人）不能挽回大局，我国的左倾和教条是一个历史的趋向。我国太穷了，我们的介（解）放战争胜利来得太快，从建国到57年的建设成就太大，干部来不及培养，中国农民的头脑只能支配黄牛和锄头。但是应该看到我们的目标是光明的，方向是对头的，只是路线走弯了。我们付代价太大了，但必须是能叫人睁开眼睛看看现实。⁷⁴

……现在社会上比较混乱，你斗争应加小心，在现在很难取得胜利。如果有适当机会就应把手，等自己到一定地位再争不迟。目前风左右摇摆，而且很厉害。我想从事政治工作，但在我国如此情况下很难起作用。在我国有才能和勇敢的政治家太少了，而一些政治乞丐和文化乞丐太多了。权力是政治的太上皇，有它就有一切。但中国目前权是高不可攀的，目前没有一个青年学会爬，只是伏在地上乞求和幻想……⁷⁵

三弟的劝解并没有让丁志伟感到慰藉，或许冷静之后，丁志伟能体会到三弟的苦心，但此时丁志伟很难平静下来。三弟的劝解甚至让他感到愤怒，这种气愤伴随着观念世界的孤独，一种连亲人都不能理解的孤独。

丁志伟遭受的顿挫接二连三。这年年底，舟山地委针对丁志伟的问题，做出了改划其家庭成分的决定。1950年土改时，根据土地拥有量做标准，丁志伟家被划成贫农。丁志伟能很早入党，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正是这种政治上优越的家庭成分。但此时，这些政治资本正在一点点消失。丁志伟的党籍已经被开除了，这次改划成分的决定，又让他的贫农家庭变成了手工业资本家。改划成分的理由是：丁家拥有大量的酿酒工具、作坊、原料等资本，雇佣工人，取得利润；丁家1.3亩田和几年轮种一次的宗田，并非家庭收入的主要部分；丁家成员之中，

⁷³ 丁志伟：《告党内同志书》，1962年4月17日。

⁷⁴ 《丁士杰致丁志伟信》，1962年7月。

⁷⁵ 《丁士杰致丁志伟信》，1962年9月3日。

无一人参加劳动，全靠剥削收入生活。根据政务院1950年8月4日公布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中，“丙、政务院的若干新规定”第二项：“有多量手工工具、作坊、原料等资本，雇佣工人和学徒进行手工业生产，取得利润，作为收入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划为手工业资本家”。据此，1962年9月4日地委常委讨论决定，改划丁志伟家庭成分为手工业资本家。⁷⁶

从写出《反浮夸风报告》开始，丁志伟就不断写信为自己伸冤。到1963年4月，他已经写了大约一百万字，一千多封信。他七次上杭州，两次去华东，还特地去过北京。其间总共花去五百多元费用。⁷⁷然而，伸冤的过程充满曲折，也始终看不到平反希望。舟山地委对他的一系列行为很反感，他们用明确态度表达了对丁志伟无理取闹的不满：

（丁志伟）不分场合不分对象到处讲，今年5月在轮船码头上对陈××说：“现在我在打官司，到省委到中央去，娘希匹，这场官司打不赢不肯息。”陈说这样影响不好，劝他不要这样搞，他不理，还是高声地讲。在理发店门口向社员沈××也是这样讲，“和领导上打官司”，要别人给他写“抄过家”“提拔他”的证明。由于人家不了解，都不给他写，并劝他“不要搞”“是错误的”，他就批评他们是“胆小鬼”“个人主义”。特别是房客洪××和……不给他写“抄过家”证明，他就翻脸和他们吵，几次威胁他们搬家，甚至骂，在他们孩子身上也大发态度。由于这样搞，在群众中都在讨论着“丁志伟在打官司”，有的群众因为不明白真相，就打听他打官司的事，影响很不好。⁷⁸

省监委的态度虽然理性，但结论仍让丁志伟看不到希望。比如1963年5月，省监委曾派调查员前来调查。调查员得出的结论是：

我在调查该案时，曾注意到这不是一般性的案

件，而牵涉到原舟山县委书记和现舟山地委领导的问题，丁又处在“孤立”“少数”的情况下，这一点，刘××同志在我未去舟山时曾再三指示过。因此在整个调查过程中，并没有忽略这些客观情况，思想上还是有警惕的。在调查过程中多次听取……，要他提供他认为“可靠”的线索，经50多个有关人员的了解，他们反映的情况基本上是一致的。

……至于是否像丁对我说的，舟山地委事先安排了布置，因此在我去调查时被他们“瞒住”了呢？经再三回忆和自问，感到在调查这个案件的过程中，没有发现有这样的迹象。⁷⁹

大约1963年4月份，丁志伟第二次前往北京。与第一次赴京无果而终相比，这一次他很可能收到了相关部门答复。丁志伟可能仍在被“抄家”和“提拔农工部副部长”的问题上纠缠，但毕竟他只是风闻，没有直接证据。北京的答复也是劝他不要再做坚持。⁸⁰

六、生与死的考量

1963年4月27日，丁志伟给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二弟写信，流露出经历坎坷后的绝望：

现在我处在这样的地步，随时随地有光荣牺牲的可能，我死了以后，你将我的材料交给党。我现在处境很困难，但亦想好了，自古人生谁不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历史会给我下结论的。……哥哥只能杀身成仁，不能屈膝投降，因为我坚信的事实是真理，又是舟山干部群众都知道的，现在他们屈服于地委书记的权势，不敢给我作证明，我若不坚持向他们投降，历史今后会嘲讽我的，那还是死了痛快。⁸¹

大约从这时开始，丁志伟的文字中开始频繁出现“死”的字眼，也开始考虑身后正名的问题。这

⁷⁶ 《关于改划丁志伟家庭成分的决定》，1962年12月1日。

⁷⁷ 丁志伟：《历史的见证——天大的冤枉》，1963年5月30日。

⁷⁸ 《关于丁志伟同志申诉的调查报告》1962年7月24日

⁷⁹ 《张雨调查材料》，1963年5月31日。

⁸⁰ 丁志伟：《给吴志（子）诚专员的信》，1963年5月1日。

⁸¹ 丁志伟：《给胞弟丁世忠的信》1963年4月27日。

不单是顿挫后失望、绝望的流露，也是丁志伟切身体会到的人身不安的流露。因为在此前后，他可能风闻了对他不利的一个消息：舟山地委决定逮捕丁志伟。

1963年5月10日，尚未被捕的丁志伟给舟山专员公署副专员吴志（子）诚写信：

吴志（子）诚专员：

这几年来我很想找领导上谈一谈，可是亦感到很难谈。回忆在62年2月底我放弃这两个问题，您问我心情能够舒畅否？我亦实事求是向您说了。可是问题是个别人得寸进尺，以至搞到今天这样的地步。

这次我来北京是万不得已，逮捕前，一切准备工作我都做好了。现在我听后组织上发落，亦许我这样是神经过敏，但是现在的情况不能不叫我这样想。丁志伟始终不能理解的，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不能容我一个小小的丁志伟，这场斗争我做许多的让步，可是有人看到我是一个恐惧的人，应该给我想一想。政治舞台上我根本不懂得，我不会搞别人，我只懂实事求是。我是他们培养起来的，虽然我做了些冒昧的事情，引起某些领导的不满，可是我只一个人呀。一时冲动，做了一些尝试，亦应该给我谈一谈，给我讲讲利害关系，我怎么会不听呢？现在这些问题叫丁志伟有何面目承认呢？怎么叫丁志伟去见广大的同志呢？这些问题同志们都知道，丁志伟承认以后比鸡狗都不如了，因此我宁可杀身成仁，不愿屈膝投降。

最近几天我给崔、王提出我的要求，解决这场斗争的办法，1.只搞清搜查，只怪郑贤芳一人。2.提拔的问题我放弃了，现在同志们说与我开玩笑，我没有亲眼看到，没有理由再坚持，这个事全部由我负责。3.对领导上过去所提意见，我都收回来，今后言归于好，这一切由我自己负责。

这样好不好，我没有发言权。问题在各位首长，这样组织上错只错在情况不了解，也可以说得过去。我这样对党的事业，对各位领导，对我自己，对全体同志都好，是一个最好的办法。

假使说这样也不好，那么请他们给我一条路走，我现在做人没有味道，逮捕、枪毙都好。我现

在已回家，因为他们扣了我四个月工资，我无法工作。请领导上劝劝他们，同意我的意见，合理解决这个问题。我毕竟是他们培养出来的，过去根本没有意见，我意见只对郑贤芳（白泉公社组织干部）、徐金海（白泉公社社长）。第二，这样做是个万全之策，领导上过去都很好，不管工作不管其他方面，我应该考虑党的事业，考虑别人的困难，根本没有需要彻底搞清不需要的问题。第三，我也可以向全舟山干部保证，向领导上保证，合理解决以后，我不会再搞了。再搞我会脱离群众，要受到社会舆论的唾骂。四、老实向领导上说，这次华东、中央都说这个职务问题我不该搞，中央也这么说，我有什么理由再搞呢？第五、领导上同意我的意见的话，能够给我报销一些路费，我就完全满意了。我要说的我心中的话，都向领导说了一说，假使说领导上不同意，那应该怎么办？最多搞死我吧，死我也想好了，坐牢我也想好了。可我坐牢以后，死了以后更能激起正义人们的舆论，引起上级党的重视。丁志伟虽死犹荣，死得很有价值。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死也瞑目了。至于回家吗？我已经回来了。我不计较50.5块。最后要求领导上听听我的要求，这是真正的情谊。关于开除我党籍的问题，我也认了，只和我自己急于搞这些问题，威胁要发传单所造成的。

敬礼！

丁志伟/63.5.10

或许逮捕令让丁志伟感到了真正的恐惧，丁志伟在字里行间开始流露一种妥协语气，比如“亦许我这样是神经过敏”“为什么不容我一个小小的丁志伟”“我做了些冒昧的事”“一时冲动”“以后比鸡狗都不如了”等等。也可能群众舆论已经出现于己不利的倾向，群众开始时虽然知道丁志伟有冤屈，但这样大搞大闹的做法，时间久了难免引起反感。丁志伟自己也意识到，“再搞我会脱离群众，要受到社会舆论的唾骂”。

这些情况都促使丁志伟冷静下来，反思自己这几年的行为。丁志伟已经意识到自己不懂政治，这意味着他也预感到，自己不可能在这场斗争中取得胜利。三年前写《反浮夸风报告》时，丁志伟的纠

结尚是说真话还是说假话，而此时，他的顾虑已经转向生命与名誉的考量。“最多搞死我吧！死我亦想好了！坐牢我也想好了，可是我坐牢以后，死了以后，可能更激起正义人们的舆论，引起上级党的重视。丁志伟虽死犹荣，死得很有价值。”⁸²

5月30日，丁志伟起草《历史的见证——天大的冤枉》，这几乎是孤注一掷的最后一搏，他控诉道：“历史早就证明我是对的，可是我现在反被舟山地委莱芜帮合伙陷害……最后置我于死地。”丁志伟如同落水的求生者，拼命挣扎，希望抓住无济于事的救命稻草。他在文件中号召党内同志提建议，期待党中央根据八届十中全会有计划交流党政干部的决定⁸³，把舟山的莱芜帮调离出去。⁸⁴ 丁志伟显然不想默默地死去，死也得为自己讨个说法。他不仅为亲朋好友而写，也为身为共产党员的地方干部而写。他将名誉至于当前斗争的胜利之上，希望后来者能为自己讨个公道说法。

1963年6月12日，舟山地委监委在报告中写道：“党对丁教育仁至义尽，不可救药，应当一刀两断”“丁已堕落成坏分子，开除公职送劳教，并在群众中公开宣布处理”。⁸⁵ 8月12日，省监委在报告中进一步确认：“丁志伟是一个坚持错误的无理取闹分子”“一贯坚持其剥削阶级的反动立场，不仅是无理取闹的问题，而且使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是阶级斗争的问题。因此，同意舟山地委的处理，开除其党籍，开除其公职，逮捕法办”。⁸⁶

丁志伟的申诉历程不仅给自己惹了麻烦，而且祸及整个家庭。二弟丁士忠从北大毕业时，并没有顺利地分配工作，而是来到一个劳动农场先接受改造。丁士忠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学的是核物理系原子能专业。当时，学生专业的选择与家庭出身有很大关联，比如，一些被认为与国家安全有联系

的专业，往往只允许家庭出身好的学生选择。丁士忠能学习原子能专业，与他当时贫农的家庭成分不无关系。但毕业时，他的家庭成分已经改划为落魄资产阶级，这次划分显然影响了他的分配。丁士忠为此不断给组织写信申诉，他的行为和家庭遭遇被另一位参与劳动的北大学生知晓，他同情丁士忠的际遇，却也清楚类似问题太多，很难解决。⁸⁷

三弟丁士杰1960年春考入杭州大学化学系，1961年9月由浙江省科学院选送上海科技大学学习。1962年8月，因浙江省科学院停办，丁士杰返回杭州大学转政治系学习。1962年9月3日，丁士杰给哥哥丁志伟的劝慰信中，对中国政治氛围颇有犀利批判。1964年8月，以“同情、支持其哥哥丁志伟反党、反革命活动，有赞同修正主义观点，对现实不满”为由，定位“反动学生”，开除党籍、学籍，送回原籍农村交群众监督劳动。对丁士杰的处分依据，是在他哥哥丁志伟被捕后，干部在他家中搜出丁士杰给丁志伟的部分信件。⁸⁸

1966年12月30号，丁士杰预感到文革中的舟山动荡，因此决定逃出舟山。他的出逃也有另外目的，即前往北京为自己的哥哥申诉。为了筹集北上路费，他不得不在出逃前零散卖掉家中的家具。在卖床的时候，他意外发现床头木板里藏着一些文件。这些文件正是大哥丁志伟在被捕前写下的申诉材料，也是躲过地方干部抄家的幸存材料。除了《反浮夸风报告》外，其他材料均为丁士杰头一次所见。

狱中的丁志伟在接受改造的同时，仍不忘坚持自学。1965年11月底，丁志伟给三弟寄信，谈到让弟弟给自己买书的事情：

我看书的本领很大，几本书，没有几天都可以给我看完，我叫你源源不断给我寄点书，直到我死了为止。家中的一切，你们兄弟二人处理就是。士

⁸² 丁志伟：《给吴志（子）诚专员的信》，1963年5月1日。

⁸³ 《中共中央关于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1962年9月27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4页。

⁸⁴ 丁志伟：《历史见证——天大的冤枉》，1963年5月30日。

⁸⁵ 《1963年6月12日舟山地委监委报告记录》

⁸⁶ 《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监察委员会报告》，1963年8月12日。

⁸⁷ 唐云（1941年—），2018年4月27日，清华大学。

⁸⁸ 《杭州大学关于丁士杰同志开除党籍、学籍问题的复查决定》，1979年12月12日。

忠可以结婚了，你过一、二年亦可以结婚了。关于我自己的家，我想得很明白，多考虑亦没有用。死了就死了算了，人做过了！我希望死神早日到来，可是死神就是不来！死神不来，叫我活着，我只好活着。活着就要看书，书现在比吃饭还重要。我可以十天二十天不吃饭，可是不能一天没有书看。⁸⁹

1967年3月，中央最高检察院、人民法院、公安部和中央监委联合审理丁志伟案件。1967年9月，丁志伟被带上“反革命”帽子，判刑20年，理由是“在狱中反毛主席和江青同志”。⁹⁰他没有熬过20年的刑期，仅仅三年后，便在浙江金华十里丰劳改农场去世。⁹¹

七、尾声：一个历史叙述者的思考

1979年2月，舟山地区开始落实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这项工作持续到1983年。⁹²1983年4月，浙江舟山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上面写道：

在关押期间，丁多次违犯监规打骂看守人员，并声称要批判毛泽东思想，用牙膏壳在草纸上乱写攻击党与领袖的错误词句等事实。但从多方考察，尚不是以反革命为目的。据此，原判以反革命定罪处罚不当。

决议最终结论是“撤销本院（64）舟法刑初字第5号刑事判决；宣告丁志伟无罪”。⁹³6月4日，舟山地委纪委发出文件，同意恢复丁志伟党籍，将其家庭成分恢复到土改时划的贫农成分。⁹⁴

二十年后，丁志伟的冤屈最终获得平反。但结论却让丁士杰感到可叹、可笑。文革结束后，阶级斗争和阶级成分的概念渐成历史。这种情境下，恢复原来贫农成分的决定让丁士杰啼笑皆非。况且，丁士杰认为判决书的很多文字闪烁其词，显然是为

了摆脱舟山地委的责任。比如，对于哥哥的去世，判决书写的是1970年11月病亡于十里丰农场，但丁士杰认定他是被人打死的。另外，判决书在最终做出无罪宣告前，仍然列举了丁志伟窃取材料、诬告他人、攻击领袖等罪名，像是给先前的审判找台阶，丁士杰很气愤。丁士杰在1983年7月的申诉中写道：“舟山中级法院宣告丁志伟无罪的判决书，同六七年判决丁志伟二十年徒刑的判决书本质上完全相同”“这不是落实党的政策，而是继续掩盖左的错误，这不是在纠正冤假错案，而是左的错误倾向在新形势下的挣扎”。⁹⁵

丁士杰此后多次申诉，想为哥哥讨一个彻底公道的说法，并希望中央追认丁志伟为优秀共产党员、革命烈士。他的努力一时不及预期，于是只能暂时留住材料，等待未来的机会。这些材料既有自己书写的申诉文件，也有文革中意外发现的哥哥保存的材料。

2018年3月，我从清华大学退休教授唐云那里获知故事，并由其代为联络，获得了这批民间史料。唐云先生正是上文提及的北大毕业生，曾与丁志伟二弟在同一个农场参加劳动。理顺史料后，我隐约看到了特殊年代一位基层干部的内心曲折，为此，特地前往浙江舟山，同丁志伟的三弟丁士杰讨论这个故事。

丁志伟的个案具有一定史学价值，它呈现了当时基层干部的心态史料，因此有助于从基层干部的个体视角理解那个时代。长期以来，对“大跃进”及其后续影响的认知，学界多停留在宏观层面。即便涉及微观，也多是群体的行为呈现，却鲜有系统的体现个人命运、观念波动的故事。人们往往想到群体无理性、乌合之众等概念，并借此想象那个特殊年代的社会状态。人们看到发自肺腑的集体欢腾，也看到了顺应时势的政治演出，但似乎忽略了

⁸⁹ 《丁志伟致丁士杰信》，1965年11月底。

⁹⁰ 《浙江省舟山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1967年9月8日。

⁹¹ 《丁士杰申诉材料》，1991年6月。

⁹² 《舟山市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5页。

⁹³ 《浙江省舟山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1983年4月2日。

⁹⁴ 《中共舟山地委关于对丁志伟问题复议复查情况报告的批复》，1983年6月4日。

⁹⁵ 《丁士杰申诉材料》，1983年7月11日。

为数不多的呐喊者。相对而言，他们保持了理性与常识认知，重要的是，他们敢于发出质疑。他们往往个性耿直，也往往因此命运坎坷。

在所有反应丁志伟故事的材料中，《反浮夸风报告》无疑具有最大史料价值。当然，历史叙述者在使用这份史料时，仍有必要看到可能潜在的问题。丁志伟写这份报告的意图，既是向上级反映自己的冤屈，同时也分析浮夸的原因、表现，并发出纠正浮夸的呐喊。从这一点考虑，报告反映故事的来龙去脉，大体可以作为历史叙述的参照。但从个体感情层面分析，这份报告仍有微妙之处值得注意。丁志伟1960年6月写这份报告，分析的是1959年发生的事情，记忆本身已经给历史添加了时间维度。从1959年到写报告时，丁志伟受到的不顺与压制是个不断积累的过程。这意味着他很可能在书写回忆性文字时，将后来不断累计的情绪挪到早期的故事叙述中。比如，丁志伟在报告中写下几段对话，这是不是历史情境中真实发生过的，或者他有没有无意中把自己此后的思考添加到过去的故事中，这些问题我们无法给出明确回答。

丁志伟在此后的申诉文件中，多次提到他的事迹已经轰动舟山。在对丁士杰的访谈中，他也认定哥哥的事迹在舟山家喻户晓。但我怀疑这种陈述有夸大的可能。2018年5月9日，丁士杰带我访问舟山一位老人，据说当年公社干部抄丁志伟家时，正是这位老人带领他们前往，她当时是居委会主任。老人愿意给抄家事情作证，并在丁士杰写好的书面材料上签了字。当我问起丁志伟反浮夸在当时是否轰动时，尽管她的口音让我难做辨别，但从略有沉默的反应看，这个事件的影响似乎不至于轰动舟山。我也尝试到舟山市档案馆寻找相关记载，但并没有收获。不排除确有关于丁志伟的记载，但没有被我发现的可能。但我隐隐感觉，或许这个事件在当年的舟山官场确有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它给地方干部带来不少麻烦，至于它在民间是否引起了很大反响，这仍是难以确定的。

有太多的细节问题难以确定。丁志伟的申诉和监委的调查自始至终存在冲突，比如“抄家”与“提拔副部长”的问题，真相也许是以下诸多情况中的

一种：也许省监委调查案件时，舟山县为了掩盖失误、责任，已经做好布置，统一口径，否认有抄家和提拔的事情。也许确有抄家与提拔的事情，舟山地委也没有应付检查，统一口径，但在民间取证时，老百姓因为对官员的畏惧，不敢为丁志伟做证明。也许确有抄家和提拔，也有目击百姓做了证明，但省监委派下来的调查人员玩忽职守，收受贿赂，歪曲调查事实。抑或刻意掩盖事实的不是别人，正是丁志伟自己。他为了渲染自己的冤屈，为了进一步宣传反浮夸风的想法，也为了制造更大的民众舆论，情急之下托人作假证，以便在这场民告官的官司中占据更主动的位置。

在这场斗争中，舟山地委和丁志伟可能都有造势的念头。舟山地委揪住“抄家”“提拔副部长”的问题不放，大概有“攻其一点，不管其余”的想法。也就是说，假如这两件事情真是空穴来风，那么即便丁志伟在其它问题上有理，他的坚持也可被视作无理取闹，舟山地委足以做大文章，给丁志伟按个罪名。另一方面，在事情闹大到超出预期后，丁志伟骑虎难下，只能继续战斗下去，并想要在大造舆论和不断上诉中，使自己占据更有利的地位。即便最后希望渺茫，他在生命与名誉的考量中，也坚定了战斗到底的决心。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得不到解释。1958年至1970年，丁志伟做过一系列反抗与挣扎。或许从最初那一刻起，丁志伟近乎偏执的性情已经决定了他抗争的徒劳。在他的个案中，就像政治运动年代的许多人一样，这种鲜明的个性往往使他们成为运动波及的对象。丁志伟生命的悲剧，很大程度上也正源自他耿直的性情，他认理不认人，耿直的性情催生了他对带有理想色彩的共产主义的笃信。至于他早年如何形成了这样的性情，我只能从并不丰富的线索中寻得一鳞半爪的解释：童年的凄惨境遇与共产党带来和平局面的对比，是他这种性情形成的重要因素。但一定还有其它重要因素，比如父母的角色、少年教育经历等，这些是这篇文章无法呈现的。

当然，我们仍能大致确定很多历史事实：“大跃进”初期，丁志伟没有顺从大流，虚报产量；1960年，丁志伟反对浮夸，并表现出众人皆醉我独醒的

思考力；同样 1960 年，丁志伟喊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比 1978 年中国改革的先声早了十八年。我们也能确定，在整个过程中，丁志伟始终处在“孤立”“少数”的状态中。从更大层面，我们看到了“大跃进”的浮夸泛滥，看到南下干部与本土干部的矛盾问题……

可以想象，面对狱中冰冷的墙壁，丁志伟可能重新想起《孙安动本》的戏剧。这出为民请命的柳子戏，促使他在浮夸风中发出呐喊。而当年的他也许从未料想，这个剧本早为自己的人生做了注脚。世事恍惚，他在历史与现实的穿梭中看到了绝望。

我们很难说丁志伟是寻常的基层干部，他在旁观，也在呐喊，既是囚徒，也是斗士。他与毛泽东时代的许多亲历者一样，钟情于共产主义的原则与想象。他一生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恰恰源自这种笃信与想象。不过，他更是一位挖掘者，试图探索深邃幽暗之境。尽管他不断声称自己没有任何私人目的，但他或许也意识到，只要有人追忆，往事就不必如烟。于是，他决心尽其所能记录自己的遭遇，发出自己的呐喊。我们无法确信 he 诉说的每件事都真实无误，但可以肯定，这些事情，他都想留给后世。¶

（上接 67 页）

出于历史书写者的责任感，我们还必须指出，在经济工作方面，阎红彦的云南德政，充其量不过一典型中国农村殷实的小财东作派罢了，远远谈不上现代经济理念。举两个例子就够了：

例 1：1965 年云南第一条通向内地的铁路：贵（阳）昆（明）线举行通车典礼，两省大员均已到场，却迟迟不见阎红彦身影，主持典礼的省计委主任郭超慌了，急忙让计委秘书长胡延观再去恭请。不料阎书记一盆“冷水”泼去：“铁路通了有什么好庆祝的？大跃进为什么云南饿死人少？交通不通嘛！中央调不走粮食嘛！”后来，计委准备调云南调油脂给上海，再从上海换回肥皂、牙膏，亦累遭阎书记一票否决，坚决不同意上海人赚云南的钱；

例 2：1965 年，中央主持云贵州三省计委领导（四川为杨超、云南为郭超、贵州为贾启允）在四川邛海开会，以支援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为题，研究大三线建设。会上，大家都想方设法“抢”项目、“抢”资金。贵州把飞机基地（01 基地）项目“抢”

走了。云南永仁县宝鼎山的煤炭发储量大，品质好，本可“抢”一笔钱为“攀枝花”配套，不料阎书记的回答让郭超痛心疾首又哭笑不得。阎说，搞煤矿，人多了供不了饭。四川要，干脆就把宝鼎山划给攀枝花吧！四川杨超大感惊喜，于是得寸进尺，说永仁拉姑林业局年产木材 20 万方，也划给四川吧！阎亦当即认账。还有，中央考虑云南穷，决定趁配套大三线，在昭通安排 8 个精密仪器项目（与贵州的 01 基地配套），同时推动内（江）昆（明）铁路的建设。如此利好的事情，竟然也被阎红彦一口回绝（他担心外地来人向云南抢粮吃），让与会的郭超忍不住扼腕长叹！搞了一辈子经济工作的胡延观，几十年后谈起仍痛惜连连，说如果当初阎红彦接受了北京的恩施，听进了同僚专家们的意见，云南工业何至于至今还在全国末尾徘徊！

历史没有再给云南机会，因为，文化大革命马上开始了。¶

【评论】

被忽略的历史 ——重视对文革保守派的研究

李 逊

内容提要：作为造反派对立面的保守派也是文革的重要方面。保守派组织的活动是执政党文革前十七年运动模式的延伸，保守派力量的兴衰，实质是毛泽东的文革与他的文革对象较量过程的彰显。弄清保守派的活动轨迹，就是理清文革中权力的运行轨迹，以及民众的思维和行动方式，并打通毛时代和后毛时代的共同点，有利于更深刻地总结文革乃至整个共产主义革命的教训。

关键词：保守派、文革、动员模式、话语的扭曲

研究上海文革史之余，读了不少文革著述，包括许多当事人的回忆，觉得在浩瀚的文革研究资料中，似乎有一个明显的疏漏，即文革中保守派组织的研究。大量文革回忆录作者以当年造反派居多。笔者所能见到的，除了当年武汉的“百万雄师”负责人之一章迪杰的《峥嵘岁月》，以及上海市总工会编写的《忠诚于党的上海工人赤卫队》，还有最早的红卫兵的回忆文章，鲜见“老保”回忆录面世。而已有的文革著述中，除了笔者的上海文革研究，以及山西某县文革史，其他著作关于保守派的活动内容，除了最早的红卫兵，也基本未见引自保守派方面的回忆资料。这一点，早在 20 年前，海外的研究者王绍光和陈佩华便已有提出，但直到现在变化似乎不大。

作为群众运动的文革史主要由造反派的活动构成，但作为造反派对立面的保守派，也是文革的重要方面，许多事件是造反派和保守派组织互动结果。另一方面，保守派组织的活动是执政党文革前十七年运动模式的延伸，保守派力量的兴衰，实质是毛泽东的文革与他的文革对象较量过程的彰显，所以对保守派的研究应是文革研究的重要内容。

研究保守派组织，既是历史实证，也是理论研究。笔者这篇文章并不在于讨论理论问题，而是希望引起对保守派组织的重视，使文革研究更立体和饱满。

一、保守派的产生

以干部子女为核心的第一批红卫兵首先喊出造反口号，但从他们以后的行动看，他们既是造反者，又是顽固的保守派。在冲击不准自由结社的社会制度方面，他们是造反者，因为他们冲破了执政党对社会组织和社会活动的严密控制，成立了不受党团组织控制的体制外青少年组织——红卫兵。而在此之前，共产党不允许任何官方控制之外的民间社团存在。红卫兵组织兴起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其体制外的组织形态，成为不久全社会结社自由的开端。这是一个具有颠覆意义的开端，是对共产党严密社会控制的造反。而在最初的批判对象上，他们也可算是造反者，因为他们的反叛从反对学校党组织和工作队开始。在此之前的十七年，执政党从来不允许对各级党组织说“不”。成立红卫兵组织以

及反校党组织和工作队都是反体制的造反行为。所以从这点上说，这批干部子女应该是文革中最早的造反者。不过，这种造反主要发生于北大附中以及率先成立红卫兵组织的清华附中等少数学校。在其他干部子女云集的中学，红卫兵组织是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后成立的，学校党组织不敢反对。

但是，这批造反者并没有将“造反”的桂冠保持多久。当毛泽东明确表达对他们造反行为的支持后，外在的政治压力消失，他们马上将斗争矛头指向了十七年一贯的革命对象，还加上学校老师和同学。他们制造了血腥的“红八月”，将在此之前各级党委发动的对知识精英以及前政权的政治、经济精英的迫害，推向新的高潮和更大规模范围。在斗争方向和斗争对象上，这批红卫兵和共产党的一贯目标完全一致，他们的暴戾是阶级斗争学说更赤裸的直白，是被刻意引导的必然结果。他们对文革前便已形成的政治等级身份制不但坚决维护，而且极力扩大和固化。而政治等级身份制正是十七年政治统治的核心。他们宣扬“血统论”，就是为了消除那些学习成绩出色的非红五类子女对教育资源的威胁，独占革命接班人的地位，以便将来独享政治资源。他们的政治要求，只止步于不受党团组织控制的结社自由。

毛泽东的文革对象是他所认为的各级“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这些新的革命对象，正是以干部子女为骨干的第一批红卫兵的父母，这令第一批红卫兵不能接受，本能地站到了文革的对立面。因此，在对文革批判对象意义上说，他们是保守派，而且是最顽固的保守派。而他们与不久崛起的造反派从一开始就非常对立，以后也始终不愿意与之为伍。他们自始至终的行为便是反对造反派对各级干部的批判和冲击。所以从文革政治派别的意义上说，他们也应该被划入保守派。

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红卫兵运动骤然兴起。全国各地第一批红卫兵组织都是北京模式的翻版：核心人物都是各级干部子女，批判对象都是十七年阶级斗争的继续；抄家、打人、破坏文物；当然也都狂热鼓吹“血统论”。也和北京最初的红卫兵一样，他们不久都成为保守派。所不同的是，

他们从成立伊始就是保守派，不像北京第一批红卫兵那样至少还有反体制的开端。而且由于毛泽东对北京红卫兵的支持，其它省市第一批红卫兵组织成立，几乎都有各省市党委的支持和扶植；不像北京第一批红卫兵，成立时遭到学校党组织的反对。

第一批红卫兵的血统论，激化了其他阶层子女的逆反心理。1966年9月6日，以平民子女为主体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成立。“三司”的批判锋芒直指“党内走资派”。接着，因这些造反派红卫兵的榜样和支持，工人造反派组织也纷纷成立。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造反派组织很快成为文革主流。而正是在对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态度上，真正形成了文革的两大派别：造反派和保守派。所以秦晖认为，文革初期正式政治派别意义上的保守派，就是随着这批造反派的诞生而被确认。

保守派和造反派的最初分野，在许多学校和工厂是因为对工作队或党委的不同评价。保守派拥护工作队或党委对分歧的裁决权。而造反派则反对党委和工作队的裁决权，认为应该对照当时的报刊社论以及《十六条》，因为这传递了毛泽东的文革主张。造反派实际是试图将裁决权抽象化，突破十七年一贯的党的干部说了算的话语权和对真理的解释权。这是造反派最初的造反行为。而保守派最初没有这样的思想突破，以后也始终基本服从新的权威和权力的裁决。

二、保守派及其组织活动是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革的对象是干部阶层。还是在1965年1月，毛泽东制定的对农村“社教”的23条中，第一次提出整“走资派”的思想。接着在同年制定的《五一六通知》中，又明确将“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作为新一轮革命对象。1966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更进一步将文革对象确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提出“炮打司令部”。

但各级党委包括派往各学校各单位的工作组，并没有悟出毛泽东的批判指向。他们纷纷抛出专家、学者和文化名人作为打击对象。当有人贴出大字报质疑，即使十分温和，他们立即条件反射地出手反击，发动群众围攻那些提意见者。在这样的围攻中，形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最初雏形。那些被围攻的提意见者日后大多成为造反派；而跟着党委或工作组围攻提意见者，日后很多人成为保守派组织的核心或骨干成员。

保守派的活跃时期真正开始，是在 1966 年 9 月以后，各级党委普遍遭到冲击。而此时中央决策层因对文革的不同看法，传递到底层的对造反派支持态度不是十分明晰。于是对省市委的评价，分化出文革群众派别意义上的造反派和保守派。各地都有保守派群众与造反派辩论以及保守派组织“保卫”省市委的行动。到 1966 年年底，保守派组织与造反派组织的分歧更发展成冲突甚至流血事件。例如 1966 年 12 月 4 日重庆的“12.4 事件”，1966 年 12 月 30 日上海的“康平路事件”，1967 年 1 月南京的“1.3 事件”，1967 年 1 月 26 日新疆的石河子大规模流血事件，等等。这些事件看起来是底层民众两派的冲突，其背后是中央决策层的文革势力和抵制文革势力的较量。

1967年初，毛泽东让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三个最高机构，再加上中央文革小组，向上海以“工总司”为首的造反派组织发贺电，表达了支持造反派的明确而坚定态度。造反派组织对保守派组织的强行取缔和武斗围歼在全国范围展开，各地保守派普遍遭受重大打击。在上海，一月夺权之后，以张春桥为首的文革派掌控了上海的大局，文革新政权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造反派和拥护文革者占了优势。即使是被“三结合”的老干部，也都是下决心紧跟文革者。保守派组织即使想死灰复燃，在市革委会中也找不到同情或代理。

但这样的情况只是少数例外。在大部分省市，文革新政权革委会中干部和军队对文革的态度尤其是对造反派的反感态度，给予了保守派组织重新生存的空隙。有些省市的保守派换一面旗帜重新整合自己的力量，例如武汉的“百万雄师”，广西的

“联指”。更有在支左部队的支持下连旗帜都不换继续存在，例如成都的“产业军”。尤其广西和广东，因为军队的支持，保守派始终占强势地位。

绝大多数支左部队对文革的态度，与原来抵制文革的地方党组织基本一脉相承。因此 1967 年至 1968 年各地的武斗事件，许多看似保守派组织与造反派组织冲突的事件，背后仍是干部阶层对文革的抵制。最轰动全国的是武汉“7.20 事件”，以及四川遍及全省的动用武器弹药的武斗。而保守派占优势的广西，武斗更是持续一年半，大规模杀人尤为惨烈。所有这些事件中，有相当一部分并不是造反派挑起的。可以说，在文革最高潮的 1966 年下半年至 1968 年年底，全国各地许多重大事件或武斗冲突，许多都与保守派组织有关。这是保守派背靠文革新政权与造反派的继续对立。所以，保守派的活动是文革的重要组成，少了保守派的活动轨迹，文革记载便不完整。

三、保守派组织是十七年政治运动动员模式的集中体现

保守派组织的活动轨迹，就是十七年运动群众的模式，或者可以说是共产党历次政治运动的动员模式。

1966 年 6 月，聂元梓大字报发表后，全国掀起大字报高潮，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和“黑帮”。各级党委讨论圈定并抛出本单位的运动对象，组织群众写大字报。那些稍有名望的专家、学者、业务拔尖的学科带头人，还有“出身不好”者、“政治历史复杂”或“社会关系复杂”者，被纷纷抛出。而在工厂，一些技术人员和资方人员也被党委抛出。这样有准备地抛出批判对象，形成人口诛笔伐的氛围，给被批判对象以强大心理和政治压力，是历次政治运动的一贯模式。

但这样的模式在文革初遭到质疑。对照《十六条》，有人认为党委首先应将自己作为这一次运动的对象，于是给本单位的党组织或工作队贴大字报，但立即遭到党委有组织的围攻。在这个后来被

毛泽东称为“资反路线”的 50 天中，各级党委发动群众保卫自己，打击和围攻提意见者。这样的做法也是以往政治运动的延续，尤其是从反右运动之后的一贯做法：凡是给干部提意见者都是心怀不满分子或反党分子。这是造反派最初造反的原因。不过，绝大多数造反派造反，并不是从人权的普遍意义出发，而只是从自身被批判打击的特殊性出发，所以他们对比自己政治地位更低者例如“地富反坏右”没有同情心。这种情况同样体现在保守派身上。

最初的保守派是在 1966 年下半年造反派冲击各级党委时产生的。他们不同意对各级党委的批判，以各种形式保卫党组织。在上海，1966 年 8 月底和 9 月初，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上海市民以对上海市委的评价，分成不同观点。许多市民去上海市委办公大楼门前与北京红卫兵辩论。更有许多工人去市委门前“保卫上海市委”。市委门口贴出了许多为上海市委评功摆好、反击北京红卫兵观点的大字报。其中最著名的有两篇。一篇是以国棉二厂的老工人名义写的《我们老工人要说话》，另一篇是以上海市委树立的先进人物杨富珍的名义写的《给毛主席的急电》。两张大字报都被印成传单，不但在上海广为散发，全国其它城市也都有传抄翻印，影响很大，是文革初期保卫省市委的典型文字。

看起来，“保卫上海市委”的行动以及大字报都是工人们的自发行动。但不久便有传单揭露，说两张大字报的真实作者是上海市委干部和工厂干部：《我们老工人要说话》是上海国棉二厂党委组织的，起草者是党委的秘书；《给毛主席的急电》是驻厂的市委工作队向市委请示，得到市委书记陈丕显同意后，由工作队撰写的。其它这一类的保卫市委的大字报，也大都是基层工厂或主管局、公司的干部们组织或暗示撰写的。而大批去市委门前与红卫兵辩论的工人，都是应市委要求由下面各工厂党委派出的。被组织前往的工人一律算公假。为了显示工人们是“自发”去保卫市委的，出面组织的工厂干部特地关照：若有人问起，就说是自己去的。

这样的以工人名义出面说话，是历次政治运动的一贯路径。《我们老工人要说话》，从 1957 年“反

击右派”，到 1966 年的“保卫省市委”，到 1989 年的“反对动乱”，同样的题目、同样的内容，以“工人阶级”及“广大群众”的双重的名义一再重现，严厉斥责任何对执政党的质疑，正义正气正能量。只是过去暗箱操作，文革中终于被揭露出“自发”背后的捉刀真相，让人明白那些看似汹涌民意的背后，是权力操纵为官方代言的实质。这样的政治留痕使得以往和以后的“自发”都失去了崇高，成为你知我知人人皆知的虚假政治游戏。

和“要说话”之类的政治表态一样，保守派组织的成立，也与各级党组织的大力支持分不开。大多数省市 1966 年红卫兵运动兴起之后成立的保卫省市委的保守派组织，都是各级党委明里暗里扶植的。即使在上海，虽然保守派组织不是市委直接出面组织的，但也与市委的默许和大力支持有很大关系。保守派运动看上去很热闹，其实都是党委的导向和意志。

而在之后的 1967 和 1968 年，各地保守派组织也与文革中的主流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是保守派组织最本质的特征——没有自己的主体意志，跟着执政者的导向制定自己的行动方针。即使是后来造反了的保守派，也始终不改听话本色，过去是听各级党组织的话，夺权后听文革新政权的话，包括对地方文革握有重大话语权的支左军队。而群众组织对保守与否的鉴别，也从 1966 年底的与各级党委的亲疏，变为与革委会或支左军区关系的远近。所以，尽管文革的各个时期保守派组织的名称和保卫对象会有变更，但他们与主流政治的亲近关系没有变更。事实上，保守派组织的主心骨在 1967 年全面夺权前是各级党组织，全面夺权后就是各级革委会中的反对造反派的干部们。

除了上海等少数城市，造反派在大多数省市得势时间不长，革委会成立以后，造反派重新成为整肃对象。十七年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模式重又回归，许多地方的保守派参与了这个回归。而保守派参与秩序和权威回归的过程，正是文革目标渐行渐远的过程。到 1976 年，原来一度不得不向造反归顺的保守派，又重新站到了造反派的对立面。而造反派中的许多人，也开始怀疑毛泽东和他的文革，

于是发生 1976 年的“四五运动”。这是文革结束的社会基础。

弄清保守派的活动轨迹，就是理清文革中权力的运行轨迹，以及民众的思维和行动方式，并打通毛时代和后毛时代的共同点，有利于更深刻地总结文革乃至整个共产主义革命的教训。

四、保守派的类型和区分

与造反派一样，保守派也有不同类型。一类是真心认同和拥护十七年者，以劳模先进人物和党团员为骨干。他们是共产党执政后的受益者，有着强烈的翻身感，更对给了他们荣誉的各级干部有着强烈感恩。他们看不惯造反派打倒一切的行径，1967 年“一月夺权”造反派取得全面胜利后，他们迷茫困惑。过去的努力和荣光反成为负资源，他们也曾因此努力迫使自己适应新的形势，跟上文革。但首先情感上就与造反派始终格格不入。许多人只能从行动上淡出文革。之所以说“从行动上”，是因为他们仍然反感文革，只是不再以行动抵制。上海文革初期工人保守派组织“赤卫队”的主要负责人王玉玺、陈阿春、李剑钰、马骥等，大多是这种类型。这些朴实的工人，坚守自己的良心和直觉，又无法超越毛泽东和党的权威，只能沉默，以沉默表达对文革的不认同。

第二类是努力跟上文革形势者。当毛泽东明确表达了对造反派的支持后，他们反戈一击起来造反，不但揭发当初支持他们的各级干部，而且一遍又一遍地检讨自己当初是“受蒙蔽的，以这样的表态开脱自己，表达对文革的认同，从而延续他们文革前被各级党组织信任的政治身份。一些人也因此保持甚至提高了政治和体制身分，例如文革前的上海著名先进人物杨富珍，宣布造反后，一次又一次地检讨自己“被旧市委利用”，从而成为劳模先进人物“正确对待文革”的典型，被提拔重用。文革前她是纺织厂的挡车工人；文革中当了上海普陀区区委书记。

第三类是 1967 年一月夺权后改换旗帜宣布造反者。但他们即使造反，也始终和原来的造反派貌

合神离。他们中有些人是文革初期批斗“黑帮”的积极分子，其中有些人有侮辱和殴打批斗对象的行为。宣布造反后，他们与之前的造反派颇多冲突，甚至酿成大的武斗事件。这些冲突有的是因不同观点例如对某个干部的评价引起，有的则是对文革新政权席位的纷争。

第四类保守派是强权的追随者，谁有权便紧跟谁。文革初期他们保各级党组织，与其说是出于对党的热爱，不说是向权力表达忠心。文革中他们跟着新的权力，例如支左部队。哪怕新的权力大开杀戒，他们也跟着参与杀戮。上面第二、第三类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也可列在此类。

而大多数底层群众参加保守派组织，是因为安全。这是他们从十七年历次政治运动得出的经验。1966 年 10 月前，中央决策层传出的对造反派的支持态度不是十分清晰，信息显得不确定，解读不一。最安全的选择，就是继续跟着原来的权威，即还在台上的那些干部。这是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是这一时期保守派占大多数的原因。以后，当造反派得势，保守派全面崩溃，许多人弄不清文革的形势，也不愿意参加造反派，于是成为逍遥派。

1967 年一月夺权后，各级党委被打倒，保守派组织的捍卫对象不存在了。“保守派”也成为抵制文革的代名词，没有哪个组织再会理直气壮地自称保守派。而 1967 年全面夺权以后，将对立派组织指为“老保”，从而取消其参加文革运动的资格，更成为最常见的派性争斗方式。上海柴油机厂 1967 年上半年，“联司”和“东方红”，都开足马力指责对方是“老保组织”，武斗冲突不断。但事实上双方都是造反组织。

当时将对方指为保守派组织有各种理由：有的以 1966 年文革初期的政治站队为标准，将曾经“保”过各级党组织者指为老保，即使这个组织 1967 年以后“反戈一击”改旗易帜。有的以与文革前主流政治的亲疏为标准，将党团员多的组织指为“老保”。有的以与文革中主流政治的亲疏为标准，把与夺权后成立的革委会或支左军队关系密切的组织指为“老保”。除了原来便是保守派的组织，一些较温和的造反派组织也被指为保守派。例如清华

大学的“414”。所以，文革中指责对立面组织为“老保”的理由，标准不一，许多时候甚至只是打倒对手的借口。

文革结束后，保守派和造反派被作为文革中的不同政治倾向，不少文革研究学者提出自己的区分原则。

最早研究中国文革的国外学者例如李鸿永、罗思典、陈佩华和裴宜理等，以“社会冲突”的理论分析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区别。认为保守派组织的特点是党团员、劳模先进人物多。这其实也是中国每个文革经历者的切身感受：最初的老保组织的核心和骨干都是共产党的依靠对象，参加者也以党组织所信任的积极分子为多。

而中国的学者对如何区分保守派和造反派也有着颇多观点。徐友渔的《形形色色的造反》一书中，将如何区分保守派组织定为六个标准：支持还是反对工作组；支持还是反对“血统论”；回避还是积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维护还是反对各级党组织；“二月镇反”中是帮凶还是挨整；主要斗争对象是党外“阶级敌人”还是党内“走资派”。

周伦佐在《文革中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根本区别》一文中，将追随毛泽东的何种理念作为区分标准。认为保守派“实际追随的是1966年10月以前的毛泽东——及其‘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造反派“实际追随的是1966年10月以后的毛泽东——及其‘路线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思想”。

印红标在《红卫兵运动的主要流派》一文中，将对权力来源的认可作为判断标准。指出：保守派认可的权力来源是各级党组织，要坚持党的领导，所以他们会保卫各级党组织；而造反派认可的权力来源是毛泽东，跟着毛泽东的文革批判和打倒各级党委；至于干部子女红卫兵，他们认可的权力来源主要是自己的红色血统，不那么把工作队和学校领导看在眼里，更不接受对上层干部也即自己父母的批判。

杨继绳在《天地翻覆》中，干脆明确地将“矛头向上还是向下”作为区分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标

准。所有这些标准的核心都是革命对象的不同。也即革命对象是十七年阶级斗争的继续，还是干部阶层本身。这可以从与以干部阶层为核心的主流政治的亲疏关系鉴定：夺权前是与各级党组织的关系，夺权后是与革委会或支左军队的关系。

1967年一月夺权时期，虽然造反派取得全面胜利，但这个时期很短。毛泽东的文革没有改变十七年政治规则：只要掌权，就掌握话语权和对真理的解释权。随着军队支左全面介入地方文革，以及大批老干部被“三结合”进文革新政权，文革前的干部阶层全面恢复了原有的权力和权威。这个恢复过程与对造反派的不断打击清算同步。而在整个过程中，保守派势力始终是干部阶层的同盟者和群众基础。所以，文革各个时期保守派组织的名称和保卫对象会有变更，但他们与干部阶层的亲近关系不会变更：在1967年全面夺权前是各级党组织，全面夺权后是各级革委会中的党政军的干部们。区分造反派与保守派，就是观其在文革各个阶段与权力的关系。而大多数党政军干部虽然进入文革新政权，但与不断找他们麻烦的造反派始终不融洽，更容易倾向保守派。

不过，上海是个特殊例外。上海在1966年底的“康平路事件”后，王洪文坚决主张大力吸收保守派进造反派组织，从情绪和组织上瓦解了保守派。保守派组织不复存在，造反派全面掌权。所以上海亲主流政治的是造反派。这样的现象也与上海市民的政治性格有关：重技术轻政治，讲实际反空头，尊重秩序，反对极端。这一政治性格不但体现在保守派身上，也体现在上海的造反派身上。这也使王洪文和他的造反组织被一些更激进的造反派视为“保守”。这是另一个话题。

五、保守派思想和话语的扭曲性

如果剥去那些带有强烈时代特征的话语外壳，人们可以感受到保守派思想的核心，是反对文革对秩序和权威的颠覆，反对暴力和无序。而敬畏既有权威和秩序，尊重既有价值和现实，这样的政治性格，是一切社会的保守派所共有的。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将这些文革最初的反对派称作保守派，是比较确切的。这是保守派最可贵的价值，也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

但是，如果把文革中的保守派等同于政治学意义上的保守派，似乎也不尽然。因为文革中的保守派是对 1949 年革命与造反形成的统治秩序与价值观的“保守”，本身是对上一次“革命”与“造反”成果的坚持，并未抛弃“革命”与“造反”的核心价值观。真正的政治学意义上的保守派有着自己的价值体系和政治伦理，对于任何变革传统和秩序的激烈革命，始终抱着警惕和审慎。而在中国，共产党是靠破坏旧有秩序取得政权的。十七年的强权与教化，早已形成新的秩序，共产党的传统成为政治文化的核心。但这样由革命形成的新传统，有许多与普世价值及中国文化传统相悖。文革中保守派保卫的是对上一次革命也即 1949 年后所形成的统治秩序与价值观，并不是对普世价值的坚守。

徐友渔指出：一个革命政党依靠破坏旧秩序夺得政权后，天长日久，也会形成新的、自己的传统和正统，在新语境之下产生的革命或保守，自然就具有一定的扭曲性和复杂性。谈文革中的保守，是相对于新传统而非老传统。这样的扭曲可以从许多话语中看到。例如保守派反对造反派打倒一切，呼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是执政党十七年所一再宣扬的，似乎很宽宏大量。但这个话语的背后是严酷的阶级分类，意味着那些“团结对象”不是自己人，“团结”他们是宽大和恩施。这样的“团结”话语就有了某种扭曲。于是到文革时期，绝大多数“团结对象”被打回非我族类原形，被收回“团结”资格，遭到残酷迫害。而保守派要捍卫的，不是那些被迫害者的人身权利，而是文革前的“团结”政策。

朱学勤认为，文革话语因当年官方意识形态的强势打造，严重扭曲相关汉语原有含义。如“造反”“保皇”与“保守”：“造反”的汉语原意是对最高皇权与统治秩序的背叛，但在文革初期的绝大多数

“造反”中，人们看到的是相反现象，是奉旨或领旨“造反”；“保皇”一词来自法国革命及其后续话语，专指当年的王党与拥护皇室的正统派与拿破仑

派，但在《人民日报》社论中却被用来指称一时未能领悟毛泽东意图的另一派群众；此后周恩来等建议改称“保守派”。“保守”本为政治学、社会学专用话语，并无褒贬，但在这里貌合神离，虽弱化一格，却还是贬称，并未消减政治歧视。而在另一方面，当年的“造反派”在吸收、消化大量“保守”组织与群众后，又发明另一名词“老造反”，以强调自己“造反”最早，其实是对当年等级身份制的红色顶端——“老革命”身份的模仿，保守而不自知。

所以，文革中的保守派坚守的是十七年革命制定的新规则和新秩序。他们不反对阶级斗争，他们反对的只是过于激烈的嗜血。但也有部分保守派，尤其 1967 年以后的保守派例如在广西，对生命的践踏比造反派有过之无不及。

保守派与其说是对文革有看法，不如说他们更多的是对造反派看不惯。看不惯造反派打倒一切的行径以及对秩序的破坏。不过保守派不可能坚守自己的切身感觉，1949 年后的中国，不允许任何与执政党理念不同的独立思想存在，失去了个人权利的任何派别，都不可能坚守自己的政治伦理。

事实上，保守派中的许多人并不反对文革前对沉淀了多少代的习俗和秩序的颠覆，甚至也不反对文革初期对文化和传统的破坏。第一批干部子女红卫兵的“破四旧”席卷全国，其破坏性比历史上的历次战争更彻底更无微不至。除了干部子女，许多保守派也都是“破四旧”和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最起劲参与者。例如在上海复旦大学，“破四旧”和“斗鬼风”中的积极分子，后来很多都成为复旦大学保守派组织“红卫兵大队部”的成员。以至于日后复旦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们回忆起 1966 年夏季的红色恐怖时，都说是“老保干的”。保守派中向文革对象下狠手而毫无同情心者不在少数。不但在 1966 年的政治迫害中，而且当 1967 年和 1968 年军队掌握各地权力，对造反派清算和对“地富反坏右”大开杀戒时，许多地区都能看到原保守派组织成员的积极参与。

无论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是毛泽东文革的响应者，造反派奉旨造反；志在“打倒”；保守派没有及时领悟旨意仍停留在原来的行为模式，仍坚持

“捍卫”。保守和造反在于领悟圣旨的时间差。无论捍卫还是打倒，都是对文革的积极参与，更是为了表明自己对共产党的忠心。当然，真正反对破坏文化和传统者应该始终存在，但持这样观点者不会是文革积极分子，很可能倒是文革对象，极少有人敢于公开站出来。

六、加强对保守派的研究和资料收集

文革结束后，彻底否定文革，发动者的责任，被完全转移到造反派头上，大批造反派被审查。保守派没有被追究，尽管他们中许多人也曾是文革最早的迫害参与者。

对造反派的清查资料构成了丰富的文革档案：从个人的交待包括造反动机及对各个事件的参与等，到各种各样的旁证包括相关人员的揭发交待或当时的会议记录、传单小报。由这些清查资料能拼出许多事件的脉络走向。但是，在清查档案中，缺少了同样参与事件的保守派资料。即使有保守派的文字，一般也只是证词。而且大多是造反派如何迫害他们的证词，却没有他们对自己行为的回忆，更没有他们的行为与原干部或支左军人关系的回忆。或者换句话说，没有显示他们是如何被操纵和利用的。其实，保守派也有交待材料，而且应该曾经数量不少。但那是文革中他们被造反派迫害审查时的交待。文革结束后，这些资料作为迫害个人的文字，大都销毁或还给了本人，地方档案馆很可能很少有保留。

如今，保守派的资料大多见于当时保守派组织的传单小报，个人回忆极少。不过，他们当年的工作笔记或日记应该有部分留存在世；归还他们的文革交待，有些人也会保留。当然，这样的收集很费功夫。笔者就曾经收集到一套当年上海赤卫队成员写的交待。

对比保守派回忆录的缺位，造反派对文革历史回忆的参与非常踊跃。目前境内外出版的大量文革回忆录，基本都是造反派写的。在这些回忆录中，可以看到大量的鲜活细节：最初的造反动机，造反组织的崛起和活动，以后又如何遭到清算，更有对

许多事件场景和人物的描写。虽然有些回忆不乏美化自己或回避开脱责任，但至少留下了丰富的史料。为研究者和后人对照其它史料去伪存真提供了依据。而在文革研究者的名单中，我们更可以看到许多当年的造反派或持有造反派观点者：杨曦光、徐友渔、秦晖、印红标、杨继绳、宋永毅、何蜀、周伦佐、余汝信、徐海亮、周孜仁、石名岗等等。但当年的保守派，至今在做文革研究者，笔者所知道的，只有我自己，我当年是上海的中学生保守派。此外，第一批北京红卫兵卜伟华，文革史《砸烂旧世界》的撰写人也可算是保守派。

最初的干部子女红卫兵撰写回忆录者倒是不少。如联动重要成员邹建平，化名钟雪写了《联动娃娃：文革初期拼争纪实》。血统论对联的鼓吹者谭力夫化名谭斌，写了本《赤子白话》。“西纠”负责人孔丹口述了《难得本色任天然》(米鹤都执笔)，北岛编的《暴风雨的记忆》一书中，也有老兵的回忆。但这些回忆录回避了许多重要史实，对许多事情的来龙去脉尤其自己参与的暴力行为语焉不详。例如：1966年8月的抄家行动是如何决定和发动的？是红卫兵自发的行动，还是被有所组织或暗示？如果是自发行动，是哪个中学哪个组织首先行动？行动之前如何决策？首先被抄家的是哪些对象？抄家名单如何制定？根据什么原则制定？那些人参与制定？又如，北京的驱逐黑五类行动以及北京大兴县的大屠杀是谁决定？更不说在回忆录中提及文革初期的打死人名单和施暴者名单。至于其它保守派组织，除了上海的“工人赤卫队”、武汉的“百万雄师”，也鲜见他们的回忆录。许多事件至今仍是谜。例如上海“412炮打张春桥事件”与军队的关系；“720事件”与武汉军区的关系，等等。而文革中后期也有许多与保守派可能有关的未解谜团。例如广西和湖南的屠杀和吃人事件究竟因何发生，等等。即使现在可以见到的少数保守派的回忆，例如武汉“百万雄师”负责人的回忆录，也使人觉得似乎缺失了许多情节。所有这些，是记忆流失，还是有意无意甚至刻意的回避？

造反派积极撰写回忆录，与他们文革后的境遇有着很大关系。文革结束后，造反派被清查，一些

人被判刑。部分省份“揭批查”扩大化，胡耀邦主持的中共中央下发1982年9号文件予以遏制，但在某些地区被停止执行。如河南省有两千四百多造反派被突击判刑，更多的人受审查或不予重用。这些年河南等地毛派群众屡屡发生群体事件，即与上述历史遗留问题相关。造反派们不服于将历史的责任全归于他们，他们要为自己辩护，但他们的辩护话语大多仍来自毛泽东文革话语。

造反派中的一部分人相比其他人，具有更多自我意识及个性，不安于现状，对自己的人生有着自我设计。他们最初由反对压抑个性的政治等级身份制而造反，而反抗官府是中国文化的民间传统。这使他们甚至有种失败的悲剧英雄情结。文革是与他们人生紧紧相连的特殊时代。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弄潮儿。对不少人来说，文革甚至是他们人生的巅峰。他们不满意自己这一段人生被彻底否定，他们要留下资料，让后人评说。文革后再看有些当年的造反派，透过文革式炮轰、火烧的话语外壳，是对当政者的质疑，这是被毛泽东“大民主”催生的朦胧的权利意识。这种对当政者不断质疑的思考，使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又进一步质疑体制的弊病。1967年至1968年各地都有由造反派写出的独立思索文章，例如湖南“省无联”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即使是比较温和的造反派组织例如清华大学的“414 东方红战团”，也写出《414 思潮必胜》。文革结束后，一些人考上大学，成为学者，更试图从理论和认识高度剖析那些始终与文革经历纠缠在心头的问题与困惑。

而保守派，虽然也在“彻底否定”之列，但没听说谁因为当年参加保守派组织而被清算审查，更尚未听说有人因此被判刑。保守派没有诉求和自我

辩护的强烈愿望。事实上，对一些参与过暴行的老红卫兵或参加过武斗的保守派来说，许多事情不是需要澄清和自我辩护；而是相反，淡忘是他们对自己最好的开脱和保护。保守派始终是权威话语的服从者，以官方准则为自己的思维准则，在这方面的思维能力似乎远不及造反派，文革中就几乎没写出过有影响的文章。除了干部子女红卫兵的“三论造反”。即使“三论造反”，也是通篇谩骂而无说理。而工人保守派，文革中许多文章都不是他们自己写，许多工人保守派组织的成立宣言多由党委秘书代笔。而在与造反派的笔战中，保守派传单的数量和煽动力也远不及造反派。文革结束后，他们也缺乏进一步思考与探讨的自觉和动力。他们高度认同对造反派的批判，满足于彻底否定文革。在彻底否定文革的话语中，他们的形象是正面高大的，所以不希望重提当年被操纵利用的尴尬角色。

徐友渔认为：造反派的擅长是进行社会动员，掌握民间话语权，写回忆是这种能力的表现；保守派的擅长是体制内运作，获得实际权力，面对公众的语言表达是其所短。各有长短，难论高下。

文革已经过去了五十年。半个世纪的漫长时间，应该足以销蚀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恩怨，何况这样的恩怨由一个非常时期强加。武汉的造反派与保守派两派群众组织的骨干人物，，早在2007年便握手言和，消解了当年的对立情绪。如今，造反派和保守派都已经进入老年，超脱文革和派性语境，抢救文革记忆，已经迫在眉睫，不但抢救造反派的记忆，也抢救保守派的记忆。❷

注：本文引用文字，除了文中写明文章或书籍题目的，都来自笔者与被引者的信件往来。

【评论】

对“三角游戏”与“最后胜利者”的讨论

——与杨继绳先生商榷

何 蜀

内容提要：杨继绳先生在《天地翻覆》一书中提出了“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毛泽东、造反派、官僚集团之间的三角游戏，这场游戏的最终结局是：胜利者是官僚集团，失败者是毛泽东，承受失败后果的是造反派”这样一个论断。本文认为，“三角关系”并不存在毛泽东与所谓“官僚集团”实为一体，造反派并不构成第三方。而且造反派是在文革取得决定性胜利时被毛打下去的。毛的文革遭受到诸多失败，但得到了一项根本的胜利，即《五一六通知》提出的防止中国出现“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让后来的领导人不敢在毛身后对他进行政治清算。

关键词：官僚集团、造反派、三角游戏、最后胜利者、赫鲁晓夫式人物

杨继绳先生在《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一书的“导论”中提出了一个论断：“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毛泽东、造反派、官僚集团之间的三角游戏，这场游戏的最终结局是：胜利者是官僚集团，失败者是毛泽东，承受失败后果的是造反派。”

这个论断有新意，有深意，自提出以后，颇有影响，但是经不起推敲，因为其表述不清晰，不准确，可商榷之处甚多。

首先，“三角游戏”之说不能成立，因为这一论断所说到的这三者之间并非对等或对立的关系。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之时，他已经是至高无上的独裁者，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不论“官僚集团”还是造反派都一致拥戴、尊崇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他可以主宰其他二者的命运；而造反派更不能构成“三角”中的一角，因造反派在文革舞台上仅仅活跃了两年左右就

被毛泽东抛弃，群众组织被撤销，小报、广播被封禁，最后只剩下极少数的“代表”作为“三结合”的点缀，而且除了上海以外，这些“代表”也基本上长期处于反复受审查、写交待、关“学习班”的状况，哪里有资格参与“游戏”？即使在造反派活跃于文革舞台的那两年间，也无不坚称自己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无不坚称“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小兵”与“司令”是对立的两方吗？当然不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小兵”只能是“司令”手中的棋子。因此，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三角”。而以“游戏”一词来指称那场“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也很难作为严肃的历史叙事中的概念。如果说“游戏”，也只能说是毛泽东一人的，如陈子明所说的“一场由东方君主所导演的极其残酷的揪人、整人、杀人游戏”¹。

其次，说文革的“最终结局”“胜利者是官僚集团，失败者是毛泽东，承受失败后果的是造反派”，

¹ 陈子明《文革：一场游戏一场梦——兼与“人民文革”说商榷》，载《昨天》第28期，2014年1月30日。

这一论断中的这三句话均有可商榷之处，分别讨论于后。

一、毛泽东与“官僚集团”

“官僚集团”（与之相似的提法还有“权贵集团”“既得利益集团”），是近年才开始使用的不甚清晰的概念。说它不甚清晰，是因为缺乏明确的界定：怎样才算是官僚（或权贵）？正像文革初期，人们知道“斗争的大方向”是矛头要对着“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概念中只有“党内”的含义一目了然，但对怎样才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甚至怎样才算是“当权派”，中央都没有明文作出过概念上的说明与界定，因此人们都弄不清楚。文革初期笔者曾看到过一张传单，有人走访中央文革接待站，询问哪级干部才算是“当权派”，得到的答复是“科长以上”。这传单现在不好找了，但有另一个找得到的资料可以证实当年确有这样的说法，即《周恩来接见中国科学院京外单位在京革命同志时的谈话》（1966年12月7日），其中，当有人问“如何划分当权派、干部、群众”的时候，周恩�回答：“当权派在科学院首先是院、所党委，部里行政上是部长、副部长，处里处长、副处长是当权派，科长对于他所负责的科也是当权派，也可以批判。”² 1967年姚文元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评陶铸的两本书》，就谴责陶铸以极“左”的无政府主义面目出现，鼓吹：“我是主张普遍轰！”³ 其实，陶铸当时所传达的正是毛泽东及其“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发动（或曰煽动）群众阶段”的主张。

按照共产党的理论，共产党执政后，各级官员（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或曰“勤务员”（所以造反派群众组织的头头都以“勤务员”为正式职称），绝不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旧式官老爷。现在这样的说法当然没有几个人相信了。但是，共产党执政的“党国”领导干部，毕竟不同于君主专制时代的那些“朝廷”官僚，因为在君主专制时代，

天下是皇帝一家一姓私有的，各级官僚只是为皇帝家族服务的。而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天下是共产党的，所以被称为“党天下”，各级领导干部名义上是“为人民服务”，实际上是为党服务，一切为着贯彻“党的路线”、完成“党的事业”、维护“党的领导”而且要确保“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这里实际上已经有一种在历史演变中出现的“异化”：以“为人民”为宗旨而建立的一个党，执政后变成了人民要“听党的话”和“把一切献给党”了。

那么，毛泽东与“党天下”的“官僚”们是什么关系？这就很清楚了：是一体的关系。回顾一下毛泽东执政以后所发动的一场场政治运动，特别是反胡风、反“右派”这样的运动，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都是为了维护这个“官僚集团”的利益，巩固这个“官僚集团”的统治，不允许任何来自民间、来自异己的力量对这个“官僚集团”有所触动或威胁。

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造反派斗“官僚集团”，其实是一种极大的错觉。文革初期，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造反有理”的号召、鼓动下，群众纷纷起来“炮轰”“火烧”各级当权派，甚至向他们“夺权”。但是一旦夺权成为现实，上海正式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毛泽东却改变主意了，他认为如果到处都叫“公社”，那么整个国体就要改变了，更重要的是：“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摆呢？党放在哪里呢？”“总得要有一个党嘛，要有个核心嘛”⁴。

毛泽东怎么会担心建立了“公社”就会失去“党”的领导地位呢？他在那里所说的“公社”，当然不是全国农村都已经建立、成为他所高举的“三面红旗”之一的人民公社，因为那种公社里是有党委的，是完全服从“党的领导”的，毛泽东所担心的，是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十六条”中所提倡的“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选举”即普选所产生的那种“公社”，而那种普选产生的“公社”是很可能把共产党从执政地位选下去的——所以自

² 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10年版。

³ 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载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

⁴ 李逊著《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04页。

1967年“一月夺权”之后，中央就不再提倡“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选举”了。李逊对此评价说：“‘党的领导’是毛泽东的文革底线，也是对巴黎公社市民自治模式的不信任和坚决否定。”⁵

有一个事例很能说明问题，即黑龙江省造反派的夺权与奉命让权。

经历过文革的人大都应该记得，早在上海市完成对市级党政领导的“夺权”并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之前，就已经有山西、山东、贵州、黑龙江四个省完成了省级“夺权”并得到了中央的承认，《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作了充分的宣传介绍。其中，黑龙江省于1967年1月31日（比“上海人民公社”早五天）成立了临时权力机构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2月2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第一条新闻，全面报道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的消息，并且全文播发了大会发布的《一号通告》、抓革命促生产《呼吁书》《给毛主席的致敬电》以及宋任穷、潘复生、汪家道、游好扬等党政军领导干部到会祝贺的讲话，《人民日报》还配发了社论《东北的新曙光》，对黑龙江省的夺权给予了高度评价。

黑龙江省夺权后建立的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班子，班长是范正美（哈尔滨师范学院学生，造反派红卫兵领袖），副班长是刘雪峰（职工造反派代表）、游兴懋（哈尔滨军工学院红色造反团代表），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和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为成员。

在最先完成“夺权”并得到中央承认和祝贺的四个省中，其他三个省都是由原来的“当权派”主政（山西是刘格平、张日清，山东是王效禹，贵州是李再含），只有黑龙江是由造反派推选出来的红卫兵代表主政。这是黑龙江夺权一个最大的特点。

戏剧性的变化就发生了。几天后，周恩来打电话通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组成汇报团到北京向中央汇报。新班子的“红色造反者”们兴高采烈地推选出26人的代表团，踌躇满志地做了充分准备，安排好了谁负责汇报什么内容。

潘复生、汪家道于3月9日坐飞机先去了北京，当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剑英、徐向前、李先念、肖华、王力、关锋等中央领导就接见了他们，宋任穷和陈锡联在座陪同。潘复生作了全面汇报。

代表团其他成员（主要是群众代表）于3月11日到达北京。他们却被晾在一边，一等就等了五六天！直到3月16日晚饭之后，才接到中央文革的通知，要代表团中的全体群众代表到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接受中央文革领导接见。当晚11时，出席接见的中央文革领导只有一位戚本禹。戚本禹并不听他们汇报，却在绕了一个大圈子后，要他们让潘复生、汪家道任省革委主任、副主任。

这是中央文革传达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红色造反者”谁能不坚决照办？随后，潘复生、汪家道把范正美接到他们在京西宾馆的房间去，要他写一个给中央的信，“提议”让潘、汪任省革命委员会正、副主任。最后，3月19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周恩来、康生、陈伯达、肖华、王力、关锋、穆欣等才出席接见了黑龙江省汇报团全体成员。周恩来讲话中说：“黑龙江省革委会成立后还没有见过。一个是领导问题，一个是要扩大的问题。我们提议，你们来信也同意我们的意见。我们同意以潘复生为主席，汪家道为副主席的革命委员会。”

多年后，范正美在回忆录中写到此事时感慨道：“后来我才意识到，在这件事情上，我是很迟钝的，是个地道的书呆子，幼稚的可笑。我在这时，一点也没有思考过，这是毛泽东、周恩来要调整黑龙江省革委会领导班子的信号。我的参谋不少，他们常常有什么事给我提个醒，但在这件事情上，还没有一个人向我作过任何明示或暗示。我和许多人后来谈起这件事时，以为革委会是一个临时权力机构，其负责人是在暴风骤雨的群众斗争中，经过群众组织推选出来的，两个通告也写得明明白白，以后要通过直接选举产生新的权力机构予以取代。所以，我们谁也没有料到在这个时期中央要调整领导

⁵ 李逊著《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第811页。

班子，要重新恢复任命制，重新启用原来的老干部。也就是说，我对于文革以后的政治体制转换处于天真幼稚的朦胧憧憬之中。”⁶

如果说文革是“游戏”，这就是毛泽东愚弄群众的“游戏”，他把那些狂热而虔诚的造反派完全戏弄、欺骗了。

今天那些还在呼唤“再来一次文革”，还在梦想着再来一次造反夺权的人们，不是也同样“处于天真幼稚的朦胧憧憬之中”吗？

毛泽东自1967年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之后便不再“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不再承认各地自发完成的造反派夺权，而从此改为由中央主持各方面“协商”后经中央批准再成立革命委员会。接着，毛泽东又宣布：要“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⁷，这里所说的“干部”当然不是指身份编制上与工人相区别的一般干部，而是指各级领导干部即当权派，也就是说要“相信和依靠当权派的大多数”，并且针对曾经被奉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十六条”中规定的“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毛泽东来了一个朝令夕改的新说法：“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⁸ 把文革初期要坚决打倒的“走资派”这一主要的“革命对象”，轻描淡写地偷换成了可以是好人犯的“错误”。

不久就在中共“九大”前后陆续恢复重建了各级中共组织，并且在中共“十大”上由王洪文代表中央宣读的（当然不是由他而是由张春桥之流起草并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强调：“在条文部分规定：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和各个革命群众组织，‘都必须接受党的一元化领导’。党的一元化领导，在组织上应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同级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不是平行的，更不是相反的；第二，在上下级关系

上，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我们党历来的规矩，必须坚持下去。”

显然，在毛泽东那里，“党天下”的体制是不容改变的，要确保“党天下”的万世长存“永不变色”，当然离不开各级领导干部或曰“官僚集团”。把毛泽东与“官僚集团”分割开来，甚至对立起来，似乎毛泽东跟造反派一样是“官僚集团”之外的另一种政治力量，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毛泽东确实也整过一些“官僚”，这并不是文革时才有的，从他执政之初的“三反”运动杀刘青山、张子善，到打击“高饶联盟”“潘汉年、扬帆集团”，再到以后的“反右派”“反右倾”“四清”……他从来没有停止过打击一部分“官僚”，但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与“官僚集团”处于对立状态，他打击的只是他认为不听话的、对“党天下”有危害或者只是被他怀疑为有危害的“一小撮”。而一旦这种怀疑消失，比如在林彪事件之后，被他“大树特树”起来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被发现竟是他身边最危险的敌人，而那些曾经被他怀疑为有二心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比如在西南民愤极大的“土皇帝”李井泉之流，不要说“取得群众的谅解”了，根本就不需要考虑群众会怎么想，不用向群众作任何说明、交待，毛泽东就可以下令“解放”出来官复原职或易地做官。他哪里是“官僚集团”的对立面？而包括造反派在内的“群众”，则早已习惯于争相表现“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了。哪来的什么“三角游戏”？

二、如何理解“文化大革命最终结局的胜利者”

“文化大革命……最终结局是：胜利者是官僚集团”，这个说法的问题同样是：不清晰，不准确。

因为“文化大革命最终结局的胜利者”这个说法不清晰，就会产生不同的理解：

⁶ 范正美著《秋梦追思》，网传电子版。

⁷ 《红旗》杂志1967年第六期社论《热烈响应拥军爱民的号召》。

⁸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第617页。

“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者”——就像“抗日战争的胜利者”一样，指的是积极参加并为之英勇奋斗而取得胜利的人们。对于文化大革命来说，除了“江青集团”的几个人外，“官僚集团”的大多数显然不属于积极参加并为之英勇奋斗的人，他们在刚开始时误把文革当成又一场“反右”运动时，普遍是很积极的，但是很快就发现跟不上毛泽东变幻莫测的“部署”成了“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就普遍处于“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状态——这是在中央委员们一致通过的党中央决定“十六条”上明文载入的，后来他们则大多处于挨批斗、被关押、写检查、等“解放”的状态，即使好不容易得到“解放”“结合”了，也不断受到“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反回潮”“反复辟”“反翻案”等等的敲打。因此，即使文化大革命取得了胜利，也不是他们的胜利，更何况没有取得胜利。

“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而最终取得胜利者”——“官僚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过遇罗克、王佩英、刘文辉、张志新、史云峰们那样的坚决反对吗？没有，或者说极为罕见。文化大革命是中共中央全会上一致通过的决定正式发动的，刘少奇也是在中央全会上“一致通过”正式决定打倒的——只有唯一的一个陈少敏以头痛为由趴在桌上没有举手。文革中处于当权地位的“官僚”没有谁真正表示过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对，即使是现在被改称为“二月抗争”的所谓“二月逆流”，谭震林、叶剑英、陈毅等反对的也只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极端的具体做法，反感的只是中央文革小组那几个没有军功且级别不高的文人的颐指气使。老帅与副总理们并没有反对文化大革命本身。其他执政的“官僚”就更不用说了。特别是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杀人权下放，各地枪杀的那些真正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民间志士，都是被当时执政的“官僚”（基本上是军队干部和原来的地方干部）们批准杀害的，罪名中都有“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这一条。再看一看1976年4月和10月的《人民日报》就很清楚，全国各地执政的“官僚”们，不管是在中央镇压天安门群众民主运动、再次罢免邓小平之后的积极拥护，还是在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积极

拥护，都是同一些人在那里争相表态，唯恐落后，都要“与中央保持一致”。

“文化大革命被否定之后的胜利者”——只有这样说，才适用于“官僚集团”。在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彻底破产并遭到否定之后，所谓“官僚集团”才得到了空前的胜利。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他们比文革前更加得势了，特权更多更大了，打压民众更加心狠手辣了，贪赃枉法更加肆无忌惮了。如果说这些都是他们的“胜利”的话，那也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并遭到否定的若干年以后才逐步成为现实的，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结局”，而是“文化大革命被否定之后的最终结局”。

但是，应该看到，文化大革命被否定之后，得到胜利的绝不只是“官僚集团”，而是更多的、更广大的民众。

不要忘了1976年清明节前以“四五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各地民众抗议运动，那是饱经十年劫难的民众心声的一次真实反映。民众要求结束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却遭到了镇压。文革最终被否定了，民众得到了胜利，因而有了“十月的狂欢”“今日啊畅饮胜利酒……”那首韩伟作词、施光南作曲的欢快的《祝酒歌》，不正是唱出了民众的胜利心声吗？

此外，还有一类人也在文化大革命被否定之后得到了“胜利”，这就是在“毛泽东时代”长期遭到打压、被作为“阶级斗争”活靶子的“专政对象”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这

“黑五类”及其子女家属。他们是毛泽东专政制度下的“犹太人”。正是文化大革命导致的物极必反，他们才得以摆脱在“毛泽东时代”根本不可能摆脱的政治贱民的地位和终身（再加上后代子孙）永远成为“专政对象”的噩梦，终于成为有了合法地位的公民，能够挺起腰杆过上正常的人的生活了。

还不应忘了更大数目的一类人的胜利，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社员”，即农民。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破产，曾经被吹嘘为“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农村人民公社，毛泽东树立的“三面红旗”中的最后一面，也终于遭到抛弃，

几亿农民得到了解放，不会再因为争生存、争温饱的努力而被斥为“挖社会主义墙脚”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甚至遭到“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无情打击了，他们更不会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因所谓的“自然灾害”而不能自救、不准逃荒、只能坐以待毙甚至整户、整村地饿死了。难道这对他们不是可歌可泣的历史性的胜利？

还有那些在文化大革命被否定之后的“平反冤假错案”历史大潮中洗清了污名、得到平反昭雪的形形色色、不同时期（包括中共执政之前在中共队伍中遭到整肃甚至冤杀）的蒙冤者及其家属、后代、亲朋好友，难道他们没有感到胜利的喜悦？

当然，所谓“官僚集团”的胜利与民众的胜利，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意味着历史的倒退，后者意味着历史的进步。这正反映了历史的多面性与复杂性。

三、毛泽东的多项失败与一项胜利

“文化大革命……失败者是毛泽东”，这个说法，看上去似乎没问题：毛泽东自己十分看重的他一生所做两件大事之一的文化大革命，却在他生命垂危之时就引起广泛的公开抗议和暗中抵制，死后很快就被他自己的党“彻底否定”了，还不算失败吗？

毛泽东确实得到了多方面的失败。

理论上的失败。严格说来，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并无理论，那个“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只是王力、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等御用文人将毛泽东的一些片言只语拼凑起来，加工整理并加以阐述，为之编造出来的一个所谓理论。其实毛泽东的根本理论就是他执政以来长期信奉的“阶级斗争”理论。这个理论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惨痛历史，使其荒谬性、反动性暴露到极致，终于被后来的执政者抛弃。

挑选“接班人”的失败。挑选“接班人”是毛泽东最看重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然而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打倒原有的“接班人”刘少奇之后重新选定的“接班人”，不是又被打倒就是被他改换，

最后一个他自认为“你办事我放心”的接班人，竟然还在他死后不到一个月就主持抓捕了坚持文革路线、最为毛泽东宠信的几个亲信（包括他名义上的妻子江青在内），断送了他的文革大业。

用人路上的失败。毛泽东在文革中起用和倚重的那些“左派”，如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关、戚和组长陈伯达，军队中的刘志坚、萧华、“杨余傅”

“黄吴李邱”……一个个都被他拉下马，甚至关进大牢；第一批得到他认可“夺权”成功的省份的“左派”领导干部，如山西的刘格平、山东的王效禹、贵州的李再含、黑龙江的潘复生，以及被他选作“突破口”为之平反、提拔的四川的刘结挺、张西挺等，全都在中共“九大”前后陆续被他抛弃，成为因执行他的路线而导致各地动乱不止的替罪羊。首都红卫兵曾经是他忠实的“马前卒”和“中央文革铁拳头”的“五大领袖”，最后也都灰溜溜地被他赶下文革舞台，成为审查、批斗对象，强迫劳动改造，毛泽东最后发出的那批“最高指示”中，还在讲到“老中青三结合”时专门有一句“青要好的，不要聂元梓、蒯大富那样的”，明确将他们弃若敝屣。

诸多决策、“战略部署”的失败。“自下而上的夺权”，很快就被他自己否定了，变成了仍然是自上而下的任命组建“三结合”；军队“支持左派”激化了各地矛盾，他不得不改变为促进（实为强迫）两派大联合；“武装左派”导致各地愈演愈烈的“全面内战”，不得不又命令上交武器；为了收拾烂摊子，重新起用被打倒的“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夸他是“人才难得”，结果又发现这个“人才”与他的文革路线格格不入，只好又批“翻案不得人心”“走资派还在走”，将其再次打倒……

文革十年，毛泽东把全国人民折腾得苦不堪言，怨声载道，把自己也折腾成了中南海红墙深宫里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他的失败是十分明显的。

但是，还应该看到——

毛泽东有一项根本性的胜利。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清除刘少奇这样的“政敌”吗？且不说刘少奇是不是他真正的“政敌”，即使是，他也用不

着发动文化大革命，只需要像对待彭德怀或者“彭罗陆杨”那样，开一次中央全会或者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甚至不需要他亲自出席主持，就可以解决了。何况，刘少奇已经在 1966 年 10 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认错检查，不久又当面向毛泽东提出辞职之后，为什么还不收兵？在 1967 年春开始的对“中国赫鲁晓夫”的所谓“革命大批判”已将刘少奇“批倒、批臭”之后，为什么还不收兵？在 1968 年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已经通过决议将刘少奇以“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永远开除出党之后，为什么还不收兵？

是为了发动群众“清洗官僚集团”吗？真要“清洗官僚集团”，再搞一次“三反”“反右倾”或“四清”之类的运动，不就够了？何况，在“官僚集团”已经遭到大规模清洗，被批斗，被夺权，“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后，为什么还不收兵？

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才需要如此兴师动众、劳神费力、旷日持久地先让几亿人都成为“批判家”，然后又让几亿人都在“斗私批修”中“狠斗私字一闪念”，还要不停地“清理阶级队伍”，反“回潮”，反“复辟”，反“翻案”，批判“投降派”……还要强调：“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⁹……

“天意从来高难问”。其实，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不必问，也不必猜，只要看他那个“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就行了。

《通知》的核心要点，是毛泽东亲笔写上的内容：要求全党提防“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清洗这些人”，特别是“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因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一概念太抽象、太空泛了，毛唯恐别人不好理解，特地加了另一个代名词：“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这真是《五一六通知》这一“划时代的文献”的画龙点睛之笔，这就是《通知》的关键词中的最关键词。

而“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什么意思？毛泽东到底防的、怕的是什么？

仅仅过了一天，林彪就在那个有名的“五一八讲话”中，用他特有的语言风格点明了，说穿了：

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这就是毛泽东的心病所在：担心有人像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那样，在他身后对他进行政治清算。

其他高级干部，应该也会有人对毛泽东防止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有类似的认识理解，只是不会或不敢像林彪那样直白地说出来。所以毛泽东对林彪这个讲话十分欣赏——尽管在林彪事件之后公布的那个据说是毛泽东早在文革发动之初就写给江青的信中说他对林彪的这个讲话感到不安，但那毕竟只是写给个人的信，而且是在事过多年后才公布的，没有原件只有“抄件”，到底当时是否这样写的，谁也说不清。但在 1966 年 9 月 22 日（即那封据说写了“感到不安”的信两个多月后），却分明有毛泽东批准以中央名义号召全党学习林彪这个讲话的文件，并在中央批语中高度评价：

“林彪同志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林彪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事实，根据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特别是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党、篡政、篡军的教训，对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反革命颠覆的问题做了系统的精确的阐述。”“林彪同志说，毛主席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思想是永远的普遍真理。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

⁹ 1968 年 11 月 25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认真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中引用。

彪同志这个讲话，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是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文件。全党全军都应当认真讨论，认真领会，把它运用到文化革命和一切行动中去。”¹⁰

这哪有什么“不安”啊！

从毛泽东以批判《海瑞罢官》点燃文革导火线，也能看出这一点，为什么要批《海瑞罢官》？不是他提倡学习海瑞精神吗？当年他提倡之后，我们小学生看的《中国少年报》上都连篇累牍地歌颂海瑞。只因为后来发生了彭德怀上书为自己申诉的事，毛泽东不能容许被他定罪的彭德怀翻案，因为彭德怀翻案就意味着他要认错。在他生前就不能容许有这样的事发生，他更要防止在他身后出现这样的情況。为了防止出现“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和那样的“秘密报告”，他就要发动一场独出心裁的文化大革命，进行一场全民“洗脑”。因为他深知，仅靠开会，仅靠表决通过中央文件，并不能确保事后又被翻案——彭德怀不是已经在做了吗？因此，他必须让所有的领导干部受到一次警告性的冲击，让所有民众受到一次所谓“反修防修大演习”即“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的“实弹演习”的锻炼，形成一种强大的、遍及城乡的、深入到家家户户的、“触及人们灵魂”的社会氛围和思维定势，使任何想做赫鲁晓夫式报告的人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整个文革中，他随时都在提防有人“翻案”，从发动文革开始批判《海瑞罢官》为被罢官的海瑞翻案，到1967年批“二月逆流”时反对为延安整风翻案，1968年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妖风”，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特别强调这一点，再到后来的反“黑线回潮”，再到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提出“翻案不得人心”——邓小平正是因为再三向他保证“永不翻案”才得以复出，也是被他发现在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而被他再次打倒的……他始终怕有人翻案，怕被人在身后对他进行清算。这是他最大的心病。

从上述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根本目的——防止

出现“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防止有人在他身后对他进行政治清算来看，毛泽东的这个目的不是已经达到了吗？毛泽东在文革中主持召开过“九大”“十大”两次党代会，而在他身后已经召开了九次党代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已经换了若干届，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当“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文革已经结束四十余年了，在许多地方还弥漫着浓重的崇毛情绪，甚至在2017年初还出现了“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的文革口号……《五一六通知》所要求达到的根本目的，不是达到了吗？

从这个意义上说，到目前为止，毛泽东还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者，受益者，赢家。

当然，从更长远的历史时期来看，毛泽东的这一“胜利”也只可能是一时的。

四、造反派是在文化大革命“胜利”时被毛泽东打下去的

“文化大革命……承受失败后果的是造反派”这一说法，同样是不清晰、不准确的，容易产生歧义，似乎造反派是在文化大革命“失败”之后才成了“承受失败后果”的替罪羊。

如果仅从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揭批查”，到八十年代前期“整党”时的“清理三种人”来看，造反派都是被当作文化大革命的罪责承担者来清理和惩处的，从这一角度，说造反派承受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后果”，有一定道理，但是不够分量，应该说是“承担了文化大革命的罪责”。

不过，这样说也是不准确的。众所周知，文革结束之后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有一个结论性的说法：“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个结论，把文化大革命的罪责推给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显然，文化大革命最大的罪责承

¹⁰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林彪讲话的通知，1966年9月22日，中发〔66〕502号文件。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担者不是造反派，而是“官僚集团”中的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因此，应该说是“官僚集团”中的一部分和造反派一起承担了文化大革命的罪责，而且“官僚集团”中的两个集团承担了主要的罪责。

另一方面，必须明确的是，造反派并不是在文化大革命“失败”之后才遭到打击的。

造反派到底是在什么时候被打下去、被谁打下去的？

早在文化大革命还在高歌猛进、“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中共“九大”之前，即刘少奇被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正式宣布以“叛徒、内奸、工贼”罪名打倒之时，造反派就已经被毛泽东抛弃。不过，当时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失败”，毛泽东不是让造反派“承受失败后果”，而是让造反派充当文化大革命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的替罪羊。我们看看毛泽东是在什么时候把大学、工矿企业、中学的红卫兵、造反派分别打下去的。

1968年“七二七”，大学红卫兵的末路——

一个最重要的、“划时代”的标志，就是1968年的“七二七”，毛泽东亲自决策并精心部署，派出工人、解放军宣传队以高度保密、突然袭击的方式进驻清华大学，随后是工宣队这个变相的工作组全面进驻所有大中学校及文化单位，造反派红卫兵被明确赶下文革舞台，成了只能“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臭老九”。

1968年“八一五”，工矿企业造反派的末路——

紧接着“七二七”的是“八一五”——这是在文革研究中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另一个标志性事件：从1968年8月15日（即“七二七”之后不到二十天）开始，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各地重点工矿企业的造反派及相关领导干部、军代表的所谓“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因会议涉及的工业系统部门多，

会议名称复杂¹¹，因此以会议开始的日期统称为“八一五会议”。这次会议长达近半年，到1969年1月才结束（有的如山西代表团还被推迟离开），这可能是中共执政以来会期最长的一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强行终结工矿企业群众造反运动的大型学习班，要赶在中共“九大”之前把“工人阶级”这个文化大革命“主力军”中的造反运动也强行结束。在“八一五会议”期间，各地各单位代表团严厉追查文革中造反派的停产、武斗等罪责，揪“坏头头”，追“黑后台”，强行揭发、交待、请罪，“八一五会议”成了许多亲历者谈之色变的恐怖“集中营”。在会议开始一月后的9月16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碰头会领导人接见国防企业“八一五会议”代表，做了一个定调子的著名的“九一六”讲话，讲话中的蛮横无理、以势压人、不准申辩、无限上纲等等做法，比起文革初期“五十天”中的所谓“刘邓路线”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杀一儆百”，会议期间还由中央批准抓人。在这个“会议”上已经广泛使用了后来在“清队”和“清查五一六”中采用的那些残暴的逼供手段，有人在会议期间被打死、打伤、逼得自杀……¹²

从196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到1968年“八一五会议”，才一年零八个月时间，工人造反派就被以种种罪名打下了文革舞台。

1968年“一二·二二”，中学红卫兵的末路——

到1968年底，毛泽东又通过12月22日的《人民日报》发出一段“最新指示”把所有中学生赶下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变相劳改，有的甚至陷入比劳改犯人不如的悲惨境地。整个红卫兵运动从此釜底抽薪，黯然熄火。

（下转132页）

¹¹ 1968年9月16日中央首长“九一六”讲话是接见“国防工业部分工厂和一机部化工部协作厂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代表时的讲话（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此外还有同时召开的冶金系统工厂的“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在丁龙嘉、听雨著《康生与“赵健民冤案”》（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一书中即将“八一五会议”称为“国防、冶金等企业抓革命促生产会议”。

¹² 有关“八一五会议”的研究可参见拙文《“八一五会议”：毛泽东收拾工人造反派的重要部署》，载《昨天》第108期，2018年3月30日。

【评论】

文革中的造反派是什么人？

——以《奉献》为例证剖析

徐友漁

内容提要：造反派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先锋和主力，对这类人的正确描述和评价是研究文革的重大课题之一。本文以原湖北省大学生造反派首领杨道远的回忆录《奉献》为例分析了造反派的家庭出身、文革前的政治面貌和文革中的立场与表现，着重指出他们造反的动因是忠于毛泽东、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而不是反对现存的政治制度，他们被污名化和定罪判刑是时代的悲剧。

关键词：造反派、家庭出身、政治面貌

随着中国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和社会不公正加剧，文革这个话题越来越经常被人们提起，而说到文革，积极投身于运动的主体——造反派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对造反派的评价与对于文革的评价密切相关，正如对文革的评价有尖锐对立的不同立场，对造反派的评价也是大不相同。

有一种现象有趣而复杂，值得指出和研究。文革结束后，在运动中被打倒或受到冲击的当权者肆无忌惮地报复造反派，说他们是仇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人，利用文革的混乱从事破坏和颠覆活动，以刑事犯罪的名目对他们处以重刑；另一方面，一些具有自由民主价值取向的学者和文革研究者把造反派说成是对专制极权制度最早有觉悟和认识，并在文革中反抗这种制度，追求民主的先知先觉者。

这两种看法价值立场对立，但对于事实的认定却比较一致。但是，它们都没有得到造反派本身的认同，几乎所有的人都强调，他们当年起来造反，完全是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为了革命政权、红色江山稳固长存。其中极少数人在几十年之后认同了宪政民主的价值取向，但他们从来没有说那是

当年造反时的政治立场，而是坦承那是经历文革惨痛教训，深入批判和反思的结果。

最近若干年，不少前文革活跃人士——特别是当年的造反派领袖——通过自费印刷或者在外海发行的方式出版了一系列回忆录和反思文革的著述，为我们了解和研究文革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解读和剖析这些著作，有助于我们得到文革是什么，造反派是什么的答案。本文正是力图通过解读和剖析杨道远（湖北省著名的学生成反派领袖，曾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奉献》一书和其他相关著作，来勾画和说明文革中的造反派，解释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要造反，在文革中拥护什么，反对什么，对自己的遭遇和下场怎么看，从文革中得到什么教训，悟出了什么道理。

用杨道远一个人及他的一本书为例证来说明有关文革的普遍性道理，似乎有以偏概全之嫌。这里的关键是，杨道远这个人非常具有代表性。第一，与他情况类似的例子可以举出许多个；第二，他作为湖北地区学生成反派的重要头目，说明了他的身份、形象、所作所为得到了广大学生成反派的认可，他们所具有的共同性是一望而知的。

一、造反派的家庭出身和政治面貌

《奉献》一书的作者杨道远家庭出身贫农，从小对共产党充满感情，将其视为自己和一家人的大救星。他在上初小刚学会写大字的时候，就给家里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共产党带来好光景，下联是：毛主席教人不受穷；横批是：当家作主。他在读大学期间当班主任和团支部书记，还因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而给同学作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报告。杨道远这个名字，是他后来为了自身革命化而改的。

杨道远的妻子孙卫旗，与他同为造反派首领，其家庭出身和本人政治面貌的红色，丝毫不逊于杨。孙卫旗出身于贫农家庭，青少年时期一直任少先队和共青团干部，入大学后任团支部书记，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学院每次运动都是积极分子”，文革运动兴起，为了表示保卫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决心，毅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卫旗”。¹

我们知道，有论者用家庭出身和本人政治面貌不好来说明人们造反的原因。比如周伦佐认为，造反派的先锋和主体都是非“红五类”家庭出身子女，² 杨小凯则断言：“文革中积极造反的人都是市民中对共产党不满的人。”³

杨道远绝非反例或孤例。黑龙江省的造反派领袖范正美，文革时是政治教育系学生，大学二年级当系学生会主席，系团总支宣传委员；内蒙古造反派首领高树华，初中三年级入团，大学二年级入党，入党后一直兼做学生政治思想工作，定时给他们上团课、党课，本人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我曾指出：“全国著名的造反派学生领袖，如北京的所谓‘五大领袖’，陕西的李世英，河南的党言川，江苏的曾邦元、文风来，四川的江海云、武陵江，吉林的姚美玲，湖南的叶卫东，浙江的张永生，广东的武传斌，个个都是所谓的‘好’出身，

其中大多数文革前就是团干部或三好学生，他们造反显然是出于相信毛泽东‘防修反修’的理论。另一部分造反派首领或积极分子是各地著名的劳动模范，如山西的陈永贵、李顺达，沈阳的李素文、尉凤英，陕西的姚连蔚，云南的徐学惠等等，他们是出于热爱毛泽东，响应毛泽东号召而造反的。其他造反派积极分子，如上海的王洪文、王秀珍，浙江的翁森鹤，湖南的唐忠富，四川的邓兴国等人，不论从他们的家庭出身，文革前的政治面貌和表现，以及文革中的所作所为看，都不能说他们是抱着反共的目的而造反。”⁴

1966年9月13日，以作者为首的武汉测绘学院造反派红卫兵组织成立了，“受血统论影响，尤其怕抓辫子，第一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全是‘红五类’子弟。”本书提供了一份材料：“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组织条例（草案）”，这是作者本人领导的一大派造反者的组织发展条例，其中“第二条：组织发展原则是，以红五类子弟为主体，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1. 有成分论；2. 不唯成分论；3. 重在表现（重在思想政治表现）。”

⁵ 据此，我们可以看到，“造反派以家庭出身不好者为主”的说法是不确切的，虽然我们同时承认，造反派的组织原则比起保守派来说在家庭出身或本人政治面貌方面的要求要宽松许多，为一些出身不好的人参加群众组织提供了机会。

文革研究者李逊根据统计资料指出，上海职工造反派中的党团员比例相当高，高于文革前他们在职工中的比例，这与“造反派里落后分子多”的习惯说法不一致。她进而指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党团员都是积极的投入者，文革运动也不例外。只不过在文革刚开始时，对运动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于是产生两种不同的积极投入方式，一种是沿着以前的思维惯性，认为保卫各级党委就是积极投入运动，另一种认为响应毛主席号召造反才是积极投入

¹ 杨道远：《奉献》，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香港：2010年，第418页。

² 周伦佐：《“文革”造反派真相》，田园书屋，香港：2006年，第26、109页。

³ 杨小凯：“六四省悟：为文革造反派翻案”，《中国之春》，1990年8月号，第42页。

⁴ 徐友渔：“关于‘两个文革’说”，《中国研究》，东京：1996年，8月号，第14—15页。

⁵ 《奉献》，第35、64页。

运动，这就产生了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分野。⁶

我认为，一般而言，保守派中的党团员、积极分子的比例会高于他们在造反派中的比例，但即使在造反派中，他们仍然占有相当的比例，并在骨干和领导层中起支配作用。对于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而言，积极投入运动以挣得一种突出的政治表现，既是本能，也是他们的自觉意识。上世纪 50 和 60 年代的政治生活塑造了政治积极分子的习惯，他们要响应号召、积极投入运动——不管是什么运动。

二、造反派与党和体制

华林山说：“保守派捍卫中共制度的现存社会秩序，造反派则试图破坏这个社会秩序。”⁷但读者从杨道远的书中可以看到，造反派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对他们所缔造和维护的社会制度，是支持的，他们的拥护是自觉的，他们的政治信念是虔诚的。

杨道远和它的战友在本校成立造反组织时，“把组织名称定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决定于 1966 年 9 月 13 号正式成立组织。为什么定在 9 月 13 号呢？因为 1958 年 9 月 13 号毛主席来武汉视察，有纪念意义。”⁸在商量成立武汉地区一大派学生造反组织时，他们最初拟名为“造反司令部”，经过讨论，改为“革命造反司令部”，⁹这一变动意味深长，虽然毛泽东已经说过“造反有理”，但这一批政治觉悟很高的学生，还是认为有必要强调自己的造反是“革命造反”，而绝不愿留下丝毫可能产生其他联想或误解的余地。

上海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在成立起名时也有

完全一样的考虑。“工总司”的发起人之一黄金海说：“共产党领导下，‘造反’，造谁的反？容易被误解。所以我提出将‘造反’的含义和性质明确一些，加上‘革命’二字。”¹⁰

武汉测绘学院的造反派队伍发展很快，“为保证这支队伍的正确方向，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成立了党的领导小组，其成员有杨道远……七人。”而在此之前，“武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成员有五位学生党员，他们是杨道远……，形成了很强的领导班子。”¹¹造反派在自己组织的领导层中设立党组，这种做法恐怕很少见，但也并非绝无仅有，徐海亮在研究武汉地区文化革命的论文中，就记载了“在刚成立的造反工人组织中按常规建立党小组”的现象。¹²而造反派首领是党员积极分子的情况则相当普遍，这些人的政治觉悟之高，党性之强，不会比杨道远所说的差多少。

政治觉悟和党性不仅表现在造反派党员身上，也表现在党组织和当权派那里。杨道远说，他们在学校成立造反派组织时，本单位武测（武汉测绘学院）“留守的负责人是院文革副主任，我们要求成立组织，向他宣传周总理指示：红卫兵你可以组织他也可以组织，只要执行《十六条》我们都支持。这话他也可能听说过，因此没费多大劲他就同意了成立组织，并给了办公室，给印制了旗帜、袖章，供给运动必须物品（主要是写大字报的东西）。”¹³

同样，成立地区大派造反组织也得到了官方的支持，“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从酝酿、筹备到成立，都向湖北省‘文革办’报告了，并取得了‘省文革办’的认可，由省里出面要武测给解决办公室及办公设施桌椅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设在武测。省里

⁶ 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 I》，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377、378 页。

⁷ 华林山：“文革期间群众性对立派系成因”，载于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193 页。

⁸ 《奉献》，第 34 页。

⁹ 《奉献》，第 51 页。

¹⁰ 《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 I》，第 278 页。

¹¹ 《奉献》，第 40、41 页。

¹² 见徐海亮：“社会视野下的初期武汉文革”，载于宋永毅主编：《文革五十周年——毛泽东遗产和当代中国》（下），香港：明镜出版社，2016 年，第 262 页。

¹³ 《奉献》，第 34--35 页。

拨经费给司令部购置旗帜、袖章、印刷材料，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大会召开时，省委派员参加。”“湖北省委派省委秘书长张华、省委书记处书记许道琦两人出席。在主席台上，张华代表湖北省委把印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特大号旗帜交到我手中。许道琦代表省委在会上讲话，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成立表示支持和祝贺。”¹⁴

人们一般以为，而且文化大革命中的一般规律也确实是当权派支持保守派压制造反派，如果不细读上下文，我们很可能以为这里描述的是一个保守派组织的成立。而事实上，这里说的是造反派，就在省委干部出席并致贺词的成立大会上，造反派头头杨道远在讲话中就大声疾呼号召造反：“我们已经组织起来了，我们要战斗！要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我们最坚决地站在毛主席这一边，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准备坐牢，准备掉脑袋！”¹⁵ 事实上，当权派确实是大力支持保守派，千方百计压制造反派，对此，《奉献》一书有细致、深入的说明，那怎么理解上面描述的情况呢？

我想说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卷入其中的所有各种力量，不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不论是群众还是官员，他们都是在一种现存的政治格局中，在遵守一系列既定规则（即中共党的家法）的前提下行动的，他们的自主性远远不像后来人们想象的那么强。所以，杨道远在书中说：“总之，我们当时提出任何要求，只要有说得过去的理由，一般还总能得到省政府领导的同意和批准的。”甚至连办报纸这种政治上控制得很紧的事情，省委也同意得很爽快，在经费、印刷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¹⁶

湖北省的当权派何尝不知道，他们支持和祝贺造反派组织的成立，无异于养虎成患，不知道有多少想造反又不敢造反或心存犹豫的人，因为省委的

态度而投入造反派大军，这对于他们是现实的威胁。但他们有什么办法呢？毛主席的指示，党中央的决定就摆在那里，他们最多搞点阳奉阴违，大面上该怎么做还得怎么做。对于造反派情况也如此，造反首先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而非个人的决断与选择，就像鲁迅描写的阿Q所处的时代是“咸与维新”的时代一样，毛泽东时代的1966年是“咸与造反”的时代，阿Q与赵太爷是对立的，但他们都知道现在“革命了”“造反了”，他们都要赶同一个浪潮。

三、造反派为何要造反？

杨道远叙述自己起来造反的故事，和我们听过的其他故事几乎一模一样。

长期的阶级斗争教育使杨道远和其他青年一样，相信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政权是中国人民幸福的根本所系，还相信，有阶级敌人妄图动摇和推翻这个政权，将中国拖回到暗无天日的苦难之中。1966年5月，杨道远和他的同学正在外地实习，他们完全无心于业务，坚决要求停止实习，集中搞文化革命。在文革动员和忆苦思甜会上，杨道远回忆了自己幼年的贫苦生活，并说：“可是，吴晗、邓拓、廖沫沙攻击社会主义新中国，想开历史倒车，还要我们回到旧社会，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我们要保卫社会主义江山世世代代永不变质，永不褪色！”¹⁷ 这种教育和政治灌输效力之大、影响之深远，一般人是很难估量的。如果说，当时杨道远不清楚吴晗、邓拓、廖沫沙是否有罪错，是否是政治运动的牺牲品，这可以理解和谅解，那么令人深思的是，读完全书我们看不到他在文革之后有反思和新的认识，他没有说，经历了文革之后，他是否还认为自己当初仇视和声讨的那些人真的是大坏蛋。一方面，他对于自己和其他数以百万计的人蒙冤受屈有痛切

¹⁴ 《奉献》，第52、53页。

¹⁵ 《奉献》，第53页。

¹⁶ 《奉献》，第58页。

¹⁷ 《奉献》，第20页。

的感受，另一方面，他对自己当初接受的教育和宣传（在这种教育宣传之下青年学生干出了种种蠢事和坏事）没有表示出反思和批判之意，可见这种宣传和教育影响之深远。

如果说，阶级斗争的教义是当时青年学生思想和行为中永不消退的底色，那么他们造反的直接原因是在“运动重点是打击什么人”这个问题上与党组织发生了冲突。从1964年冬季起至1965年，杨道远这批人参加了四清运动，他们对于运动的指导思想“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烂熟于心，当党委部署运动要揭发批判的对象包括炊事员、作业员等一般群众时，杨道远不干了，他贴出大字报批评党委，“我一直把矛头对着领导层，因为我记得很清楚，《二十三条》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到当权派中去找，难道能到炊事员、作业员中去找吗？”杨的态度引起党组织的围剿，“抓反革命的大字报铺天盖地。点我们实习队的名，说我们实习队里有反革命，说我们攻击党委，要搞垮党委……”¹⁸

杨道远头上压着“反革命”帽子从实习地回到学校，系党委马上找他谈话，要他把矛头对准他所在的学生党支部，揭发批判其他几个支部委员的问题。他知道，这些人“有很好的个人经历，有实际经验，有组织活动能力，在学校里都比较活跃，对于系领导、政治辅导员的话不那么迷信，工作中表现出很强的独立性，领导就觉得他们不听话，运动来了就想整整他们，发动群众揭发他们，称三个支委是‘三家村’。”¹⁹ 他去找工作组反映自己的看法，直言靠整群众不可能搞好文化革命运动，但招来的却是孤立、排斥和打击。

杨道远终于带头成立了造反派红卫兵队伍，他把自己走上造反之路称为“逼上梁山”，这表现了一种无奈，但说的倒很准确。没有什么人一开始就存心要与党组织对立和决裂，多数人一直生长在体制内，是组织容不下他们那一点点独立思考而把他

们推了出去——其实说独立思考真是过甚其辞，他们只不过不像别人那样俯首帖耳，习惯听命于顶头上司而已。文革区别于以往运动之处在于，决定人们思想和行动的信息源不是一个而是两个，这次，杨道远选择的信息源不是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那一个——本单位的党组织，他接受的信息来源于远方的北京，来源于党中央和毛主席，他认为这是更权威的信息源。

当然，政治运动中不把矛头对准群众，没有动辄就拿弱势群体开刀的习惯，是一种难得的优点，也是造反派突出的特点。当周伦佐在《“文革”造反派真相》中大谈“造反运动的直接正义性”时，他的断言是有经验事实根据的。文革之后，关于走资派、造反派、保守派的价值判断有很大的改变，甚至颠倒，但那些在运动中整人的人，特别是整一般群众的人，揭发批判和告密的人，还是不能把当年“听党组织的话、保卫党”干的事情拿到台面上来说。另外一种值得注意和议论的现象是，尽管“造反派”一词在官方的语汇中已经带极度的贬义，但多数前造反派对于自己在文革中的身份并不刻意回避，而造反派首领撰写回忆录的更是数不胜数。在电视和其他视频节目中亮相的也是前造反派，虽然有挨整的经历，但谈起往事却毫无羞愧，相反，要在采访节目或其他视频作品中发现前保守派或血统论红卫兵的身影却是难上加难，偶有一两例，人们看到的居然只是他们的背影！为什么这一类人不敢面对镜头从而面对自己的同胞，面对世界，而那些被贬抑甚至被判刑的人却能够坦然地甚至自豪地讲述自己的过去，这是令人深思的。

四、造反派在文革中干了些什么？

我们以杨道远、他的战友和他的组织为例，来看看造反派在文革中干了些什么。

造反组织成立初期，主要干的事情是抵制当地党委的镇压，与他们的压制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

¹⁸ 《奉献》，第22页。

¹⁹ 《奉献》，第23页。

路线”进行斗争。这包括参与南下学生在省委的静坐绝食，反抗本院文革委员会的歧视和压制，维护自己得到《毛泽东选集》的权利，与保守派红卫兵组织“大专兵”辩论，澄清对方的污蔑和攻击（“怀疑共产党”“要推翻共产党”），阻止院文革转移整群众的黑材料，等等。

湖北的造反派还发动了封闭《湖北日报》，把原湖北省第一号当权派王任重从广州揪回武汉的斗争，这些行为放在文革之前纯属大逆不道，是“反革命行为”，但在文革中，由于得到中央的支持，被认为是革命行动，并且取得了胜利。造反派在这些斗争中有恃无恐，是因为他们攻击的对象执行了“与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1967年年初，武汉各造反派组织还联合成立“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防止生产瘫痪，保证运动顺利进行。

1967年1月，在毛泽东的部署和中央的号令下，文革进入了“联合、夺权”阶段，这时武汉的造反派发生分裂，一部分组织在1月26日宣布夺了武汉市委的权，那些被排斥在外的组织发表声明宣布夺权无效。2月8日，杨道远所在的“二司”等12个组织在《长江日报》发表声明，批评夺权为“形左实右的假夺权”，造成造反派的公开分裂和对立。2月中旬，武汉军区正式表态，宣布“二八声明”为毒草，对这一派群众组织压制和镇压。从3月中旬起，军队对这部分造反派进行大抓捕。直到4月初《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造反派重整旗鼓，“反击逆流”。

1967年5月中旬，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成立，从此，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冲突不断、武斗不断。直至震惊全国的“七二〇事件”爆发之后，武汉军区的做法被彻底否定，造反派得到平反、恢复和发展。

1967年夏季之后，形势对于造反派来说一派大好，“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节节胜利。年底，武汉地区红卫兵代表大会成立，杨道远当选为主席；1968年2月，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杨道远是常委和

副主任。但是，好景不长，杨道远没当几天的官，日子就越来越难过。1968年夏，毛泽东宣布“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与此同时全国展开“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一度风光的造反派开始受到清算。1969年10月，参加没有人身自由、只能作检讨的学习班；年底，参加北京学习班，被迫检查交待；1970年8月，大学生分配工作，去到江西。1971年，被人带回武汉，隔离审查，然后在全省游斗，被关押至1983年。

追踪杨道远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活动轨迹，可以总结出造反派文革活动的一般情况：运动初期（大致到1966年8月）和运动后期（大致从1968年秋季开始）挨整，真正算得上从事造反活动的时间基本上是两年。在这两年中，他们干的事大体是这么几项：第一，反抗和批判各级党委（学校党委、市委、省委以及工作组）的压制；第二，与保守派斗争；第三，与造反派中其他组织斗争；第四，受到军队的压制并在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抗争。这种种斗争，其动力和指导思想，都是“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的斗争取得胜利，完全是因为毛泽东的党中央的表态支持。

杨小凯（即文革中著名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的作者杨曦光）认为造反派反对的是中国共产党：“文革中积极造反的人都是市民中对共产党不满的人”“共产党官僚十七年来干的所有事都受到市民的清算。”²⁰ 从杨道远的造反活动轨迹看，我们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诚然，文革中造反派冲击了大大小小的共产党官僚，但他们并没有想要去改变现存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相反，他们冲击党官僚，理由就是毛泽东不满意这些人，他们做的事情不利于维护和巩固这个制度。

文化革命中也有极少数先知先觉者对现存制度发出质疑和批评，比如广东写出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李一哲，但他们的思想远远超出了造反派的范围，他们被官方打成反革命，而造反派则急于附和、追随官方，声讨那些“反革命”。这样的人往往也有一个造反派的身份，这使得所有

²⁰ 杨小凯：“六四省悟：为文革造反派翻案”，《中国之春》，1990年8月号，第43页。

的造反派组织以加倍的热情批判他们，唯恐与他们划不清界线。杨道远在本书中就提到一个武汉的大学生鲁礼安，用杨的话说觉得他有很多话很出格，杨一直注意叫自己人与他保持距离，不要有任何组织关系。²¹ 唯一值得指出的是，他们的观点易于在一些造反派中间，而不是在保守派那里引起共鸣和传播。

五、造反派对文革的认识和评价

从《奉献》一书可以看出，杨道远对于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至今都是拥护和怀念的，他的最大遗憾是文革没有成功。对于文革，他完全重复当年的一套，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第三个里程碑”，曾经投身于中共革命的党政官员“从民主派变成走资派”等等。近半个世纪中国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社会思想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对杨道远没有产生影响，或者说更正确：一切巨大变化都没有促使他重新思考，一切变化只是证明了文化大革命正确，证明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英明预见。

杨道远代表了一个极端，也有人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蒯大富是文革中大学生造反派的另一种代表，他对毛发动文革有肯定和赞扬，也有批评，有感情上的留恋，也有理性分析。他认为毛泽东反对腐败和特权，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非常英明的，但他建立清正廉明社会制度的理想却有赖于他个人的集权领导，这是一个悖论；他主张造反有理，似乎是以真理为标准，但他不允许对他本人造反，这是矛盾的；他支持群众起来攻击领导，但没有严格的法治，势必出现暴民政治。²²

四川的造反派学生头领蔡文斌其文革经历和地位与杨道远相当（也曾任省革委会副主任），他可能是与杨对立的另一个极端，他全面否定文革，

否定毛泽东，毫不留恋文革的“大民主”之类的东西，肯定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把争取宪政民主作为自己余生的奋斗目标。

应该指出，对于造反派中的多数而言，发生了一个从狂热地拥护毛泽东、拥护文革，经过怀疑、反思到程度不同地反感和反对毛泽东和文革的转变，而且这个转变不是发生在文革结束官方否定文革之后，而是发生在文革之中，最初的怀疑（以种种“想不通”的形式出现）可以追溯到早至1966年，高潮是1972年的林彪事件发生之后，而形成强大的潮流并在社会上得到明确表达，是在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中。

这时，各阶层的不同利益要求已经不约而同地交合在一起，共同形成了与毛及其极端派渐渐远离、而与刘、周、邓政治倾向日益亲近的大趋向。人们实现自身利益的现实取向会随着具体处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造反派中的大多数人眼见1969年革委会建立后的社会状况甚至不如自己所反对的文革前，早已对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失去信任，转而倾向于邓小平恢复秩序和发展生产的路线。这和法国大革命后期广大民众因对动乱和杀戮产生厌恶而不惜欢迎拿破仑以武力和帝制恢复秩序的心理几乎一样。毛自然想不到，自己再次寄以厚望的造反派，绝大多数已经成为首都和全国各地“悼周拥邓批毛”浩浩人潮中的排头浪，正高呼着“打倒封建法西斯专制”的口号，将矛头转向自己。

看不到人心转变大势的，不只是毛泽东为首的极端派，还有原造反派中的少数人。²³

杨道远属于少数没有看到人心转变大势的人，对他而言也许情有可原。从上世纪60年代末起，他一直生活在受审查、受批斗，被隔离、被关押的状态，感受到的只是武汉党政军官员的报复打击。在商品大潮中他一度尝试下海但遭到失败，不像蒯大富、蔡文斌和其他一些前造反派头目，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利用自己的能力和人脉关系，或者发了

²¹ 《奉献》，第292-293页。

²² 蒯大富：“潮起潮落”，载于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 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之一》，香港：中国书局有限公司，2011年，386—387页。

²³ 《“文革”造反派真相》，第219页。

财，或者至少能维持体面的物质生活，在政治上的整治不能逃脱时毕竟还从市场经济那里找到了一条生路。

杨道远和其他原造反派积极分子坚持自己的文革信念，还有更为深刻、复杂的原因。

上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是否定文革的高峰期，那时，否定和批判文革是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正确”思潮，为文革说话的人销声匿迹。遇罗克的遭遇、张志新的惨剧都见诸官方报刊，对文革的揭露和声讨、大量平反冤假错案、为右派改正、地主富农摘帽、恢复高考招生等等一系列措施，让人感到中国正进入一个万象更新的时期。前造反派中爱读书、好思考的人对于民主、自由、法治、权力制衡、竞选等等理念从以前的批判转为欣赏和争取，正如西方文革研究者约瑟夫所指出的：“政治变革的一些最紧急和有说服力的要求出自以前的红卫兵，特别是出自那些有幸完成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现在在运动的前线为中国民主事业作先锋，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²⁴

但是，从 90 年代开始，随着贪腐的严重和不公正的加剧，信心和希望被抱怨和谴责取代，对于前造反派和“革命群众”，文革中节日般的扬眉吐气与被下岗的黯淡现实相对照，对文革怀念和呼唤的情绪慢慢地滋长。才十几年不到，文化大革命一词的含义已经从负面转变为正面。

毛泽东的文革理论虽然被林彪和几个笔杆子吹捧上了天，但实际上支离破碎，不能自圆其说。比如对于文革的对象这个重大问题，毛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走资产主义道路当权派。”人们通过正确的政治原则进行逻辑代换得到的说法是：要在没有私有制的中国发现资产阶级太困难，原来他们潜伏在无

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里面。这哪里是文革理论，完全是一派昏热的胡话。但是从 90 年代起，由于市场经济的发育，文革中原来荒谬的等式“当权派=走资派”不再显得荒谬，对于一些不满现实而又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毛的胡言乱语根本就是先见之明！杨道远死抱着文革理念不放，因为他对照目前中国的现实，认定自己守奉的是传世真经。

杨道远的情况不是个别的，对于前造反派、造反派骨干和造反派首领，杨道远很有代表性。他们经历了一场巨大的悲剧，他们的个人命运、个人生活也因为积极投入文革而非常不幸。但是，不论是对于国家和社会，还是对于个人，他们都没有认识到悲剧的根源。包括杨道远在内的湖北造反派，大致是从 1969 年年中开始倒霉的，这时距毛泽东逝世还有 7 年多，他们只敢把反攻倒算和迫害的账算到湖北党政军官员头上，而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当地官员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是有中央文件和中央精神为依据吗？他们认为听任当地官员报复造反派是毛泽东不得已对复旧派官员的妥协，那么可以问：这难道不是发生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全面胜利”之后吗？当初“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白色恐怖”何其猖狂，毛主席不是能力挽狂澜，带领造反派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吗？他们逃避这个尖锐的问题：整造反派，到底有没有毛泽东的份？

当然，承认被利用和被抛弃，是困难的。否定文革，否定毛，也就是否定自己，否定自己在文革中达到的人生高峰体验。

只有找到悲剧之源，才能防止悲剧再次发生。敢不敢否定毛，这是能否找到悲剧根源的关键，对国家和个人都是如此。❷

²⁴ William, Joseph A. 1987. “Forward.” in Gao Yuan’s *Born Red: A Chronicl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xxix.

【往事】

“猴子被吓住，鸡却没有死”

——我的母亲刘衡

刘新华

一

1957年我在呼和浩特麻花板幼儿园中班，它属于全托寄宿制。我不习惯这种吃喝拉撒睡都按部就班的集体生活，每周去幼儿园之前总要设法逃避，从假装肚子疼到藏到箱子里，用尽了一个学龄前儿童能够想到的各种小伎俩。这就是我最大的烦恼，对那个波诡云谲的夏天给全家带来的灾难懵然无知。后来渐渐感觉到家里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大人常来家里和爸爸妈妈关起门谈话。有时候我还听到爸爸和妈妈大声争论着什么，悄悄看去，爸爸不断地做出各种手势，很凶的样子，妈妈在一旁默默地流着眼泪。我十分害怕，爸爸妈妈总是教育我们兄妹之间要团结友爱，为什么自己还要吵架？

不久后全家从内蒙古回到北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知道了妈妈是右派，还知道右派是坏人，是反动分子。广播里没完没了地放《社会主义好》，里边一句：“反动派想反也反不了”总让我心惊肉跳。最后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几年前在一个公共场合，当时所有的人都笑了，我却没有觉得可笑，我忘不了它曾给我带来的屈辱。

二

妈妈在唐山劳动改造了三年后回到报社，别人都摘了右派帽子，唯独她加重处分。当时人民日报社在王府井大街，妈妈就在这个北京最繁华的地方喂猪，每月发26元生活费。

1961年爸爸调到云南工作，随后全家也去了，只有妈妈和我留在北京。在这样的逆境中，妈妈尽

管痛苦不堪，但为了不影响孩子，在我面前仍然表现出很乐观的样子。她坚决否认自己是右派，逢人就讲述自己的看法。我的学习成绩不错，一直担任班干部，老师们也很喜欢我，尤其是班主任甘老师，经常请我到她家共同商量班里的事情。在一次家访中甘老师知道了妈妈的情况，从此对我态度大变，处处刁难指责，在期末的操行评语中竟然说我“错误比较严重”。一个四年级的小学生，又有多大的能力犯严重错误呢？错误就是我是右派妈妈生的。

我当时还小，并不能完全理解妈妈，对妈妈的感情很矛盾，有时会产生抱怨，认为她给我们这个家庭带来了灾难。我没有抗打击能力，便于1963年去了云南，半年后又随爸爸去了内蒙，妈妈一个人孤零零地困在北京，进行坚壁清野式的抗争。

三

“阳谋”设计者曾像受了很大委屈一样喊“这是为什么？”我心里也一直有同样的疑问，但是右派已经成为家里禁忌的话题。有一天我看到爸爸心情不错，便小心翼翼地问妈妈为什么当了右派，爸爸看着我慢慢地回答说，因为她反对共产党反对毛主席，可是妈妈为什么要反对共产党和毛主席呢？爸爸沉默了许久，挤出的答案是因为她是右派。

我被这种循环论证绕得似懂非懂。爸爸也知道我并没有被真正说服，一个周末，他从资料室搬来1957年全年的《人民日报》，要我认真看。

我看到了许多著名的右派言论，却没有看出这些言论究竟恶毒在哪里。“党天下”是不好的词吗？

为什么很多人都理直气壮地说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他们实际上是在骂共产党吗？政治设计院似乎就是大家共同研究国家大事，有什么不对呢？我当时只是一个五、六年级的小学生，这些东西不在我的理解范围，令人困惑。

还有那个葛佩琦，一提起他，除了“我们工人阶级决不容许！”就是“贫下中农的肺都气炸了！”这个问题我也不明白，他说党如果做不好，群众就可以杀共产党。人们当然可以批评他太悲观了，对党失去信心，也可以说如果党有错误应该帮助党，不要杀头，甚至可以表示如果真有那天，我们自杀，无须别人动手，这些都可以回应葛佩琦，但是怎么能硬说人家要杀共产党呢？这不是语文老师教过的假设句吗？

许多年后知道，类似的话大人物也说过，毛主席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大家就造反。邓小平在联合国昭告全世界，如果中国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世界人民就应当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按照这种逻辑，不就成了毛主席和邓小平号召造党中央的反和打倒中国吗？这些话虽算不上杀气腾腾，咬牙切齿的级别还是够的。毛主席说的话大家当然不敢批评，但批邓时邓小平被骂的狗血淋头，连蛮不讲理的四人帮都没有拿这句话做文章，可见这种断章取义的批评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当时我对这些问题没有清晰的答案，只是难以理解甚至感觉有些不对头，更多的却是深深的恐惧：为什么我会同情这些敌人？为什么我觉得他们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我将来也会成为他们那样的阶级敌人吗？

四

和妈妈分开后，爸爸不希望我们几个孩子和妈妈有任何联系。文革中爸爸也被打倒，已经无力反对我们和另一个阶级敌人来往。1968年，年轻学生造反胡闹一番后，像用过的抹布一样被丢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哥哥去插队，一年后我去了建设兵团，都离开了家，爸爸更是鞭长莫及。尤其是林彪事件发生后，大家对过去的那一套开始反思，政治环境有所松动，我几乎每年都回北京看望妈妈。

我已经是成年人了，文革促使我真正思考，过去不清楚的问题可以直接问妈妈了。妈妈向我详细讲述了她当右派的经历。说老实话，妈妈这个右派当得有些惭愧，她并没有提出什么思想体系，没有什么“政治设计院”的宏论，也没有对“党天下”有什么批评，她只是对一些具体做法提了一些自己的看法，结果被上纲为攻击肃反，包庇右派父亲和为胡风鸣不平三条罪状。

妈妈说，她没有攻击肃反运动，而是肯定了肃反的成绩，只是认为肃反运动中搞斗争会这种形式不好，伤害了许多自己的同志。她自己在延安抢救运动中就有过教训，不希望重演以前的闹剧。所谓包庇她父亲的真相是她写信要她父亲实事求是地向党讲明情况，连中央组织部也认为包庇她父亲的罪名是不能成立的。三条罪状中最严重的就是为胡风鸣不平，而且被称为矛头指向毛主席。她不明白毛主席说谁是特务谁就是，却傻乎乎地说没发现胡风与国民党有组织上的联系，问中央是否掌握了其它材料。她的这些看法并不是在大鸣大放时期说的，也没有写大字报，而是在向上级党组织汇报思想时谈的，却被一口咬定为配合右派在党内进攻。

五

妈妈说过去国民党指责共产党故意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我们不承认，实际上我们就是这样做的。硬是无中生有地制造出一批又一批的敌人，他们有什么错？无非就是我们需要阶级敌人，狼对羊说你的错误就是我的肚子饿。反右时那些积极分子处在阿Q与王胡比赛捉虱子的亢奋中，捉得越多越上瘾。当时爸爸的一只脚也踏进了右派的行列，反右领导小组的一个人说了一句，“算了，不要把人家两口子都搞成右派”，于是侥幸逃脱。划右派就像饭馆里点菜一样随意。

按说妈妈根本算不上主菜，只是一小碟配菜或甜点，但是她始终不肯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在报社，刘衡成为顽固不化的同义词。为了惩罚这个不低头罪，妈妈不断地受到越来越严酷的迫害。对一些人们眼里理所当然的东西，妈妈经常质疑。要她在劳动改造中认罪，她说：“劳动和认罪有什么

关系？为什么劳动可以认罪？”组织上允诺只要她承认自己是右派，就可以摘掉右派帽子，她问：“一个人如果承认自己是小偷，就可以不算小偷，这是什么逻辑？”当时把改造后的右派按表现从好到坏分为口服心服、口服心不服、心口都不服三类，妈妈问：“口服心不服的人明明是说假话，为什么比说真话的心口都不服改造得好？”

六

妈妈心里怎么想的，总是老老实实地说出来，她最不能理解的是这样做反而被指责为不老实，她不停地反问“我哪里不老实？请你们指出来。”

妈妈总是在不停地讲道理，在那些人眼里，她越讲道理，便越是顽固，越是气焰嚣张。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妈妈永远长不了那个一智，只好一堑接一堑不停地吃。从资料室赶到印刷厂，最后进了牛棚，工资也一降再降。后来妈妈给胡耀邦写信，说二十年来我的问题就是那三条，一直没有新的问题，每来一次运动就处罚我一次，没完没了地层层加码，什么时候能有个头？很多人奇怪妈妈这样一个参加革命多年的人为什么不了解党内斗争，把自己搞得这样惨，他们都知道秀才遇到丘八是无法讲理的，因此没必要吃眼前亏。

其实妈妈尽管入党几十年，并没有弄明白她认定的理和人家遵循的理根本不是一个东西，一个是天灵盖，一个是狼牙棒。同样，语言体系也是不同的，妈妈决心要当老实人，不能讲假话，在上级领导的眼里，这是不识时务。在他们的字典里，老实就是听话，就是百依百顺，上级说煤球是白的，你就要颠倒黑白，说地球是方的，你也不能妄议，跟着指鹿为马，才是老实。妈妈总以为不能欺骗组织，其实组织上有时是欢迎欺骗的，他们要的只是服服帖帖，至于真假倒是无所谓的。

七

那个年代领导带头，上行下效，许多人以凌辱知识分子为乐趣。妈妈不仅在精神上受到各种侮辱，肉体上也备受摧残。尤其是在文革期间，各种花样不断，从批刘少奇到批王关戚，从批孔老二到

批宋江，一有风吹草动，妈妈就被拉出来批斗。每次游街都排在第一位，拳打脚踢更是家常便饭，甚至搞出假活埋闹剧。这些情况她从未向我提起，我是看了妈妈的回忆录和其他人的文章才知道的。妈妈被当做杀鸡吓猴中的那只鸡，她从不屈服，还写诗“……猴子被吓住，鸡却没有死。”

文革中时兴“揪叛徒”，造反派找妈妈外调，要她证明某位地下党同学是叛徒。妈妈向造反派解释党的“隐蔽精干”方针，说明当时允许入狱的革命者写自首出狱是国共合作时期党的一项集体决定，不属于背叛组织，并说所谓61人叛徒集团也是不能成立的，并建议来外调的造反派好好读一读列宁的《论左派幼稚病》，结果被打得手指骨折。

有一次我问妈妈：“既然当时共产党员可以写假自首，你为什么不能写假检查？”妈妈生气地回答：“我们可以欺骗敌人，但是怎么能欺骗组织呢？”我说：“欺骗组织有什么大惊小怪，邓小平保证永不翻案还欺骗毛主席呢。保存自己是第一位的，留得青山在，将来拉清单。你只知道传统的道德伦理，不知道革命者还有责任伦理。”妈妈说大人物可以先保存自己，然后反攻倒算，自己是小人物，没有秋后算账的能力，只能当烈士，即使可以回到过去重来一遍，也没有其它选择。

妈妈是死不悔改的顽固右派，这给她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她自我解嘲说，顽固也有好处，报社的许多右派摘帽子后被发配到内蒙、新疆等地，她因为没有摘帽子，没有单位肯接受，只能留在人民日报社，反而得以留在北京。

妈妈像一根湿木头，你想烧一下，只能带来滚滚浓烟，熏得玩火者狼狈不堪。右派改正后的几十年里，形形色色的不叫运动的运动接连不断，无论形势如何险恶，妈妈仍是大声仗义执言，那些整人者知道这根骨头啃不动，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八

妈妈当右派时受到各种虐待，却从不单纯为自己喊冤叫屈，许多人劝妈妈只谈自己的冤屈，不要涉及整个反右运动，否则就是否定了反右，麻烦就大了。妈妈回答：“我谈的就是整个反右的问题，只

有纠正了反右的错误，我的问题才能够解决。”

妈妈对反右也有一个认识过程，她起初并没有否定反右，只是认为一些人被错划，因此应该有一个甄别的程序来纠正。文革中我曾对妈妈说，反右恐怕不是个别人搞错了，而是根本上就错了。妈妈当时很吃惊：“你是说反右完全是个错误？”后来妈妈接受了这个观点，晚年对这个问题更是有了很深的反思。

我和妈妈在一些问题上也有过不同的看法。最令妈妈寒心的是弱者之间的互相欺凌，它比强者对弱者的欺凌更可怕。在劳改时和在牛棚中，妈妈是贱民中的贱民，有些人为了在妈妈身上挣表现，做出了种种丑陋行为，使妈妈产生了豆在釜中泣的悲愤。妈妈在回忆录中记载了这种灵魂的阴暗，她坚持采用真实姓名，认为这些人做了坏事，应该被历史记录下来。我则认为主要应该揭示那个逼迫人们丧尽天良的政治环境，这些具体的人不过是一些符号，究竟是张三还是李四并不重要。当时我们在争论中互不相让，没想到不久后妈妈离开了我们，这次争论成为我心中挥之不去的痛楚。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觉得还是妈妈的道理更多一些，对那些邪恶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做什么，只能把他们的所作所为记录下来，留给历史审判。

九

1978年，妈妈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我们都很高兴，认为党终于能够正视自己的错误，前途光明，国家还是大有希望的。现在看来，我们还是太幼稚太乐观了，没想到姗姗来迟的公平和正义只是来这里拐个弯，随即掉头而去。

实际上右派得以改正有很大的偶然性，主要源于胡耀邦的一个自选动作。当时两个凡是受到质疑，四项原则尚未提出，英明领袖作风比较民主，能够听取不同意见，曾经在反右中立下赫赫战功的那位第一线总指挥还没有成为第二代核心，走资派都在纷纷要求平反，自顾不暇。思想领域、组织领域和社会思潮各方面出现了新气象，胡耀邦、杨士杰等人抓住了这个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力排众议，使右派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大潮中搭了顺风车。

胡耀邦的胆识令人极为钦佩，当时为了排除重重阻力，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大家对此都很理解。可是事实证明这个改正是很不彻底的，很快又出现了什么“娘打儿子”之类的言论，妈妈对此极为反感，连呼无耻。最令她无法接受的论调是“反右是必要的，只是出现了扩大化”。为了这个歪理，还特意保留了几位右派不予改正，即便如此，也不得不承认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右派都搞错了。妈妈生气地说：“如果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们说杀人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杀多了，理由是几十万人中总会有几个有问题的人，我们能接受这样的逻辑吗？”

当初整人时歇斯底里，后来改正时却哼哼唧唧，然后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了沙子里。人们没有得到一个像样的交待，反而收到了封口的胶带，许多问题成为言论禁区。妈妈总是叨叨说如果不能接受教训，不肯承认错误，我们这么多年的罪就白受了，这些苦难真的就是毫无意义。恶恐人知，必是大恶，拼命掩盖大恶，说明恶势力还在，还会卷土重来。

十

妈妈离开我们已经8年了，至今仍有报社的同事们写文章怀念她。她的一生，能够说的，她大声疾呼毫无保留，能够做的，她不计安危竭尽全力。生前尽到了责任，死后捐献了遗体，对这个国家问心无愧，对这个党仁至义尽。

在历次运动中，反右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却是一个转折点。随着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遭到灭顶之灾，理性湮灭走向疯狂。随之而来的是大饥荒、大动乱，农民、干部、学生、工人依次被按在祭坛上，无一幸免。

翻开历史，鲜有什么值得一提的经验，全是惨痛的教训。正如黑格尔说：“我们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我们从没有从历史中得到过教训。”前人不暇自哀，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就是这样在哀之复哀之的死循环中从血腥走向堕落。¶

【往事】

独酌翁杂忆

——情爱篇

梁沪生

一、没有结婚证也要结婚

凉某和小银是在文革开始后的第三年即 1968 年相识的。

那正是两派还在武斗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的那个时间段，工厂停产工人不用上班，在这座近万职工而青年男女就占了 85% 以上的国营企业里，所谓的群众运动已由一年前的轰轰烈烈而转为势微，当大多数二十郎当岁的少男少女已对当革命闯将不再感兴趣时，自然便把精力转移到男欢女爱上面来。

凉某和小银就是这样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相见、相识、相恋的。两人都是普通青工，不在同一车间。那时候不开工却每月工资照发（虽微薄却足以对付伙食费用），有充足的时间天天厮守，足以使这场恋爱平静和谐良好地发展了四年。一切似乎水到渠成就待谈婚论嫁。

一个事件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的平衡。为了恢复平衡，故事里的人物便采取行动，最终导致一个结局……这是世界上所有戏剧性故事几可概括的模式。这是很多年以后直到今天，凉某在给学生上剧作课时的必讲观点。

凉某的爱情故事当年出现的第一个激励事件是小银父亲的出现以及他对这场恋爱的反对立场（之所以在这里不用粗暴干涉横加阻挠这样的词语，是因为现在已对老泰山当年的立场充分理解以及对逝者的尊重）。老泰山当时成都某个电力设计院的保卫科长，一听说女儿谈恋爱后的第一反应就

是调查男方的家庭背景。这工作对保卫科长来说轻车熟路完全属于他的专业范畴。于是展开外调行动。

凉某的父亲在一座当时使用代号和信箱号的军工企业当工程师（无党无派的纯技术人员），以任职部门和职业而言，基本上可以说门当户对。不幸的是外调的时候，他正被以英国特务嫌疑的身份关在牛棚里。为了让今天的小朋友们不致看得云里雾里，不得不赘言几句。凉父的历史背景乃两航起义人员，而当时有大人物发话，这里面坏人很多，不乏美蒋特务。其时正是文革伟大战略部署的清理阶级队伍阶段。于是凉父便成清理对象被关进了“牛棚”（群众专政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

门当户对？瞎扯！明明就是对立的两个阶级嘛！女儿嫁给敌对阶级，这还了得！于是保卫科长便给身陷“牛棚”的“英国特嫌”写了一封亲笔信表示了断然决然的回绝，信中有这样的辞句：“你是香港来的海外来客，我们是中国的穷工人，我们是铁路上的两股叉，走的不是一条道！”熟悉当年样板戏的看官一看便知，此言乃是由中共地下党员李玉和对日本鬼子鸠山义正辞严驳斥转换而来。当凉某接过老爸递过的信看后，竟然笑了。

保卫科长采取的行动是双管齐下的。一方面拒敌于千里之外，另一方面对内严加看管将女儿关在家中不许出门，连班也不让她去上。然而……

小银还是趁机从家里跑了出来，跑回了工厂。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在工厂单身宿舍区的一个角落里，在昏黄的路灯的辉映下，两人进行

了一场历史性的决定终生的会谈。

“分不分手？关键在你，你自己决定。”

“不分，要分我就不跑出来了。”

“那好，我们这就结婚。”

“好，结婚。”

“我明天就去车间开证明办结婚证。”

“好，办结婚证！”

问题就这样解决了。然而……问题往往就出在自以为问题解决了的时候。

第二天凉某拿着结婚申请到车间办公室盖章的时候，车间某领导立刻打电话到小银所在车间去落实。不想对方车间领导告之，女方家长不同意，此刻正在车间办公室反映情况（我仍然善意地不用‘闹’这个字眼）。于是开证明的事居然就这样荒谬地搁浅了。

然而，还是然而……别忘了那还在文革期间，脾气再温顺的人还是未免沾染了一点造反精神的：不办结婚证又如何？不办结婚证老子照样结婚！

凉某这样想，凉某的朋友们也这样怂恿。

于是，在1972年的初春，在成都西马棚街37号的小院里，一伙热心朋友张罗，每人凑了人民币2元钱的份子，居然就热热闹闹吃吃喝喝喜气洋洋地过了一天，然后高调宣示：凉某和银女士喜结良缘！

此事在厂里有点小轰动。有人说这两人真胆大，没有执照就敢开张营业。其实惭愧，没执照还真不敢开张营业，两人是和衣躺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各自归巢回自己的单身宿舍。此举的意义就是造就一个既定事实而已。这就是当年的年轻人，肯定让今天的少男少女们见笑。

没多久，承蒙双方车间领导开恩盖章，办妥结婚证。又承蒙一位朋友帮忙借到一间没有窗户的陋室，才算名正言顺正式安了一个家。

故事终于走向了结局。尾声是几年后退休的保卫科长终于也承认了这桩合法婚姻。

这个家延续至今，45年过去，屡屡迁徙多经乔迁。租住过工厂周边的农舍，搬进过改变用途的单

身宿舍筒子楼……没有改变的是这个家的成员，而且添加了下一代，下下一代。

1972年那张文物般的结婚证依然有效。尽管盖章单位“四川省成都市东城区革命委员会”已成历史。

至此，熟悉的朋友已经知道：凉某人便是在下——独酌翁本人。

二、武斗之夜天赐良缘

1966年的最后一夜我彻夜未眠，我们工厂的许多人也彻夜失眠。人们是在一片喧闹声中迎来1967年元旦的。迎接新年的不是喜庆的烟花爆竹，而是人们群殴武斗的呐喊和响彻夜空的高音喇叭的喧嚣。

一场轰动成都乃至全国的被称为“12.31事件”的大武斗就爆发在我当年所在的四川第一棉纺织印染厂。厂里的两派群众组织的斗士们因观点不同，先是唇枪舌剑面红耳赤的辩论，发展到你来我往的推搡，继之便是相互的拳脚相加。最后升级成对一座大楼的攻守战。石块纷飞，木棒飞舞，云梯高架，最终以人多势众的攻方大获全胜，攻陷城池而告终。

以上只是本文故事的背景，给故事主人公的一个规定情境。

我其实想讲的是彭师兄的故事。彭师兄是与我同年（1965年）进厂的师兄弟，分在了不同的车间。其时，他虽也从众加入群众组织，却算不上是个铁杆分子。下午开始干仗时，他无动于衷，那阵子双方这样的小摩擦已经习以为常。晚饭时听说事情闹大，就从食堂打了饭边吃边往现场那边溜达。此时楼内楼外正在僵持叫骂，不时有石块飞上飞下。一块鹅卵石蹦到彭师兄脚下，他按捺不住，也冲楼上叫骂了几声。他是属于进攻方这一派的。

吼了几嗓子，刚吞了半斤大米饭的彭师兄觉得嗓子在冒烟，离开现场回到单身宿舍。从小在成都老巷子长大的彭师兄，承袭着老成都人不改的习性：喜好啖茶。先到开水房提了瓶开水，往自己那

偌大的印有“先进学工”字样的搪瓷茶缸（这是他进厂后得的平生第一个奖品）抓了两撮“三花”（三花者，三级花茶之简称也。那时候普通成都人皆好三花，觉得二花、一花乃至特花偏贵，四花、五花不经泡，而三花正好适中价廉物美。）泡上，点上一支烟，吹开还浮在面上茶叶，抿上一口，眯着细眼吞云吐雾，快活似神仙。

那时爱引用一句话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彭师兄要当快活神仙，可外面分贝越来越高声调越来越激昂的高音喇叭声不断传入他的耳膜，让他一腔热血涌动起来。

当今互联网厉害，有什么突发事件都会顷刻间传遍全世界。那时候的宣传利器是高音喇叭。装着高音喇叭的宣传车或现场助阵，或开进城满街去嚷嚷，声嘶力竭地传播着武斗的信息。从发生大武斗，到酿成血案，再到死伤多人……震耳欲聋的喇叭声不断提高着分贝，也不断提高着伤亡人数！把事实无限扩大，把人们的仇恨升级！耸人听闻的号外传遍全城。相比之下，现在的标题党是小巫见大巫。谣言散播，真假难辨，声援者几乎倾城而动。

彭师兄再也无意逍遥品茶，欣然起身重返现场。这正是城池被攻陷的那一刻。登云梯而上的勇士已将一楼大门打开，一阵欢呼呐喊，宣传车上高音喇叭也适时地响起了冲锋号，进攻者蜂拥而入。守敌被一一生擒，其中不乏顽抗不屈者，更多的是从没见过如此阵仗而吓得战战兢兢的人们。毕竟是些普通的工人（女工还占了很大的比例）。

年轻人谁无英雄情结？彭师兄也置身于冲进大楼的人流中，那一刻内心顿时涌起一种攻城拔寨的豪迈感。其实他也不知道冲进去后该干什么，被推拥着进了一个似已无人的房间，他四下打量一番正要离去，身后传来声响。一扇倒下的破柜门后出现一个黑黝黝的人影。看不清人却分明看见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闪烁着惊恐。

彭师兄顿时愣住，这是一双年轻姑娘的眼睛，似熟悉又陌生的眼光。那熟悉眼光似乎有过那么几次回眸一瞥，曾经使他怦然心动。是在厂区上班的人流中？食堂排队买饭的队列中？上台领取奖品

的会场上？

出于一种本能的冲动，彭师兄伸手抓住那姑娘的手腕，不由分说把她拉了出来，一把扯掉还戴在她胳膊上的对方组织的红袖章，毫不迟疑地拖着她，奋力挤出大门，避开喧闹的人潮，径自朝自己的寝室方向而去。而此刻，从大楼里被押出的俘虏们正被一个个扭着胳膊穿过一道人巷子，被组成人巷子的愤怒的人们拳打脚踢，无论是强悍的还是羸弱的，个个难逃此劫。他们之间，昨天也许还是亲密的师兄弟、互相关爱的师徒……

从离开到归来，估计没超过半个小时。关公斩华雄，凯旋归帐，其酒尚温。彭师兄回到寝室，那缸子三花茶也还未凉。他将搪瓷茶缸递给坐在床沿的姑娘：“喝口茶，还是温嘟嘟的。”这是两人之间的第一句话。惊魂甫定的姑娘接过彭师兄递到面前那缸茶喝了两口，一股暖流沁入肺腑，砰砰乱跳的心才平稳下来。

当天晚上……什么也没发生。姑娘困乏不已，和衣靠在彭师兄床上打盹。而彭师兄则端着尚酽的三花抽着烟，听着喧嚣声在门外蹲到天亮。天亮后他亲自将姑娘护送进城回家。至此，彭师兄才知道姑娘叫小芸。至此，文革弄潮儿们的行列里不再有彭师兄的踪影。

那年武斗不断升级，由冷兵器发展到热兵器。到了9月14日终于有了最新最高指示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而彭师兄早已身体力行，实行两派大联合了。武斗结束通知返厂上班时，他和小芸已经喜结连理，恩恩爱爱一起回厂里抓革命促生产来了。彭师兄是我们那批进厂的工人中恋爱结婚的先驱者。早生儿女早享福，之后什么工厂倒闭，员工下岗都没怎么影响到他的生活，家里自有早已成年且出息的儿女支撑。半个世纪过去，而今已年过七旬刚参加过孙子婚礼的彭师兄，正品着竹叶青（早不再啖三花了）幸福无比地期待着四世同堂。

彭师兄所在车间是纺织工艺的头道工序清花

车间，而小芸在最后一道工序整理车间。所谓君在长江头我在长江尾，平时相见不相识。而这武斗之夜却天赐良缘，迎来彭师兄幸福的1967年元旦。

那年头，就连在我们工厂里的普通工人职员，都以捍卫革命路线的名义，乃至夫妻反目、师徒结怨、兄弟成仇……这样的故事我耳闻目睹甚多，我却更愿意把彭师兄的故事放到前面来讲。

三、被截肢的“林道静”

我与吴磊只有一年的同窗之谊。到了初三，我就转学走了，此后没有联系。只是到1964年我高考落第后碰到另一位同学，才得知吴磊考上了成都工学院。

后来我进了工厂。在文革初期大学生喊着“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口号杀上社会时，我不顾厂里的戒令跑到街上看大字报看大辩论，在西南局大门外我看到了吴磊的身影。他正和几个同学在刷标语。在吃瓜群众的围攻质疑下全无惧色，舌战群儒，历数西南局省市委对抗中央指示反对伟大领袖的罪状，硬把一出辩论变成了个人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演说。人丛外我很是惊讶，记得这小子当年在班上沉默寡言，说话木讷，几年不见，竟然变得如此伶牙俐齿，如此善辩且充满激情。

我还注意到给他们打下手刷浆糊的几个中学生娃儿。其中有一个女娃娃，个子不高，白皙恬静，一对眼睛亮晶晶，忽闪忽闪的，显得很有灵气。刷标语时很是卖力，当吴磊辩论和演讲时，她亮闪闪的眼睛始终盯着充满激情的吴磊，目光中是满满的敬佩和仰慕。我眼前倏然闪过电影《青春之歌》里面的画面，向往革命的林道静（谢芳演的）就是用这样敬佩和仰慕的目光注视着演说中潇洒倜傥的卢兄（卢嘉川，康泰演的）。

这次邂逅我没有与吴磊相认。没想到不久又见到了他。

学生们开始到工厂串联。在成都工学院联络站的学生里，我又看见曾经同窗过的吴磊。他正重演着我在西南局门口那一幕。只不过这次围攻他的不是散漫的吃瓜群众，很显然是厂方组织的积极分

子。他们基本不讲什么道理，一口咬定造西南局省市委的反就是反党反毛主席。甚至动起手来要把进行“反革命宣传”的吴磊扭送去保卫科。

此时我和三两师兄弟正巧路过，见状欲替他解围。不等我们介入，已有一人闯入人丛，奋力搡开拽住吴磊的人，嘴里喊着“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想干什么？”这竟然是个中学生女娃娃。

我一眼就认出来，这就是那天在西南局大门外跟着大学生刷标语的“林道静”。

小“林道静”那气势顿时震住了那几个人。等他们回过神来，心知文斗不是对手还想动粗，周边越来越多的旁观者可不答应了。七嘴八舌地叫喊着不许镇压学生运动！镇压学生运动绝没有好下场！这可都是新社论里的最高指示，那些人自知要辩论不是对手，悻悻撤退。

“谢谢啦，谢谢师傅们！你？你是……”吴磊显得很兴奋，向支持他的工人们道谢，他突然认出了我来，喊出了我的名字。

至此我的单身宿舍竟成了他经常的留宿点。几个准备在大风浪中弄潮一番的师兄弟也常到这里找他串联。从刚开始被阻拦被质疑被围攻，到被大多数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所同情所接受，大学生们并没有花多少时间。在他们的宣传鼓动下，顺应着全国的大趋势，厂里的造反大旗呼啦啦地揭竿而起。

小“林道静”真名范静，始终是个忠诚的追随者不离吴磊左右。随着他一起协助工人造反组织工作，又随他一起离开奔赴新的战场。大家都直接把她叫做林道静，她坦然受之。叫她称吴磊为“卢兄”，她也会撒娇般追打着逗她的人，被反击时又乐呵呵地躲到吴磊身后寻求庇护。她显然很喜欢这样燃烧着激情和充满战斗友情的日子。

夺权、武斗、二月镇反、三月平反……“保皇派”垮了，造反派自己又打了起来，冷兵器变成了热兵器，都声称自己在捍卫信仰，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信仰的坚守者似乎不多了，大多成了逍遥派观

望派。我把能搜罗到的中外文学名著，塞了两大书包，躲到农村一个师兄的家里，过了几天世外桃源的日子，把那些不成系统的书籍囫囵吞枣饱读了一通。在一个回厂领工资的日子，又听说了吴磊和范静的事。

隔着一条马路的两所大学，分别由对立着的两派占据着。面对面的两个大门外，都设置了沙包掩体，双方都有持枪的武斗队员把守着，警惕着对方的偷袭。

那天半夜吴磊在自己学院门外值班。一个黑影沿着马路向大门走来。瘦小的身影临近大门，吴磊喊了一声：“谁？”对方尚未回答，一声枪响划破夜空，黑影“啊——”应声倒地。

“范静！”吴磊听出来了，不顾一切扑了上去。范静痛苦地倒在血泊中，一个装食品的罐子摔破在地，汤水和抄手洒了一地。范静的家就在附近，她是不顾父母的阻拦，给吴磊送夜宵来的。

范静被送到同一派掌权的医学院治疗，没有生命危险，但右臂不得不被截肢了。

那些日子枪声在城市的日夜此起彼伏，无辜挨冷枪的人多了去了，无从查找也无人查找枪手。想去看她，没能见到，听说是被父母带到乡下疗伤去了。而吴磊，进了学校军管会办的强制学习班。斯人既去，唯余叹息。

那年头大中学生普遍的命运结局是不幸的（当然不包括有权势背景的）。大学生毕业大多都被发到部队农村接受锻炼改造，中学生则上山下乡去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从强制学习班终于得以解脱出来的吴磊，被发到云南的一个军垦农场劳动锻炼。而范静则因为残疾，丧失了再次响应伟大领袖号召到农村去战天斗地的机会，在家陪伴同是退休中小学教师的父母。

几年后吴磊从云南回来了，分配到成都周边一县城的拖拉机厂当技术员。他是学机械的，还算专业对口。报到后立即赶回成都，颇费了点周折才找到范静。范静的父亲已经病故，只剩下她和母亲相依为命。吴磊见到范静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她求婚。然后，娶了她。

在他结婚一年后，我专门到小县城看望他。他家的陋室外有小院，我俩在月光下对酌。微醺下他滔滔不绝，讲这些年的经历和沧桑。他说，我倒没后悔过这些的年所作所为，那是我有过的信仰。可是我后悔，不该让这所谓的信仰，影响了她的……”

他朝屋门口望了一眼。没了右胳膊的范静就坐在门口听我们谈话。她看着他，淡淡一笑：“又喝多了吧？”

那眼光还是林道静望着卢兄时的那样吗？似是又非是。□

【往事】

追忆三线“五七”厂

马昌海

40年前“三线”企业多年的务工生涯，我未曾留下片言只语。读《记忆》第129期李南央《献给“三线”的青春》引发回忆，于是就有了动笔的冲动，一吐为快。我与南央都是66届初三的北京学生，而且有过一段多少有些近似的生活经历。我工作过的企业，名为纺织工业部“五七”棉纺厂。是一个有细纱4万锭及配套的织布机，并且包括年产30万打衫裤针织厂的中型棉纺织企业。

一、“五七”棉纺厂的由来

熟悉的人，都知道毛主席1966年5月7日给林彪的一封信，简称“五七”指示。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黑龙江《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编者按中，引述了毛泽东的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此后，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纷纷响应，走“五七”道路，在农村办起了“五七”干校。

原国家纺织工业部也在湖北安陆与湖南邵阳选了两个点办“五七”干校，除了留守北京的两三百人，纺织工业部千余名机关干部一律下放劳动。在北京的纺织科学研究院和纺织设计院的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连同这三个单位的行政后勤工人，也一起下放劳动。

安陆位于武汉西北110.7公里，是武汉至丹江口铁路上的一个小站，属于孝感地区的丘陵地带。唐开元十七年，李白娶唐高宗时的宰相许圉师之孙女为妻，住居白兆山下，写下《安陆白兆山桃花岩寄刘侍御馆》等篇章。其自谓的“酒隐安陆，蹉跎

十年”，就是在这里。一千二百年之后，数百名北京下放干部和家属，百余大学毕业生，数千青年工人，也来到这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

1969年6月，原纺织工业部200多名下放干部和家属抵达。8月，原纺织科学研究院及纺织设计院的350名下放干部和职工抵达安陆。在这前后，陆陆续续还有一些下放干部来到安陆，但总数不详。所有的人最初都是在“五七”农场从事农业劳动，分三个点：从县城过府河往西五公里半胡棚村的“黄金山”，大家一般习惯称之为“五公里半”。往西还有一个“六公里半”，一个“八公里”。

在纺织部的规划安排下，这些下放干部在“五七”农场劳动了一段时间以后，利用自己的工程技术和管理优势，在而后兴办了几个“三线”企业：湖北安陆“五七”棉纺厂（含一个生产能力达中等规模的针织工场）、湖北化纤厂（位于襄阳县太平店镇）、湖北宜昌纺织机械厂、湖南邵阳纺织机械厂、湖南常德纺织机械厂。其中安陆“五七”棉纺厂和邵阳第二纺织机械厂是下放干部最多最集中的两个地方。

二、初到安陆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安陆是湖北的三等县，全县只有38万人。1969年纺织部“五七”农场开办时，甚至将原纺织部高碑店农场的几匹马都用火车从北京拉过来了（后来我在农场劳动时，因为有在草原插队骑马的背景，还受命照料过这几匹马）。安陆当地的牲畜只有水牛和驴，老乡说，过去日本鬼子来的时候，才见过这种马匹。当年的安陆县城

总共只驻扎了九个日本兵，后来其中一个日本兵的尸体被发现在县城附近的一个村庄外，剩下的8个日本兵就开到这个村，烧了村庄。我在给学生讲持久抗战时就举过这个例子：日本想占领整个中国的确力不从心，兵力明显不足，一个县城只能派来区区9个兵。但为什么9个日本兵就能占领一个县城？这与中国人当汉奸有关。随同9个日本兵来的，还有一个中队的100多伪军。一个学生下课后对我说，其父母也在安陆工作过。原来他是老同学兼老同事叶超和王远慧的儿子。

小小的安陆县城在“五七”厂兴建以前，只有一条弯弯曲曲铺着石板的狭窄“老街”，经常湿漉漉的。街两旁的旧屋歪歪斜斜，没有什么像样的房子。全县最大的房子是原台湾“外交部长”周书楷的故居。此前有个粮食机械厂从上海迁至安陆，后来又在铁路以东的凤凰山附近兴建了湖北铝厂，生产铝锭。

1972年初，我从天寒地冻的锡林郭勒草原第一次去安陆“五七”农场探亲。下火车后走了不少冤枉路，才找到已经从内蒙古开鲁县转到安陆当了工人的舍弟。我从小就与来自江汉平原的祖辈生活在一起，熟悉湖北方言。在锡林郭勒草原待了近四年，却居然听不懂湖北的路人在说什么了，看来还是环境造成了语言习惯的蜕化。后来又在湖北生活了10年，大脑皮层里隐藏着的乡音才被重新唤醒，以致我今天还能不连贯地说几句不流利的湖北天门话，而且能准确地区分武汉、荆州、孝感、黄梅、钟祥、浠水等湖北各地的不同口音。

舍弟向工段请好假以后，我们携带着行囊，在蒙蒙细雨中走向“五公里半”。弟弟说，府河上原来没有桥，来回全靠摆渡，遇到风雨天，船工老乡还趁机提高摆渡费或停止摆渡，极不方便。后来是“五七”棉纺厂出资修建了这座现代化的大桥。河水在桥下涌动，路旁的田野中，突然出现了一片金灿灿的菜花。我一周前还在冰天雪地的锡林郭勒草原，蜷缩在敞篷卡车上冒着刺骨的寒风前行，现在真真确确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行至半途，一辆回农场的手扶拖拉机冒着烟突突驶来，驾驶者是70届北京学生。舍弟与其打过招呼后，我们坐着拖拉机，

回到了位于“五公里半”的家中。而后春暖花开之时，我回到锡林郭勒草原，拿到了转往安陆“五七”干校继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户口迁移证。

初到湖北，最难以适应的，就是绵绵阴雨的气候。在锡林郭勒草原，一年四季都是阳光灿烂，干燥风大。在湖北这种连绵阴雨的冬季，潮湿的寒气沁入骨缝，使我这个来自北国草原的牧羊人，在没有取暖设备的房间里簌簌发抖。在锡林郭勒草原天天吃羊肉，抗寒能力强，四年之中我只感冒发烧过一次。来到湖北水土不服，时间不长就病了一场。病好以后去找也是从锡林郭勒西乌旗草原回来的小华，看到他额头上敷着一块湿毛巾，躺在床上哼哼唧唧，正在发烧。下雨造成的泥泞也令人厌烦，每次出去，都带回满鞋厚厚的粘土，刮了又刮。被褥湿乎乎的，洗过的衣服10天都干不了。一旦有个难得的艳阳天，只见家家户户都忙着晾晒被褥和衣物。再就是每到冬春换季的时候，身上都会连续多天起包，常常是几十个，奇痒，也不知是对什么过敏。为什么在北方生活的时候就不这样？怎么连续七八年了还水土不服？

按照不成文的惯例，所有的青工在进“五七”厂以前，都要在农场劳动三个月到半年，然后才正式分配车间和工种。

来到湖北，深深感到水田农事的辛劳，南方的农民比北方更辛苦。在北方，有几个农民会挑着百余斤的担子日行数十里？而这在南方是司空见惯的。南方极少见北方的骡马大车，有个毛驴车运输或送肥就不错了。一般的运输工具就是南方常见的两轮人力“板车”。春寒料峭挑塘泥，天蒙蒙亮的时候，赤脚踏入带着冰凌的泥水里，寒冷刺骨。如果是挑着两桶满是蛆虫的粪水在水田里施肥，脚趾必须牢牢抠住田底才能保持平衡。我挑着满满两大桶粪水，在旱路上还走不稳呢，结果连人带粪翻倒在水田里。我这个来自北方的笨拙知青，不谙南方大田的农事，常常受到一起劳动的湖北当地青工的嘲讽。

1972年的夏天到了，按照国家的规定，国企职工每人有一笔防暑降温费。防暑降温关系到全厂职工的健康安全。厂里食堂负责防暑降温工作的是我

上幼儿园时的魏老师，小华和我被抽调进厂协助魏老师工作，提前结束了在农场的生活。每年防暑降温的工作，加上做准备和扫尾大约三个月。主要是做冰水饮料，就是在通过了高压陶瓷棒过滤的自来水里放点糖精和食用香料及染料，糖放得很少，然后在水里放进冰块。各部门都可以拿着暖水瓶来打，或送到各车间的保温桶里。安陆县卫生防疫站虽然每年都来取样检测饮料冰水的卫生指标，但也就是官样文章。而我们出于责任心还是要经常清洗高压过滤器中的陶瓷棒，用水砂纸打磨，换掉破损的陶瓷棒。此外，防暑降温的第一个月常常去农村拉西瓜回来发。虽然经常忙得顾不上吃饭，但总有摔破的熟西瓜吃。常有人要求换一个熟瓜，有的人可以不厌其烦要求换好几次。如果他态度蛮横，就免不了发生争吵。时间一长，我也学会了挑瓜。还有的人拿着个小瓜，非要换个大的，也免不了吵架。做后勤工作就是这样：“一人难称百人心”，总有人不满意。我整天在西瓜堆里，根本不把一个生瓜当回事，但发到别人手里，就是一个地地道道不能吃的瓜，没有选择的余地，你让人家怎么满意？

厂计划科长常从我们这里拿十几个西瓜装上，乘吉普到 11 万伏变电站去慰劳，以利于厂里的正常供电。在那个年代，不知在夏季之外，厂里是如何“打点”供电部门的。那个年代常常限电停电，严重影响了正常生产。一遇停电，车间里就横七竖八地躺倒了一片，正好趁机休息一下。麻烦的是，停电的同时会停水，给职工和家属的生活带来不便。我有多次在夏日的凌晨，被青年工人们的喧闹和吼叫声所惊醒：由于停电停水，一身臭汗和棉花毛的夜班工人提前下班回到宿舍以后，在楼道里高声喧哗。由于无法洗漱入眠，就隔窗对着相邻的厂长居住的宿舍楼大叫：“潘定生！没得水，老子日你妈！”其实这样的发泄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至于是否因此而影响了他人的休息，那他们就不管了。

后来厂里专门安装了一台大型柴油发电机，虽然解决了生活和厂区安全照明，但仍然无法解决供水问题。每次恢复供电供水，厂里就有无数水龙头哗哗流淌，造成极大的浪费。因为根据人的心理特征，把水龙头打开发现没有水后，有很多人都是选

择离开，忽略了应关掉并无水流出的龙头，忽视了这个水龙头是打开（上图：1972 年 9 月纺织部五七棉纺厂门口）的。最尴尬的，是停电停水后从澡堂里摸着黑，披头散发、慌慌张张跑出来的女工们，如果有人刚刚打上肥皂，却突然停水停电了，你说糟糕不糟糕。

到了第二年的 1973 年初夏，魏老师带着我们去武汉市的冷饮厂观摩，学做冰棍。因冰水饮料供应不限量，浪费很大。我于是决定在冰水饮料里不再放糖，只放糖精、香料和颜料，把宝贵的食糖集中放在冰棍里，在冰棍配方里只放一点点糖精。后来觉得发西瓜太累太麻烦，日夜不得安宁不说，还要请司机班出车，看某个大爷的嘴脸。我们就着重做冰棍发放。除了做果汁和牛奶冰棍，我还用可可粉做出了巧克力冰棍，受到极大欢迎。离开北京好多年了，居然在“五七”厂吃到了巧克力冰棍，大家当然高兴。

我虽然在白天里做着全厂最清凉的工作，但夜晚的酷热还是无法逃脱。在气压偏低、闷热潮湿的夜晚，坐着不动都会流汗。湖北的蚊子又多又大，毒性也大，常常被咬出很多大包。那个年代在湖北基本上见不到纱窗，必须用蚊帐，这就更加重了闷热。侧身睡，汗水会像众多蚂蚁爬过一样，从上往下流淌。翻身换个姿势，汗水又反方向流淌下来。到凌晨两点还睡不着，爬起来往身上泼水。中午睡一会儿就热醒了，真是受罪啊。

刚刚来到厂里，就听说众多农民在队长的带领下打破工厂的围墙，成群结伙地公然抢走了不少煤炭，结果有青工还因打伤农民受了处分。由于对农民已有了一定的认识，我也就没有因此而太奇怪。北方人知道什么是南方农民的“冲担”吗？两头用尖尖的铁皮包裹，锃光瓦亮，是用来挑谷的，一使劲就可以把人的肚子捅个窟窿。农民那么苦，抢点煤就抢点吧，不怕他们的“冲担”吗。

三、成为产业工人的一员

1972 年夏季过后，我终于分配了正式工作：细纱车间保养工，常白班。发了一条背带裤和一顶帽

子。看看我领到的工具，就知道我是做什么的了：两个油壶，塑料壶装锭子油，长细嘴的铁皮壶装机油；一个装着工业黄油的小铁盒；三把刷子；一根1米多长的细竹捻棍（用来清除附着在细纱机底部隐蔽处的棉花毛）；几块破布；一把锥子；一个小扳手。名为“保养”，其实就是个清洁加油工吧。所谓细纱机保养工，就是在细纱机运转数月后，拆开细纱机用于牵引、延伸粗纱的三根细细的长轴（术语：罗拉），擦干净，抹上油再装回去。还有皮辊、锭子盘等部件的清洁和加油。这工作毫无技术性可言，只要手脚灵活就可以。保养一台细纱机需时一个半小时，每天上下午各两台。因为是要求六个人在组长的指挥下协同一致动作，一个人的动作慢了，就会引起他人因等待而造成的不耐烦。所以我每天都有6个小时是在恶劣的空气和噪音环境里，弯腰撅腚、手忙脚乱中度过。

刚开始很不适应，每天下班都腰酸背痛、疲惫不堪。当初从草原来安陆当工人是怀着学一门技术的憧憬，以实现加入伟大工人阶级队伍的理想，却没想到当个工人这么辛苦。还是在草原信马驰骋自在啊。我常感到自己反而成了细纱机的附属物，面对高速运转的庞大机器无可奈何，恨不得砸烂这个A512细纱机以求解脱。多年后，在大学历史系学到英国工人运动初期以捣毁机器为特征的“路德运动”和“斯温暴动”，不禁想起了我自己当年的真切感受。

细纱机保养用纺织行业的上海话发音是“揩(ka)车”（擦车）；保全叫“平车”（把机器拆开后重装）。上海是老纺织基地之一，所以纺织行业的好多传统术语都是从那里流传下来的。在“五七”厂的各车间，保养和保全都是合二为一的，保全工按照计划进度，即“揩车”，也“平车”。唯独在细纱车间，保养工和保全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工种，前者是熟练工，后者是技术工种。但工资待遇却完全一样，都按照四类地区轻纺行业技术工种的标准发放。学徒工第一年月工资22元，第二年月工资24元，第三年月工资27元，第四年转正，一级工月工资31元，第四年转为二级工，月工资36.3元。1974年我借“批林批孔”运动还就此写过大字报，

认为细纱“楷车”就是熟练工，为什么要按照技术工种的标准发放工资？细纱车间的熟练工种，第一年的月工资就是29元，第二年月工资38元。结果回答是：细纱车间的保全工，一般都是由保养工转来的。再问：为什么不能等以后真的转成保全工了，再重新调整工资？不予回答。

那个年代厂里食堂的伙食极差，有时一个月也见不到肉。为了改善伙食，与南央所在的“陕汽”一样，厂方也逐渐开始偷偷用国家调拨的钢材等计划物资去换猪肉。有一次在河南某地做交易，为了掩人耳目，天黑以后才装车，然后做好巧妙伪装，连夜开车回程，昼伏夜行，以避开路上的检查。结果回到厂里卸车才发现，一片片猪肉都是被割去了瘦肉的肥膘。显然是对方利用黑夜装车，在事先就做了手脚。瘦肉的价格当然高于肥肉，对方这样做，等于是又赚取了一笔差价。食堂只好将一车肥肉存进了冷库，以后再分批取出来熬成猪油，慢慢炒菜用。这就是厂里食堂为什么要建一个冷库的原因。全厂七千多职工和家属，后勤保障工作一定要做好，需要保持最低限度的猪肉储备，细水长流。

伙食不好，大家只好动手动脑的自己想办法。在这方面，我们可比李南央所在的“陕汽”要高一个档次。与老乡换鸡蛋、菜油是一样的。但湖北毕竟是鱼米之乡，天天吃大米白面，比陕西岐山的山沟里要富庶。农户普遍大量养鸡，鸡蛋最便宜时6分钱一个，冬天8分一个。一斤粮票合一毛钱。“腺鸡”（被阉割后的公鸡）7毛钱一斤，母鸡9毛一斤，鲜美的甲鱼最初是三斤粮票加五毛钱一斤，合8毛。但很少遇到，后来也涨到9毛甚至一块钱一斤了。

每到周日的清晨，天一亮，厂里的人们就像出窝黄蜂一般涌向只有一条马路的安陆街头。这条街还是有了“五七”厂以后才兴建的。“五七”厂数千职工和家属的到来，提升了县城自发农贸市场的物价。人们几乎是见什么抢什么：鸡、鸭、鱼、蔬菜……，出手稍慢，或者起晚了，就只好买几个鸡蛋怏怏而归。

满载而归后怎么做熟？凡是20世纪七十年代当过工人的，恐怕都熟悉一个词汇：“干私活”，就

是利用国有企业的设备和原材料制作私人用品。比如精美的台灯和落地灯。很快就有人模仿买来的煤油炉，开始自己制作煤油炉。尽管烟大火苗发红，煤油燃烧率不高，但也马马虎虎能对付着用了。自己制作电炉就更容易了，但最好不要超过1500瓦。由于电炉的普遍使用，青工宿舍楼经常跳闸断电，大家都备有保险丝，马上就会有人接好，前纺车间青工宿舍楼的保险箱甚至被人换成了铜丝或铁丝，烧得通红！

每个周日都要忙活到中午，我们才能开始享用难得的菜肴。啤酒极少有，喝了点白酒，大家就会开始发牢骚，慢慢地也敢发泄对文革和现状的不满了。一顿饭常常会吃到下午两点，酒足饭饱之后再美美地睡上一觉。晚上去食堂买点米饭，把剩菜打扫一净，刷锅洗碗收拾放好，再期待下一个星期天。

当了两年工人后，大家都学会了做几样菜，尤其是烧鸡鸭和鱼。离开湖北很多年了，一直认为那里最好吃的东西是鱠鱼和甲鱼，味道鲜美。

厂里最早盖起的几栋单身宿舍楼，后来修了围墙，作为男人不得随意进入的女工宿舍。男工就以车间为单位住在家属楼里，最小的厨房两平米，只能住一个人。大房间最多可住五六个人，上下铺。刚刚进细纱车间的时候，我们三个人蜗居在一间6平米的小屋里，真可谓是“鸽子笼”。厂方多次调整宿舍，有一次，青工们在40度的高温酷暑之下被逼着搬家，只见楼前和路旁，到处是五颜六色的纸箱杂物，怨声载道又无可奈何。我记得王学东就此发牢骚：我们没有受过旧社会的苦，却受过“五七”厂的苦。我们在“五七”厂受过的苦，当然不仅仅是在高温之下搬家吧？

四、“五七”棉纺厂人员构成及其相互关系

“五七”棉纺厂是在征用了安陆城关镇东北角原砖瓦厂的地皮兴建的。全厂四千多职工，加上家属七千余人。不包括一直留守在“五公里半”和“六公里半”农场，没有到工厂工作的下放干部和工人。厂级各科室，各车间、下至工段长一级的干部，基本上都是原纺织工业部和纺织科学研究院及纺织

设计院的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

1970年8月，150多名上海华东纺织工学院（中国纺织大学，即现在的东华大学）69、70届大学生被分配来厂；另有一批北京化纤工学院（即现在的北京服装学院）的大学生被分配来厂，都是从普通工人做起。后来随着一些干部陆续调离，仍留在厂里的大学生才逐渐接替了技术和管理的一些岗位。

厂里不多的老工人师傅由郑州及石家庄等地调入。他们中有一些是江浙一带的南方人，是支援内地建设到北方的，愿意借此机会来湖北鱼米之乡，同时也可以解决子女的就业问题。有的老师傅担任了工段长和车间副主任。此外，工段一级还有少数复转军人，其中也有奸诈之徒，如细纱车间四工段的书记张全顺，就遭到全工段几乎所有青年工人的厌恶。一个安陆籍复员军人吴国安，在厂劳资科负责调配工作，很多办理过调动的职工都受尽了他的刁难。此人突患急症去世，一群人立即冲入将其家，将缝纫机之类的贵重物品洗劫一空。看来其生前大概是接受了不少贿赂。

我对工人阶级的认识也和李南央一样，是自己成为工人的一员后，才有了切实的感同身受。工人老师傅中当然有不少淳朴善良的人，但文化水平普遍偏低。也有少数刁钻之人。其中有的人，对拿“高薪”的北京干部不免心生妒意。这其实也是那个年代干群关系、知识分子与普通工人双重关系一种曲折的映射。

人数最多的青年工人群体，大多是原先在孝感和黄陂等地区下乡插队的，以武汉知青最多，还有不少孝感、黄陂人，一些汉川、黄梅知青。当然，也有一些借知青招工之机，搭车进厂的农村社队干部的亲戚子女，以安陆本地居多。

青年工人中有的原北京和武汉学生有优越感，自以为是大城市来的，把湖北其它地方的人视为“乡里人”。这些乡里人中最善于钻营的是黄陂人，人数不少，能量较大，乡土观念重。他们常常拉帮结派，相互提携，占据了一些较好的岗位。这大概也可算作是一种生存之道吧。1971年6月，“五七”

棉纺厂革委会一成立，就有一位黄陂姑娘杨腊梅作为青年工人的代表担任了副主任，后来又就任厂党委副书记。上述细纱车间四工段的张某也是黄陂人。

1969年最早来安陆的上百名原北京学生，是躲过了上山下乡的一批人。他们是在“五七”农场从事基建和农业劳动一段时间后正式进厂当工人的。后来还有70届及其后的不少原北京学生在农场劳动后陆续进厂。

1970年以后，陆陆续续有百余名原北京知青从天南海北、四面八方来到安陆，在“五七”农场劳动后进厂当了工人，我就是其中之一。

一般而言，从北京来的干部有很多是工程技术人员出身，又在国家机关从事行政和技术管理多年。他们工作认真负责，对业务精益求精，重视知识和技术，管理严格，使得“五七”棉纺厂在20世纪七十年代成为全国纺织战线的一面旗帜。有一个织布车间女工还于1975年1月去人大会堂开会，作为第四届全国人大湖北团的代表受到李先念副总理的接见。

四千青年聚集在一起，年轻火气大，青春的激素勃发；文革中和农村里流氓无产者习气的耳闻目濡，加上湖北民风强悍，喜欢“斗狠”，最常见的口头禅就是“么样啊”（你想怎么着或你要怎么样）？就难免会发生种种纠纷和冲突。在食堂买个饭，由于挤撞，就可能引发争吵甚至动手。由于厂方的严格管理，打架斗殴的事情一经发生，就会严肃处理，所以不多。有一个武汉籍杨姓炊事员，因多次参与斗殴和赌博，被厂保卫科送到由县公安局授意设在安陆火车站的拘禁点，被那里的一些装卸工天天虐待取乐，被打得浑身是伤。“五七”厂食堂的管理干部觉得这样长久下去也不是个事，就去把他接回来疗伤。这个炊事员看到北京干部来接他时，抱着干部的腿嚎啕大哭，看来是受尽了折磨。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无法想象：在文革那样一个无法无天的岁月，全国许多地方都有一个叫“群众专政指挥部”的机构，协助公安部门工作。有不少人被送到那个地狱里整天遭受毒打和折磨。

在青工中也发生过少数恶性案件。细纱车间一个武汉籍谢姓辅助工，平时喜欢“斗狠”，与当过厂食堂炊事员的、细纱车间另一个黑胖粗壮的孝感籍壮工，经常发生冲突。谢某有一次上夜班躲在五六层楼高的大车间房顶睡觉，孝感籍壮工见状就一下子将其掀下了屋顶。夜半，北京学生、电工宋晓红路过车间大门，看到谢某躺在血泊之中，便连忙将其背到厂医院抢救。谢某从此陷入昏迷状态，神志不清。孝感籍壮工随后调离“五七”厂，回了老家。没想到谢某在两年之后醒了过来，说出了事情的经过。结果这个心黑手狠的孝感籍壮工才因此而被逮捕法办。

北京干部的严格管理，甚至涉及到了青年工人的生活习惯。湖北夏季酷热，一些小伙子下班以后在公共场合也穿着运动短裤和拖鞋。有一次厂里放电影刚刚散场，在夜幕下的人流中，我看到一个操着普通话的干部在厉声训斥一个青工：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太不像话了！成何体统？你是哪个车间的？这个青工在连珠炮般的责问之下，只是诺诺地用湖北话连连辩解：“这有么事”（么事：什么）。他大概想不到这也有人管。

“五七”厂是个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建立才数年，人员构成也很特别的新企业。1974年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使得厂里潜伏的种种问题和矛盾，都一下子显露出来了。不管是老人还是青工，也不分什么北京的或湖北的，不少人纷纷贴出大字报，发泄自己所属群体或个人的不满。我也写了大字报，诉说对细纱保养工资待遇的意见。我们还把厂劳资科科长叫到车间里，对其当面质询。

少数老人更拿出文革中造反派搞大批判的劲头写大字报，刷标语口号，捕风捉影，上纲上线。有个老师傅还戴着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奖章，在大食堂前发表演讲，攻击厂里的北京干部，再现了文革场景。

一个管理食堂的北京干部为了丰富全厂职工的文艺生活，多次请老战友属下的部队文艺宣传队来厂里演出精彩节目，受到职工们的热烈欢迎。结果有老工人据此贴大字报，说他拿厂里的钱招待部队文艺宣传队大吃大喝，还污蔑他是“新生的资产

阶级分子”。从此，厂里就再也没有请部队文艺宣传队来演出了。

批林批孔运动的内容之一是批“走后门”。北京学生如果进厂较早，有不少安排了较好的技术工种。但上运转班早中晚三班倒的也不少，尤其是女工。一个9级干部的大公子，父亲的“问题”悬而未决，十多年都是运转班的辅助工。同样，有几个部长的子女，都是上运转班的。其中的一个后来调去开吊车，引起湖北青工的强烈不满，还被贴了大字报。当地青工对北京学生占据了相对较多的好工种，显然是颇有微词。舍弟1970年进厂，也算“半元老”级，分得了一个好工种：“空调保全”，维护检修空调设备。“五七”棉纺厂是按照我国援助非洲热带地区的厂房结构设计的，细纱车间与织布车间甚至都没有窗户，用空调来保持一定的温度和湿度，以利于纱线的韧度，不易断裂。为了节省中央空调的电力，也有意限制了厂房建筑的高度空间。但工人们在这种环境里工作，一进车间就感觉透不过气来，到处飞舞着纤细的棉花毛，空气污浊，戴上口罩也不舒服。数小时后脸上、鞋上、全身就落了一层棉毛，要用一块泡沫塑料仔细擦拭，才能将棉花毛除掉。因为没有窗户，电机和机器部件高速运转的轰鸣声和撞击声也无法传出去，噪音就在低矮的空间里来回撞击激荡，震耳欲聋。湖北本来就已经是阴雨连绵，工人们每天早出晚归，更是难见天日。加上伙食差，一个个都脸色惨白。从阳光灿烂的草原来到这样的工作生活环境，使我真切地感受到人们对新鲜空气和阳光的需求；在这以前，这对我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问题。我不禁怀念起在草原放牧天天风吹日晒，肮脏不堪却时常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蹉跎岁月。

舍弟干了半年的“空调保全”，又被调去当管道工，也还可以。舍弟工作兢兢业业、勤恳好学，没有出过任何差错，还常常得到好评。没想到一年后，在没有任何解释和理由的情况下，又突然调他去锅炉房，三班倒烧锅炉！家母因此找了相识的机动车间主任，也无济于事。舍弟后来推测：机动车间刘主任刚刚将其外甥女（养女）从机动车间的技术工种调换到了更干净舒服的针织工场上班。为了

堵住别人的嘴，就将其调去烧锅炉，以此作为挡箭牌：北京的孩子也有当锅炉工的！其实就是柿子拿软的捏，欺负人。

我从进厂的第一年开始，就在夏季里做防暑降温工作。我对工作也是认真负责、任劳任怨。负责防暑降温工作的魏老师对我非常满意，每个夏天都把我从车间抽调出来协助她工作。到第四个夏天后食堂盖了新冷库，才把我正式从细纱车间调到食堂冷库开冷冻机，并承担全厂夏季的防暑降温工作，因为我在这方面已经是轻车熟路，可以给血压高的魏老师省不少心。哪一件事的促成，不是多方面的因素呢。

五、辛辛苦苦的纺织女工

纺织厂女工居多，一般都是运转班的一线挡车工，早中晚三班倒。细纱和织布车间的姑娘们每天都要在恶劣的车间环境里围绕着机器走五六十里路，不敢喝水或去厕所，很辛苦。记得著名的全国劳动模范、陕西“赵梦桃”小组的代表来厂里做报告传经送宝：“多吃馍，少喝汤，省得车间上茅房！”粗纱和准备车间的挡车工好一点。整理车间检验坯布，天天坐着不用巡回，只是费眼睛。女工最好的工种是实验室，干净，也有点技术含量。

男工最差的工种是上运转班的辅助工和壮工，毫无技术可言，文盲都可以极快胜任，因而地位底下，有自卑感。一般而言，上常白班的二线工人都算好工种。最好的是机动车间，车钳铣、电工、钣金、管道、电焊、木工等等。其次是各车间的设备维修工（纺织行业叫保全工）和上运转班的设备检修工。再其次是各车间里的辅助工段，比如皮辊、水管、修梭等等。起码可以在安安静静的环境里边干活边聊天，但技术含量很低。

如果能够混入三线科室，那就太舒服了。干干净净，没有一身的臭汗和油泥。所以纺织厂的澡堂是必备的，每天开放10个小时，以保证三班运转的工人能够在下班后洗澡、洗衣服。但在澡堂里丢东西（比如毛衣）是常有的事情。我在锡林郭勒草原插队时曾经三年没有洗过澡，来到安陆后，冬日

里常常每天洗两次澡，下班后洗一次，临睡前再洗一次，暖和和入梦乡，不然咬着牙进冰窟一般的被窝太难受。

三线总务科后勤，炊事员、理发员都没人愿意干。幼儿园还可以，比车间里上运转班的挡车工强多了。细纱车间的一个女工因为皮肤过敏，调到总务科看澡堂，相对而言也算是个美差。厂医院的护士就太抢手了。厂里后来还办了子弟学校，可以上到高中毕业。“五七”厂甚至还专门从北京买来了一套设备，每天轰隆隆的制作供应蜂窝煤。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六、全国纺织战线学习的榜样

由于厂里的各级干部大多是北京来的工程技术管理人员，所以，从建厂之初就形成了一种尊重知识和技术，严格管理的厂风，这大概是那个年代所不多见的。1975年11月17日，厂里还放映过新闻纪录片《前进中的五七棉纺厂》。11月29日，传达了湖北省委关于学习“五七”棉纺厂经验的第49号文件。

“五七”棉纺厂之所以能够在七十年代成为全国纺织战线学习的榜样，也有着得天独厚的多重因素：（1）特殊的干部队伍，连工段长一级都是管理经验丰富的工程师，班组长最初有很多都是在文革中毕业的大学生。（2）由纺织部调拨厂里所需的计划物资，保证供应。（3）使用了援外的、国内最先进的整套棉纺织设备。并由工程技术人员对每一种设备的保全安装、保养维修制定了细致周密的工作法流程，精确到小时，用图表张贴公之于众。（4）制定了全面完善的岗位责任制，大张旗鼓地推行，所有的岗位都必须严格遵照执行。

由于全国各地的许多棉纺织企业都要陆续更新“五七”厂率先采用的这一整套国内最先进的设备，他们就需要派人来学习操作运转以及安装维护这套设备的操作法和工作法。“五七”厂各大车间的操作运转和设备维修人员，也就在正常工作的同时，担负起培训全国棉纺织行业同行的任务。据我所见，数年当中，细纱车间接待了国内所有各省派

来学习的同行。厂招待所因此常年住着操着全国各地口音的众多客人。

七、伴随了我们十几年的军代表

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军代表伴随了我们的生活十几年。最早接触军代表，是1967—1968年派驻北京各中学的军训团。除了学校一级，当时每个班级都有一名现役军人当排长。派到北京八十中的是北京军区空军部队，我们班的王排长是山西人，参加过抗美援越战争。后来在锡林郭勒草原下乡插队时，内蒙古自治区实行军管，派到锡林郭勒盟的是65军。军管对稳定当地的混乱局势的确起了很大作用，但这些人自恃“军管”的特殊地位，趾高气扬。西乌旗哈拉图公社的一个北京知青向军管组提了几个问题，结果被说成是“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就是北京知青给军管出难题”，因此而挨整。派驻我们公社的军管组组长是一个小班长，带着几个战士。相当于营级的公社书记在他们面前都俯首帖耳、服服帖帖。这几个战士中有两个是石家庄老高一的中学生，一个老初三的农村兵，都是同龄人。只不过是他们当了兵，我们来插队了，结果处境竟然是天壤之别。这个小班长多次奸污女知青，面对家长的申诉控告，为了包庇部下，其上司、掌管数个公社军管组的杨排长，竟然在知青家长面前拔出手枪，将办公室桌上的玻璃板拍碎，大喊大叫，保证他的下属没有问题，以此来威胁恐吓或震慑。但这个小班长最终还是被五花大绑送交了军法审判。没有想到，离开了锡林郭勒草原，千里迢迢来到小小的安陆，又遇到了军代表！

大多数军代表虽不是坏人，但他们的极“左”和无知却有目共睹。海军派驻纺织工业部的军代表毛洪祥，曾多次到安陆“五七”棉纺厂视察。一次在农场看到正在给窗户安装铁栏杆，不禁勃然大怒：你们这是在防备贫下中农吗？结果铁栏杆停止安装，为以后附近的农民入窗盗窃提供了方便，农具和储藏用品经常被洗劫一空。

针织工场的建筑设计方案是两层楼，由八根粗大的方柱贯通上下，一层是编织和漂染车间，其产

品可用电梯送到二层的成衣车间加工。结果，厂房一层建筑刚刚完工，准备盖第二层时，毛代表来了。一看到厂房一层屋顶上耸立的八根方柱，毛代表就厉声斥责：你们这是在干什么？搞什么“高、大、洋、全”？结果工程被迫停止，成衣车间的设计施工方案也被迫取消。编织和漂染车间正式投产后多年，车间房顶那八根大方柱还一直孤零零地耸立在那里，成为“五七”棉纺厂一道奇特的景观。忘了是哪年才截断清除掉的。

编织和漂染车间位于“五七”棉纺厂的东北角。成衣车间的设计施工被迫取消以后，厂里只得另选地段，隔着巨大的棉纺织主厂房，在厂里的东南角兴建了新的成衣车间。原来的设计方案是楼上楼下，电梯输送。现在却要专门雇佣几个民工，每天将编织和漂染车间的产品推到成衣车间加工。

早在1969年6月建厂之初，武汉驻军8228部队就向“五七”棉纺厂派驻了五人军宣队，队长臧福义参加了厂筹备处领导小组。1971年6月，“五七”棉纺厂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军代表王德全为革委会排名第一的副主任。

前面说过，根据纺织设备的运转周期，要进行“平车”（把机器拆开后重装），分“小平车”和“大平车”：半年一“小平”，三年一“大平”。因此，每天都有一些机器设备处于“平车”的状态。“大平车”时连地脚螺丝都敲掉了，要重新用水泥封固。一次“大平车”往往需要7~10天才能做完。所以，“平车”肯定会影响到产量，但这是必须做的事情。王代表某日忽发奇想，给工程师出身的北京干部、织布车间主任打电话：能不能想个法子，使得织布机在“平车”的同时继续织布，不影响生产（也就是把织布机拆了，同时还能让它继续运转织布）？织布车间叶主任在电话中连连答应，说我们一定想方设法。放下电话，有人看见其嘴角露出了一丝不为人所觉察的轻蔑。

王代表大概是政工干部，喜欢做报告，针对厂里和青工中的问题，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两个多小时，大话、套话连篇，令人厌烦。他还多次带人搜查青工宿舍，看看有没有“黄色”书籍和违禁品，因此不得人心。在1974年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中，

他被贴了一些大字报。有人捕风捉影，说他喜欢深入女工宿舍找人谈心，还有不雅动作。结果把他搞得灰溜溜的，后来就调走了。但军代表的家属都在厂里安排了工作，还分配了住房。不知这些军代表是哪年撤离的。

八、中国有个“大家拿”

随着成为工人阶级的热情慢慢消退，生活更日渐平淡枯燥。几年以后，随着价值观念的逐渐变化，人们的胆子也越来越大，在交互作用的影响下，不论什么工种的工人，都有了一个共同的行为：“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最初只是顺点工具，榔头、钢丝钳、螺丝刀之类，以后就慢慢发展成什么方便就偷什么了。我在厂里管冷饮，面对储存了几公斤白糖的小库，在当工人的后两年也拿过白糖。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我给好友家祥一瓶白糖，结果他当电工的弟弟家豪见到我就大念唐诗：“官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亦不走。”我也无言可对。可见我们这一代人的价值观念是何等顽固。我开冷冻机值夜班时饿了，也有过拿做冷饮剩下的酸梅汁冲着喝。相对而言，我还算是小偷小摸。第二食堂专管各大车间运转班中间的三顿饭，食堂管理员每天提着一个暖水瓶来上夜班，趁人不备悄悄灌满食油，早晨下班再提回家。有一天一个炊事员想喝水，拿起这个暖瓶，倒出来的居然是菜油，这才败露。你想想他偷了多少食油？有一次食堂炸肉丸子，我看那个心黑手狠的孝感籍炊事员，捧着冒尖的一大碗肉丸子，蹲在二食堂的门口吃，谁也不敢管这个一身黑肉的蛮横壮汉。

有一天大食堂杀了两头猪，下锅做成熟肉，因滚烫没有出锅。到下午上班时，两头猪的肉都不翼而飞。报案后县公安局发现，街上有人在卖熟肉。在整理车间，有人偷了整匹的坯布，夜半扔到厂围墙外，等吃夜班饭时抽空绕过围墙去取时，居然空空荡荡！难道是被半夜游荡的路人捡走了？针织工厂的成衣车间，也常发生盗窃事件。

“所有制”一词，实际上是对马克思原著中的德文 Eigentuw 或英文 Property 的误译。前苏联的

译者用所谓“所有制”的概念代替了马克思原著中的“财产(权)”理论。我们的所谓“全民所有制”，与马克思所讲的民主制度下的、服务于公共利益的“社会所有制”自由人联合体及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基础上重建的“个人所有制”，并不是一回事。“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国有制”，其实都是带有虚幻感的概念，20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工人，有几个人把自己当成是企业的主人？现如今呢？

出于产权关系不明晰而造成的“人人都是主人，人人都不负责任”的状况，理论界所讨论的国有经济“所有者缺位”的问题，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从苏联开始，社会主义“公有制”一直采取政府所有的形式。这一形式如果在政治上、经济上未能做出严格地限制并正确地加以规范，往往就可能蜕化为特权阶层所有制，从而阻滞向“社会所有制”的过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真正能够使国有企业摆脱政府“附属物”的状态，使广大的普通工人真正感到自己是企业的主人，才有可能摸索出一条向“社会所有制”过渡的某种形式和途径。这才是为摆脱苏联式“社会主义”旧模式而可行的一种演变途径。

九、并不丰富的业余生活

李南央所在的“陕汽”当年之所以能够有较高水平的丰富业余生活，这恐怕是有1500个北京66届初三和高三毕业生参与的结果。不知当年的中国，还有多少企业常年同时集中了数千朝夕相处的66届初三、高三毕业生？“老三届”学生中本来就人才济济，北京又是藏龙卧虎之地。1500个北京66届初中毕业生，特别是还有不少老高三毕业生，如果不闹出点动静来，那还对得起养育了他们的那片热土吗。学者朱学勤就有过亲身感受：文革前重点中学的老高三生，综合素质高于后来的研究生。他在复旦读博时，还以此为据指摘过一个研究生班长：你的见识，还不如一个文革前重点中学的老高三生！

据我的亲身体验：文革前，全国各地重点中学学生的综合素质应该是不相上下的。在“五七”厂

表现比较突出的老高中生，人数似乎也不是很多。

“五七”棉纺厂的原北京学生大概有300人，以69届、70届的居多，“老三届”的不到半数，其中老高中生大概只有30来人。就这样，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和黄石市人民广播电台还一下子就挑走了4个播音员。当然，我们的业余生活比上山下乡时还是丰富多了。

我们这些“老三届”的100多个下乡知青，从东北、内蒙古、陕西、山西、新疆、云南汇集到安陆，大家聚在一起，首先就会聊起下乡的经历和事情，天南海北的风土人情无所不谈。那毕竟是我们走向社会的人生第一课，印象太深，对我们的影响也太大了。这样的话题，竟然延续了两三年。除了这个话题，就是聊文革前看过的小说和电影，详详细细地描述，如临其境，堪称是一种精神会餐。不仅增长了见识，还练就了会讲故事的口才。

到了炎炎夏日，也有人常去府河游泳，在河滩上踢球。直到筋疲力尽之后才回厂。有一次几个人踢完球回来找我要冷饮喝，一人半塑料勺喝下去，几分钟以后，其中一个伸出胳膊让我看：已经渗出了点点汗珠。

由于在锡林郭勒草原下乡插队数年，只要安陆县电影院放映没有看过的影片，我就会跑去看。一次由于买电影票挤撞与县城当地的小流氓发生了冲突，县公安局的警察不由分说，就把我们带走讯问。释放以后，我们才赶去看了已经上映了一半的电影。此前厂里的一帮北京学生，在县电影院也是因买票与当地的恶少发生冲突，结果被县公安局拘留了三天。这些人不服，就在牢房里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释放时，拘留原因居然写的是“骄傲自大”，要他们签字。

厂里每周如果能放一场电影，就是一大乐事。影片中的插曲也很快就会在全厂流传开来。尤其是外国电影，如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摘苹果的时候》《鲜花盛开的村庄》《南江村的妇女》《一个护士的故事》；罗马尼亚电影《多瑙河之波》中的插曲。南斯拉夫电影《桥》1974年上映后，其插曲《啊，朋友再见》迅速流传，成为联欢会上受欢迎的男声小合唱。1976年上映的阿尔巴尼亚电影《初春》中，

有一群德国兵在街边酒馆醉醺醺地高唱意大利民歌《美丽的村庄》。在文革尚未结束的氛围下，熟悉这首歌曲的北京学生很快就浑水摸鱼，在厂里的文艺会演中推出了。如果是在文革的高潮时期，恐怕没有人敢公开传播法西斯德国兵唱过的歌曲，不管他们唱的是什么歌。

吉他在文革时被视为不务正业的玩物。因阿尔巴尼亚影片《宁死不屈》中的一句对白：“没想到革命者也玩吉他”，以及弹着吉他唱起的歌“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吉他热，其弹奏还有西班牙吉他与夏威夷吉他之别。此后就时常看到三三两两的青年在弹着吉他吟唱。

当然，在“五七”厂的青工中，特别是在北京学生中，私下里演奏的外国乐曲和哼唱的外国歌曲就太多太多了。不少人学拉手风琴和小提琴，弹吉他，还有冬育、米甘等几个吹黑管的。厂工会组织过几次各车间的文艺汇演，排演过《红灯记》《黄河大合唱》《长征组歌》等。与南央所在的“陕汽”不同的是，没见过由“五七”厂职工自编自导的文艺节目，大概是缺乏这方面的人才吧。车间一级的工会有过什么作为，也没有什么印象了。

厂工会经常组织篮球、排球、羽毛球联赛，还组队外出参加各种比赛。舍弟在这方面表现比较突出，当年在“五七”厂，大家都知道活跃在各类球场锅炉房的“马胖子”。厂工会还举办过两次全厂运动会，大家都兴奋了好几天，呈现出一派节日的气氛。舍弟又成为百米径赛和田赛跳远的冠军。但我和舍弟都无缘参加七二无后坐力炮实弹射击训练，是拉到山里打的。

“五七”厂毕竟与北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因此也看过一些内部发行的书籍：最早的一本《第三帝国的兴亡》被裁成了四册，大家争相传阅。我是第一次从这本书里知道，斯大林与希特勒共谋瓜分了波兰。后来又读了锡兰（斯里兰卡）共产党人特加·古纳瓦达纳夫人写的《赫鲁晓夫主义》、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斯大林女儿《给友人的十二封信》，对斯大林的了解就更多了。当时还看过一些前苏联小说：《叶尔绍夫兄弟》《你到底要什么》《落角》《多雪的冬天》等。看《普隆

恰托夫经理的故事》，第一次接触到“意识流”文学手法，简直是心惊肉跳般的兴奋。读过几本战争回忆录，朱可夫的《回忆与思考》，什捷缅科的《战争时期的苏军总参谋部》等等，深有感触：苏德双方都动辄动员上百万兵力的大会战，一次战役就死伤几十万，一次就被俘几十万。相比之下，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捷也太“小儿科”了。那时我还不知道国军在抗战期间进行过 22 次大型会战，蒋介石在武汉会战时动用了 110 万国军。诺曼底登陆，盟军居然出动了 280 万人。

另一个感受是：普通士兵的生命在这样的战争中太微不足道了。只是为了与盟军争夺攻克柏林的功绩和荣誉，就在已近胜利的前夕，在欧战的最后一仗中牺牲了 30 万苏军将士。

还看过一本 4 个日本“左翼”青年写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真心相信苏联已经“变修”了。后来在报纸上看到中国邀请这 4 个人以“日本青年反修代表团”的名义访华，还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心中激动不已。

那时“五七”厂也流传过几本文革前出版的旧书：如《牛虻》《斯巴达克斯》《安娜·卡列宁娜》《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红与黑》《九三年》《基督山恩仇记》《我所知道的戴笠》等等。只可惜这样的书籍太少了，那是个“一书难求”的时代。

学徒工出师以后，每年都可以享受 12 天的探亲假。很多人都将平时加班的时日集中攒在一起，利用“调休假”延长探亲的时间。每当有人从北京探亲回来，我们就会像过节一般围坐在其身旁，桌上摆着从北京带回来的糖果香烟，大家挤成一堆，听他讲述在北京的一切所见所闻，如醉如痴，如同会餐一般的兴奋和满足。有时谈及中央内部的小道消息，大家就赶快紧闭门窗，小小的房间里不久就已是烟雾腾腾。

如果有人在北京看过内部电影：如《啊，海军》《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大海战》《巴顿将军》《他们比男人更凶狠》《黄天霸》《恶虎村》等等，那就更过瘾了，绘声绘色娓娓道来，能说好几晚上，让人回味不已。在那年代，只有部分人有机会回北京探

亲，对能回北京的人，当然是羡慕之极。北京当时是我们心目中最最美好的地方。

大约是 1975 年，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和各省一样，开办了英语教学节目。“五七”厂也兴起了一股小小的“英语热”，学习者以北京学生居多。还有些人，包括大学生，一直坚持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九百句”教学节目，但前提是需要有原版教材和一台较高质量的短波半导体收音机。有人冒险按“美国之音”电台广播提供的地址写信，免费索取“英语九百句”教材，居然也顺利收到了。

毛主席 1975 年发出“七二一”指示后，厂里也开办了七二一工人大学，由北京来的工程师和“老五届”大学生授课。同时还开办了业余大学，

上百人热热闹闹去上课，盛况空前。业大从初中的数学开始讲起，陆陆续续开设过不少课程：机械制图、金属工艺学、电工原理、晶体管电路、理论力学、材料力学，还有棉纺织工艺学；各车间的工程师按照生产流程讲厂里各种机器设备的原理。这些课程我基本上都是听了一半就学不下去了，一是提不起兴趣，二是实在学不进去。机械制图到现在还记得“长对正、高平齐、宽相等”，大概只能画轴类和轮盘类的图纸；金属工艺学只记得一点铸造知识；电工原理仅仅记得节点电流定律（基尔霍夫定律）和回路电压定律；晶体管电路还记得整流与放大；理论力学只记得一个到现在也没有搞明白的“转动惯量”。不过，棉花是怎么成为棉布的，棉纺织设备的基本原理，大致还是清楚的。¶

（上接 103 页）

请注意这三个日期：从 1968 年 7 月底到年底。这一系列环环紧扣的旨在取缔造反派的重大举措，都发生在正式宣布打倒刘少奇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10 月 13~31 日）前后。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可以看出，这就是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是毛泽东而不是别人（这时不可能有别人）在抛弃并且打压造反派。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 1968 年，文化大革命的第三年，造反派就从整体上被赶下了文革舞台——这也就是后来一些人认为文革只有三年这个说法的来历，因为他们认为没有造反派群众组织的文革就不再是他们认为的文革了。

当群众组织全被解散，造反派不再成群结“派”之后，全国更进一步展开了逐步升级的“清查五一六”运动，这是毛泽东领导下明确以造反派为打击目标的整人运动，其打击面之宽，整个人数之大，手段之恶劣，整死整病整残者之众，都远远超过文化大革命中的其他整人运动。此后各地都抓捕、批斗甚至处决了一些造反派头头或骨干，其他头头或

骨干也基本上无一幸免地被关进了各种“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集中营接受反复清查、批判、逼供，在革命委员会中有职务的已经所剩无几，完全成为陪衬的“花瓶”。因为“革命群众组织”（即造反派）已经不复存在，本来以军队干部、革命领导干部、革命群众代表（主要是造反派群众组织代表）这种文革身份来组建革命委员会的“三结合”，也被毛泽东偷梁换柱地改成了以年龄来划分的“老、中、青三结合”。

总之，造反派从整体上说，早在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之时就已经被“胜利者”毛泽东卸磨杀驴了，不存在了。文化大革命“失败”之后对原造反派人士的进一步追究、惩处，不过是“继承毛主席遗志”和维护毛泽东形象、转嫁文革罪责的政治需要而已，其中当然也掺杂着一些“官僚”对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报复，不过他们的报复也是欺软怕硬地把矛头指向替罪羊——他们不敢报复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毛泽东。¶

【往事】

北师大二附中的红卫兵暴力

——1966年“八二五”惨案概述

季 烨

一、“八二五”惨案

1966年8月25日，北京师大二附中红卫兵再次闯入高二1班同学曹滨海家“破四旧”，还要跟他“辩论对联”，揪他家的“黑线——曹滨海的母亲，时任铁道部党校党委副书记的樊西曼。此前“对联”肆虐，曹滨海态度鲜明地反对对联，写大字报、贴标语、上台辩论；而前一天，其所在高二1班红卫兵领导人陈涵实带人闯入曹滨海家，侮辱性地审讯了曹滨海的母亲。25日，红卫兵第二次闯进其家，曹滨海激愤抗争，挥刀砍伤了陈涵实。

曹滨海此举引发了二附中红卫兵的疯狂报复，他们将樊西曼揪到二附中，在校园乒乓球的砖台上，将其活活打死！

当天，二附中红卫兵宣布，第二天要在全北京市召开十万人大会，批斗并打死曹滨海及全体劳改队成员。经周恩来总理派人反复做工作，此会才没有召开，红卫兵转而在校内进行更大范围的人身迫害。他们将校党支部书记姜培良和青年教师、复转残废军人靳正宇活活打死。同时对“劳改队”全体成员、全校教师、同学进行疯狂的殴打虐待。其迫害范围之广、手段之残暴，骇人听闻。

二、对老师没有理由的侮辱残害

在“八二五”事件中，北师大二附中的红卫兵对本校老师，不分年纪，不分男女，进行了普遍的施虐和残害。侮辱、欺凌成了广大教师的家常便饭。

赵文滔在《伤害》一书中，记叙了姜书记被打死后老师的遭遇：“就在要把姜培良拉到医院之时，红卫兵开始拿笔记本逐个登记教职工的家庭住址，说是明天开始要挨门挨户地去登门造反。面对刚才小食堂中间那血肉模糊、泥水滚了一身的三个被打者不知死活那一幕，有的女教师，当红卫兵走到面前拿着笔记本登记住址时，早已浑身颤抖，牙齿上下磕打，战战兢兢，语不成声了。为此，又遭到一阵阵的训斥和责骂。紧接着，又组成了牛鬼蛇神队，把一些女老师剃了阴阳头，男老师则用墨水涂成黑脸，极力侮辱和丑化。”

下面是几位老师对当年的回忆——

杜平老师：记得清楚的是勒令老师们都得去看打樊西曼，惨不忍睹，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说去上厕所，出去坐在小楼台阶上。吴××（青年教师，红卫兵）走过来训我说：“你怎么在这里，不去受教育？！”我心里那个气啊，这种态度对我！

杨×老师：打姜培良他们的时候，让老师们全蹲在那儿，小伙房，天多热啊，闷啊，汗就止不住地流。刚用手抹一下，有人就喊：“你们抹什么眼泪，为他哭啊？！”吓得连汗都不敢擦了。喊的是老师里的那些人。

杨涵老师：“八二五”当天，老师们一律不准回家。我家洋洋太小，杜平俩孩子也小，规定有事要回家的必须向红卫兵请假。我们俩都是找的李××请假，他是老师里的红卫兵，他给写了条儿红卫兵才让走的。我那时给剃了头，回家保姆说说：“你们这儿太吓人了，我得回家。你要放心就让我把洋洋

抱走。”我有什么办法？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就说：“您把孩子带走吧，我不知道以后会出什么事。”我就掏兜儿，一个兜一个兜地掏，把身上的钱全给了她。她老家是贫农，进城后是工人，她不怕。后来她就一直给我带洋洋。

季烨：杨涵老师是党员，她丈夫当时是空军现役军人。红八月中她被剃了阴阳头，其父母家被二附中红卫兵抄了家并勒令她必须到场。她的孩子当时应该只有半岁大。我记得在“八二五”之前，我们班主任就已经被剃了阴阳头，副主任作为“姜培良的红人”被戴高帽子陪斗……这次，应该是更普遍的、不论名目的侮辱欺凌吧。团委书记孙素英老师没有关进劳改队里，但文革开始后，被斗。让她站在摞起来的课桌上，斗争过程中我亲眼看见有人把桌子一撤，她从上面摔下来！有人告诉我，高三二班的门被抽掉最下面的门板，强迫孙老师每天从门最下面的洞里爬进爬出。有人在楼梯上推搡她，摔下来。那时候，孙素英正怀孕。后来，这个孩子生下来就是残疾。据说，高三2班主任X老师，春游时和同学老师一起拍集体照，她和总务主任王杰被安排坐在中间。文革时，高三2红卫兵将集体照中其他人挖走，只剩了他们二人，于是就以“流氓”罪名斗争她。X老师几乎精神失常。

D老师：红卫兵闹得最凶时，每天学校门口，一个初一的小眼镜就守在大门口，监督老师们进门一个个签到，还随时训斥按时来的老师们：你怎么来这么晚？！再来这么晚，就对你不客气！

杜平老师：我是世界史专业的，历数古今中外的各种暴行屠杀，像这样全国范围的、由青年学生大规模地侮辱残害虐杀老师，古今中外、上下几千年啊，实在是史无前例！

三、对同学的侮辱、围攻、驱赶、殴打

“八二五”当天，以及欲召开全市十万人批斗大会的企图受挫后的26号，二附中红卫兵为泄愤，对同学中持不同意见者及“出身不好”者大规模侮辱、围攻、轰赶以致鞭笞，其范围遍及全校，这在北京当时的中学中是少有的。

3.1 砸抄“红旗”总部

“红旗”是二附中校内第一个公开与“红卫兵”的极左相对抗的群众组织，与红卫兵前后建立，成员基本是“红五类”出身同学，其与红卫兵的基本分歧就是不同意“对联”的“绝对如此”并公开写大字报进行辩论。“八二五”事件突然发生，红卫兵找到了打击“红旗”的理由，诬其为“黑保护伞”“反革命组织”。红卫兵王×带人砸抄“红旗”总部（在图书馆小院），桌倒椅翻，书籍纸张等到处乱扔，书包等物品被扔出甚至扔到房顶上，……在场人员被殴打围攻谩骂侮辱扣押。

发“驱赶令”，砸抄全部持不同意见者及“出身不好”的同学宿舍，将其驱赶出学校。实际上，红卫兵成立之初即有人有此意图，要把“出身不好的”同学赶出宿舍食堂，“八一八”之后已经有实际行动——将与之辩论的王学忠同学驱赶出宿舍（见王骥《疯狂的时代，血的记忆》）。而“八二五”事件，引发了红卫兵疯全面驱赶同学的疯狂举动。

“红旗”成员曹新书同学被打出学校，她家在外地，是张园园及其父母收留了她。时隔近五十年，曹新书充满深情地写道：“是她们一家保护了我，接受了我，供养了我。使我这个当时北京没家的孩子有了可以自由出入，吃住有保障的家。当时红卫兵把异己者都轰出了学校。把住校人的铺盖卷都从宿舍扔出来了。不知是哪位好心人把我的铺盖放到了储藏室。致使我去青海工作还有一套被褥……”王志乐、冯小健等同学的被褥物品被红卫兵从四楼扔出窗外。冯小健当时就跟他们吵起来。

张新同学：“八二五”那天，我的行李也被扔出来了。我们班红卫兵领着去的，他们不能说我是狗崽子，我父亲到底是国家计委的党员干部；因我文革前是班里的支部书记，就说我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孝子贤孙”。工作组当时就整肃学生干部，班里开会揭发批斗。红卫兵继续工作组这套，整学干部。我家65年搬到外地，没地方呆，我只能拿着行李跑到礼堂舞台后面，那里堆着烂桌椅，我用椅子拼着，住了十来天。后来看宿舍南头11号，没锁门，很杂乱，有一空床，我就凑合住下。

陈天感同学：那天我上午没在学校里，回校发现，我的被褥、脸盆、各种用品都被红卫兵扔了，灯泡都给拧下来了。我们宿舍的几个同学和我的被褥东西全找不到了。不能在学校宿舍住，我们只好到处混。记得在邮电学院一个同学家住过，在北京火车站候车室混过。后来回到学校，没有被褥，只能铺着报纸睡觉。

刘贺先同学：8月26号，我去学校是去拿行李，老兵儿（即红卫兵）把咱们轰出宿舍，你（指季烨）也是。咱们的行李铺盖什么的全给扔出来了，他们把我的行李都从窗户扔了出去，走廊里也到处都是。后来他们都走了，我到楼下收拾了自己的行李，当时下着小雨。

高一2班的同学回忆，他们班年龄刚刚16岁的H××被赶出宿舍，只能睡在北师大操场台子上。她的父亲是周恩来总理亲自任命的某导弹研究所所长。

3.2 殴打、侮辱同学

“八二五”当天，曹新书、郭振等“红旗”成员都挨鞭打甚至被掴耳光。“红旗”被砸抄后，从校外赶回来的红旗成员许××同学，一进学校即被红卫兵殴打。红卫兵命“红旗”成员李×同学当众脱下衣服，不允许她穿军装，使她倍感受侮辱。

8月26日“红旗”领导人之一李南生同学来到学校，即被围攻鞭打，是一群小红卫兵，他根本不认识。

红卫兵王×用皮带抽打曹新书，一边打一边吼：“叫你不觉悟！”意思是曹没有及时站出来，像她那样批判姜培良和参加红卫兵。该红卫兵知道曹出身好，文革前和曹关系还不错。像这样陷“好友”于敌的，还不止这一件。

红旗成员许建忠当时也外出了，下午三点多钟，王谦带人抄查了红旗小院，碰见许建忠，上去打了他一耳光。

钟山同学被殴最甚。钟山同学反对“对联”并与其他同学共同发起组建“红旗”，遂被红卫兵忌恨；文革初起钟山同学的父亲钟伟将军所谓“彭黄

死党”问题被传达到解放军大校级，更引发二附中红卫兵对其仇视，诬其为“红旗内参”“黑参”。曹滨海事件发生，她遂被诬为“曹滨海的黑后台”，遭到红卫兵残酷迫害。26日，她听说“红旗”被砸抄、人员被扣，遂赶到学校，一进校即被本班红卫兵头头拉进宿舍，接踵而来的是扇耳光，罚跪，抡军用皮带抽打，抓住头发用剪子乱剪。军用皮带铜头抽在眼睛上，眼睛立刻出血、黑肿、封住了；拽搡推打中两只鞋子都被打脱落了。钟山同学说：“他们说要把我押到十万人大会上去陪斗。那个大会要是真开成了，我能不能活得成就不知道了。”

刘绮菲同学说：“八二五”那天，我在宿舍，同学G××喊我（厉声）：“刘绮菲，过来！”把我带到小宿舍，进门看见钟山坐在床上，光着脚，头发好像已经给绞了，几个女红卫兵，又高又壮，拿着皮带，冲着她当胸就抽！夏天啊，就穿一小薄单褂，啪啪地抽！钟山什么也不说，一句话都不说，好像也没叫唤。我站那就想：打完她该打我了。我也什么都没说，说什么呀！也不知为什么，有一个初中红卫兵冲着我大喊一声“滚！”我赶紧跑了，躲出去了。

刘贺先同学说：我一进学校，就看见钟山被一群红卫兵推推搡搡的从宿舍往外面走，头发被绞得乱七八糟，眼睛被打黑了封住了。我问：“钟山你是怎么了？”钟山说：“她们说我是狗崽子。”记得在场红卫兵好像说要让她第二天陪斗。

刘贺先祖辈是工人贫下中农，父亲是普通职员，也被推进对面大宿舍，踢膝盖窝罚跪，鞭打。她眼睛被打伤，头发剪得乱七八糟，有家不敢回。

季烨被勒令回校取行李，8月26日回到宿舍，见行李衣物等全被扔出来。小红卫兵一边往走廊扔她的衣物鞋子等，一边谩骂侮辱。红卫兵王×打完钟山，看见季烨，即将其推进大宿舍，劈头盖脸，挥鞭便打。本班红卫兵1×在一边挥鞭助阵。期间季烨不肯下跪，即被他们从后面猛踢膝盖窝致其跪倒，鞭打中侮辱谩骂，不一而足。此前因季烨参加一些不同意见者的小型聚会，又不肯向闻讯带红卫兵来镇压的王×低眼示弱，引其怀恨，本次殴打侮辱季烨，借机报复的成分很大。

张新同学：我挨过打。出校门，G××正气势汹汹的，叫住我，她是初二的，打人厉害，上来抽了我几皮带，还骂了我几句。她是主动打人。高中王×闹得厉害，在女生里表现突出。

初三一班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全被逼跪在教室里。

刘绮菲同学看见操场上，一个初二的小男生被一群红卫兵追着毒打。她看见这个小男生挨过好几次打，高中朱景龙同学保护过这个小男生。

64 级文科班一位男同学在操场上被一群初中红卫兵毒打。

高三二 Y××同学在操场被围攻，裙子都被铰破了。

高一刘××同学“八二五”事发时不在场，下午来到学校，迎面碰见王×，她挥鞭就要打刘。因为刘观点与红卫兵不同，在大字报上签名。

“八二五”当天下午3点，朱元同学从三楼教室出来，即被高中一个女红卫兵带着一群小红卫兵围攻，他们喊着“保皇派”“走资派大红人”“这回你见识了红卫兵的厉害了吧”之类，鞭子围着朱元身体抽来抽去的，有七八次，但没有落到他身上。朱元分析说，那女生过去跟他一起做团的工作，很熟悉，没好下手，要是换了其他人，鞭子肯定早抽下去了，她眼都红了。另外，自从被工作组批判彻底孤立后，朱元没有怎么说话，小红卫兵不太了解他，所以没有真打。

3.3 几点说明

打普通老师同学时，多数红卫兵没有动手，暴行多是初中红卫兵所为。高中生打人的是有数的几个人。一些红卫兵在缓和暴行时还是起了作用的，

如：文科班那位男同学在操场上被毒打时，是同班一位女红卫兵赵××上前制止解围的。钟山遭毒打扣押，最后是在场的同班同学红卫兵刘C一边骂骂咧咧的一边连轰带护地把她放离了现场。王志乐的行李被扔下四楼后，他直接找红卫兵领导贾××理论。后来贾××制止了这几个小红卫兵往窗外扔行李。王×要打刘自芦同学时，被红卫兵领导之一钟××制止了。

季烨在挨打时大声喊叫抗辩，却没有像钟山被打那么厉害。原因之一是之前钟山被打的惨状，让打人者有点心虚了。同学毕竟不是最高领袖钦定的直接打击目标。胡依年同学说，“八二五”之前，她看见在烈日下一帮小红卫兵往高云脸上身上泼开水，她就去找红卫兵头目李WL，说：高云有高血压，你该制止他们这么胡来。李WL当众训斥了胡依年，但事后还是去制止了。她们文革前有过接触。

四、结束语

这里所列材料，仅只是我个人有限范围内了解的事例，到底有多少师生被侮辱谩骂殴打抄家批斗，我无法统计。在校内，除了大庭广众之下众所周知的虐杀樊西曼、姜培良、靳正宇之外，二附中红卫兵有没有打死过外面抓来的人？二附中红卫兵在校外到底抄了多少家、打了多少人、打死了多少人？更是难以统计。当年参与其中的红卫兵特别是红卫兵头头们不出来说明，恐怕是永远的谜。

2016年2月份，在这一事件中被砍伤的陈涵实及其他当事人，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召开座谈会，回顾了曹滨海事件的详细经过，使这段痛史的得以厘清。会上，陈涵实等人表达了对受害人的深刻歉意、对本人当年行为的深刻反省。■

【序跋】

信史，在民间不在府衙

——《师劫：北京师范大学文革亲历者文集》序

启之

大学老五届和中学老三届，是乌托邦的祭祀，毛时代的牺牲。“青春无悔”固然可以换取安宁，但是这种“认知失调”不过是自我麻痹。“选择遗忘”固然可以免于失眠，但它逃避了痛苦，也逃避了责任。

回忆往昔，追索因果，付诸文字：苦痛而艰难。核实真伪，联系出版，编辑出书：繁琐且劳神。自掏腰包不说，还要顶风冒险。而在这期间，如果你有什么差池，往往怨声四起——天下的事就是这样，啥也不干的，是好人。一旦干点事，指摘就来了：说你想出名，说你有派性，说你有支配欲，说你自己不消停，还不让人家安静……所以，编这种书的，不但要有勇有谋，还要有境界，有涵养，有胸襟，有担当。

在北京高校的老五届中，不乏这种自找苦吃的人——清华有孙怒涛、唐金鹤、胡鹏池……北大有胡宗式、章铎、王复兴、张从……地院有蔡新平、孟繁华、朱德瑜……人大有高宁、李豫生、陆伟国……北师大有刘明、赵惠中、蔡鸣乔、丛立新……北师大虽然姗姗来迟，但是他们的起点并不低。

这文集中的作者，有的我见过，有的只是神交。这文集中的文章，有的早就读过，有的第一次看到。无论认识与否，无论文字高下，这些人都值得敬重，因为他们有承担，有历史感。他们知道，与其歌颂母校之荣光，不如牢记师道之耻辱。“‘文革’不是

‘国难’而是‘国耻’。‘国难’是外族强加于中华民族的，‘国耻’是中国自己折腾自己，自己作践自己。”¹ 其作践的，首先是自己的人民，而人民之中，首先是精英，是文化人，是知识分子。麻木者沉沦，知耻而后勇。反思文革，就要记住“国耻”，而记住“国耻”的第一步，就是把自己当年的经历见闻、所思所想记录下来，汇集而成，付之梨枣，传之网络。

近十年来，文革研究出现了三种趋势：一是从通史转向专史；二是从官方转向民间，三是从政治转向思想文化与社会生活。专史是通史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专史包括地方史和单位史。单位史首先是高校史。校方编写的大事记，对十年浩劫，或遗漏，或曲解，甚至只字不提。《北京师范大学111年发展历史大事件概记》，从1959跳到1978，1960至1977只字不提。这18年间千万人的苦难，近百人的死伤，学校的混乱，学业的荒废，煌煌校史置若罔闻。² 官家编撰的高校史中的文革，既粗陋，又浮夸，以弄虚做假为能事：“1966年后，师大经历了10年动乱的浩劫，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北京师大广大师生员工忠于职守，坚持科学教研工作，并取得了卓越成绩。”³ 这54个字来自北师大校史。师大红卫兵在曲阜的暴行，极左思潮对教育的破坏，斯文扫地，文化倒退，堂堂校史视而不见。

“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

¹ 单少杰：《大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兼论“猫论哲学”与“戏子文化”》，载启之主编《中华学人文革论文集》（三）第2页。美国华忆出版社，2019年。

² 北京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北京师范大学校史研究》<https://sdxs.bnu.edu.cn/xsyj/sdsj/>

³ 同上。

个耻臣戎。”官府、高校、校史不断地提醒着人们，几十年来的主旋律无非就是掩盖“国耻”，充沛天地之间的“正能量”，无非就是粉饰“国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制造着新的国耻！

退休之士、草根之民，有大音声起——清华、北大、地院、人大，以及北师大的老五届，用自己的行动，昭示着这样一个事实：真正有学术价值、秉笔直书的高校史，在闾阎不在庙堂，在民间不在府衙。

高校史的基础是史料的整理和亲历者的回忆。而最重要的亲历者是当年群众组织的领导。北师大之所以落后于清华、北大和地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派头头的缺席——“井冈山战斗团”的头头谭厚兰病故，造反兵团的“一号勤务员”沉默。三年前，我曾与这位一把手见面，劝她写写当年。她说忙。她的先生告诉我，当年为了逃避“现反”的命运，他逃出母校，逃离北京，没有钱没有粮票，靠做木匠活儿，打黑工维生，手上磨起了厚厚的茧子……他的叙述，让我知道了，当年北师大造反兵团受到的迫害，兵团成员处境的危殆，票证时代生存的艰辛。把这些经历用一个“忙”字雪藏深埋，很符合“宜粗不宜细”的歪理邪说，但是一个时代的不公，一个群体的苦难，也随之消逝在历史的黑洞之中——最应该说话的没有说，是这本文集最大

的遗憾。

编《记忆》的经历告诉我，高校史的编著者是“三多一少”。

三多：一是亲历者多。这些人多是当年的大学老五届。二是老者多。他们都是40后，年纪都在古稀以上。三是业余多。这些人所学专业绝大多数是理工科，出身文科的占少数，学历史的更是寥寥无几，以本书为例，刘明、赵惠中、蔡鸣乔全是物理系毕业，蒋世信学的是数学，他们的专业离史学远得不能再远，他们投入文革研究，不是教学的需要，不是领导的安排，而是出于兴趣和责任。他们不但挣不上钱，评不了职称，还要做出各种牺牲——从贴钱费力，到失去安全感。

我所说的“一少”，指的是中青少。80后，90后不必说，就是60、70后关心高校文革史的，也极为罕见。这“三多一少”意味着，民间学者任重而道远。

“师劫”二字，沉重而深邃。它以极简之笔，揭示了文化大革命毁灭文化的本质。人生是一个长征，此文集的作者们，用晚年的步武，丈量出人生的意义。用余生的光和热，温暖了后人，照亮了历史。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看到文集（二）的问世，而所有的雪藏深埋，都会付诸笔墨，留诸后世。❷

【序跋】

借鉴前覆 展望未来

《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第二集）》序

乔晞华

友人王复兴主编邀我写序。本书的主编、作者们均比我年长，作为文革研究的后学，我实在不敢当。但是盛情难却，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敬意，写一点我的想法权作为序。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革的群众运动始于北大，终于清华。北大在文革史上，尤其是文革群众运动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不了解北大的群众运动，就不能了解文革的群众运动，也就无从了解文革。本书 29 位作者的 33 篇力作，为人们进一步展示了北京大学的文革历程，描述了北大文革的全景画面，提供了亲历者们的深刻反思，实乃功德无量。

文革不能简单地定义为“内乱”（即“内乱说”）。这是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的定义。“内乱说”把文革描述为一场权力斗争，把民众描述成为无知、非理性、无意识的群氓，在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中只是无足轻重的棋子而已，根本没有必要在文革的官方史中写上一笔。更重要的是，“内乱说”把保守派和各级领导在文革中的罪责一笔勾消，邓及其追随者被打扮成文革的主要受害者，掩盖了真正受害者是“黑五类”的事实。

文革也不能简单地定义为一场政治运动。这是一个“文革说”学者对文革的定义。该派学者忽视了政党运动（Campaign）与群众运动（Movement）之间的本质区别，将两者混为一谈。该派学者认为群众运动的目标既非改朝换代、也非推翻国家政权，只反官僚不反皇帝，连古代的造反者都不如。他们对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视而不见的错误源于

一个过时的理论框架——“乌合之众论”（the Crowd Theory）。他们认为，亿万群众卷入文革是由于林彪和“四人帮”的蛊惑和挑唆、是不明真相，造反群众是疯子、逍遥群众是傻子。非常遗憾的是，“乌合之众论”早在上世纪的 70 年代就已经被西方学界摈弃了。

文革也不是西方学者定义的为期三年的“社会冲突”（即“社会冲突说”）。西方学者在分析文革群众运动时运用了马克思的“社会冲突论”，把文革中的矛盾归咎于集团利益冲突。家庭出身问题成为突出的矛盾，保守派由出身好的人组成，造反派中出身不好的占多数。阶级背景的对立转化成群众的派性。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社会冲突论”在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被更新的社会运动学理论所取代，淡出了西方理论界。

“内乱说”把文革作为十年一起否定出于政治考虑，造反群众成了诬陷、阴谋和暴力的代名词，成为容量巨大的替罪羊。而罪魁祸首却仍被奉为神明，只是小错而大英明。“社会冲突说”可以撇清当局对造反群众的妖化。文革中的群众运动虽然有其独立性，应该与党的运动区别对待，但是群众运动并不像西方国家里的民主运动那样享受真正的自主权，并不完全独立。由于忽略了中国国情，西方学者一边倒地持文革三年期的观点。

文革也不是部分海外华人学者所说的“人民革命”（即“两个文革说”）。深受“社会冲突说”影响的海外华人学者大多亲自经历过文革，对中共及其体制有深刻的理解。该派学者认为文革的群众运动是一个利用皇帝打倒贪官污吏，争取自身权力的不

自觉的帶有民主色彩的人民革命。在他们看来，人文革不是乌合之众心理的非理性爆发，而是一个具有明确目标和策略的群众运动。“两个文革说”的学者通过他们自身的经历和使命感从正面来描述文革的群众运动。

但是在一个重要问题上，“一个文革说”和“两个文革说”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两派学者忽视了西方社会运动学，没有认识到：“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群众运动属于改革运动。是改革而不是推翻现存整个体制的革命。文革涉及全国亿万民众和中共的各层官僚。文革不是内乱，不是革命，也不能用政治运动一言蔽之。文革是一场不同的集团之间，为谋取各自利益的斗争，是诸多的决策主体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和对自身能力的认知，做出有利于自己决策的一场经济和政治斗争。文革是党内以毛林和中央文革等为首的激进派，以周恩来等为首的温和派，以刘邓等为首的保守派，与党外群众运动中以上海工总司、广东旗派、湖南湘江风雷等为代表的激进派、以清华四一四派、四川重庆八一五、江苏 P 派等为代表的温和派，和以广西联指、湖北百万雄师、新疆三促等为代表的保守派，六个集团间和集团内进行的一场不完全信息的非合作式的博弈（即“博弈说”）。此即本人的六派博弈说。

文革的前三年中，党内、外的激进派和温和派联合起来对付党内、外的保守派，保守派无情地打压民众的激进派。当保守派垮台以后，民众的激进派与温和派发生分裂打派仗。党内的激进派内斗，导致林彪集团倒台。此后，民众的激进派与温和派同时受到残酷的镇压。文革的后七年，是党内的激进派、温和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最终以激进派的彻底失败告终。文革是一场混战，六个集团没有固定的同盟，没有长久的利益，没有真心的合作，各打各的算盘，是一场非合作式的博弈。

文革的群众运动最终失败了。群众运动是被自己的内讧打败的。因“窝里斗”而最终被淘汰、被收拾、被镇压。认真总结他们失败的教训，对今后的民主运动不无益处。被歪曲的文革群众运动史使我们不能正确地理解文革群众运动与民主运动之间的联系。在“内乱说”的影响下，造反群众与流

氓成为同义词，受到民运人士的抵制和排斥。民运人士没有汲取前人的教训，后果是令人痛心的。尽管中国的民运人士鄙视文革造反群众，可是他们却依然继续在犯先驱们同样的错误：不包容、不妥协、无休止地争权夺利，直至自毁。在文革中，群众运动好歹还造就了一批叱咤风云的领袖，领导数万、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民众进行抗争。而今天的中国民运却是一盘散沙、毫无战斗力，比当年的造反群众还不如。这正应了美国哲学家 Santayana 的一句名言：“忘记过去，必将重蹈覆辙。”

文革结束已有四十余年，中国虽曾发生过几次大规模的民主运动，自从 1989 年民运遭到血腥镇压以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有影响力的民主运动。但是中国民众的抗议活动却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相信：由无数抗议活动组成的社会运动将使专制国家向民主化发展。

采取经济改革开放但拒绝政治改革的一些中东国家在“阿拉伯之春”的革命浪潮中先后倒台了。一个社会地位低下、无权无势的突尼斯青年的自焚竟然能够导致巨大的中东社会变革是任何人都没有预料到的。在中东革命运动中，突尼斯成功地和平转型实现了民主，成为颜色革命的范例。这是因为各派革命民众妥协的结果。“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后，突尼斯举行了制宪议会选举。温和的伊斯兰政党“伊斯兰复兴运动”成为突尼斯第一大党。在过渡政府中各党的合作并非一帆风顺。伊斯兰政党与世俗政党在权力配置、宗教地位、公民权利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分歧。由于经济下滑，伊斯兰政党为首的过渡政府危机重重。伊斯兰政党选择对世俗政党做出妥协。突尼斯举行了正式议会选举，该党失去了第一大党的地位，由“呼声党”取而代之。2015 年 2 月，突尼斯新政府宣誓就职，标志着突尼斯过渡期平稳结束。

2015 年 10 月 9 日，诺贝尔奖委员会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突尼斯全国对话大会”，以表彰其在突尼斯政治过渡中所做出的卓越贡献。突尼斯和平转型的成功经验，值得中国民主运动重视。

（下转 162 页）

【综述】

文革时期省级领导干部沉浮录

——地方干部、军队干部、群众干部的情况综述

石名岗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是指内部，当权派是指领导干部，至于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共中央从来没有提供一个明确可行的标准。这就把所有的干部推上了风口浪尖。干部之间的内斗成了这场旷日持久的群众运动的重要内容，而领导干部的起落成败，则关系到各派力量的消长，由此增大运动的不可控性和不确定性。因此，研究文革中的领导干部的作用和命运，对深入认识文革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以省级领导干部为考察主体，中央干部，其他干部，包括部委的领导干部也有不可避免的涉及。

一、干部情况概述

1. 文革中省级干部的类型：地方干部、军队干部和群众干部

干部是路线、利益、思潮的载体，要详细论述干部在文革中的功能，首先应当对干部进行分类。文革中的省级干部有地方干部、军队干部及群众干部三类。下面分别叙述。

地方干部，指中共建政后，在各省市自治区的党政事企等部门从事领导工作的人。有的还担任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地方干部是文革对象“走资派”的主要载体，在文革中受到极大的冲击。

军队干部，指中共建政后，在军队中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人。而军队在文革历史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军队干部的意向不可忽视。

群众干部指的是在“三结合”中被选入省级领导班子的群众代表。这些人分两类，一类是文革中造反组织的领袖，一类是文革前受到国家表彰的劳动模范。前者的最高代表是王洪文，官至中央副主席；后者的最高代表是陈永贵，官至国务院副总理。

2. 三种干部的“山头”

由于中共发展历史原因，三类干部有自己的“山头”。就地方干部而言，“山头”就是各个时期的根据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有中央苏区、鄂豫皖、湘鄂西、陕北四大根据地。抗战时，从山西开始，主要开辟了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鲁西、鲁南、胶东、渤海、滨海等）、华中（皖中、皖东、皖东北、苏南、苏中、苏北、豫皖苏、皖南等）等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南下或西上干部大多来源于晋绥、晋冀鲁豫、山东等战略区，大致区域是西北、西南为晋绥、晋冀鲁豫所占，中南为四野干部和部分晋冀鲁豫所占，上海、江浙、福建为山东、苏北所占。

除根据地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还有北方局的地下工作系统。

对于军队干部来说，“山头”可概括为五个野战军：西北野战军（一野）、中原野战军（二野）、

华东野战军（三野）、东北野战军（四野）、华北军区野战部队（军委直属）。

西北野战军，即第一野战军。一野的前身是红二方面军，主要有红二、六军团组成。抗战时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120师。解放战争时期发展晋绥野战军，后与陕甘宁联防军合并成一野，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副政委习仲勋。副司令员张宗逊。

中原野战军，即第二野战军。二野的前身是红四方面军。抗战时改编为八路军129师。解放战争千里跃进大别山后编为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

华东野战军，即第三野战军。三野的前身是中央苏区长征后留南方的部队，由项英、陈毅负责。抗战时改编为新四军。解放战争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副司令员兼副政委粟裕。

东北野战军，即第四野战军。四野的前身是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下辖红一、三等军团，到陕北加入红十五军团。抗战时改编为八路军115师。解放战争115师大部进入东北，成为东野，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

华北军区野战部队（军委直属）由晋察冀野战军和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组成。晋察冀野战军由115师一部（聂荣臻）扩大而来，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委薄一波。

就群众干部来说，其“山头”没有地干、军干那么久远，大多是在文革中形成的。有两种分法可以参考。

一是按他们所拥护、追随的干部的“山头”划分。如上海王洪文，文革一直跟随张春桥，可以划在柯庆施（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张春桥线上；又如山西李顺达，文革中一直与军分区站在一条线上，应归于军区“山头”。

二是可按“造反派”与“保守派”分为两个“山头”，这是在老保皇派（指官办的群众组织，大多在批判资反路线后解散）消亡之后，由造反派队伍分裂而形成的。这种分法不是绝对的，首都“三司”是造反派的代表、首都“一司”“二司”是保守派的

代表。从思潮上讲，清华团派和四一四派是两个山头的代表。

两种“山头”划分之间似乎没有内在的有机联系，但是群众组织没有干部进行支撑是无法长久存在的，他们的政治态度总是被他们拥戴的干部所决定。

1. 三种干部的政治分类

按路线分类，路线所指是社会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修正主义）之分。

早在建政初期，党内就产生了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新民主主义道路的分歧。大跃进之后，又出现了关于人民公社的争论，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的《万言书》实际上是这种争论的一次大爆发。

按对文革的态度分类。文革十年，革命者、被革命者和反革命者都有自己的立场，而且这种立场是在变化的。

从文革的实际进程看，文革目标不仅仅是反修反资，而且下层群众也有着急切的反腐反官僚的愿望。这就是文革有了一个矛盾的目标，反修反资具有反进步的倒退作用，反腐反官僚具有反封建的进步作用。所谓“走资派”是两者的载体，很难让一般人区分开来。

如果群众干部按对文革的态度分类的话，就是在“走资派”数量上的分歧问题。

造反派干部认为“走资派”占领导干部的大多数，其思想代表作是长沙一中学生杨曦光写的《中国向何处去》，矛头指向“红色资本家阶级”，欲实现公社理想，思想基础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保守派认为“走资派”是极少数，其思想代表作是清华四一四派周泉缨的《四一四思潮必胜》，反对矛头对准大部分干部，思想基础在实质上还是“新民主主义理论”。

因之，不能把群众干部的观点简单地看成“派性”，其实派性中包含着有关中国命运的大道理，

只不过体现在一些似乎细微的问题上。

文革中把支持文革、领头造反的地方干部称呼为“革命干部”。其余的干部毛泽东似乎是在考察，是否“走资派”“交给群众先斗一斗”再说。实际上大部分地方干部对文革持有抵触态度，因为他们不认为自己是“走资派”，也不愿意作文革的对象。至于那些认真落实六十年代初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和“三自一包”政策的干部，他们在主观上也不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认为是“权宜之计”。

军队干部自成系统，不参与地方事务，但在1967年1月21日毛泽东批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之后，军队开始大规模介入文革。后来的事实证明，大部分军队尤其是地方军区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站在了保守派一边，原因当然是军队干部与原来各战略区的地方干部息息相关。

二、各省革委会成立前后干部的分布

从1967年1月开始，到1968年9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开展夺权并成立新政权革命委员会，历时二十个月左右，可见建立新政权之复杂之艰难。我们在此把革委会成立前后各省一把手的情况分列如下（按革委会成立时间为序），供读者了解干部分布和各类干部对文革进程的影响。

1. 1967年1月至4月

黑龙江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7年1月31日。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出身山东分局。革委会主任潘复生。

山东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7年2月3日。原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出身华东局（新四军）。革委会主任王效禹，原青岛市副市长，出身山东分局渤海区。

上海市，公社成立时间：1967年2月5日。原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出身华东局（新四军）。革委会主任张春桥，原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文教、宣传），出身晋察冀。

贵州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7年2月13日。原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出身晋冀鲁豫太岳区。革委会主任李再含，原贵州省军区副政委，大校，出身二野。

山西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7年3月18日。原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出身晋冀鲁豫太岳区。革委会主任刘格平，原山西省副省长，出身北方局，山东分局渤海区。

北京市，革委会成立时间：1967年4月20日。原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出身北方局。革委会主任谢富治，上将，原公安部部长，出身红四方面军，晋冀鲁豫太岳区，二野。

2. 1967年8月至12月

青海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7年8月12日。原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出身北方局。原省长王昭，出身华北军区野战部队19兵团。革委会主任刘贤权，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少将，出身四野。

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时间：1967年11月1日。原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乌兰夫，出身北方局内蒙工委、晋察冀，上将。革委会主任腾海清，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少将，出身红四方面军、三野。

天津市，革委会成立时间：1967年12月6日。原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出身晋冀鲁豫冀鲁豫区。革委会主任解学恭，原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出身八路军120师、晋绥、晋中。

3. 1968年

江西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年1月5日。原省委第一书记方志纯，出身中央苏区、南方游击队，新疆统战、中央卫戍司令部。革委会主任程世清，26军政委，少将，出身红25军（十五军团）、115师、新四军、四野。

甘肃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年1月24日。原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出身红26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革委会主任洗恒汉，兰州军区第二政治委员，中将，出身一野。

河南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年1月27日，原省委第一书记文敏生，出身新四军。革委会主任刘建勋，原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出身晋冀鲁豫。

河北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年2月5日。原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出身晋察冀。革委会主任李雪峰，原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出身晋冀鲁豫太行区。

湖北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年2月7日。原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出身晋冀鲁豫。革委会主任曾思玉，原沈阳军区副司令员，中将，出身中央苏区、115师，华北军区19兵团。

广东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年2月21日。原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出身晋冀鲁豫。革委会主任黄永胜，广州军区司令员，上将，出身红一军团、115师、四野。

吉林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年3月6日。原省委第一书记赵林，出身北方局、晋绥。革委会主任王淮湘，原16军政委，出身八路军山东纵队、四野。

江苏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年3月23日。原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出身中央苏区、新四军、三野。革委会主任许世友，南京军区司令员，上将，出身红四方面军、八路军山东纵队、三野。

浙江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年3月24日。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出身红三军团、八路军山东纵队、东北局。革委会主任南萍，20军政委，大校（64年少将），出身北方局、八路军山东纵队，三野。

湖南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年4月8日。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王延春，出身北方局、晋察冀。革委会主任黎原，47军军长，大校（64年少将），出身陕甘宁、四野。

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年4月10日。原自治区第一书记杨静仁，出身陕甘宁。革委会主任康建民，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少将，出身二方面军、晋绥、华北军区。

安徽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年4月18日。原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出身北方局、晋察冀。革委会主任李德生，12军军长，少将，出身四方面军、

129师，二野。

陕西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年5月1日。原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出身陕甘宁、山东纵队、华东局。革委会主任李瑞山，原陕西省第二书记，出身陕甘宁、东北局。

辽宁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年5月10日。原省委第一书记黄火青，出身中央苏区、中央党校、晋察冀冀热辽分局。革委会主任陈锡联，沈阳军区司令员，上将，出身四方面军、129师，二野。

四川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年5月31日。原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出身红军总政治部、四川地下党、中央直属队。革委会主任张国华，原西藏自治区第一书记，中将，出身红一军团、115师、晋冀鲁豫冀鲁豫区，二野。

云南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年8月14日。原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上将，1967年1月8日自杀。出身西北红军、留守兵团、二野。革委会主任谭甫仁，昆明军区政委，中将，出身一方面军、115师、四野。

福建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年8月19日。原省委第一书记叶飞，上将，出身南方游击队、新四军、三野。革委会主任韩先楚，福州军区司令员，上将，出身鄂豫皖红二十五军、115师、四野。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年8月27日。原自治区第一书记韦国清，上将，出身一方面军、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纵队、三野；原书记处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常务副主席贺希明，出身新四军。革委会主任韦国清。

西藏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年9月5日。原自治区代理第一书记周仁山，出身陕甘宁。革委会主任曾雍雅，西藏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少将，出身一军团、晋察冀、四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年9月5日。原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兼乌鲁木齐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兼新疆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王恩茂，中将，出身六军团，120师，一野；原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武光，出身北方局、晋察冀。革委会主任龙书金，原广东

省军区司令员兼广州市警备区司令员，少将，出身一军团、115师、四野。

4. 小统计

从以上资料可知：

其一，文革前的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除潘复生、韦国清、张国华（调四川）外，三十六个被打倒或下台，占总数的近百分之九十，说明当时大形势的判断是“走资派”占多数。潘复生、韦国清、张国华的情况多少有点特殊。潘复生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突然单独造反，原因至今不明，也可能是他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自悟”的，也可能是像传言一样，说他与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的高干子女有联系，得到了“内部消息”；韦国清没有倒霉的原因也很特殊，一是他是“抗美援越”的总联系人，与越南的关系很好，二是他本身算是“军人”，与广西军区的关系很好，得到军区有力支持；张国华是军人，中印边境反击战的指挥者，西南边陲重镇需要他坐镇。

其二，文革前有军衔的干部担任一把手的有：乌兰夫（上将）、阎红彦（上将）、韦国清（上将）、王恩茂（中将）、张国华（中将）。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七。但乌兰夫、阎红彦、王恩茂主要负责地方党政工作，韦国清最多算半个军事干部。文革革委会成立后，军队干部数量增加到了二十个，占到总数的近百分之六十九。实际上，即便是地方干部做一把手的地方，多数省份也进行了军管，说明军队是文革的稳定力量。

其三，1967年5月前成立革委会的六个省市的革委会主任中，只有贵州一个省是军队干部，占百分之十六。67年5月到年底，三个省中有两个是军队干部，占百分之六十六。整个1968年，二十个省中，军队干部占十七个，达到百分之八十五。说明从1967年8月开始文革的局面变得越来越难控制。

其四，在二十个军队干部出身的革委会主任中，一野2人；二野3人；三野4人，四野9人；华北军区2人。说明四野干部有一定的特殊地位。

三、革命干部在一月革命风暴的作用

政权是一切革命或动乱的要害问题。文革既然是革命，或者是“动乱”，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政权问题。

到1966年底、1967年初，文化大革命已经到了解决地方政权问题的时候。当时的情况应该是十分混乱，原因有二：一是由于敌我阵线不分明，中央也不知道该怎样夺权，由谁夺权，夺谁的权；二是各省的领导干部都正在被造反派围攻，干部也和造反派一样正在分化中。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自然地出现了重点策划和自发夺权两种情况，实际上无论哪种情况，在夺权中，所谓革命干部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67年1月5个省、市发生的“夺权”斗争在文革史上被称为“一月革命风暴”。各自的夺权时间分别是：山西1月12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青岛1月22日青岛革命造反委员会（山东2月3日，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贵州1月25日，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黑龙江1月31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委员会；上海1月6日（上海夺权没有明确时间，各组织在2月5日商定成立上海人民公社，1月6日是上海反经济主义大会的时间，后来确定为夺权时间），上海工总司等十一个组织联名。刘格平、王效禹、潘复生、李再含（军队）、张春桥等革命干部表现的特别突出，使得这几个省、市的夺权有了各自的特色。

1. 山西特点：秘密奉旨

山西省夺权是重点策划的典型，而刘格平具备了重点策划的充分必要条件。秘密奉旨的意思是，中央本身也没有解决是否夺权、靠谁夺权、夺谁的权、怎样建立新政权的问题。但中央在策划地方省份夺权时，要求的条件是敌我基本分明。这个条件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策划夺权者认为夺权者是自己人；另一方面被夺权者至少不是自己人，山西正好符合这两个条件。山西就是一个试验品。

刘格平，行政三级，时任山西省副省长，八届中央委员。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主席，区党委代理第一书记，因犯“地方民族主义”错误，1965年被贬山西。刘格平之所以是自己人，与他的一个经历有关。1934年刘格平被捕，进入北平军人反省院（草炭子监狱），与刘澜涛、薄一波、杨献珍等六十多个共产党员关在一起。1936年，由于抗日形势紧迫，需要大量干部，中共中央北方局（刘少奇负责）决定，被关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党员，可履行一个自首手续出狱。当时有六十一位党员履行了手续出了狱。而刘格平没有履行手续，一直到1944年才出狱。文革初期，六十一人被打成“叛徒集团”，刘少奇被打成“叛徒集团头子”，刘格平成为“活证据”，自然成为“自己人”。另外刘格平曾在康生领导的山东分局渤海区工作过，又是“老熟人”。

卫恒，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按山头出身于薄一波领导的晋冀鲁豫太岳区，文革前还用公款补助过安子文的岳父，与彭薄安陶集团关系密切，自然“至少不是自己人”。

12月（当为10日——作者），周恩来、康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刘格平谈话。周恩来对刘格平说，毛主席要你站出来，山西省委瘫痪了，你回去找省委的一些同志组织一个小组，把工作管起来，注意要抓紧经济工作，特别是山西的煤炭很重要。当刘格平表示不好办时，周恩来说，不要紧，中央支持你。

刘格平返并后，积极联络了在山西不得势的几个外来干部刘贯一（省委常委、副省长，原为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犯错误贬到山西）、袁振（省委书记处书记，太原市委第一书记）、陈守中（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原为包钢党委书记）、刘志兰（省委农工部副部长，左权、陈守中夫人）、何英才（省委常委、政协副主席），写了五大人字报，公开亮相抨击山西省委。刘格平还联络总理打过招呼的省军区政委张日清，商讨夺权事宜。

1月12日晚，刘格平等五位干部及张日清、一些群众组织领袖在刘家开会，会间刘贯一提出夺权，得到与会人员的赞同。开始临时召集队伍工人、学生几千人，对省委、省人委机关进行了夺权。赴

晋大队的邢晓光起草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人民日报》1月25日刊登该通告并配发社论），提出“一切权力归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口号，夺权后，原省委的绝大部分领导被关进监狱。

山西的夺权有着标杆作用。其意义在于它提出“一切权力归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明确了领导机构。另一层意义是它创造了“革命三结合”（军、干、群）的夺权及政权形式。从过程上看，山西夺权更像一次政变。

2. 上海特点：自然夺权

上海是自然夺权的典型。张春桥、姚文元及群众干部徐景贤都是理论工作者，自然不能像革命家刘格平那样粗鲁，所以上海的夺权要自然的多。张春桥、姚文元早就是“自己人”了，1966年5月，张春桥担任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姚文元成为中央文革成员。

按徐景贤回忆录《十年一梦》的记述还无法说出上海是哪一天夺权的。下面是上海的夺权过程。

1月5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等十一个革命造反派组织的《急告全市人民书》，题目是《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该文件是由当时他们要打倒的对象、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签发的。

1月6日，上海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会上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市长）等十余位上海市委领导人。会议结束时，由北京体育学院驻沪联络站的一位女红卫兵，代表各造反派组织宣读了三条通令：

（1）宣布从即日起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和上海市长；

（2）勒令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七天内向全市人民交待自己的罪行；

（3）请求中共中央彻底改组中共上海市委，

命令各级干部坚守岗位。

这次大会被认为是上海夺权的标志，其实这次大会并未宣布夺权，而是等待中央改组上海市委。

在 1 月 5 日宣布打倒上海市委后，上海似乎一直处于权力真空状态，也就是处于一种“革命”状态。一方面是多个造反派组织走马灯式的宣布夺权而未遂。另一方面是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等“革命家”们在协调各造反派组织之间的关系，力争实现最大的“革命大联合”，并寻找一种新的权力机构形式。从这一点上讲，上海的一月革命像巴黎公社革命，更像一场“革命”。

上海的一月革命终于在 2 月 5 日结出硕果。经各组织协商，决定成立“上海人民公社”，2 月 5 日召开了百万群众参加的公社成立大会，宣布“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会上发表了上海公社宣言《一月革命胜利万岁》。

3. 山东特点：自下而上

山东是自下而上的典型。王效禹是山东夺权的代表性人物，时任青岛市副市长。

1966 年 8 月 25 日，青岛发生了一件震动全国的“八二五”事件，当时职工和红卫兵出现冲突，职工保青岛市委，红卫兵反青岛市委。只有青岛市政府副市长王效禹一人公开支持红卫兵，得到毛泽东赞赏。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原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康生的养子张子石，是青岛市教育局局长。王效禹造反时紧紧抓住张子石，同康生建立了直接关系。再加上王效禹以前就认识康生，因此有了政治依靠，王效禹在山东成为响当当的革命造反干部。

1967 年 1 月 19 日，康生、王力通过张子石等人向王效禹打招呼，让王效禹在青岛市“夺权”。1 月 22 日，王效禹发动夺权，驻青岛部队 67 军支持了夺权，成立青岛革命造反委员会接管了政权并中央承认。

1 月底的济南，各路人马为夺权激战正酣，局

面甚乱。王力等人又授意王效禹到济南市夺取山东省委的“权”。1 月 31 日王带领由 22 人“轻骑”（青岛夺权代表团）突袭济南。青岛代表团发表《呼吁书》：“全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把山东省委、省人委的权夺过来”。

2 月 2 日，山东革命工人造反指挥部、红卫兵山东指挥部等 25 个群众组织 2000 多人在济南军区八一礼堂集会，宣布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成立，并去省委、省人委夺权。期间，济南军区的部队支持了夺权。其后王效禹担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

作为一个级别较低的地方干部，王效禹是一个善于捕捉时机、也捕捉到了时机的人，但正因为他的级别低，引起了许多老资格干部的轻视、敌视及鄙视，为他的以后工作造成了障碍。

4. 贵州特点：公开奉旨

贵州是公开奉旨夺权的典型。公开奉旨的含义是，是否夺权、靠谁夺权、夺谁的权、怎样建立新政权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中央已决定以“革命三结合”的方式进行夺权，并且“差不多的地方都要夺权”（江青语）。

李再含，时任贵州省军区副政委，贵州省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在邓振新编著的《贵州风云》一书中是这样评价李再含的：“毛泽东并不知道李再含何许人也，他是通过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介绍才知道李再含其人的。当时李再含身为贵州省文革领导小组中的军队代表，既给省委第一书记先后写了六封信提意见，又避开省文革领导小组向中央先后发了 18 份电报，反映了贵州省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王力觉得李再含能这样做很不错，便向毛泽东推荐。这是毛泽东赞赏‘军队出了个李再含，地方出了个王效禹’的缘起之一。”¹

贵州的夺权实际上是中央指挥的。1 月 24 日，根据毛泽东批示，周恩来派飞机接李再含、省军区司令员何光宇等贵州代表团十一人到达北京部署

¹ 邓振新编著：《贵州风云》，香港：中国国际文艺出版社，2014，第 2 页。

夺权。王年一在《大动乱年代》中说：“李再含1月下旬到了北京，在江青处受领了回去夺权的任务。江青对他说，差不多的地方都要夺权。”²

1月25日，贵州省、贵阳市及外地红卫兵四十个组织联合行动，夺取了贵州省委和省人委、贵阳市委和市人委的权，成立了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宣称“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2月13日，贵州省毛泽东思想革命委员会成立，李再含担任主任。

5. 黑龙江特点：自觉革命

黑龙江是自觉夺权的典型。潘复生，时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是全国第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单独带头造反的人。

文革开始后，潘复生对各地批判“三家村”持保留态度，尽量在保护受到冲击的一些干部。但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受到了“教育”，有所自悟，态度起了变化。

潘复生后来回忆说，1966年元月中央派我到黑龙江省委主持工作后，我整天想着一定要谨记在河南工作时的教训，千万不能再犯“右倾”错误了，一定要紧跟毛主席。谁知这次紧跟的结果，却犯了“左”的错误。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是文革中全国著名的造反组织，哈军工有许多中央高干子女，消息灵通，造反积极性特高，毛主席的侄儿毛远新就出自哈军工。潘复生与哈军工红色造反团联系密切，这也可能是潘复生抛开省委，单独率先造反的原因之一。

1月28日下午，红色造反团等31个总部的联席会议在北方大厦三楼会议室召开。师院学生范正美在会上提议开始夺权。

范正美说：“我们搞军、干、群三结合，红色造反团联合总部负责人，同省军区驻军首长和省委、省政府里的革命干部代表联合夺权，以军队为后

盾，这是对《二十三条》的发展，也是学习山西等地解放军参加夺权的经验，有利于建立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革命权威。”³

他的这个发言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认同。会议决定于1月31日召开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并准备以多路广播车和海报的形式通告全省。会前，造反派代表与潘复生、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23军军长游好阳进行了沟通，得到完全同意的结果。

1月31日，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召开，潘复生、汪家道、游好阳及东北局书记宋任穷参加了会议，会上宣读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第一号通告》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呼吁书》。《通告》宣告：“黑龙江省委、省人委的党、政、财、文等一切大权，自即日起，归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停止黑龙江省委、省人委的一切领导权。”之后，潘复生担任了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和顾问。如果不了解酝酿过程的话，从表面上看，这一切似乎都是潘复生一人导演的闹剧。

从一月革命的情况看，三个主要干部刘格平、潘复生、王效禹都是被打成了“右”的典型，长期不太得志，在文革夺权时积极起事，多少有“泄愤”因素。在一月革命中，群众干部走上历史舞台，最著名的有王洪文、陈永贵、徐景贤、王秀珍、李顺达等。

四、军干统天下

面对一月革命风暴，所有干部都面临着赞成或反对的抉择。这是路线和利益的抉择，其实路线也是一种利益，不过是某个集团、阶层、阶级的利益罢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由于大多数干部的抵抗和群众组织的分裂，各省革委会的组建遇到了极大的阻力，致使不得不用军队稳定局面，这就造成了文革中期的“军干统天下”的形势。

² 转引自《贵州风云》，第115页。

³ 引自网文，范正美长篇文革回忆录《秋梦追思》（四）http://blog.sina.com.cn/s/blog_8a5f29450102wk0b.html。2017-10-9

1. “二月逆流”和“二月镇反”

历史证明：越大的革命反对的力量越大。这是因为革命的变动越大，造成的动乱越大，触动的利益阶层越大，对原社会结构的破坏越大，因此，反制的力量自然越强。其实，在一月革命的同时，高层就对一月革命进行了强烈抵制，这就是所谓的“二月逆流”事件。

“二月逆流”是指在 1967 年 1 月 19 日至 20 日中共中央军委会议和 2 月 11 日、16 日在怀仁堂召开的两次政治局碰头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因对文革和一月革命夺权风暴的作法不满，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问题，与中央文革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过程中叶剑英、谭震林、陈毅、李先念、徐向前等都在会上作了激烈的发言。⁴

18 日晚，毛泽东亲自召开政治局会议，严厉指责了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人，随后，中央文革开始了反击“二月逆流”的行动。与此同时，在全国的许多省市，出现造反派冲击军队的事件，为此，1 月 28 日，中央军委下达了毛主席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的《八项命令》。《命令》中有对反革命分子冲击军队予以严惩的语句，据说叶剑英在传达《八项命令》时“故意”进行了“歪曲”。在这种条件下，依各地军队对《八项命令》的理解，出现了大量军队镇压造反派的事件，当时被称为“二月镇反”。

“二月镇反”实际上是下层的“二月逆流”，可以看作为是维护“走资派”利益的军队干部对一月革命风暴思潮的“逆反”。其中，青海省发生的军队开枪镇压夺权的造反派的事件震惊了全国。成为“二月镇反”典型。

1967 年初，青海省分成了两派，“八一八”派支持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捍卫”派支持省长王昭。当时的一般看法认为反王昭的“八一八”是造反派。但王昭得到省委大部分领导和以省军区

副司令员赵永夫为首的大部分驻青部队领导的支持。

1 月 29 日，身为中央文革成员的杨植霖向“八一八”派“和平交权”，这一夺权并没有得到军区及驻青 205 部队的支持，造成了“八一八”派强烈炮轰赵永夫和省军区的局面。

2 月中旬，“八一八”派率先抢占《青海日报》社，并派两千多人坚守。2 月 21 日，赵永夫与 205 部队副军长张晓川主持会议，确定二十三日取缔

“八一八”，武装占领《青海日报》社。23 日省军区调动独立师、独立团的部队，计十三个连，开枪用武力攻占《青海日报》社。按后来中央处理事件的会议上，赵永夫回答周总理问话说，该事件共伤亡 260 人。实际数字是：“八一八”派死 169 人，伤 178 人，共 347 人；军队死 4 人，伤 46 人，共 50 人。据说，当天晚上赵永夫向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汇报了情况，叶称赞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

后该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赵永夫被逮捕，张晓川、王昭（1970 年病逝于南滩监狱）隔离审查，刘贤权全面负责青海事务。

按徐友渔《文化大革命中的“二月镇反”》⁵一文的统计，除北京、上海、山西、山东、贵州等省份外，其他省份或多或少都有“二月镇反”现象，四川、福建、内蒙古、湖南、湖北、广东、江西、河南、吉林、河北、辽宁、天津、云南、西藏等省市自治区都有典型事件发生。

“二月逆流”和“二月镇反”是军队军干向文革路线的宣战，“大闹怀仁堂”事件、青海“二二三”事件就是宣战书。

2. 军干与造反派对抗焦点：“七二〇”

从 1967 年 3 月到 11 月，全国只有三个革委会产生。

在这八个月里，革委会产生之少的原因有二，一是说明斗争之激烈，军队“二月镇反”现象有力

⁴ 见百度百科词条“二月逆流”。

⁵ 《领导者》总 68 期，财经文摘，2016 年 2 月 25 出版，第 127—136 页。

地阻止了造反派擅自夺权，二是说明没有中央支持，革命干部的产生之艰难。

由于军队的支持，一般各地的保守派在逐渐激烈的武斗中占了上风。武汉“七二〇”事件就集中表现了这种矛盾。

“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说明了湖北人的厉害。1967年7月的武汉，文革运动进行的如火如荼，似乎比其他省份折腾得更激烈。武汉的两大派组织为“保”或“反”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发生了激烈的武斗。

反王任重的一派是“三钢（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三新（新湖大、新华工、新华农）”，保王任重的一派是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百万雄师联络站（简称百万雄师）。

当时的武汉军区司令员兼湖北省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上将采取支持王任重及百万雄师的态度，在两派的武斗中，当时湖北省军区独立师部分干部和战士及公安人员（当时公安系统已军管）都穿便装参加了武斗，百万雄师的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加强，造反派“三钢三新”在武斗中遭到重创，死伤了不少人。据1967年8月1日出版的《新华工》报报道：5、6两个月间，“三钢三新”方面，“已知死亡的一百五十八人”“受伤人员住院治疗，已查出姓名的就有一千零六十二人。如果加上散失在各单位和街道居民中的伤员，估计在三千人以上。”另外，“三钢三新”方面的有40万成员的工人总部早已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其主要领导人朱红霞、胡厚民被抓。

当时委派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的谢富治、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及空军政委余立金，到武汉解决湖北问题。谢富治、王力到达武汉后，按中央指示公开表态支持反王任重的“三钢三新”，并要求陈再道释放被抓人员，一下子惹怒了湖北省军区的部队和百万雄师。7月20日，军区警卫部队、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群众数千人，冲击谢富治、王力住所武汉东湖宾馆，围攻谢、王二人，中间推打了王力，撕破了王力的衬衣，并把王力劫持到军区，企图逼迫谢、王改变态度。

后“七二〇”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事件，被全国声讨。当时是周恩来、杨成武处理的武汉事件，陈再道最终也没有敢举旗造反，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一公开，百万雄师立即土崩瓦解，全国军干陷入极大被动。

3. 《八一社论》帮倒忙

武汉“七二〇”事件之后时间不长，由于一个事件的发生，使得军队干部的处境有了转机。

1967年7月31日，主管《红旗》杂志的中央文革成员关锋主持起草了一篇社论，题目是“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于8月1日发表。社论提出：“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

这篇社论在《红旗》杂志发表后，立即在全国引起震动。北京各大专院校的造反派们北上南下串联，联合各地造反派，“揪军内一小撮”。各地造反派趁势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制造事端，军地矛盾更加尖锐。全国的武斗已经不是大刀长矛的阶段了，主要武器开始升级为半自动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及六〇炮等。对于执政者来说，这种纷乱局面是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社论的精神和纷乱的局面，先是引起了林彪的不满，也引起了多数军队干部的不满。这篇火上加油的社论引起了毛泽东的震怒。8月上旬，毛泽东在上海看到这篇社论后，在旁边写道：“大毒草！”

“还我长城！”很显然，毛泽东对动摇军队的作法不能容忍。

毛泽东的这一批示，很快就传到了中央文革小组那里，康生否认自己说过“揪军内一小撮”这句话，陈伯达也赶紧把责任往下推。关锋作为主持起草这篇社论的人，难逃其责。毛泽东已经把目光锁定在“王、关、戚”三人身上。《八一社论》发表不到一个月的9月30日，主张“揪军内一小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1968年1月12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被隔离审查。把中央文革小组最骨干最得力的工作人员抛弃，说明这

是毛对军队干部的妥协，而军队干部对“揪军内一小撮”有强烈的反抗。

既然已经不揪“军内一小撮”，军队干部“支左”的积极性明显提高，各省两派的斗争越演越烈，已经形成了“局部国内战争”（杨曦光《中国向何处去》语），尤其以西南、广西、陕西、安徽、湖南为最，中央不得不一个省一个省的解决问题。

从1968年7月份开始，领袖和中央决心要收摊了，而收摊的办法只有依靠军队。过程中，中央发布了三个布告“七·三”（1968年针对广西），“七·二四”（1968年针对陕西），“七·二三”（1969年针对山西）布告，并派工（军）宣队进入清华大学，继而进入全国各大中专院校。

4. “七·三”“七·二四”布告安天下

1968年5、6月份，广西两派四二二（造反派）与联指（保守派）对峙已经到了中央无法容忍的地步。在广西自治区的柳州、桂林、南宁等地区，连续发生了一系列破坏铁路交通、抢夺援越物资、军队武器，冲击解放军机关、部队，杀伤解放军指战员的恶性事件。

7月3日中共中央针对广西乱状发布布告（简称“七·三布告”），《布告》要求：

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联，保证运输畅通，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解放军武器装备，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七·三”布告发布后，广西军区、联指联合行动用武力针对“四二二”执行布告，南宁、柳州、桂林等地区连续发生大规模镇压、屠杀造反派事件。之后，军区和联指又以清查“反共救国团”为借口，枪杀、刑杀、毒打、关押几十万四二二人员，广西全面军管，8月27日革委会成立，韦国清在广西的地位得到巩固，从此广西再无造反派，造反派拥护的干部谢王岗被打倒。

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

央文革小组特别针对陕西省发生的武斗不断升级，一些地方连续发生抢劫银行、仓库、商店，烧毁和炸毁国家仓库、公共建筑和人民房屋，抢劫车船，中断交通、邮电，私设电台，冲击人民解放军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杀伤解放军战士等一系列严重事件，颁布了《七·二四布告》，布告重申：

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七·三布告》，不得违抗，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抢去的现金、物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迅速交回，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产，中断交通通讯，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依法惩办。

陕西省收缴武器的过程比广西顺利得多，截止9月中旬，陕西省共收缴武器7万余件、收缴各种子弹近400万发和一大批手榴弹、炮弹、炸药和雷管。至9月底，陕西省各地的武斗陆续停止，武斗据点、工事、关卡被拆除，绝大多数地区的大宗武器基本收缴完毕，武斗带来的动乱局面得到控制。

5. 工宣队进清华

1967年4月，清华大学井冈山分裂为两派，即团派和“四一四”派。公认为团派是激进派，“四一四”派是温和派。1968年4月23日至7月27日，清华大学开始了清华史上著名的“百日大武斗”。据后来统计，“百日大武斗”导致18人阵亡，1100多人受伤，30多人终生残疾，直接经济损失折合人民币逾1000万元。

1968年7月27日，在毛泽东的策划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从60多个工厂抽调了3万多人（包含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组织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清华井冈山（团派）进行了抵抗，最后开枪造成5名工宣队员死亡，731人受伤。这就是闻名全国的“七·二七”事件。7月28日，毛召见北京五大造反领袖聂（元梓）、韩（爱晶）、蒯（大富）、王（大宾）、谭（厚兰），毛怒斥武斗不得人心，警告说：“现在是轮到

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此后，各地各校相继进入工（军）宣队，清华四一四的胡鹏池认为：“清华七二七事件”动因与后果的持续发酵，直接导致了毛泽东整个文革方针及主导思想的“变法”，从而导致了毛泽东最终抛弃造反派，导致了“红卫兵运动”的终结，导致了以“红卫兵造反派”为标志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的结束。

6. “七二三”布告收尾

“天下未乱晋先乱，天下已治晋未治”。夺权最早的山西，终于乱到了最后。在“七三”布告发布一年后，1969年7月23日，中共中央针对山西发布《七二三布告》，整顿山西乱局。

山西夺权后一个月，“三结合”分裂，革命干部刘格平就与负责支左的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产生了分歧。山西的两大派开始了长达两年的武斗，中央在“七三”布告发布一年后，针对山西发布“七二三布告”，其主要内容是：

双方立即无条件停止武斗，解散各种形式、各种名称的专业武斗队，撤除一切武斗据点，上交一切武器装备；武力强占地盘、拒不执行本布告、负隅顽抗者，由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包围，发动政治攻势，强制缴械；逃跑流窜者，由人民解放军实行追捕，归案法办；立即无条件恢复铁路、公路交通运输。撤销同蒲路南段非法的“三一八次”列车；对杀人放火和其他罪大恶极的现行犯罪分子，应当发动群众检举；对确有证据者，要列出他们的罪行，交给当地群众家家户户讨论，并依法惩处；自布告公布之日起，逾期一月不回工厂生产、不回机关工作者，工人、职员停发工资。如继续顽抗，长期不回者，责成山西省革命委员会视情况予以纪律处分，直至开除；凡分裂革命大联合、破坏革命三结合的行动，另立的山头，一律是非法的，中央概不承认。重新拉起的队伍，都要立即解散，实行归口大联合。

《七二三布告》发布后，经中央军委批准，六十九军副军长谢振华调动了北京军区驻晋各部队

（包括69军）及从河南调入的第一军的一个师，共二十多个团的部队，对全省实行了军管。

到1970、71年间，全国各省基本进入军管状态，一月革命中最著名的三个革命干部刘格平、王效禹、潘复生均已下台，分别被谢振华、杨得志、汪家道所替代。而文革结束了群众运动阶段。

五、典型群众干部剖析

每一次革命或动乱，都会涌现出许多“英雄”，这是因为革命或动乱解除了对人的旧法律和旧习惯的束缚，从而解放了人的“自然力”，文革也不例外。从文革的群众组织中涌现出来的干部，都是“人尖子”，在发动和组织群众方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把群众干部妖魔化当然是错误的，他们的造反既有“听党的话”的历史原因，也有自身处境的原因。

1. 红卫兵领袖聂元梓、蒯大富

全国第一个造反派非聂元梓莫属。聂元梓出生于1921年，16岁参加革命，行政12级，文革前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与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高云鹏、赵正义、李醒尘（均为北大哲学系教师）等六人贴出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发动冲击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和北大领导陆平、彭珮云而声名大噪，被毛泽东誉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二十世纪北京公社宣言”。

按身份，聂元梓应该是“革命干部”。成为红卫兵的领袖应当是历史的阴差阳错，估计聂元梓自己也没有想到她的一张大字报轰动了全国，轰动了世界，并引出了毛泽东的“我的一张大字报”，成为文革的开端。使她成为红卫兵的领袖，这就是“时势造英雄”，一个思想相对保守的人，却成了政治风云人物，等待她的，只有悲剧的下场。

全国第一造反派非蒯大富所属。蒯大富，1945

年9月13日生，1967届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学生。1945年9月13日蒯大富出生在江苏省滨海县，祖父是新四军的战士，父母都是40年代的中共党员。

“造反派红卫兵”的群众干部大部分是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产生的，蒯大富是一个典型。

1966年6月1日，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出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全国上下兴起了造反运动。蒯大富到一些大学看大字报，不久便要求同驻清华大学的工作组负责人进行公开辩论。1966年6月由于率先提出“炮轰”压制文革的工作组，并要求夺权。工作组认为蒯大富是“假左派，真右派”，蒯大富被打成右派学生。后成为清华大学井冈山领袖，首都三司副司令，成为造反派的领头人。

像蒯大富这样的造反派给工作组提意见，本不是什么大事，却被工作组隔离审查，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解救，能不感激毛主席？能不为毛主席冲锋陷阵？蒯大富和他的井冈山兵团在后来的批判刘少奇、王光美的运动中充当了急先锋。

注意全国“第一个”和“第一”有不同的含义，“第一个”是首个，“第一”有最大的意思，能与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对抗，岂非最大的“造反派”？！

2. 王洪文

全国职位第一的造反派非王洪文莫属。王洪文，男，1935年12月生，吉林长春人。曾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靠“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因毛泽东的赏识，成为继林彪之后的第二个所谓“接班人”。

王洪文是一个“理想”的接班人，工、农、兵、干都作过，像这样的人能不听党的话？！能不痛恨“资本主义复辟”？！

王洪文的造反是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作的。其实王洪文是造反派中的温和派，这从他们不敢贸然夺权，一直等待中央改组上海市委，并且在1967年1月份两次《通告》允许陈丕显代表上海市委签

字引起张春桥不满等几件事可以看出。

王洪文有组织能力强的一面，上海是全国唯一没有军管单位的城市，当然与强大的工总司的工人队伍有关。

时任总后勤部长的邱会作（造反派的“死敌”，被总后造反派批斗时几乎被打死）对王洪文的评价很高：我曾认为王洪文是上海滩上的“瘪三”，是摆不上台面的人。1970年7月，毛主席知道我厌恶造反派，要我到上海学习一下。“那一次，王洪文当我在上海‘学习’的向导，热情接待，陪同参观。我看上海社会稳定、供应充足、群众对生活满意，比同期最好的北京还要强。我就想了，共产党安排一个省长、市长，要在经历多年战争考验的老干部中选优秀的，才能胜任。王洪文两三年就把上海搞成那个样子，难怪毛主席那么喜欢他、器重他。”⁶

王洪文之所以能成为全国职位最高的造反派，是因为他的工人阶级即领导阶级身份。王洪文之所以成为“四人帮”之一而下台，是因为他是文革的“象征”，他并没有犯什么“错误”，而是文革被否定，他就被否定，没有人会记得他在稳定上海时的功绩。

3. 徐景贤

全国理论水平最高的造反派非徐景贤莫属。徐景贤，1933年12月生，上海奉贤人，曾任上海市委书记，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任职至文革结束）。

徐景贤在上海滩的权势仅次于张春桥、姚文元，人称“徐老三”。此后张春桥和姚文元，还有后来居上的王洪文，都到了北京工作，徐景贤身为上海市委书记，实际上成了上海的头号人物。

夺权时，在各省热衷于成立什么“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革命造反委员会”等权力机构之时，上海的造反派正构思“公社”形式。像上海的造反派能演出“上海人民公社”的大剧，也绝不是偶然的。这至少反映了他们的理论素养、理想和思想。

⁶ 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第76页。

徐景贤比较详细地回顾了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过程。他在《十年一梦》中说：“时至一九六七一年底，上海联合夺权的步伐加快了，几个主要的组织在市委党校成立了夺权宣言的起草小组，执笔者们根据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提出要把巴黎公社的革命精神写进上海的夺权宣言，主张‘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公社委员由群众直接选举’‘公社委员是人民公仆，工资收入不得超过普通工人’等等。初稿起草出来以后，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徐景贤自己则认为“我们的‘一月革命’可以说是‘十月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因此，“夺权宣言的题目可以定名为《从‘十月革命’到‘一月革命’》，副题是《上海人民公社宣言》，这样既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又有恢弘雄伟的气魄。我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一致赞成，夺权宣言的草稿就这样草成并付印了”。由此可看出，上海造反派的理论性特点，这种特点正是有了像徐景贤这样的年青理论工作者所造成的。

4. 陈永贵

全国思想最左的造反派非陈永贵所属。陈永贵（1915年2月14日—1986年3月26日），中国山西昔阳大寨人，为农民及政治人物，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

陈永贵是经历最复杂阅历最多的造反派。抗战时期陈永贵曾任伪村长和日本间谍组织兴亚会的情报员。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陈永贵接替“主动让贤”的所在村原书记贾进才，出任中国共产党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的支部书记。在环境非常恶劣的大寨村，他带领农民艰苦创业，从山下用扁担挑土上山造田，对当地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1964年毛泽东乘火车南下视察了解到大寨战天斗地的精神，号召全国要“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相对而言，与上海几乎同时夺权的山西就要“土”得多。山西是一个不大的省，当时的人口约一千七百万人，省会太原市的人口也就是一百二十万人。山西省基本上是一个农业省，造反派无法离开他们的土地纲领。陈永贵在文革中提出了“农业

社会主义”的升级版，即：变“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为“公社为基础（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取消农民自留地，取消农村“自由市场”。也许是这种紧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路线”的作法，是陈永贵跃升至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因素之一。陈永贵的“公社”思想与上海的“公社”思想，有着质的区别。这种区别在于公社机构的民主性，即公社委员是否由选举产生。陈永贵的“公社”有很强的封建性，最终只能沦为封建“领地”和“庄园”。

事实上，陈永贵在文革中以“反大寨”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名义，批斗和残害了反对他的许多干部和群众。这和上海的稳定不可同日而语。

5. 李顺达

全国思想最右的造反派非李顺达莫属。李顺达（1915年—1983年），全国劳动模范，历任中共平顺县委书记、晋东南地委副书记、书记，山西省革委常委，并先后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九、十届代表大会的代表和第九、十届党中央委员等。

李顺达是一个一直跟党走的“乖宝宝”，与陈永贵的“灰色”历史相比，李顺达的历史是鲜红的。1948年，平顺县人民政府在他家的门楣上，为他悬挂了“劳动英雄”的牌匾。1952年李顺达被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爱国丰产“金星奖章”，成了全国著名的劳动英雄。

在文革中，李顺达成为群众和干部对抗大寨的旗帜。如山西省群众干部清徐县委副书记段立生，曾在《山西日报》发文，建议坚持“队为基础”、保留“自留地”，襄汾县委书记李辅则反对“割资本主义尾巴”，坚持活跃自由市场等，都是汇集在李顺达的旗帜下。在文革的思想动乱中，在群众中产生各种左和右的思想是必然的，不过表面上都必须打上“毛泽东思想”的印记。

六、各类干部的命运

革命或者动乱的结果往往与人们的原因大相

径庭，文革也是如此。当文革的“大乱”得到“大治”之时，原来的人物、原来的社会结构不可避免地出现在人们眼前，不知命运捉弄人，还是人捉弄命运。

1. 军干

全国军管后，尤其是 1971 年林彪事件后，大批地方干部得到“解放”，重新分配工作，军队干部逐渐退出地方政权，回归军队职位。值得一提的是林彪事件前当红的四野干部或多或少的受到林彪牵连，失去当权地位。

黑龙江汪家道，原黑龙江军区司令员。1971 年接替潘复生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1977 年卸任两职，78 年黑龙江省委召开大会对潘复生、汪家道在文革中的严重错误进行批判。汪家道闲出政坛。

山东杨得志，原济南军区司令员，1969 年接任王效禹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山东省革委主任。1974 年卸任地方职务（白如冰接任），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1979 年 1 月任昆明军区司令员。之后担任过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军委秘书长职务。

山西谢振华，原 69 军副军长（因军长董其武未到职，实为代理军长），1970 年接任刘担格平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74 年中央政治局开会批判谢振华。后离职学习由王谦接任，又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政委等职。

北京谢富治，原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67 年任北京市革委主任，71 年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1972 年去世，1980 年 10 月 16 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谢富治党籍并撤销谢富治《悼词》。

青海刘贤权，1977 年卸任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青海省革委主任。期间担任过铁道兵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1969—1975）。后任济南军区顾问，1981 年按大军区副职待遇离休。因为刘贤权在文革的表现，1988 年只获得二级红星勋章，按刘贤权的资历，应该获一级红星勋章。

青海赵永夫，1967 年青海“二二三”事件后入狱，获释后任北京军区装甲兵顾问，后以正军职干

部离休。

内蒙古腾海清，在内蒙期间腾海清的最大“功绩”是挖肃“内蒙古人民党”。1969 年底腾海清被另一股革命造反派批斗，中央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由，调回北京，其职由郑维山接任。令人不解的是，腾海清在文革结束后未收到处分或刑事指控，1975 年—1980 年任济南军区任副司令员。

江西程世清，原 26 军政委，文革到江西后因“与林副主席关系不错”，1971 年，被撤职隔离审查，后被开除党籍，1978 年 10 月被逮捕。1982 年 1 月获释。回福州市作离休处理。

甘肃冼恒汉，1977 年 6 月被免除在兰州军区和甘肃省的职务，1982 年 12 月退出现役，按地师级干部政治、医疗待遇，1985 年 6 月改按正军职待遇。

湖北曾思玉，武汉事件后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1973 年与杨得志对调，任济南军区司令员，脱离地方职务，1980 年任南京军区顾问。

湖北陈再道，武汉事件后被批判。1972 年后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央军委顾问，铁道兵司令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广东黄永胜，1968 年调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刘兴元（原广州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曾任四野 42 军政委）接任。1971 年 9 月，在“九一三事件”后被撤职。1973 年 8 月 20 日被开除党籍。1981 年 1 月 2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有期徒刑 18 年，剥夺其政治权利 5 年。

吉林王淮湘，1976 年“四人帮”被粉碎后，王淮湘极力阻碍揭批“四人帮”运动，并于 1976 年 12 月 1 日下令枪杀了长春第一光学仪器厂青年工人史云峰。1977 年 2 月，中共中央免除了王淮湘在吉林的一切职务，5 月王淮湘被调到武汉军区担任副政委，12 月王淮湘被隔离审查。后王淮湘被开除党籍。

江苏许世友，1973 年调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卸

去地方职务，彭冲接任。指挥过中越边境反击战。后任中顾委常委，副主任。

浙江南萍，在浙江任职期间，一直协调不好两派矛盾，林彪事件以后，1972年3月21日至4月26日，中共中央召开解决浙江问题会议，周恩来指出，南萍、熊应堂不向下传达“9.13”事件的通知，同陈励耘（空五军政委，在林彪事件后被捕）的思想在很长时间里有联系，会议认为南萍上了贼船，犯了严重错误，被免去职务，6月送北京审查交待问题。南萍是9届中央委员，从此未再露面。

湖南黎原，在湘时间很短，1970年，军长黎原率军调防他地，地方职务由华国锋接任。

安徽李德生，1969年，李德生被调到北京，参与政治局、国务院、军委的工作，1970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1971年又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1973年，他担任了中国共产党的党中央副主席。同年底，李德生被调到东北任沈阳军区司令员。

辽宁陈锡联，1973年12月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脱离地方工作。1975年1月—1980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中顾委常委。

四川张国华，1972年去世，刘兴元接任。

云南谭辅仁，1970年被军队人员刺杀，周兴接任。

福建韩先楚，1973年调任兰州军区司令员，脱离地方职务。后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广西韦国清，1973年脱离广西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1976年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77年脱离地方，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四至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四、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西藏曾雍雅，1970年调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脱离地方职务，任荣接任。后任沈阳军区顾问，全国政协委员。

新疆龙书金，在批林整风中接受组织审查，调离新疆，之后未安排工作。1983年按大军区副职待遇离休。

2. 革干

在一月革命风暴中崭露头角的五名革命干部，除张春桥外，其余已提早完成其历史使命在70年代下台。

刘格平，1970年被解除山西省革委会主任职务，分配到唐山陶瓷厂劳动。1983年党组织给出结论：没有任何政治历史问题。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92年去世。

王效禹，1971年3月30日，中央正式批准撤销王效禹的职务。4月14日，他被下放到辽宁盘锦农场监督劳动改造，文革后回到山东，1979年2月被开除党籍，1995年3月3日，在山东青州因病去世。

潘复生，1971年6月中共中央免除了潘复生职务，决定对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进行审查。1980年潘复生因病去世。1982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对中共黑龙江省委关于潘复生问题结论的请示回电答复中说，潘复生在文革时间，确实迫害了一些领导干部和群众，造成一些冤假错案，错误是严重的。但鉴于文革这一特定历史条件，同时考虑到潘复生参加革命较早，为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对所犯错误曾作过检查，现已病故，因此，同意黑龙江省委对潘复生同志的审查和不作组织处理的意见。

李再含，1971年5月被撤销职务。1975年8月14日在大连逝世。

张春桥、姚文元是一月革命中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革命干部，后来进入中央工作，成为“四人帮”之二。

还有一些在一月革命中没有表现机会的革命干部，如刘建勋、李雪峰，解学恭、李瑞山、马天水等。

刘建勋，太行区干部。1961年为纠正原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的错误，刘建勋从广西调至河南，为解决河南百姓的生活问题想了不少办法。文革中刘建勋虽然支持了造反派，文革后虽然没有被重用，1977年至1979年任河南政协主席。下场还

是不错的。

李雪峰，北方局、太行区干部。他在文革中充当了“救火队”的角色。1966年6月，先是替代彭真担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1967年1月到天津任职。1968年到1970年任河北省委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上，在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华北组出了问题，被划入陈伯达反党集团，隔离审查达八年之久。1985年被选为中顾委委员。

解学恭，晋绥干部。文革前任华北局书记。1967年1月，不知为何受重用担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12月任革委会主任。1978年6月被免除党内外职务。因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1987年3月被开除党籍。解学恭是文革时期任职最长的省级一把手。

李瑞山，不显山不显水的干部，实际上算不上什么革命干部。原在任湖南省委副书记处书记，1966年8月调任陕西省第二书记。1968年平稳坐上陕西省第一把交椅，至1979年调至北京，任农委副主任、经委副主任、经委顾问等职。

马天水，1967年2月至1971年1月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1月至1976年10月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1976年10月至1981年12月接受审查。因文革中犯有罪行，1981年12月被判刑，并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2年4月至1988年12月因病取保候审。1985年7月被开除党籍。1988年12月在上海去世。

另外，革命干部四川的刘结挺（原宜宾地委书记，造反后任四川革委会副主任）、张西挺（原宜宾市委书记，造反后任四川革委会副主任）夫妇也很出名，因为不是第一把手本文开始没把他们上榜。刘、张1970年8月停职接受审查，1971年8月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78年6月20日，刘结挺、张西挺被依法逮捕，1982年3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刘结挺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判处张西挺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刘、张均在1993年去世。

这些革命干部在文革中特别张扬，整了不少老干部，也得罪了不少老干部，所以没干几年早早被免职。比较起来刘格平下场最好，也许是他资格很老，整人相对较少，但后来“六十一个叛徒”重新上台，他的重新就职也很不容易。

3. 群干

相对于革命干部，群众干部的命运显然要糟得多。如果把群干分成造反派红卫兵（学生）、工农干、劳模三类的话，造反派红卫兵（学生）出局是最早的。

学生出局

1967年到69年间，由于工（军）宣队的进校，学生干部大多被发配，有许多人又回原校被清查“五一六”，多人文革后又被判刑，最典型的是北京学生的“五大领袖”。“五大领袖”有一位北京市革委副主任、四位常委，都属于副省级，但没有把他们当领导干部来看，市革委派出的工（军）宣队进校，他们居然毫不知情！他们的结局可想而知。

聂元梓（北大新北大），1969年11月，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不久的聂元梓被发配到江西省鲤鱼洲北大分校农场劳动。1983年3月，57岁的聂元梓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17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4年。

蒯大富（清华井冈山），1968年12月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冶金部三〇四厂）任技术员。1970年11月，蒯大富被以清查“五一六”名义被送到清华大学接受过审查。1983年3月10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和诬告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先被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后转移至青海共和县法塘格木监狱。

韩爱晶（北航红旗），1968年底被羁押，交待问题。1969年11月被分配到湖南株洲三三一厂工作。1971年3月8日至1975年9月9日，受隔离审查，此后被监督劳动。1983年3月16日，韩爱晶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力3年。

其先后在北京和外地关押，后来在唐格木农场被监管劳动。

谭厚兰（北师大井冈山），1968年10月，她作为大学生，被分配到北京军区4627部队农场劳动。1970年6月，谭厚兰被调回北师大隔离审查，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清算。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察分院做出了对谭厚兰免于起诉的决定。

王大宾（北地东方红），1968年被分配到成都探矿机械厂工作。1971年，王大宾因“5·16”问题被押回北京地质学院隔离审查，并被开除了党籍。1978年，他又以反革命罪被捕，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关押在武汉第一看守所。1983年获释出狱。

工农干出局

粉碎“四人帮”之后，一批被认为“四人帮”体系群众干部下台甚至被捕。

主要人物有上海的王秀珍、体委主任庄则栋、文化部长于会泳、副部长钱浩梁、刘庆棠等。这都是省部级干部。当然基层也有许多反“四人帮”的群众干部被“两个凡是派”一锅烩搞下了台。

王洪文，1976年粉碎“四人帮”被捕，198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其为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被告人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2年8月3日因肝病死于狱中。

王秀珍，曾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是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共第九、十届中央委员。1977年1月离职审查，1982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庄则栋，1961、63、65三届世乒赛男子单打冠军，“乒乓外交”的发起者，四届人大后任国家体委主任。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庄则栋被关入北京卫戍区审查了4年。后庄则栋被安排到山西乒乓球队等候审查结论。

于会泳，文革时期的风云人物，曾参加“样板戏”的音乐创作，得到江青的赏识，成为中共十届

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1976年10月被定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而隔离审查，在隔离审查期间服毒自尽。

钱浩梁，著名老生演员。文革中钱浩梁扮演李玉和后受到重用，曾任中国京剧院革委会领导成员，又任院党委副书记，1969年4月出席了党的“九大”。1975年四届人大之后，还当了三个月文化部副部长。“四人帮”被粉碎，钱浩梁被认作“爪牙”投入监狱接受审查，最后被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免于起诉”。1982年初才恢复自由。

刘庆棠，中国著名芭蕾舞演员。文革期间，刘庆棠任中央芭蕾舞剧团革委会中共核心小组副组长、中共中央芭蕾舞剧团党委书记、文化部副部长、中共十大主席团成员、第四届全国人大主席团成员。1976年10月后，刘庆棠被隔离审查，并被开除党籍。1983年，刘庆棠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劳模淡出

最典型的是陈永贵。他没有成为四人帮体系的人，纯粹是沾了劳模的光。但极左的毛病一直未改，1977年，重提全国向大队核算过渡的建议。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决议，接受陈永贵解除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82年未获选党的十一大代表。

李顺达，1977年受到“倒清查”，使其受到一连串不公正待遇，淡出人们的视线。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李顺达的所谓问题终于水落石出。1978年，他担任了山西省农委副主任、党组成员。1979年，他担任山西省第四届政协委员会副主席。1981年5月，中共山西省委正式作出了为李顺达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决定。1983年4月，他当选为山西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被选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吴桂贤，曾任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1977年9月申请辞去副总理职务，同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回到陕西省

咸阳市西北国棉一厂。1978 年任西北国棉一厂党委副书记，1981 年 6 月起任厂党委副书记、厂工会主席。1988 年任深圳外贸集团公司与港人合办的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三种人”出局

最后一轮出局的群干是“三种人”。从 1983 年 10 月到 1987 年 5 月，中共中央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整党。而清理“三种人”是此次整党的主要任务。所谓“三种人”是陈云提出的，即指：跟着林彪、“四人帮”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三种人”中有许多是反“四人帮”分子，但因“出身”不好，终被出局。

“三种人”在各省的省级干部大多是挂名省革委“副主任”“常委”之职，实际职务实为“县级”“副县级”，稍高一点的是“副厅级”。如四川省革委副主任蔡文彬，1963 年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现为电子科技大学）通讯专业学习，任校学生会主席，校“东方红”及“红成”负责人。1968 年 5 月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任共青团四川省委书记，成都邛崃县委书记。诸如此类的群干，都在“清理三种人”的攻势中败下阵来，使得许多人才毁于一旦，既不利于国家，也不利于个人，成为“双败”局面。应该说，文革后对“三种人”的批判是对一代人批判。这代人参与并推动了文化大革命，最后把文革推到了“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毛泽东语）的地步。

4. “走资派”

林彪事件后，尤其是 1973 年邓小平复出后，许多当年的走资派也逐渐复出。文革后，邓小平二次复出，胡耀邦主持平反工作，“六十一个叛徒”集团也得到平反，更多的走资派得到平反，走上工作岗位。走资派后来的命运也在“复辟”。当年各省一把手的命运如下。

欧阳钦，原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东北局第二书记，文革中遭残酷批斗和迫害，平反后全国政协副主席。

李范五，原黑龙江省委第二书记，文革中长期被关押。1983 年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谭启龙，原山东省委第一书记，1966 年至 1970 年文革中受迫害，被隔离审查，下放劳动。1970 年开始任福建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浙江省革委会主任，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青海省革委会主任、青海省政协主席，青海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二书记，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等职。离休后任中顾委委员。

陈丕显，原上海市委第一书记，1977 年恢复工作后，任云南省委书记、云南省革委会副主任，湖北省委第二书记、湖北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湖北省革委会主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湖北省军区第一政委、武汉军区政委。1983 年 5 月至 1985 年 7 月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1983 年 6 月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 后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贾启允，原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在“一月革命风暴”中受到迫害，被停止工作。1972 年恢复工作。1975 年后，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云南省军区政委、党委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1976 年，在云南省内造反派的压力下，选择了向造反派妥协，并在 1976 年 2 月份把邓小平与他的一些谈话暴露出来，客观上为批邓供了炮弹，“四人帮”一下台贾启允于 1977 年 2 月也受牵连下台，其在文革尾声的表现好比当时的外交部长乔冠华一样。贾启允在 1979 年 3 月任河北省石家庄地区行署专员，1983 年 4 月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贾启允在文革前后的表现，在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中很具有代表性，值得历史学家们研究。

卫恒，原山西省委第一书记，1967 年 1 月下旬在关押中去世。

王谦，原山西省委第二书记、省长。一月革命后王谦被关押，1970 年解放，任阳曲县委书记、省委书记处书记。1975 年在追随江青“批谢（振华）”立功，晋升省委第一书记。粉碎“四人帮”后，利

用揭批清“四人帮”机会，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迫害反“四人帮”的干部和群众。1980年停职一段时间后，调任重庆市委书记。

彭真，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是最早被打倒的“走资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宣布：文革中“强加给彭真同志的种种罪名和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均应予以推倒”。1983年6月在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王昭，原青海省省长。1967年“二月镇反”后被关押，1970年2月12日，饱受摧残的王昭被迫害致死在狱中，年仅53岁。1978年党中央为王昭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杨植霖，原青海省委第一书记。1967年2月杨植霖自觉革命，将红卫兵引入省委、省人委夺权，引起“二月镇反”的发生。但最终也没有能够救自己，文革前杨植霖写的《王若飞在狱中》一书，在文革中被批判为美化叛徒，受到牵连，被残酷迫害。平反后，1978年12月，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主管宣传文教工作。12月当选甘肃省政协主席。又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乌兰夫，原内蒙古党政军一把手。1966年华北局会议被批判下台。1972年5月2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为召开十大做准备。会前，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宣布解放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等13位老干部。1973年，中共十大上，乌兰夫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75年1月，当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3年6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万晓塘，原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在1966年6月的华北局会议上被批判，9月病逝。

方志纯，原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文革中遭受迫害。1975年后，他任江西省革委会副主任。1980年任江西省第四届政协主席、党组书记。1982年当选为党的十二大代表、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汪锋，原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文革期间，1966

年底至1977年受迫害，被关押。1977年7月开始，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二书记兼新疆军区党委第三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一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兼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四届政协主席，新疆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乌鲁木齐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987年4月增选为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十二大、十三大相继当选为中顾委委员。

文敏生，原河南省省长、省委第二书记，1966年9月任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文革期间，受残酷打击迫害。后任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市革委会主任。1979年1月平反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兼哈尔滨市委书记。1981年3月任邮电部党组书记、部长。后离休任中顾委委员。

林铁，原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华北局第三书记，行政五级。1966年6月华北局会议被批判，文革中受迫害。后任中央组织部顾问。第一、二届中顾委委员。

王任重，原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文革期间，王任重被打倒，身系冤狱近8年。1975年王任重释放被放，1978年恢复工作，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1979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和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主管农业。1980年又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1983年王任重被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8年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赵紫阳，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文革中遭迫害，被撤销一切领导职务。1971年起先后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并兼任广州军区政委。1975年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1980年4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同年9月任国务院总理。1987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推选为代理总书记。同年10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并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改革开放的发起和积极推动者，89年“六

四”后被免职。

赵林，原代理吉林省委第一书记，文革中受迫害。1979年1月后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务书记，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山东省第四届政协主席，山东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离休任中顾委委员。

江渭清，原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文革中受迫害。1974年底，江渭清重新被启用，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福州军区政委、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直至1982年。晚年江渭清返回南京定居，1987年被选为中顾委委员。

江华，原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文革开始后，江华受到关押、批斗。1973年8月24~28日，党的“十大”召开，江华再次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75年1月，江华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后为中顾委委员、常委。

王延春，原湖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被打成“叛徒”“走资派”，关押数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中共中央批准，湖南省委为他平反，恢复名誉。1979年当选为湖南省政协第一副主席。1984年3月19日在长沙病逝。

杨静仁，原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文革中，杨静仁同志受到严重迫害。1978年3月，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以后又兼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在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上，他当选为国政协副主席。1980年任国务院副总理。82年任中央统战部长兼民委主任。后为政协副主席。

李葆华，原安徽省委第一书记，1966年至1973年文革受迫害。1973年9月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二书记、贵州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央党校省干班党支部书记，贵州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1978年任中国银行行长、党组书记。

霍士廉，原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文革中，他受到诬陷，惨遭迫害，在周恩来总理关照下才幸免于难。1977年1月，霍士廉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军区第一政委。1979年2月，霍士廉任农业部部长、党组书记。1980年10月，霍士廉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离休后任中顾委委员。

黄火青，原辽宁省委第一书记，文革中受迫害。1975年9月至1977年12月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3月至1983年6月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检察委员会委员（1980年1月起）。后当选为中顾委委员、常委。

廖志高，原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文革中，廖志高于1967年初被“打倒”。1974年11月，中央任命廖志高为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福州军区政委。1980年8月，廖志高突发脑血栓塞导致半身瘫痪，难以再负担繁重的工作。1982年2月，中央调他到京任中组部顾问，后被选为中顾委委员。

叶飞，原福建省委第一书记，文革期间受到冲击，1975年恢复工作后，历任国家交通部部长，海军第一政治委员、司令员，第六、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周仁山，原西藏自治区代理第一书记，文革，在一夜之间被戴上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在西藏的代理人”的帽子，被关进监狱达8年之久。1978年周仁山恢复工作，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任区党委常务书记、第二书记，竭尽全力为保证新疆的安定团结和经济建设不懈努力。然终因身体不支，两年后调回北京，1981年以后，周仁山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第六届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顾问。

王恩茂，原新疆维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1966年文革开始后，王恩茂受到迫害。1975年，经毛泽东亲自过问，他被调到南京军区任副政委。1977年，王恩茂担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吉林省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沈阳军区副政委。1981年，党中央决定王恩茂重返新疆工作，担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和乌鲁木齐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1984年，王恩茂又兼任兵团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1985年10月，王恩茂担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顾问委员会主任。1986年3月，在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王恩茂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当走资派回归官位复辟，群干回归群众工作，

军干回归军队备战，革干、林彪“山头”军干归于湮灭的时候，文革的目标一项也没有达到，历史好像回到原先的地方。革命的原意是要社会结构和制度大跃进，但革命的动乱和暴力往往造成社会极大的分裂和破坏，实际上是一种倒退，就像跳跃之前要倒退助跑一样。正因为如此，再前进还是要回到原点。在这个意义上说，回归就是前进。

人还是那些人，但事情不同了，复辟不是真正的复辟。而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几代人，包括相当数量的老干部、军队干部认识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的危害性，所以启动、推动了改革开放，把原来不自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回归为自觉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❷

(上接 140 页)

而由于缺乏妥协精神，中东其他国家的民主状况并未获得根本性的改善，有的甚至变得更糟。“政治决定何人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法得到何物。”（美国政治学家 Lasswell 语。）政治通过非暴力的方式决定权力和资源的分配。无论一个人的目的多么崇高或者多么渺小，争夺有限的权力和资源的斗争都是政治行为。要做到在争夺有限的权力和资源的过程中不使用武力，只有通过妥协、合作、协商和争论来实现。

由于资源有限，每个人对权力和资源的愿望不可能全部实现。因此在争夺资源的斗争中会有输有赢。妥协和胜负难料是政治的两大特点。“善于妥

协需要智慧，而敢于妥协却需要勇气”（著名的文革研究者、清华“老五届”学友孙怒涛语）。文革中的群众缺乏这一智慧和勇气，激烈地派斗，残酷地武斗，最后同归于尽，受制于人。我们现在有了妥协的智慧与勇气了吗？！

未来民主运动的走向将会捉摸不定。中国是否也会出现类似突尼斯的突发事件，导致巨大的变革；如果出现类似的突发事件，民主运动的参与者能否接受文革群众运动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如果出现了类似的变革，中国将向哪个方向发展，世人将拭目以待。❸

投稿须知

本刊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观点。

作者需提供所在单位和通讯方式，并请以脚注方式在文章首页呈现。

本刊采用双向匿名的同行评审制度，来稿三个月内如未得到本刊之反馈，请自行处理。

本刊对来稿有删改权，不同意删改者，请声明。

本刊联系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为使论文符合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界通行的方法，对论文撰写特做以下规定：

1. 总体要求

资料可靠，论据充分，文字精练，文责自负。回忆性和评论性文章篇幅不超过 6,000 字，专稿、综述和研究性文章字数不超过 15,000 字。论文要求 WORD 文档格式，简体中文。

2. 文字

- 1) 字体：一律采用宋体。
- 2) 字号：论文名 14 号，署名、正文 12 号，脚注、注释、参考文献 10 号。
- 3) 加粗：论文名、标题（包括“注释”“参考文献”“摘要”“关键字”四个标题）。
- 4) 位置：论文名、作者名中间对齐，标题左对齐，正文每段开头空两个字符。
- 5) 脚注编号用带圆圈者，如：①、②、③。

3. 行段

- 1) 文行距 1.2。
- 2) 空行：论文名、作者名、标题隔空一行。

4. 论文组成

- 1) 论文格式包括：题目、作者姓名、内容提要、关键词、正文、注释、参考文献。
- 2) 内容提要与关键字：论文超过 4,000 字，必须有提要和关键词。其中，提要不超过 150 字，关键词不超过五个，关键词总字数不超过 25 字。
- 3) 脚注：单个脚注不得超过三行。超过者一律先在脚注中标明注释号，然后放入文末编号的注释。

- 4) 参考文献：详细的文献信息仅在文末的参考文献表内出现，正文中避免。不要求提供原始文件。

5. 标题

- 1) 论文需要分段，并注有标题，允许三层标题，用阿拉伯数字排序，数字后加“.”。
- 2) 第一层，如：“1.” “2.” “3.”。
- 3) 第二层显示第一层的顺序，如：“1.1.” “2.3.” “4.2.”。
- 4) 第三层显示第一、二层的顺序，如：“1.1.3.” “2.3.5.”。

6. 数字

- 1) 公历年、月、日用阿拉伯数字。如：1966 年 5 月 16 日。
- 2) 测量、计数量用阿拉伯数字，超过三位用分节号。如：5.4 千米，6,124 人。
- 3) 大约数量：有具体数字的用阿拉伯数。如：约 150 人，30,000 多人。无具体数字的用中文。如：数十辆车，几百万人。
- 4) 成语和俗语用中文，如一针见血，不管三七二十一。
- 5) 其他：十以内用中文，十以上用阿拉伯数字。如：比赛有五个项目，12 名选手。

7. 引语

- 1) 直接引语：较短的引语用双引号，直接放在句中。
- 2) 以单独段落呈现的引语，该引语仍用宋体，不得改为其他字体。段落整体向右缩进两个字符，不加双引号，并与前后正文各空一行。

8. 内文中的引证

- 1) 只列出作者名、出版年、页数（出版年与页数之间用冒号隔开，用“-”表示“至”）。如：（王年一 2005: 20），（乔晞华、张程 2015: 9），（胡杨、乔晞华、张程 2019: 139），超过三人用“等”，（韦陀等 2019: 123-124）。
- 2) 只列出版年、页数。如：王年一（2005: 21-23）谈到…，乔晞华、张程（2015: 1-3）认为…，王年一等（2005: 15）反驳说…。
- 3) 多位作者用顿号隔开。如：胡杨、乔晞华、张程。
- 4) 多篇文献用分号隔开，按年顺序。如：（王年一 2005: 乔晞华 2019）。
- 5) 引用网文须注明文章名、网址及最近登录时间。如：蒯大富。“人生权术三十六则。”<https://wenku.baidu.com/view/ca69dac6a1c7aa00b52acb25.html>。最近登录时间：2017 年 3 月 15 日。

9. 文末参考文献

- 1) 参考文献按第一作者姓的拼音排序。
- 2) 著作书写顺序：作者。出版年。书名。出版社驻地：出版社。如：
 - (1) 王年一。2005。《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 (2) 张程、乔晞华。2015。《多棱镜下：中国电影与时装、时尚》。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 3) 期刊书写顺序：作者。出版年。论文名（用双引号）。期刊名（用书名号），期刊卷数、期数（之间用冒号）与页数（之间用逗号）。如：关向光。2006。“文革再认识。”《展望与探索》，4：6期，第7-11页。
- 4) 编著书写顺序：作者。出版年。论文名（用双引号）。页数。编著名（用书名号）。编者。出版社驻地：出版社。如：徐友渔。2007。“文革研究之一瞥：历史、现状和方法”。第594-606页。《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宋永毅主编。香港：田园书屋。

10. 外文的使用

- 1) 如果参考文献是中译本，必须用中文。如果作者坚持引入外文，可以在脚注中引入。
- 2) 如果参考文献是外文，必须用外文。如果作者坚持引入中文，可以在脚注中注明。
- 3) 正文中尽量避免外文的出现，除非必要。如为了区别外文（如：Movement 和 Campaign，或 Game 和 Play 等）不同概念的意义。否则不建议使用外文。

【投稿与征订】

征订启事

《记忆》季刊是美国华忆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一份国际性的中文学术刊物，是原同名电子刊物的升级版和实体化，其刊号是 ISSN, 2687-9964 (实体版), 2687-9972 (电子版)。与原同名刊物不同的是，它关注的重点是中国近百年来的思想文化。

《记忆》季刊每年四期，每期 20 万字左右。设有专稿、研究、序跋、译文、综述、学人自述等栏目。专稿是本刊主编所约之稿，研究是作者投来的学术论文，序跋刊载近期问世的中文著作的前言、后记，译文是对西方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的翻译，综述是本刊组织的，介绍某一领域研究情况的文章。学人自述是学者对自己的求学经历，治学心得、师从、同道、方法、著述的绍介和总结。

一般来稿，一经刊发，本刊会给作者惠赠当期的电子刊。凡重点文章，本刊将给作者奉上实体刊。凡经双向匿名评审通过的综述性文章和学术论文，本刊除呈送作者实体刊之外，还将略付薄酬。

现将本刊的订价、邮资、付款方式等情况说明如下：

1. 价格

《记忆》季刊实体版每期（每册）：35 美元，邮费另计；年费（四期共四册）：140 美元，邮费另计。（订一年用户可获优惠：每期赠送电子版）。电子版每期：15 美元，年费（四期）：60 美元。

2. 邮资

计算方法：按一册计算。美境内：4 美元；加拿大：5 美元；美、加以外欧、亚地区：8 美元。全年四期邮费×4；如订两册邮费×2。订购者请自行计算邮费并与订书费同时支付本出版社。电子版无需邮费。

3. 付款

(1) 币种：美元；方式：支票。

支票抬头收款人写：Remembering Publishing

邮寄地址：

Attn: Dr. Joshua Zhang

Remembering Publishing

9600 S IH-35, C600

Austin, TX 78748, USA

寄支票时请附征订表（见下页），写明：订购者姓名/单位、收件邮政地址、电话，email。订购者如计划成为长期用户，请发 email 至上述地址告知本出版社经理：Dr. Joshua Zhang（乔晞华博士）。并

请同时发 email 告知本出版社对外联络部主任：Mr. Wang Fuxing（王复兴先生），email : wang.fhd@gmail.com。

(2) 网上支付

本出版社网址：<https://jiyi2008.com/>。进入网站后，进入购物车，填写相关信息。

本出版社确认款到帐后，将向订购单位或个人寄出由经理签名的公司发票（Invoice），并在八个工作日内寄出期刊；每个季度第二个月最后一日之前，保证寄出该季度期刊。如违反此约定，用户有权要求退款并终止订购。如因特殊原因，本社不能按时出版并寄出期刊，将提前正式通知。

《记忆》季刊征订单

订户信息

姓名/单位：_____

地址：_____

城市：_____ 州/省：_____ 邮编：_____

国家：_____

电话：_____ 电子邮箱：_____

单期（注明第几期） _____

一年四期 _____

收款单位： Remembering Publishing

收款地址： Attn: Dr. Joshua Zhang

Remembering Publishing

9600 S IH-35, C600

Austin, TX 78748

USA

